

地缘看世界

秦汉

温骏轩 / 著

第四册



地 缘 看 世 界

秦 汉

第 四 册

温
骏
轩
著

仅 供 学 习
禁 止 商 用



整理说明

本书整理自天涯社区论坛的帖子——地缘看世界，作者天涯 ID 为鄙视抢沙发的（笔名为温骏轩）。其中微信公众号：地缘看世界，亦有更新和连载，也可关注。在帖子十年连载的过程中，创作出的文字内容比较多，涉及中国历史和全球各地的解读较广，为方便查找和阅读，对其进行了分类和整理成册。当然，这些划分和整理只是基于个人的理解。由于涉及到版权问题，整理出的系列电子书可以用于个人打印，收藏，但不可用于以营利为目的的商业行为。

书中的插图（以地图为主）基本沿用帖子的原图。因很多文字内容需要对照地图才能更容易理解，但又不想经常性地翻页查看地图，所以在很多需要用图的地方都配有地图，但也因此会出现部分的重复地图，好在对于电子书来说，因此增加的这点页数并无大碍。另外，有的地图理论上来说，插入文中时就应该保持完整的一张，即保持原图的完整性。只是由于页面有限，这样的话显示会比较小，地图看着不是很清晰，所以有时会只截取其中的部分插入页面，显示效果更好。相比于美观，我想还是把实用排在第一位。

除了沿用作者所作的地图以外，还另外补充了一部分插图，其中包括地图和实景图片。补充的地图来源于网络和个人制作。由于文字内容涉及范围广，原帖地图不可能面面俱到，所以新增图还是很有必要的。对于个人制作的地图，因水平和制图能力有限，仅作为参考，如有发现错误的地方，也可指出修改，以免误人子弟，那就不是希望看到的了。至于哪些是原图，哪些是新增补充的地图，应该不难看出，况且帖子原图也已集中整理出来，大多数人应都存有，对每张原图大体比较熟悉了。

实景图片部分，则基本来源于网络。对于一个地缘板块的了解，只有地图和文字还是不够的，如果能够身临其境，会有更好的体验。如果一时不能做到，通过图片也能一定程度有直观的感受。有时候，对一些事物的描述，文字方面比较苍白，“一图胜千言”，一张精确直观的图片，所能传达出来的信息会更有效。当然，前者也同样是不可或缺的，没有文字作为铺垫，对图的理解同样会有局限性，二者相辅相成。

对于来源于网络的地图、图片，其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对原图作者深表敬意和感谢。如有版权异议及其他任何问题敬请及时告知，会立即删除或做其他妥善处理。本书整理仅用于学习，不会用于商业途径。对于地图方面，只是自学之用，并未经过权威机构的核勘审查，所以地图没有等同于正规出版物的法律效力，切忌上纲上线。如存在任何问题，也可指出进行修改或者删除，以减少因扩散而造成的不利影响。

关于划分章节方面，所要考虑的因素比较多，比如内容、字数、版面等。基本上，每一章节都是一个独立的主题，但如果字数太多的话，章节也会作调整，以使阅读体验上能

够更佳。通过这些划分的章节，层层推进，更容易理解文章内容的思路和传达的信息。章节标题基本都是自取的，作为文字内容的提示。因标题比较多，所以不敢保证所取的都比较精确，可以作为参考之用。

在整理过程中，也得到了一些朋友的帮助和支持，尤其是文字校对方面，对此表示感谢。因个人水平和精力有限，整理过程中不可避免会存在些问题和错漏之处，如有发现也可指出，以进行修改，使能够得到完善。最后，在此对沙发一直以来的付出和分享表示感谢！

清风

前言

【贴子写作总结】

开始以地缘的角度解析国际关系，最初只是来源于一时的灵感，觉得中印两国的地缘结构颇有些相似的味道，于是便有了《印度与中国的地缘情况对比》的主帖。只是写到后来，很多朋友认为这是一个不错的切入点，于是便越写越多了。也许以后还要将视线从中国的周边扩散到其他地区，因此便请版主将名字改为了《地缘看世界》。没有两个国家的情况是完全一样的，因此主帖中将中印两国做这样一个类比，也成为争议最多的话题。我承认一开始并非出于技术的角度开这个帖，只是作为一个有趣的话题罢了。不过后面的内容的确是经过一番探究的。

我并不认为大家需要全盘接受我的观点，这里只是提供一个方法，或者说一个思路。大家尽可以在这当中选择自己所需要的信息。其实用地缘的方法解析国际关系，很多高手都在做。我只不过是做些基础的分析，为部分需要的朋友答疑。就好像大家都知道 $1+1$ 等于 2 ，但也许有人会更感兴趣为什么结果不会是 3 一样。就“地缘看世界”这个话题而言，实际上还是从中国的视角来观察世界，或者说是主要探究与中国相关的地缘话题，包括中国在这个星球上的地缘定位、中国周边地区的地缘结构，以及它们与中国之间的地缘关系。这部分目前已经整理成书稿，如果幸运的话，当会有机会出现在书店的某一个角落。

在写完这部分之后，按照“地缘看世界”这个命题，应该会将视线投向其他地区，比如欧洲、美国，以从地缘的角度更为全面地了解外面的世界。不过混迹于国观也有些年头了，深感大部分朋友都对国家兴亡抱有极大的兴趣，但有些时候也显得激情有余，理性不足。对于激情，我向来是持肯定态度的，否则一个国家将会了无生气。不过在激情的背后多了解些基础知识，想来不是件坏事。而在将视线投向更为波澜壮阔的国际舞台之前，我觉得有必要了解一下中国本身的地缘结构。西方有句谚语叫“罗马城不是一天建成的”，中国也不是自古就形成现在的地缘结构的。

之前的部分，我们可以将之总结为第一部分，并暂命名为《中国崛起之地缘路线图》；而第二部分则以解读中国现有的地缘结构为方向。以地缘为角度，历史为脉络，沿着先人的足迹，渐进式地解读中国形成的过程。如果要为这部分取个名字，可以叫作《中央之国的形成》。以史为鉴，一则可以让我们更深刻地了解自己的国家；二则可以从历史的兴衰探究出国际政治的规律，以利于我们更清楚地睁眼看世界。当然，对于喜欢历史的朋友，也许这部分可以成为你读史的助手，里面的内容或许能够帮助你解开心里埋藏已久的疑惑。

帖子不会写得太快，因为按照我个人的习惯，还是要以图明事，在线做些地图以使大家更直观地了解内容，但会尽量保证每天更新。对于这些地图，如果觉得还有些参考价值的话，尽可以拿去使用。由于由于是在线写和做图，难免会出现失误甚至硬伤，如果有看

出的朋友，也请指出，在此先行谢过。另外对于史料的采信，尽量会采用已有定论的史实，不过“周”以前的历史以及地缘格局，更多的只能是一种推论，大家姑且当成一种参考。其实整个帖子的内容，都只是一家之言，希望大家不要抱着听课的态度来看，我亦担不起这个责任。大家并不一定要将每个部分都看完，尽可以在目录中寻找自己感兴趣的话题，并参与讨论，也可以短信交流。

关于之前的内容，以及新近发生的一些国际事件，与地缘相关的也会间或做一些解读，内容则会偏重于基础分析。至于预测和判断，在看过这些基础分析后，相信大家会有自己的看法。其实写些时评或慷慨激昂的文字，更新速度会快些，也会让很多朋友觉得更加过瘾。不过论坛上已经有很多方家在做这类事了，多我一个不多，少我一个不少，还是做些基础的事情更有意义些吧。

从自己的角度来看，一开始写只是为了分享一点心得，一个角度。写的多了倒也可以集结成章，期间亦有不少编辑联系过，希望可以出版。不过经过一年多的操作，终因国际部分牵扯到的敏感话题过多，而告夭折。所以对很多希望能看到纸质书的朋友说声抱歉，特别是曾经答应过赠书的朋友。

按照计划，目前已经结束了《中央之国的形成》中先秦部分的章节，并且在抽时间整理、修改。至于出版的事，不会很急，毕竟这是关于中国的事情，需要抱着一份感恩、敬畏的心情来做，在考虑商业性的同时，不能在细节方面出现硬伤。如果有编辑能够抱着同样的心情来看待这件事情，可以来共同完成这个心愿。对于希望看到地球其他角落的朋友，也不用急，待现在写的“秦汉第一帝国”部分完结了，会对欧洲的地缘结构、传承做详尽解读。写完之后，三国迷期待的三国故事就会展开了。时事的背景解读，依然会穿插期间。但不会每件事情都往地缘上面靠，除非这件事情的确有地缘博弈的成份在里面。

【时政解读的分析】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不多写些时政，这个世界上每天都在发生着各种各样的新闻，可写的素材丰富，感兴趣的人也多。其实这主要还是一个出发点的问题了，毕竟这个帖子只是从地缘的角度谈些基础的、战略性的东西。而无论是地缘还是战略，都是一个稳定的概念，并不会随时变换的。如果有些时事有着强烈的地缘背景，也是会随时插播解读的。只不过可能只是一段话，一张图，看上去不如很多方家的时政帖内容丰富罢了。

当然，观察各种层面的时政要闻，并不一定都要从地缘视角来解读。也有朋友希望我从综合的角度，来周期性地解读时政。首先感谢这些朋友的信任，不过就我个人的想法来说，还是不愿意这样去做，即使能够吸引更多的眼球和点击率。这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不愿陷入为了解读而解读的怪圈之中去。我曾经在回答一位长期跟帖的朋友问题时写到过：我之所以不愿意写时评，是因为现在的时评路子大多已经模式化了。先是按照冷战思维，一厢情愿地把世界划成中、美两极。无论什么事情，包括一些纯粹的突发事件和刑事案件，

都能和所谓的中美博弈拉上关系。演变下去，就是“美国阴谋无处不在，中国高层深谋远虑”（地球上所有的事情，都是“大棋局”的一部分）。当然，这种模式的产生，主要是基于国内主流论坛的舆论环境。如果在导向相左的网络环境中，也可以用同样的方法解读出“中国威胁无不在，美式民主力挽狂澜”的结论来。

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国家制定各项政策，做各种事情，首先都是基于自身利益、安全考虑的，而参与度也是与利益、安全关联度成正比的。大部分时候，大多数国家在具体事务的处理上，只能是见招拆招，根据时事的变化，以务实的态度调整自己的政策，并非是每一件事情都那么深谋远虑，决胜于庙堂之上。所以如果以吸引眼球为目的，周期性地写时政的话，在思路很容易演变成“过度解读、上纲上线”；在方法上，则模式化为将石油、金融、宗教、党派、共济会、二分法的集团划分（中美）等等时评必备要素，用万试万灵的“阴谋论”将之串连起来的时政分析法，就不可避免地大行其道了。正因为如此，我个人还是倾向于做一些基础的分析。如果大家觉得这些分析有“渔”的成分在里面，那就是对我最大的褒奖了。

上述对时政解读的态度，除掉不愿意陷入为了解读而解读的“逻辑怪圈”之外，技术上对这个时代有自己的看法，也是重要原因。基于国际关系当中博弈是永恒的主题，因此很多讨论，包括这个帖子的提问中，基于冷战思维将世界简单地划分为中、美两大阵营，并凡事都和两国的战略意图拉上关系的情况比比皆是。这其实是一个很偷懒的办法，因为就博弈的复杂程度来说，多角博弈的情况总是比两方对决要复杂得多。简单的两分法，更容易让大家找准辩论的焦点。只不过在现实的情况下，切割世界的铁幕早在 1990 年就被撕裂。新时代的政治博弈，也已经不是冷战中那种两极对抗明显的模式了。如果让我为这个时代贴上一个标签的话，那么现在我们所面对的时代，是一个“暗战时代”。

一个时代总是有不同于前代的诸多特点的，就像冷战时代的最大特点，就是美、苏两大阵营用军备竞赛这种战略博弈手段，来代替了那种动辄诉诸战争的大国博弈模式。能够实现这个“进步”，核武器这种毁灭性的战争武器的诞生，可以说是功不可没。从军事博弈的角度来看，核武器的作用在于极大压缩了对手的战略纵深，让大国们可以在一次攻击中就丧失战争能力，甚至生存能力的风险下，考虑国与国之间的相处之道。毕竟在双方都拥有核打击能力的情况下，同归于尽的风险，是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愿意承担的。这看起来是一个悖论，一个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武器，居然成为了世界和平的保卫者。但实际情况就是这样，前提是你不能让所有人都拥有这项可怕的武器。

回到我们的“暗战时代”。每个时代都会有不同于前代的鲜明特点，那么我们现在就来看看这个已经开启了 30 年的暗战时代，和之前的冷战时代有什么不同：

一：多极博弈取代了两极博弈模式。单从大国博弈的角度来看，冷战或者二战当中，那种非敌即友的划分阵营的方式，已经不是这个时代的特点了。尽管美国的一超地位仍然

存在，但在地缘潜力上，中国、俄国、欧盟，甚至印度，都已经作为地缘政治舞台上的主角，出现在核心政治圈中了。也许有人会觉得，在美、欧战略联盟依旧存在的情况下（实际上也已经分化明显），中、俄在战略上也在背靠背。这似乎又在表明，世界又重回两极对抗的模式了（印度在中间游走）。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诸大国、板块之间并没有拉起新的铁幕。基于务实的态度，现在无论大、小国家都不会认为在某一层面的对手，就不能在另一层面进行合作。

二：经济取代军事，成为硬实力较量的主要指标。基于核武悖论的存在，大国们终于明白了，在你不可能毁灭世界的前提下，盲目地进行军备竞赛是多么的可笑。这并不是说拥有军事上的战略威慑力就没有必要，但这一切必须和自己的经济实力成正比。

三：合作取代对抗，成为国际交往的主流。如果说在冷战及之前的一、二战时期，国家之间的相互合作、结盟，最终目的是为了在对抗中彻底击垮对方的话，那么现在的国家竞争，则是为了在合作当中取得更大的支配权。这种变化的产生，在技术上得益于经济全球化所造成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并最终成就了现在这种“暗战时代”。就大国关系的处理上来说，这个时代所表现出来的特点就是：你能够在台面上听到的，总是关于“合作”的声音；即使是台下的博弈不可避免，表面和平的维护也是必要的。如果形势发展到有一天，大国们开始撕破脸，公开指责某一方是世界和平的破坏者，那么新的时代也就到来了。

【地缘研究的要素】

很多初看帖子的朋友，会回帖表示这个帖子所表达的是“地理决定论”，或者认为这是一个普及地理知识的帖子。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地理也好，环境也罢，都只是“地缘”这个概念中的一个要素罢了。“人”才是地缘这个概念中，最为重要的要素。也就是说，当我们用地缘视角去审视一件事情时，不光要去考虑物理环境，更要考虑“人”在其中的作用。而地缘研究的终极目的，也是希望“人”在了解地缘规律的情况下，作出更事半功倍的决策。

与一般的历史、政治研究习惯着眼的精英人物有所不同，地缘视角下的“人”指的是群体性的人。当我们把视角放大到用各种属性划分的人类群体身上时，那些在漫长的历史变迁中，由于生存环境和相互博弈所衍生出来的各种属性，比如种族的划分，民族的认知；宗教、语言、文字等文化特征，就成为了“地缘”的一部分，并成为地缘研究所需要考虑的因素。在实际操作中，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也会研究、解读这些地缘要素产生的环境背景，但在大多数时候，这些要素会直接运用到地缘研究中去。

要想甄别哪些反映在群体身上的特性能归入地缘的概念中，有个很简单标准，那就是它有没有经受住时间的考验。按照这个标准，根植于绝大部分中国人心目中的，基于农耕文化所产生的对“家”的眷恋感，就是研究中国地缘时所必须考虑的要素；而那些阶段

性流行的所谓“日风韩流”，就不在考虑的范畴中了。

明确了地缘研究需要考虑的要素之后，我们就可以将地缘视角运用于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诸多领域了。由于这些要素都是相对恒量，所以解读出来的观点也就不可避免地偏向战略层面了。比如我们可以从地缘的视角来分析出，中国有哪些城市具备成为区域中心，或者“国际金融中心”的潜质，有可能直接辐射哪些区域，但具体要达到上述目标，就不是光做地缘研究能够做到的了。

温骏轩

2011 年

地缘认知的三个层面

看了下日子，这篇文章发表之时，正好应是《地缘看世界》一贴开写的九周年纪念日，《谁在世界中心》一书出版也有了一年了。九年当中，一个比较明显的变化是：在时政研究中，“地缘”一词似乎有变成一个热词的倾向。值得庆幸的是，这本书的合作者是我见过最严谨和最用心的出版方，并没有去选择一个泛娱乐化的书名。“谁在世界中心”这个书名，还是很好的体现了那本书在地缘政治层面的主要观点。

只不过，就像我一直在说的：“地理”不等于“地缘”，“地缘”亦不等于“地缘政治”。最起码我希望在写了那么多年后，一些基本认知能够得到厘清。以“地缘看世界”和“谁在世界中心”两个名称的选用来说，四年前策划书籍出版时，最起码出版方对于“地缘”一词的使用是很没有信心的。如果放在今天出版，也许“地缘看世界”本身，就有机会成为一个系列了。

我在行文中常常会提到一片土地的属性，并将之称为“地缘属性”。地缘属性并非一成不变的，它会随着物理环境、人文 / 政治环境的变化而变化。在这些变化中，政治环境的变化又是最容易被关注到的。一片土地到底属于哪个国家，又可能会属于哪个国家，通常是地缘政治爱好者所最热衷于推演的方向。我们可以将之认定为是“第一层面”的地缘认知。从这个角度说，过往大多数“地缘政治”研究，以及9年前所写的“新世界岛论”（并成为《谁在世界中心》书名的来源），都算是在满足这种“第一层面”的需求。

在国家和领土问题还普遍存在的今天，将“地缘”研究用来满足当下的政治需求，并非没有价值。问题只在于，这种大开大合的浅层次推演，虽不是地缘研究的全部，但却又是最有市场的。而当大家不再满足于土地归属层面的推演后，宗教、种族、民族等人文层面的变化，以及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将成为下一个被关注点。这种地缘认知，我们可以认为已经升级到“第二层面”。

比如西班牙人对美洲的殖民，就极大的改变了这片土地的“地缘属性”。因此关注这片土地上的民族、宗教等属性变化，比单纯的关注南美各国的国境线变化，要更加有意义。建立这种认知之后，更可以将关注点由现实政治博弈，上升到关注人类命运的层面。在中国试图推广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观的当代，这一层面的地缘认知更显得有现实意义。

不幸的是，当地缘研究推进到这第二层面后，并不能保证就一定会做出正确的决定，尤其是这种决定是由政治家作出的。比如在亚洲中部干旱地带，由于对河流上游水资源的掠夺式开发，所导致的下游生态恶化；另一更为难以把握的后果，则是将“第二层面”地缘认知，直接用来为“第一层面”地缘认识服务。在这方面，纳粹德国基于对地缘政治研究的这种片面理解，所引发的在种族、领土扩张等方面的极端做法，是最恶劣的案例之一。这场发生在70多年前的悲剧，甚至使得地缘政治学在很长一段时间，被视为邪恶政治家的“理论工具”，以至于几乎从学术领域消失。

也许“地缘政治”这个概念在今后的历史中，还是会阶段性的背负污名。然而最起码就我个人一直以来的认定来说，“地缘”视角的本质，是在探索“人与环境”如何相处。它可以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大方向的选择上做出相对正确的抉择。就像我一直认定，中国国家地理是我最合适的合作者（反过来也同样是），时间最终也证明了这点一样。至于政治，只是它服务的一个方向，甚至不是最重要的方向。毕竟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政治只是茶余饭后的八卦话题。

这种将“地缘”视角运用在普通人，特别是自己人生抉择上的认知，就是我所认定的“第三层面”的地缘认知。即使你暂时还没有意识到这个视角能够对自己的工作、生活有何帮助，也没关系。我会尽力将那些大家平时未曾关注到的地缘因素，通过一篇篇解读展现在大家面前。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些文字中，找到自己认知这个世界的方法（不一定要跟我一样）。在这样的地缘认知下我们终将会发现，人类在这个世界上的所做所为，其实都可以归结为一句话——“改变你可以改变的，适应你不能改变的”。

温骏轩

2018年7月

目 录

第一章 秦帝国在天下设立三十六郡	1
第一节 秦国本部和河东的郡级政区	1
第二节 楚赵两国故地的郡级政区	4
第三节 燕齐两国故地的郡级政区	5
第四节 泗水两侧与中原西部的郡级政区	7
第五节 淮河以南地区的郡级政区	10
第二章 秦帝国建立直道连接河套平原	12
第一节 秦帝国对边缘地区的扩张计划	12
第二节 秦军沿陕北高原北上收复河套	14
第三节 秦帝国为支援河套建立直道	17
第四节 秦直道在关中北部的走向	20
第五节 秦直道的沿线补给与起点位置	23
第六节 西套平原在秦朝时未受关注	25
第三章 秦人对瓯越和闽越的管理方式	28
第一节 东瓯国和闽越的地理位置	28
第二节 福建河流与沿海平原的分布	30
第三节 闽南和闽西的地缘特征	32
第四章 秦帝国征南越选择的路线	36
第一节 珠江的广义概念及其水系	36
第二节 广西盆地的地理结构	38
第三节 秦人没有从云贵高原征南越	40
第四节 秦人没有从海路征南越	43
第五节 由湘江流域入南越的路线	45
第六节 由赣江流域入南越的路线	47
第五章 秦帝国征南越时修筑灵渠	50
第一节 秦人为运送补给而修筑灵渠	50
第二节 赣粤运河修建的选址处	54

第三节 灵渠在后世作用有限的原因	57
第四节 粤赣运河修建面临的问题	59
第六章 秦人在南越设郡与广西的出海口	62
第一节 秦人没有进入红河三角洲的原因	62
第二节 秦帝国没能实际控制象郡	64
第三节 秦人将布山设为桂林郡郡治	65
第四节 象郡郡治设在临尘的原因	68
第五节 桂滇两省与红河平原的地缘关系	70
第六节 广西规划平陆运河打通出海口	74
第七节 广西未来发展的战略方向	77
第七章 广东珠三角城市的发展特点	79
第一节 广州成为地缘中心的影响因素	79
第二节 香港与澳门发展差异的背景	82
第三节 香港和澳门对外影响力的差异	85
第四节 珠三角城市圈未来整合的方向	88
第五节 珠海和澳门提振经济的方案	92
第八章 潮汕与海陆丰地区的地缘特征	96
第一节 秦帝国重视经营潮汕地区	96
第二节 海陆丰地区的地缘文化	98
第九章 客家先民在江西的迁移方向	101
第一节 客家的核心区域及其形成背景	101
第二节 赣南成为客家先民南下的首站	103
第十章 客家先民在福建的迁移方向	107
第一节 客家先民经石壁盆地迁入福建	107
第二节 蒙古征服华夏促客家民系形成	110
第三节 客家先民渗透至闽江流域	112
第四节 客家先民渗透至汀江流域	114
第十一章 客家先民在广东的迁移方向	117
第一节 客家先民由汀江转入广东梅江	117
第二节 蒙古征服华夏对客家入粤的影响	118

第三节 客家先民进入东江流域和迁移海外	120
第四节 清末客家人和土著居民的土地之争	122
第五节 客家民系获得的海洋突破口	124
第十二章 粤西南地区的地缘特征	128
第一节 粤西南板块的内部结构	128
第二节 粤西南的区划和族群文化	130
第十三章 陈胜发动起义拉开反秦的序幕	133
第一节 陈胜发动大泽乡起义的背景	133
第二节 陈胜为起事所做的准备工作	134
第三节 张楚的建立与诸侯国的复立	138
第四节 起义军攻入关中后被秦人击败	140
第五节 陈胜兵败撤退被其车夫所杀	143
第十四章 项梁率江东子弟北上抗秦	145
第一节 项梁沿泗水而上攻略城池	145
第二节 项梁退入薛邑并拥立楚怀王	149
第三节 秦军攻下临济后进攻东阿	152
第四节 项梁在定陶之战兵败身亡	155
第十五章 项羽率楚军与秦军展开巨鹿之战	159
第一节 王离和章邯进攻赵国并围攻巨鹿	159
第二节 诸侯国派军增援巨鹿城	162
第三节 项羽在巨鹿之战歼灭王离军队	164
第四节 章邯没有支援王离的原因	167
第五节 章邯率秦军向项羽投降	168
第十六章 刘邦领兵西征并攻入咸阳城	172
第一节 刘邦向北进攻秦军据守的城邑	172
第二节 刘邦西征中攻下陈留邑	174
第三节 刘邦帮助韩国复国和进入洛阳盆地	175
第四节 刘邦阻止司马卬进入洛阳盆地	178
第五节 刘邦攻取南阳盆地城邑	179
第六节 刘邦沿武关道攻入咸阳城	181

第十七章 项羽入关中并分封十八诸侯	184
第一节 项羽坑杀秦军降卒与放过刘邦	184
第二节 项羽实行封建制并分割秦地	186
第三节 项羽在六国故地分封诸侯王	188
第四节 项羽与刘邦控制的地缘板块	190
第五节 项羽尊楚怀王为义帝并放置郴地	192
第六节 项羽所分封的诸侯出现内乱	194
第十八章 刘邦出汉中收服诸侯后东征	198
第一节 刘邦率军从陈仓道攻入关中	198
第二节 项羽和刘邦政治远见的差距	201
第三节 刘邦派出的先锋军被楚军所阻	203
第四节 刘邦出洛阳攻取韩地和河东	205
第五节 刘邦攻取河内后从洛阳进军彭城	207
第六节 刘邦败退彭城时说服黥布反楚	209
第十九章 刘邦和项羽在荥阳的拉锯战	213
第一节 楚军和汉军相持于荥阳一线	213
第二节 刘邦与项羽和解失败	216
第二十章 韩信北上攻灭西魏和赵国	218
第一节 韩信从夏阳渡河攻灭西魏	218
第二节 韩信在阬与歼灭代国军队	220
第三节 韩信出井陉攻灭赵国	222
第四节 燕齐两国面对韩信兵威的选择	224
第二十一章 韩信率军南下攻灭齐国	226
第一节 汉军能够在荥阳坚持的原因	226
第二节 韩信决定攻打齐国的私心考虑	228
第三节 韩信击败齐楚联军后拿下齐国	230
第四节 项羽说服韩信自立的计划失败	232
第二十二章 楚汉进行固陵之战和垓下之战	234
第一节 刘邦毁约后与楚军发生固陵之战	234
第二节 刘邦对韩信和彭越裂土封王	236

第三节 汉军南下攻楚并策反淮南楚将	238
第四节 汉军在垓下之战击垮楚军	241
第五节 项羽南逃失败后自刎于乌江	243
第二十三章 汉帝国解决异姓与同姓诸侯问题	247
第一节 刘邦在郡县制与分封制上的选择	247
第二节 刘邦剪除帝国异姓诸侯王	249
第三节 刘邦用刘氏诸侯替换异姓诸侯	251
第四节 文帝和景帝解决同姓诸侯的政策	253
第五节 汉武帝以推恩令解决封国问题	255
第六节 吴氏长沙国得以保留的原因	257
第二十四章 汉帝国征服南越国和闽越国	261
第一节 汉帝国征服百越之地的背景	261
第二节 汉初南越国能存留的原因	263
第三节 南越国成为内诸侯的计划失败	265
第四节 汉军兵分五路出征南越国	266
第五节 瓯越国和南海国较早消失的原因	271
第六节 汉帝国以四路大军攻灭闽越	274

第一章 秦帝国在天下设立三十六郡

第一节 秦国本部和河东的郡级政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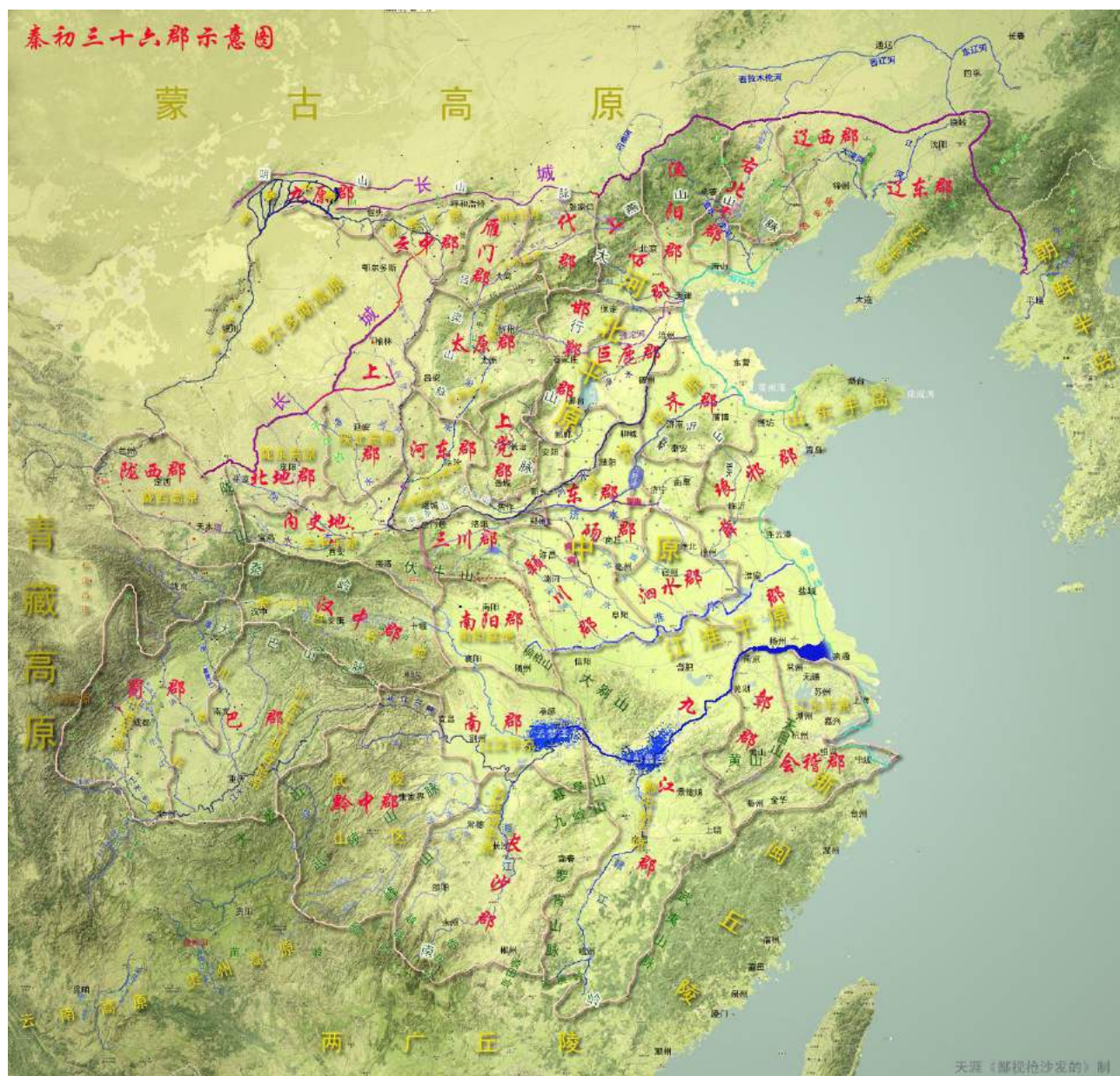
终于结束了战国时代，我想此时此刻的心情应该和当年的秦人类似。在结束一个旧时代的同时，应该开始准备迎接一个新时代了。所谓“打江山易，坐江山难”，其实在真实的世界里，二者都挺难的。特别是在先秦这种地缘结构复杂，并相对稳定的情况下，能够从数以百计的诸侯中脱颖而出，并最终一统天下。自秦以后，再也没有相似难度的案例了。

至于说坐江山的难度，秦人也并非没有考虑到。为了迎接大一统的帝国时代，应该说秦国做了很多准备工作。比如书同文、车同轨之类的标准；又比如一方面将战国诸侯们为了防御彼此而修筑的长城拆毁；另一方面则将秦、赵、燕三国修筑于农牧分割线上的长城连成一线，以为成型的中央之国核心区抵御游牧民族的入侵。在这些准备工作当中，有一点倒是与我们的主题息息相关，就是站在全局的高度，依照各自板块的属性，为“天下”重新划分政区。

之所以要做这件事，并不仅仅是因为在秦帝国整个帝国范围内，用中央集权的“郡县”制来取代周王朝所确立的“分封制”的需要（要仅仅是这个原因的话，完全照搬诸侯们的行政旧制，委派官员就行了；而要是沿用分封制，只需将秦国的贵族派到各诸侯国，替换掉旧有的王室就可以了，当年的周人就是这样做的），更是因为之前诸侯们经过长期博弈所形成的地缘关系。虽然原先的这些行政区也遵循了地缘规律，但首先由于政治分割的原因，每一个诸侯国都有自己的地缘中心，而行政设置亦是围绕自己政治中心而设立的。现在秦国需要以关中平原为中心，重新考量各地缘板块的建制了。其次，有些地区本属于同一个地缘板块，但由于处于地缘博弈区，所以建制分割的情况突出。典型的例子就是“上党”高地，如果从地缘的角度看，它应该归属于一个郡一级的行政单位，但在战国时期，三晋都曾经在自己占据的那块地盘上，成立过属于自己的“上党郡”。

依据标准的说法，秦国在翦灭六国之初共设立了三十六个郡级行政区。从体量和密度来说，大致与现在中国的省级行政区处于同一数量级。既然天下是秦人统一的，我们解读秦国郡县的划分，自然就要从秦国的本部开始了。关于秦人和秦国的由来，在以往的解读过程中应该已经很清楚了。整个渭河流域可以说就是秦国能够有机会竞争春秋霸主，并在战国中位列七雄之列的本钱。这其中包括秦人兴起的渭水上游，陇山以西的“陇西高原”；秦人成就霸、王之业的核心区，位于渭水中下游的“关中平原”；以及秦国从戎狄手中夺取的，由泾、洛两水（渭水支流）所覆盖的“陇东高原”、“陕北高原”。

因此秦人的郡县制，最早也是从这一地区开始的。每一个地缘板块相应的对应了一个郡一级的行政单位，其中陇西高原所对应的是“陇西郡”；陇东高原所对应的为“北地郡”；陕北高原则划分为“上郡”。至于说秦国乃至秦帝国的核心区（即关中平原）所对应的行政机构则叫做“内史”，相当于后来明、清两代“直隶”的概念。简单点说，这块地方虽然说的在级别、容量上和一般的“郡”一样，但属于天子脚下，直接为政治中心提供地缘保障，因此在行政上的级别与重要度都是要高上一级。需要注意的是，就像现在的北京市除了占据一块平坦的土地外，还以自己为中心构筑了中央之国的交通网一样，秦国也是以咸阳和内史地为核心，构筑了通向全国的“驰道”。



秦初三十六郡示意图

而经过漫长的春秋战国时代，这些驰道的走向，相信熟读之前内容的人已经了然于胸了。除了通过交通网的建设，稳定自己地缘中心的地位以外，秦朝和现在的政治家在选择自己的直属地时，对依山傍水的标准要求也都是必需的。其中水的重要性是毋庸置疑的，除了在生产、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外，更在古典时期承担了主要的交通功能。而山地的保护则能够让地缘中心的贵族、政治家们感到更安全。

也正因为如此，秦帝国的内史地，除了涵盖了整个关中平原外，向北亦延伸管辖了陇东、陕北高原的边缘区域。这样的话，如果北地郡和上郡在政治上出现突变的话，咸阳城的贵族们还能够有时间布置起一条防线。至于说东线，那个进出关中的门户“函谷关”，自然成为内史地的东大门。西、南两线则有陇山与秦岭（对应关中的那段叫“终南山”）以为屏障。

除掉在秦岭以北的陇西、北地、上郡、内史四个秦人故地之外，秦国在一统天下的过程中，还战略性地向南扩张至汉中、四川两大盆地。正是拥有了这两个盆地的资源，才让秦国从战国七雄中脱颖而出。早在借蜀、苴之争，从苴国手中接收汉中盆地后，秦国就在此建置了“汉中郡”。而从地缘的角度看，整个汉水中、上游都是穿行在秦岭与大巴山脉之间。因此后来秦国在战胜楚国，控制整个汉水流域后，将秦巴谷地（南阳盆地以西的汉水流域）都划入了“汉中郡”，地理条件最好的汉中盆地自然也成为新“汉中郡”的地缘中心。四川盆地的情况就简单多了，蜀、巴两国一个占据川西平原，一个控制川东平行纵谷地区进行的长期博弈，已经使得双方在川中丘陵地带形成了地缘平衡线。秦人要做的，就是遵照这条地缘平衡线，将蜀国变成为“蜀郡”，巴国变成“巴郡”就可以了。

秦人南收巴蜀为之所确立的战略优势，很快就在正面战场上显露出来了。在北线，秦国的老对手魏国最先成为牺牲品，被逐出了河东之地。占据了河东之地的秦人，很自然地将这块晋、魏的核心之地转变为了秦国的“河东郡”。就河东这个地缘板块，我们都知道主要包含有临汾、运城两个盆地，但最终秦人所划定的“河东郡”，却不仅仅限于这两块盆地，而是透过轹关陁，将河内的“南阳之地”也包含进来了。这很大程度是因为秦国在得到河东之地后，不断地透过轹关陁这条通道向东渗透。而在这个过程中，由韩国所主导的“南阳之地”，早在长平之战之前就被秦国所控制，并以此为前进基地，与赵、魏等国进行长期的拉锯战。

在这种情况下，山西高原之上的河东之地与河北平原的南阳之地，有充足的时间和理由在地缘上进行整合，并最终在秦国的建制中合为一体。从帝国统一之后的情况来看，设立一个覆盖太行山两侧的“河东郡”，使之成为横贯东西的纽带，也有利于帝国的结构稳定。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也存在，典型的案例就是甘肃省。这样一个整体呈哑铃状的省份，能够在黄土高原和西域都辖有土地，河西走廊两端从地缘上被割断的风险会被降低许多。

第二节 楚赵两国故地的郡级政区

在北线对魏国取得压倒性优势后，秦国开始把重点放在南线，而在这个方向，楚国是他们的对手。如果没有汉中盆地、四川盆地的地缘潜力和上水优势，秦国对于楚国并没有什么优势。但在有了这两块进可攻，退可守的风水宝地后，楚国便逐渐丧失了长江中游的核心区。武陵山区、南阳盆地、江汉平原，乃至洞庭湖平原的控制权相继被秦人夺取。而秦国的版图上，也依照地缘特点，向东南方向划出了南阳郡（南阳盆地为核心）、南郡（江汉平原为核心）、黔中郡（武陵山区）、长沙郡（洞庭湖平原为核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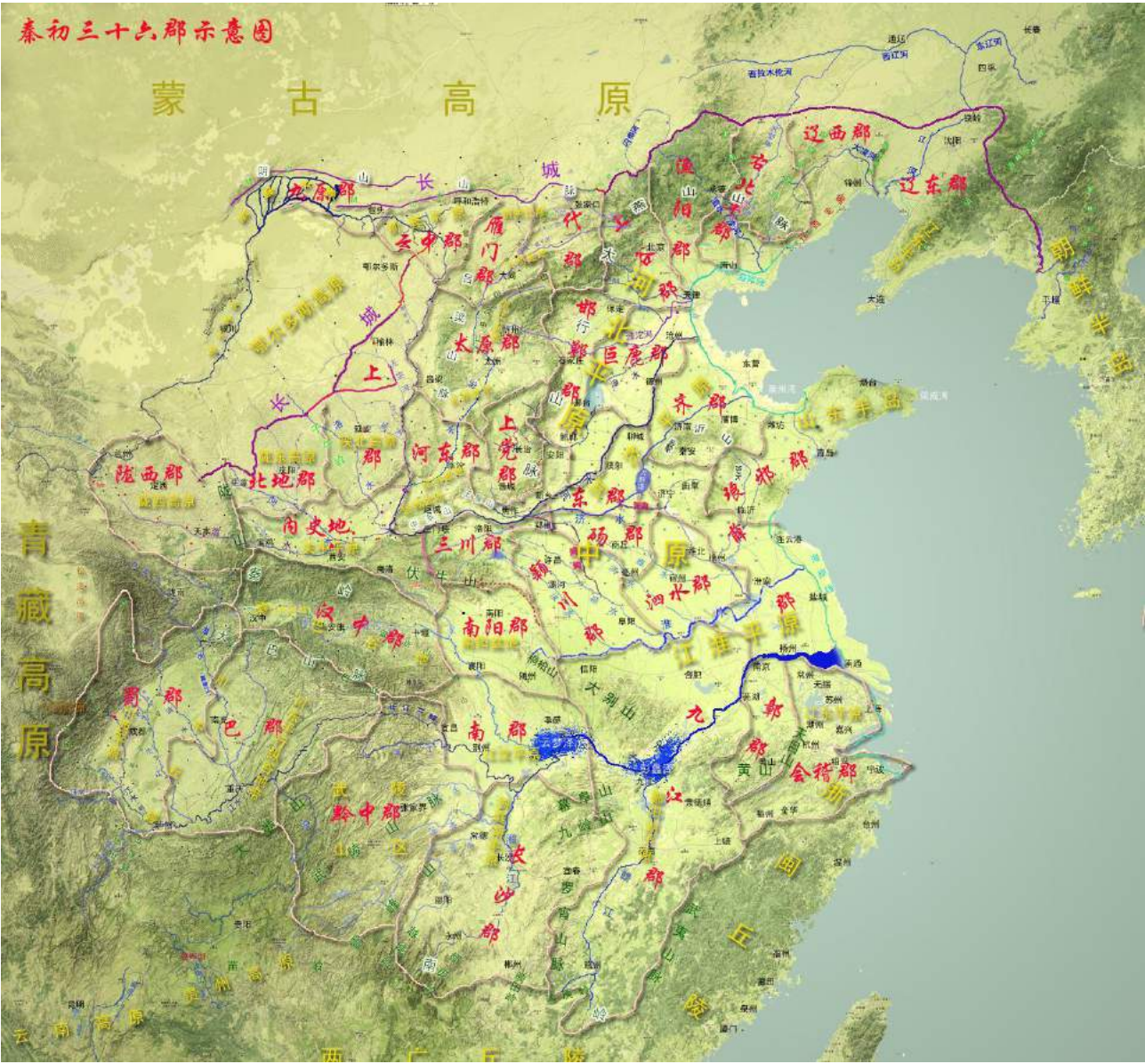
在楚国退出自己的核心区后，秦国的重点又重新回到了北线。自长平之战起，赵国和上党高地一直是秦国东扩的主要障碍。而当秦国终于一统天下之后，之前曾经被韩、赵、魏三国分割过的上党高地，终于有机会以一个完整的“上党郡”面目，出现在政治版图上了。其实要为山西高原划定行政区，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梅花间竹式的地形，让诸盆地之间都有相对清晰的山地作为地缘分割线。并不是说每一个盆地都需要设立一个郡级单位，但地缘关系更为紧密的地缘板块，更容易成为一个更大的整体。

就像同样与黄河相接的临汾、运城盆地成为河东郡的核心一样，位处上党高地腹地的长治、晋城盆地也没有被再分割为两个政区一样（上党郡）。太原盆地和它北面的忻定盆地也共同组合成为“太原郡”。相比河东之地长期以来在黄土高原的地缘中心的位置，赵人所经营的这两个盆地之间会更有共同语言。在山西高原乃至整个黄土高原上划分地缘板块，山地都会是重要的地理特征。而到了华北平原之上，这项任务就主要交给河流了。就黄河以北的情况而言，将它们划为一个整体显然过于庞大了。秦人的分割方案还是在很大程度上保留了之前地缘博弈的痕迹。首先漳水以北，燕、赵交汇之处的易水河以南，黄河以西的这片赵国核心区（包括中山国故地），被设立为“邯郸郡”。

而大陆泽以南，一直到黄河一线的土地，之前一直是魏、赵两国的重点博弈区，现在也被划入了邯郸郡这个板块中。毕竟在秦国的统一战争中，河北平原一直是以赵国为主要竞争对手的，而赵国也的确占据了河北平原的主体。因此以赵国残留的地缘标签为基础，划分行政区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另一个位于河北平原之上的郡级单位，叫做“巨鹿郡”，位于邯郸郡的东侧，向东一直伸展到黄河（部分区域越过黄河，进入河济平原），向北则大致到当日的燕南长城。这片主体位于黄河新旧河道之间的“河间”之地，是赵、燕、齐三国的博弈区，其名字则得于那个又名巨鹿泽的大湖：大陆泽。

在历史上巨鹿郡所在之地九河纵横，一直是黄河改道的核心区。无山河可依的地理特点，使得它一直无法成为一个重要的地缘板块。从地缘角度上看，这样一个

过渡区域划为一个独立地缘板块也并无不可。只不过相对弱势的地位，让它总是很容易成为周边地缘板块博弈的牺牲品。之前赵、燕、齐三国在此的竞争只是一个开始，在后来的历史中，这一幕又无数次上演。用不了多久，一场决定秦帝国命运的“巨鹿之战”就会在巨鹿泽畔上演。



秦初三十六郡示意图

第三节 燕齐两国故地的郡级政区

邯郸郡和巨鹿郡并不是河北平原的全部，因为河北平原的北部，燕山以南还有一大块燕国故土没有确定归属。理论上这块燕国的核心区应该单独设置为一个郡的，而为秦所灭的其他几国也的确是这样做的。比如我们已经分析过的邯郸郡之于赵国，南郡之于楚国，包括后面将要分析的其他诸侯国故地，也是这种情况。倒不是说秦

国有多尊重这些手下败将的知识产权，而是这些诸侯国的核心区经过上百年的经营，的确已经在文化上有了统一性。更何况当年它们能够成为一个整体，也是在地缘规律的作用下形成的。秦人如果没有特别的需要，并没有必要逆势而行，强制重新洗牌。

在历史当中，秦人的这种做法并非是一种个例，而是一种普遍现象。如果你硬把两块地缘属性不同的区域组合到一起，或是硬把一块属性相同的区域分割开来，总是会遇到很多问题的，除非有特别的需要。而在秦人看来，燕国这块核心区就很有必要被分割开了。在秦人最初划定的郡县版图中，燕人为了防御北方民族入侵而设立的上谷、渔阳、右北平、辽西、辽东五个边郡都被保留下来了。至于燕国设立这五个边郡的地缘基础，我们在燕国部分已经分析过了，应该说还是非常合理的。唯一有可能微调的，就是燕国上谷郡和赵国代郡的边界。毕竟因为燕、赵的地缘博弈，张家口盆地已经成为二者的共享区。如果在这里作出些许调整，并不会让我们感到奇怪。

问题是秦人在保留这五个边郡基本格局的同时，还让它们共同（辽东郡除外）瓜分了燕国的核心区。也就是说，除辽东郡因为离河北平原过远，其他四郡都在燕国的核心区延伸了一块辖区。由于现存的史料很少，我们并不清楚秦人具体是为什么这样做的。比较合理的解释是因为荆轲那次不成功的行刺，对秦始皇的刺激实在太大了（放在谁身上都一样，太吓人了），以至于报复性地让几个边郡将燕国核心区给瓜分掉了。这种从行政上割裂地缘文化的做法，无异于把一支有着悠久历史的军队的番号给取消了，算得上是不小的惩罚了。不过相比于军队编制的可塑性，行政划分还是要更尊重地缘规律的。因此在秦亡以后，汉朝还是在燕国的核心区建置了“广阳郡”，算是重新恢复了地缘平衡（也有认为广阳郡在秦朝就已经建制了的，只能说如果秦人真这样做了，也算是没有意气用事）。

相比划分燕国的过程中出现的异于常情的插曲，秦帝国在划分齐国领地时，倒是没有作出什么异常举动。齐国的国土被东西向地一分为二，分别设立了齐郡和琅琊郡。也许有人会觉得，齐国原来不是有五都嘛，应该划分为五个郡才对，不过那样的话，每个郡的辖区就有点小了。因此高唐（辖东河济平原）、临淄（辖鲁北平原）归入了齐郡。而深入泰沂山脉腹地的济水以北部分（平陆以北），由于长期以来就是齐国的渗透区（鲁国在与齐国的博弈中落败之后，就失去了这块区域的影响力），也被归入了齐郡的辖区。至于向南扩张至大陆泽和济水之间的这块区域，包括平陆邑本身在内，就因为地缘关系被划入了其他的郡治之中了。

除了上述三都之外，齐国原有的莒邑、即墨二都则被划入了“琅琊郡”。当年曾被越国所占据的五莲山以东，北至胶州湾，南至连云港的这条沿海地带，也是琅邪郡的属地。从地缘文化的角度看，秦国的这种划分不无道理。因为相比于齐郡，琅邪郡的属地可以说是东夷文化的最后集中地。山东半岛（包括胶莱平原）的莱国与沂沭河谷的莒国，虽然先后为齐国所灭，但在族群和文化中所带有的强烈东夷色

彩，一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仍然得到保留。因此将这样一个区域划为一个整体，也算是和齐郡分而治之了。

第四节 泗水两侧与中原西部的郡级政区

说完了齐国划分，我们要再往南看下泗水流域的情况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春秋—战国前期），泗水以东地区存在着许多以东夷系为主的小国，有一个地缘标签是指这些国家，叫做“泗上十二诸侯”（严格说算是东北方向，所以古人也认为是在泗水以北，并称之为“泗上”）。就“泗上”这个概念，我们也曾经解读过。除掉位于泗水中下游的那些小国外，位于泗水上游的鲁国，在衰弱之后也经常被列入这个概念中去。而从地缘属性上来看，泗上地区是典型的博弈区，位于江淮、河济两大地缘板块之间的特殊地位，使得泗上地区的独立性一直受到挑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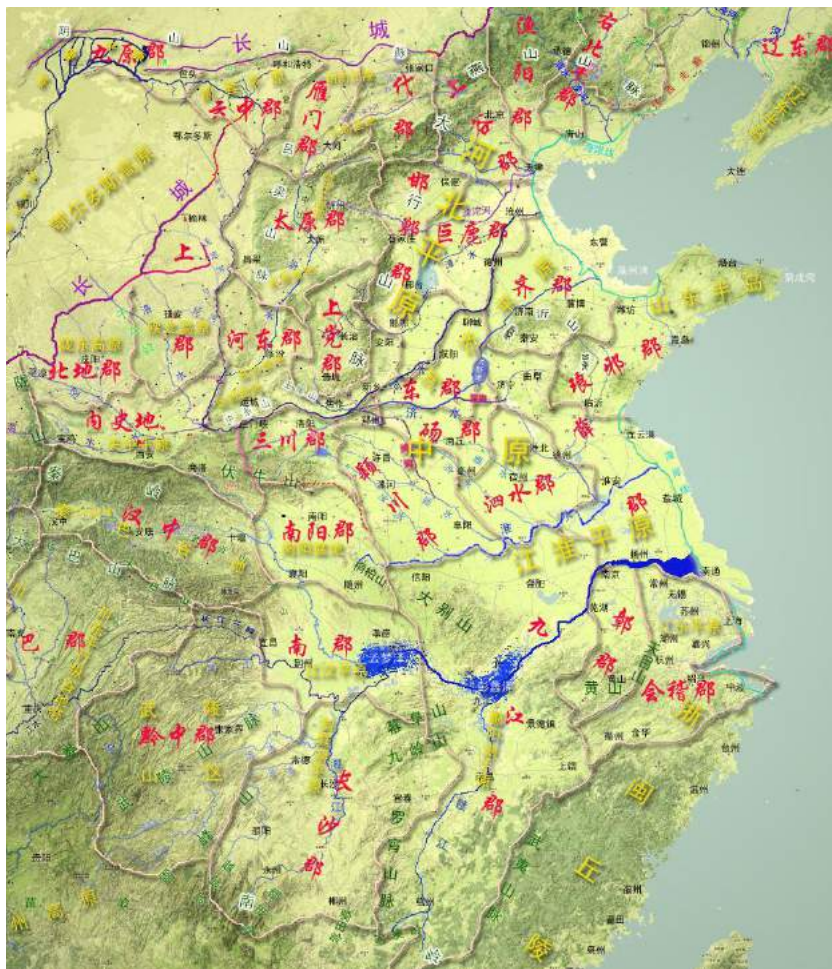


秦初三十六郡示意图

如果再为泗上地区内部做个划分的话，那么泗水上游这块，由于地处泰沂山脉腹地，在地缘属性上具有双重属性。同样具有双重属性的，还有沂沭河谷（沂、沭两河是泗水的支流，莒国也经常被列为泗上诸侯）。就目前的情况来看，这两块鲁、莒国故地和泰沂山脉以东的山东半岛（齐地）的地缘关系更为紧密，也因此而共同组成了现在的山东省。而在秦国最初在此划定郡县时，沂沭河谷的莒地是当成齐地与山东半岛划在一起的（琅琊郡）；鲁国故地则归属为泗上地区，建制成了“薛郡”，“薛”这个郡名，就是得自于泗上地区的“薛国”（在现山东省滕州市一带，微山湖东侧）。

之所以这样做，部分原因是当年吴王夫差在泗水两头开挖了连通济水的“深沟”，以及连通江淮的“邗沟”。有这样一条由深沟——泗水——邗沟组成的南北交通大动脉存在，江淮的势力更有机会向河济的纵深渗透（反过来也是一样的）。虽然吴国在完成这项伟大工程后不久就灭国了，后来的越国也对争霸中原兴趣不大。但楚国在将吴越故地变身成为“东楚”之后，却有机会利用这条交通大动脉，将势力向

北渗透。吞并泗水上游的鲁国，就是楚国的“杰作”。从秦国为中央之国划定郡县这件事来看，并非是在灭亡六国后才开始的，而是在统一的过程中就逐步展开了。这使得秦国所划定的郡一级行政区中，很大程度会参考战争的进度和自己的熟悉度（因经营时间长短会造成认知上的差别）。



秦初三十六郡示意图

到被江、淮所分割的苏北、苏中、苏南地区之间的地缘矛盾有多难调和。在乡土观念更加强烈的两千年前，这种情况只会更加严重。因此在后来的历史中，像薛郡这种跨度过大的行政区，很快就作出了调整。

不过依然悲剧的是，夹在长江、黄河两大文明之间的淮河地区，仍然摆脱不了夹心层的命运。以至于现在仍然无法出现一个以淮河文化为代表的省份（整个淮河南北，都或南或北的被南北省份分割掉了）。作为淮东主要支流的泗水流域，只是其中一例罢了。后面我们将看到在淮河流域中所存在的诸多分割现象。从薛郡所划定的行政区，我们也可以看出齐国在后来借秦楚交战之际，夺回了沂沭河谷。而秦国在对楚发起决战时，已经通过灭亡魏国，拿回了他们当年的飞地“陶”。因此北部边界直达济水，西部大致以泗水为界的“薛郡”，并没有将行政区扩展到荷济相

这种情况使得一些地缘归属本来就模糊的区域，其行政划分时会参考最后的归属国；另一方面就是秦国在西北黄土高原之上所划定的行政区，较之东部（特别是东南部）要成熟得多，也更加符合地缘规律。而薛郡这个行政区的划定就是这种不成熟表现的典型案例。因为无论从哪种角度看，将济、淮、江三个具有不同文化属性的区域，划在一个建制之下，都是有问题的，特别是最北部的济水以南地区，与最南部的长江以北地区，你甚至很难为它们找到共同点。即使是在现在继承了薛郡大部分辖区的“江苏省”，我们依然能够看

交处。这块秦人当年经营的控制区（荷、济交汇点周边）在被魏国经营后，最后的归宿是和魏国曾控制的“西河济平原”划在了一起，合并成立了“东郡”。

说完了泗水以东地区，我们要来看看泗水以西地区了。如果说泗上地区，由于地缘位置的关系，主要是由山东丘陵地区的齐、鲁等国和江淮地区的吴、越、楚三国博弈的区域，并因此影响了秦人的行政划分的话，那么作为楚国和中原国家，尤其是宋国和魏国之间的博弈区：泗水以西地区，怎么来划分就要看楚国和魏国最后的博弈情况了。这片位于济、淮之间，曾经让宋、魏、楚三国纠缠不清，包含有颍、睢、泗等流域在内的土地，算得上是半个中原了。而这半个中原在秦人的手中则变身成为了“砀郡”和“泗水郡”。北部的砀郡主要是以最后的魏国控制区为主（包括魏都大梁在内）；而南部的“泗水郡”，则主要以战国末期的楚国控制区为主。

由于楚国在最后阶段灭掉了泗水上游的鲁国（主要得益于楚国在泗上地区的地缘优势比较明显），而魏国又被秦国严重削弱。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泗水郡的东北方向在泗水一线已经切到了深沟。实际上，在正常的博弈情况下，楚国和中原国家的地缘分割线，基本还是能够拉出一条与东西走向平行的线的（济、淮为参照物）。

中原东部既然已经遵循魏、楚博弈的最后结果，而划定出了砀郡和泗水郡，那么秦人在为中原西部，包括洛阳盆地划分行政区时，所要考虑的参考对象，自然是三晋中的韩国了。不出意外的是，洛阳盆地这个由黄土高原直入华北平原的前进跳板，被单独划为了“三川郡”。所谓三川，指的就是润泽整个盆地区（包括周边山地）的伊、洛、河三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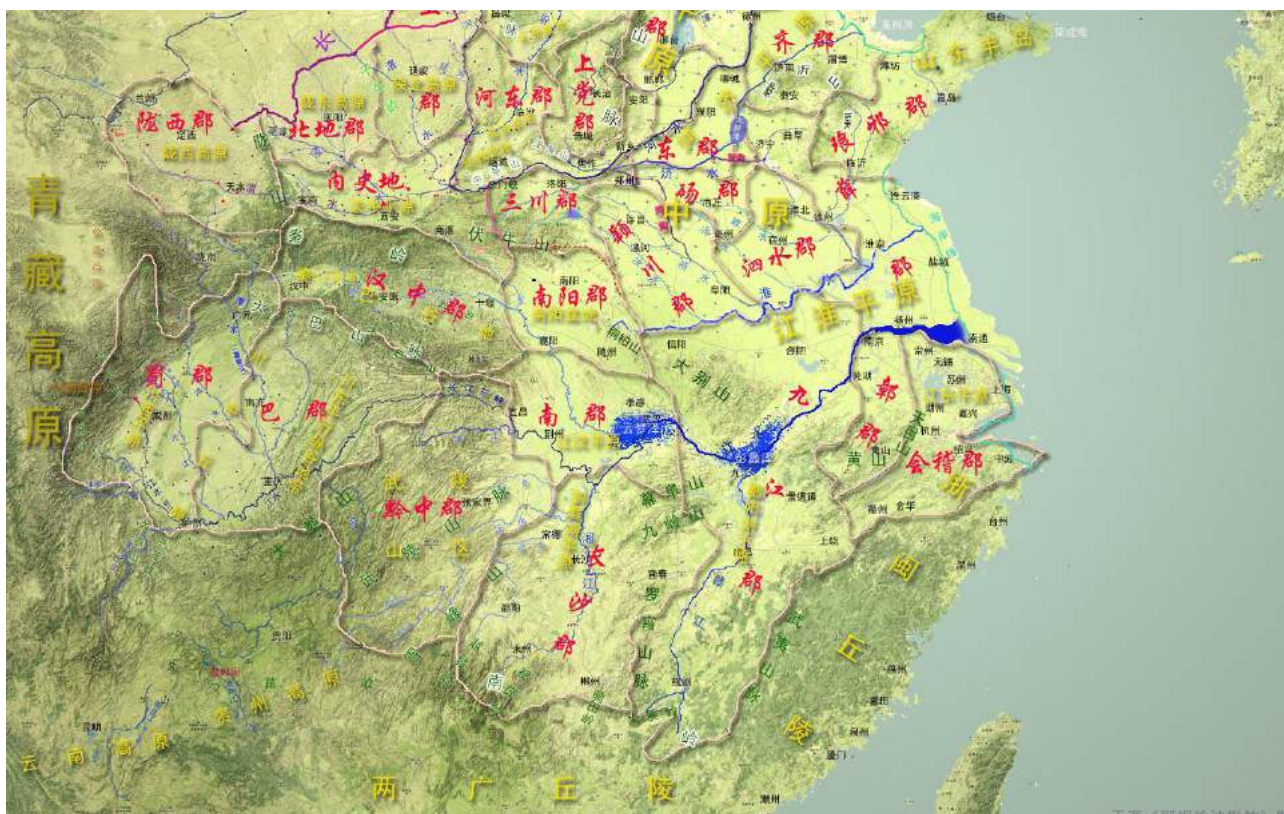
不出意料的是，三川郡的西界被定在了帝国核心区的东点“函谷关”；而令人稍感意外的是，其东界并没有定在出入洛阳盆地的虎牢一带，向是沿河济之南，向东延伸了一个突出部与砀郡接壤（郑州开封之间为二郡分割线）。秦人之所以这样做，和他们将河东郡延伸到河北平原的意义其实是一样的。作为又一个从黄土高原走出来的天下之主，秦人除了确保自己的核心区有足够的地缘保护之外，并不想因为行政划分而加剧地缘分割的现象。将黄河南北的两个缓冲区（相对于关中的核心区）的触角延伸到华北平原之上，虎牢、轘关这两个东西地缘的分割点，所能起到的分割作用就不会那么明显了。

除掉三川郡所覆盖的部分区域，韩国在中原西部以颍、汝两水流域为主的区域，被划定为颍川郡（南至淮河）。需要说明的一点是，尽管楚人在颍、汝两水下游地区已经经营了数百年，并且在地缘上也将之视为西楚地区。但由于当年周王室曾经在此封建过为数不少的嫡系诸侯，也就是说先于楚人进入这个区域，所以在计较华夏身份的一些文人心目中，颍川郡以及汉水之阳的大部分南阳郡，都不算是楚文化覆盖区。而应该是在汉阳诸姬布局之初，就已经是“根正苗红”的华夏区了。而现在在地缘概念上，基本与中原之地画上等号的“河南省”，也就此奠定了它西南部的版图范围。

第五节 淮河以南地区的郡级政区

相比于淮河以北的中原之地，秦人对于淮河以南的江、淮地区的熟悉度就更要低很多了。毕竟无论是从地理距离，还是文化认同感上来说，战国时期的秦人，都对这块“蛮夷之地”没有太大兴趣。现在既然因为所有的楚地都已经入秦成为帝国的一部分，即使再不熟悉情况，秦人也需要为它们的归属做个安排了。比较悲剧的是，秦人在划分这些最后的楚地时，粗糙程度并不比他们在划定薛郡时要低。

淮河以南，南阳郡以东，薛郡以西。包括淮南的“江淮平原”（丘陵）、江南的“鄱阳平原”，直至整个赣江流域，都被划成了一个“九江郡”，甚至连重要的地缘分界线“大别山”也被包入了这个南北纵深过长的行政区中。对于秦人来说，他们没有时间来为这片河泽众多的土地（“九江”因此得名）作更细的划分。如果帝国的国运能够再长点的话，相信秦人会对他们最初的那些不成熟做法作出调整（事实上在秦国短短的十几年中，也做过很多调整，但国运实在太短，史料又不全，最后的版本如何永远成为谜），并最终定型出一个上下都可以接受的方案。只是因为帝国很快就要陷入动乱之中，这项任务最终要由新兴的汉帝国来完成了。



秦初三十六郡示意图

去掉我们已经解读过的部分，剩下的原属吴越、后属楚国的江东地区就很好作安排了。长江所起到的天然分割作用，使得江东地区很容易被看作一个整体。而秦

人最初也是这样做的，将整个江东地区向南直至浙闽丘陵北部的“金衢盆地”（也就是属于内越的部分），都划归为“会稽郡”。从政治的角度看，这种突出越文化的做法，倒是有利于削弱楚人在江东地区的影响力。可惜的是，最后成为秦帝国掘墓人的项氏家族，还是打着楚人的旗号从江东地区渡江北上了。

虽然说秦国对于帝国的东南部不太熟悉，但越是不熟悉的地方，越要在控制的方式上多加注意。将整个江东地区粗略的归为一个郡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方案，只是这样做也很容易让之成为一个不稳定的区域。一旦控制这个郡的官吏有了异心，是很容易借助长江建立起一道难以攻破的防线的。因此，秦帝国很快就将江东地区的西部分割出来建制了“鄣郡”。从地理位置和结构来看，鄣郡所割的区域主要是长江与太湖之间的“江东丘陵”，以及南部属于江南丘陵的黄山山脉一带。江南丘陵与浙闽丘陵的分割线“天目山”，则是鄣郡与会稽郡在中部的分界线。

按一般的地缘分割法，秦人在分割江东时，应该以杭州湾为界，将江东地区横向分割为吴、越二郡。而秦人最终选择纵向分割江东的方法，亦有其道理。这种分割法，让鄣郡控制住进入江东地区的渡口、关卡，以及缓冲的山地、丘陵；而让会稽郡控制农业条件较好的江东平原。这样任何一个郡想要独立的话，都必须与另一个郡达成共识，否则的话，前者后勤堪忧，后者无险可守。而如果横向分割的话，最起码杭州湾以南的内越之地，会更有独立的倾向，就像吴越争霸时，以及为楚所灭之后的越国那样。

通过解读秦国分割六国故地，我们已经知道了在秦帝国统一中央之国后，其所能直接控制的区域究竟有哪些地缘板块，又做了什么样的行政安排。下一步则需要了解秦国在此之外，又进行了哪些地缘扩张；哪些地缘板块成为秦国的下一个目标；帝国又为此进行了哪些改变地缘关系的努力。而首先进入我们视线的，是与帝国核心区关系最为密切的西北方向，这里有一个其后两千年来，一直是农牧博弈焦点的地缘板块“河套”地区。

第二章 秦帝国建立直道连接河套平原

第一节 秦帝国对边缘地区的扩张计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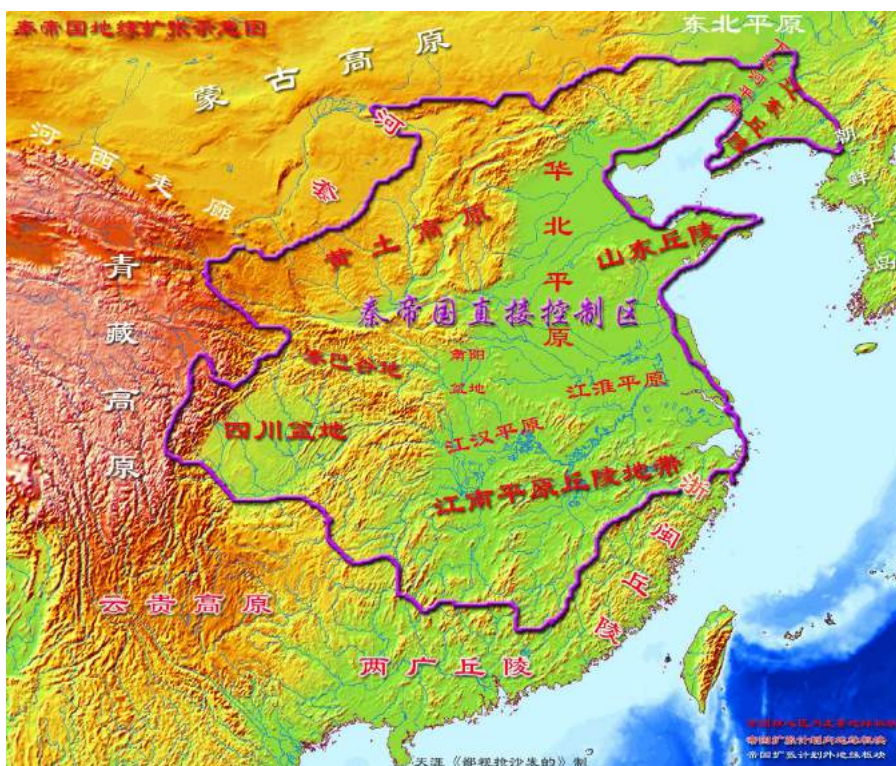
通过对战国部分的解读和对秦初三十六郡的分析，我们应该已经比较清楚秦国在帝国建立之初的版图应该有多大了。如果从地缘板块的角度来理解帝国的结构的话，那么基本上包括黄土高原、华北平原、秦巴谷地、四川盆地、南阳盆地、江汉平原、江淮平原、江南平原丘陵地带。这些地缘板块在经过六国上百年的经营后，现在都已经尽数为帝国所接收，成为可以直接控制的熟地。接下来的话，帝国可以有两个方向可以选择，一是进行内部整合；二是继续向边缘地区进行扩张。

将这些因诸侯分裂而地缘分割明显的土地变成为一个整体的内部整合，应该是最为紧迫的，毕竟这涉及帝国的结构稳定。做这件事情，技术上的准备是一方面，秦人也因此做了很多事，包括设立由中央政府直接委派官员的郡、县两级行政机构。但无论采取什么样的技术手段，用以整合的时间都是必需的。因为无论你的措施有多么到位，如果帝国的大部分臣民都还能在脑海中保留故国的记忆的话，帝国的社会结构都不能达到稳定；而如果有一天，中央之国的绝大部分臣民都出生在帝国体制下后，那么他们的国家认同感上就不大会出现冲突了。

尽管秦帝国所能够直接控制的土地达到了空前的地步，但秦人似乎并没有打算把主要精力放在内部整合上。之所以会这样，很大程度是因为秦人之前的政策太过成功，以至于秦人觉得把他们耕战的战时体制，扩展到整个中央之国就可以了。而秦人的战时体制中，以军功授爵、授田的“军功爵”制，更使得战争本身就成为一种生产力。国家可以因为战争而更快速获得土地和财富，个人也同样有理由视之作为一种生产方式。在这种思想的影响下，秦人在进行内部整合的同时，就马上开始强力渗透边缘地区了。

秦帝国所认知的边缘地区，也就是当年六国中燕、赵、楚这三个边缘国家，包括秦国自己所接触到的地区。要想得知这些边缘地区的基本情况，并不是件困难的事。因为在秦人统一六国之前，这些边缘国家在中原博弈的同时，已经对各自所能接触到的边缘地区有了很深的接触。从燕国所力主渗透的边缘地区来看，是在东北方向的东北平原、辽东半岛以及朝鲜半岛。这一地区的地缘结构我们已经多次做过分析了，基本上占据了辽河平原这个枢纽地区以及辽东半岛这个缓冲区后，再向外扩张的性价比就不高了。除非有一天，活动在东北地区以及朝鲜半岛的渔猎民族（亦可是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经由西辽河在此占据优势），强大到足以对帝国东北部的安全造成重大威胁。燕人当日所做出的努力，已经让秦人相当满意了，所以帝国暂时并没有把这个方向作为扩张的重点。

相比于东北方向的兴趣索然，秦人对于当日楚国所接触的边缘地区，兴趣却非常大。无论是与江东地区相接的“浙闽丘陵”，还是与江南地区（湘江流域和赣江流域）相接的“两广丘陵”，帝国都将之纳入了扩张计划。而由浙闽丘陵、两广丘陵所构成的涉及现在的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四省的“东南沿海丘陵地带”，一直是越人及越文化的覆盖区，其影响力甚至一直延续至今。秦人之所以会将这些看似没有太大地缘潜力的沿海丘陵地带，列为扩张重点，当年的越王勾践可以说是“功不可没”。当年越人绝地反击，翻盘吴国，称霸中原的“传奇”举动，足以让当时还困于关中的秦人刮目相看。



秦帝国地缘扩张示意图

不过我们刚才也说过了，当年勾践兴越所创立的越国本身在退回浙闽丘陵后，内部已经陷入了分裂状态。即使秦人得到了越国龙兴的“内越”之地和内越之东沿海的“外越”（瓯越）地区，内、外越之南的“闽越”地区（现福建地区）也仍在越国王族（于越族）的控制之下。

如果想要永久的消除越人的威胁，无论是由越国王族所控制的那部分浙闽丘陵，还由边缘越族所控制的南越之地“两广丘陵”，秦人都希望它们成为集权管理的帝国的一部分，而不是作为化外之地存在。除掉东南沿海丘陵外，另一个曾经在战国后期由楚人渗透过的板块“云贵高原”也被帝国列入了扩张计划中。秦人之所以关注这一区域，并不仅仅是因为楚人曾经试图以此为基地，在四川盆地开辟反击秦国的第二战场；更因为富庶的蜀人所展现出来的迥异的文化特质，使得秦人知道了在

越人的韧性，表现在他们所处着的区域在防御上的巨大优势，甚至在他们败于楚人，不得不退出江东地区之后，还能够继续在闽浙丘陵之内延续他们的国祚（虽然内部四分五裂了）。也正因为如此，秦国在灭亡楚国之后，并没有停顿下来，而是一鼓作气，将会稽山以南直至“金衢盆地”的内越之地收入囊中（内、外越的划分，详见越国部分）。不过

四川盆地的南部存在一条通往另一个世界的商路。既然有利益存在，那么即使秦人暂时还看不上云贵高原的农业潜力，也有理由想办法打通一条南入云贵高原的通道了。而一旦秦人决心这样做了，对贵州高原的“夜郎国”，以及云南高原的“滇国”来说，他们都将面临灭顶之灾了。

早在周人成为天下共主之时，华夏文化中便有了“华夷五方”的概念。现在既然秦人已经成为了中央之国的主人，他们自然也要审视一下帝国的四周，究竟还有哪些边缘地区和边缘民族有可能对帝国的安全造成威胁。从东面来说，当年和整个黄土高原族系对抗的主流“东夷”，事实上已经随着春秋战国的进程而成为华夏的一员。这其中被周王室授予平夷之权的齐国（尽管后来换了王室）功不可没。秦国在统一之后，基本没有再遇到边缘民族的问题便将帝国的东部边界推到了东海。

如果再想进一步的话，就只有看看海上有没有土地可供征服的了。不过很显然的是，无论是齐国还是现在的秦帝国，并没有遭受过来自海外的威胁。因此从帝国的层面来看，并没有必要再在这个方向花费太多的精力。而从帝国的统治者“秦始皇”的角度来看，那些似乎没有征服必要的海岛之上，却有可能居住着不属于这个世界的“神仙”。得到这样的结论，那些长期在山东半岛沿线活跃的，出身于东夷文化的方士们功不可没。其后果便是始皇帝陛下动用了一部分财力，派遣了一支小型的“远征军”（徐福带的那三千童男童女，其实算是朝圣的使团了）去海上为他寻找不死药了。尽管最终并没有奇迹出现，但却为东海最大的边缘民族“和”族，提供了加入华夏体系的最初线索。

帝国南面的地缘结构，我们已经分析过了。东南丘陵地带和云贵高原这两个蛮夷之地，由于它们潜在的威胁和利益，已经被帝国列入了远征计划。而在这项计划实施之前，帝国在另一方向还有一个更为紧迫的对手需要解决掉，那就是来自北方蒙古高原的匈奴。

第二节 秦军沿陕北高原北上收复河套

游牧民族的威胁在战国时期便已呈现，基于他们对于“骑射”这两项军事技术的熟练程度，以及在生产方式上的机动优势，长城成为农耕民族以静制动的法宝。在秦灭六国之前，通过“胡服骑射”拉平了与匈奴军事技术差异的赵人本来已经做得很好了，以阴山山脉为依托的长城防御体系也已经打造完成。不出意外的话，秦国在北部边境是可以成建制的接收赵国的代、雁门、云中三郡的。事实上秦国在灭掉赵国的继承者“代国”之后，也确实做到了这点，只不过在接收“云中郡”时出了一点意外。

我们在有关“赵北三郡”的内容中已经分析过了，赵国的云中郡主要控制的是阴山以南，包括后套、前套两个盆地型平原的土地。这两块土地平整、水源充足的

平原，之前本来是游牧民族最为优良的天然草场。而扩张至此的农耕民族，同样也能够凭借他们所掌握的水利技术将之改造成为农业区。要是给赵国充足的时间和人的话，他们应该能够有机会完成云中郡在生产方式上的转化过程的。可惜的是，秦人在赵国南线的攻击，让赵国无法集中精力完成这件事。而从战略上来看，从李牧所统帅的北地边防军被作为最后的筹码调入河北平原之后，赵国便随时要面临着退出河套平原的危险了。

凭借着李牧大破匈奴的余威，以及匈奴战略后撤所留出的缓冲空间，在李牧率军回援邯郸的那十几年间，阴山防线仍然保持着宁静。而李牧身死，赵国灭亡之后，游牧民族预料之中的渗透终于开始了。当秦人接收云中郡的时候发现，匈奴人已经控制了狼山（阳山）以南的后套地区，并由此向鄂尔多斯高原渗透。这种局势让后套平原乃至整个河套地区（主要包含河套平原和鄂尔多斯高原在内）第一时间被帝国列为战区，众人所期待的“外战”一触即发。

如果让赵人来收复河套的话，他们的主力出击路线应该是由雁门郡向西，通过“杀虎口”跨越吕梁山脉的北支“管涔山”，进入前套平原，然后再与在前套平原驻守的云中守军汇合，向盘踞在黄河北岸后套平原的匈奴人发起攻击，这也是当年赵人从匈奴人手中夺取河套平原的典型路线。相比于赵人，秦人的选择就会更多些了。最起码秦人积蓄在关中平原的大军并不需要绕道山西高原，两次渡过黄河才进入河套平原。他们可以假道陕北高原，也就是在行政区中所对应的“上郡”，沿着北洛水和黄河水系（如无定河、窟野河）所形成的河谷通道，一直向北，到达鄂尔多斯高原的东北角，然后再跨越黄河进入河套平原的腹地。

鄂尔多斯高原的地理特点，我们之前也分析过了。就是腹地地势相对平整，但缺少稳定的水源，且气候上受蒙古高原影响很大，恶劣天气比较多。这种情况显然不适合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即使是对地理条件要求相对较低的游牧生产来说，也算不上好的草场。相比之下，沟壑纵横，河谷相间其间的陕北高原，虽然看上去没有那么缺水（现在也缺得厉害），但由于地形的原因，进行大规模的农业生产也有些困难。而同样由于地形的原因，游牧民族想在陕北高原的腹地大规模的驰骋放牧也很困难。

既然双方都不能指望依靠陕北高原来提升自己的生产力，那么习惯步步为营的推进政策的农耕民族，就在陕北高原占据了优势。这是因为在陕北高原的那些河谷中，还是可以进行小规模的生产，并维持一定的人口。这些有一定自给能力的据点，在与关中平原乃至山西高原互动之后，不仅能够得到农业核心区的支援，亦能够有效的成为核心区的缓冲地。从地理结构来看，位于河套地区东南部的“陕北高原”，其顶点已经接近于前套平原了。这使得秦军在从关中平原出发，穿越陕北高原进入河套平原的路程中，大部分时候可以在条件相对较好的河谷通道中前进，并接受沿河据点的补给。



陕北高原

和河西之地收入囊中的可能性。

要说当年的赵国如果想要步步为营的向陕北高原推进的话，还是存在一定优势的。因为赵国不仅可以从云中郡所在的前套平原南下攻击陕北高原；还可以另外准备一支军队由太原盆地出发，西向切割吕梁山脉，经由“藁”地渡过黄河，与北军呼应。无论是曾经占据陕北高原南部的魏国，还是后来囊获整个陕北高原的秦国，都将陕北高原一切为二，分为两个战区。并在其间修筑了一道内长城（现绥德南）。这样做的意义在于，可以分区抵抗来自山西高原和河套地区的攻击，不至于让对手快速合围。也正因为如此，赵国当年在陕北高原也最多只能渗透到北部，无法真正接近关中平原。

不管怎么说，赵人或者匈奴人要想通过陕北高原的河谷通道威胁关中都不是件容易的事。而现在，在陕北平原经营日久的秦人，需要通过这些河谷通道向北方的河套地区推进了。执行这项战略任务的，就是蒙氏家族中最为著名的成员蒙恬。有了前套平原这个突出部，加上可以由大同盆地、陕北高原两个方向对前线进行支援，秦军的攻击还是比较顺利的。不仅将匈奴赶出了鄂尔多斯高原（地缘结构上，西部

既然秦人可以通过陕北高原的河谷通道向河套地区移动，那么反过来，来自河套地区的对手是不是也有机会这样做呢？答案是肯定的。曾经有过这种想法或举动的，并不止是那些想到关中劫掠的游牧民族，当日赵武灵王就曾经这样构思过。只不过，按照正常的国家博弈来说，要想真正对秦国的核心区“关中平原”造成威胁，赵国必须先想办法把秦国的上郡蚕食掉。否则赵国大军就算取得战术上的成功，透过陕北高原攻入关中的话，后勤补给也存在很大的问题。当然，假如赵国能够控制河东之地，仅仅将跨越陕北高原的攻击路线，作为夹击秦国河西之地的战术举动，意义还是挺大的，的确存在一举将陕北高原

称之为河南地；东部称之为“榆中”），更一举收复了匈奴在河套地区的核心区“后套平原”，将匈奴逐回至阴山山脉以北的蒙古高原上。

新生的帝国能够这么快就收复后套平原，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毕竟当年赵国以一“国”之力也曾经做到了。对于希望边境长治久安的帝国来说，他们所面临的更大问题是如何保住胜利果实。要知道，要想在大草原上围歼那些机动性超强的游牧民族几乎是不可能的（更多的是击溃战）。当他们休养生息后，随时有可能卷土重来。如果从地缘关系，包括军事地缘的角度来看，在位置上比较接近陕北高原和大同盆地的“前套平原”，帝国还是有把握稳定它的安全的。比较麻烦的是后套平原。这个位于狼山（阴山山脉的西段，又名阳山）、鄂尔多斯高原、前套平原之间的平原，离帝国的核心区有点远。除非秦人有办法将整个鄂尔多斯高原变为农业区，否则秦人必须想其他的办法来拉近后套地区与帝国核心区之间的关系，使之摆脱孤立的状态。正是在这种地缘背景之下，一个新的行政区“九原郡”和一项伟大的工程“秦直道”诞生了。

第三节 秦帝国为支援河套建立直道

当年赵国渗透入河套平原之后，以前套平原为核心建制了“云中郡”。有一种说法认为，赵国当时已经着手将后套平原作为一个单独的地缘板块，从云中郡分割出来。而比较普遍的看法是，秦帝国在为华夏“收复”后套平原之后，方才将后套平原独立为“九原郡”。不管九原郡的知识产权归谁，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九原郡的郡治“九原”并不在后套平原，而是在前套平原的东南角，也就是现在的“包头市”一带。

之所以这样做，主要原因有二：一是后套平原尽管从地理结构上看可以单独划为一个郡，但毕竟离核心区太远。如果将它与唯一与其相连的云中郡完全从地理上分割开的话，这个前突严重的边郡，前景并不让人感到乐观；另一个原因则是因为“九原”（指郡治）的位置基本位于整个河套平原的中点。由于阴山山脉属于“断块山”类型，它位于黄河之北的三个主要山体：狼山（阳山）、阴山（乌拉山）、大青山，呈交错状态存在。因此对应中段“阴山”（乌拉山）的九原地区，更像是前套平原和后套平原之间的连接点，将这个连接枢纽跟地缘控制力相对薄弱的“后套平原”划在一起，有利于加强后者的实力。

既然“九原”城本身承担着支援、管理后套平原的重任，并且在整个河套平原中具有枢纽地位（即使放弃了后套平原，为了云中郡的安全，也不能丢掉这个点），那么无论是出于主动的反击匈奴南下，还是保守的拱卫前套平原的目的，秦人都很有必要专门为它打造一条交通线，以让帝国的机动力量能够快速到达九原城。如果新生的“九原郡”只是碰到小股的游牧部落袭扰的话，那么凭借自身的力量，加上

上郡、云中两郡的支援，应该还是会有足够的安全保障的。秦人所需要做的，就是
在上郡的北部与九原之间打通一条交通线。

从技术的角度看，自上郡的郡治“肤施”（现陕西榆林县一带），向北沿陕北高原与鄂尔多斯高原的交界处，铺就一条快速通道并不算太难。鄂尔多斯高原相对低缓的地形能够让这条通道尽量呈现直线状态（肤施——九原，按现在的行政区划就是：榆林——鄂尔多斯市——包头）。而陕北高原北部那些发源于鄂尔多斯高原边缘的河流（黄河支流，如无定河、窟野河，以及它们的支流），可以阶段性地为北上的援军提供淡水来源，甚至建立兵站和小型农业区以为支持。



秦直道战略示意图

尽管上郡和云中两郡能够为九原郡的生存提供一定支撑，但为了夺回河套平原这块风水宝地，以匈奴为代表的游牧民族往往是倾巢出动，集结数十万的骑兵发动进攻。而他们的攻击点，也并不仅仅会是九原郡一线。前套平原的云中郡、大同盆

地至阴山一线的雁门郡，甚至代郡，都有可能同时受到攻击。在这种情况下，为这么漫长的战线提供支援任务就必须分解了。从地理关系上来看，山西高原腹地的那些郡县，可以比较快速地为雁门、代郡一线提供战略支援。而能够为云中、九原在内的河套平原提供支援的二线行政区，就主要靠上郡了。

问题是光靠驻扎于上郡的军队支援，是很难应对匈奴的大规模入侵的。毕竟以上郡本身的地缘潜力而言，并无法囤积太多的军力。在这种情况下，秦国需要一条能够将河套平原与帝国核心区直接连通起来的快速通道，以让秦国在关中平原的人力、物资快速调至河套前线。也许有人会想，既然帝国的最大威胁来自于北方，那又为什么不把大部分的军事储备和军队放在离前线更近，地理条件又相对较好的忻定——大同盆地一带。这样的话，帝国对于阴山前线的反应会快速许多。在后来的历史中，并非没有帝国这样做过。但在大部分时候，出于稳定内部结构的原因，帝国的中心总是希望成为资源（特别是军事资源）的最大集结地的。



秦直道遗址（一）

那些为了边境稳定而放权让边郡经营、集结大量军事资源的朝代，结果往往就是藩镇割据，最终反受其害。要想调和这种内、外不能兼顾的矛盾，也并非没有办法。比较好的方法就是把帝国的政治中心，设在最需要承受地缘压力的地方。以中国的情况

来看，就是将都城的选址，尽量往农牧分割线靠近（比如后来的明朝就是这样做的）。这样的话，政治中心所集中的资源既能用之威慑地方势力坐大，又能快速支援帝国的边境。

对于新生的秦帝国来说，应该还没有把政治中心迁离关中平原这块风水宝地的想法，毕竟这块“四塞之地”是秦人最终能够得天下的根本。既然这样的话，就只能想办法为咸阳和九原城之间铺就一条快速通道了。这倒有点像现在缺水严重的北京城，既不能迁都到水资源丰富的地方，又不愿放弃自己的政治优势，将部分功能分给其他城市（又要做政治中心，又想做经济、文化、流通中心），就只有耗费国力从远在千里之外的汉江调水了。从另一个角度看，我们即将看到的“秦直道”工程和现在即将完工的“南水北调”工程，都是中央集权力的极致表现。无论利弊、功过，从技术的角度看都堪称“伟大工程”。

关于秦直道的具体路线，历来都不是十分明确。大家在网上所能看到的示意图多是根据“直道”之名，“顾名思义”的在咸阳和九原之间画条直线。而在如今古代遗迹皆有可能变为 GDP 的年代，地方上倒是对考察直道这类工程抱有浓厚兴趣，只是既然是想为自己的一方土地带来名利，自然也很难从全局角度来探究这条“古代高速公路”的全景了。更多的是在相关自己的一方土地上发现有秦代修筑的道路遗迹，便往“直道”这个地缘标签上靠。

第四节 秦直道在关中北部的走向

下面我们从地缘的角度来解读“秦直道”的走向和战略作用。之前我们分析过了，为了应对来自蒙古高原的匈奴人对河套平原的侵扰，仅仅依靠上郡的军事支援是不够的。帝国需要有一条高速公路，能够迅速将帝国核心区（内史地）的军队和资源送达河套前线。

从常规来看，秦人可以选择的战略方案有两个：即要么向西北方向，通过泾水水系的河谷通道，进入鄂尔多斯高原，然后穿越地势相对平缓、水源稀少的鄂尔多斯高原腹地，最后到达河套平原；要么向东北方向，借助陕北高原中洛水水系的河谷通道，通过陕北高原南部，然后或溯洛水而上，入鄂尔多斯高原，至河套平原；或仍然在陕北高原穿行，借由陕北高原北部的河流谷地（北部的河流都是东南向流入黄河的）再走一程，然后再在鄂尔多斯高原和陕北高原的交汇处北行，进入河套平原。这个方案中，后段比较经典的路线，就是我们前面解读过的，溯无定河谷北上，经肤施（现榆林）、鄂尔多斯市，直至九原城的路线。

上述方案中，第二套方案中的后一种走法，无疑是最可能被使用的。因为在大部分的路程中，既有充足的淡水补充，又可以得到沿途布设在河谷中的据点支持。更重要的是，如果在咸阳——肤施——九原之间画条线的话，这条线还真的近似于直线。要是在华北平原，并且中间又没有太多横向切割的河流的话，始皇陛下的“工程师”们应该是会这样设计的。可惜的是，当秦军主力试图向河套方向运动时，他们会发现，首先将要穿越的是沟壑纵横的陕北高原。如果选择现成的河谷通道的话，并无法走出漂亮的直线来。另外无论是只走陕北高原南部，就进入鄂尔多斯高原；还是在陕北高原北部再走一段，都必须多次穿越河流。在桥梁技术还不成熟的时代，这无疑会极大的减缓行军的速度。

虽然河谷通道是人类在山地中最常开发利用的道路，沿途也容易补给淡水，但亦有其弱点，即不是特别稳定。特别是在一些水量较大河流的下游地区，在夏季雨水较多时，经常会出现山洪暴发，冲断道路的情况。按说游牧民族大都是在秋高马肥之后开始南侵的（这时候农业区也丰收了，正是“打草谷”的好时候），河谷通道受损的情况，不一定会正巧碰到游牧民族大举南侵的时节。但对于一个优秀

的战略军事家来说，这种风险是需要尽量想办法规避的。

如果放在现在，无论在什么样的山地之中，高架桥和隧道技术都可以尽量避开上述风险，并使得道路呈近似直线状态。但仅仅是在几十年前，那些古代先人所开发的路线，都还是我们修筑道路的基础。这也就是现在的高速公路，往往不能和古典时期的道路重合。而早期修筑的道路，甚至国道，大都和古人走出的路没有太大偏差的原因。既然拥有现代技术的我们，都还刚刚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就不能苛求两千多年前的秦人，在陕北高原那些沟壑之中南北向切出一条“直道”来了。



秦直道战略示意图

从地理结构的角度看，唯一能让秦人避免不断切割河流、山谷的行军路线，就是找一条南北向连接鄂尔多斯高原和关中平原的山脊作为筑路的基础。而在整个渭北高原（渭河以北，河套以南，陕北、陇东高原在内的统称）之上，唯一具备这个条件的，就是陕北高原和陇东高原的地理分割线，或者说泾水流域与洛水流域的分

水岭——子午岭。作为两大水系的分水岭，子午岭西侧的河流都汇入了泾水；而东侧的山泉、雨水，则流入了洛水。至于说子午岭的山脊之上，自然是没有任何河流切割的“宝地”了。



秦直道遗址（二）



子午岭

将直道建于分水岭之上，理论上确实是个避免河流阻断道路的好办法，但施工难度也是可想而知的。不仅在于高度，更在于子午岭上原始森林密布，从中开辟道路需要耗费不小的人力。鉴于蒙恬所主导的直道工程，在短短两年期间就已初见成效，有理由相信，在此之前，就已经有人利用过子午岭的山脊作为通行的道路了（不然的话，光勘测路线都得一两年时间）。秦人所要做的，就是把这条林间小道变身为宽度达数十米（20米—60米）的古代“高速公路”。

从技术和资源上看，秦人在子午岭上铺设一条直道北入鄂尔多斯高原，是完全可以做到的。而由子午岭切入鄂尔多斯高原南部时，秦人需要向东北方向略微调整一下方向（因为子午岭偏西北——东南方向的，其北部位于九原郡西南方

向），并在这段渭北高原的直道与九原城之间，再将直道续修下去。以鄂尔多斯的地形来说，秦人“堑山湮谷”（史记言之）修筑直道的做法才有可能实现。要是在山谷相对较多的陕北高原这样做的话，且不说秦人有没有力量把那些深谷填满，就是那些山谷中的河流也不会让秦人这样成功的（把河流阻断修路的想法是非常危险和不现实的）。

当然，虽然理论上在鄂尔多斯高原腹地，可以修筑出一条标准直线的道路。但真的做起来，也没有必要为了迎合这个名字拿标尺去量的。最起码在直道的最后一段，秦人会稍微再做一点调整，以让它和从无定河（上郡郡治肤施所临河流）出发，

向正北方向修筑的与连接九原的道路相接。这样做可以将这条直接连接关中——河套两地的直道主干线，与连接九原、上郡的道路（从形态上来看，这条路也可以算是一条“直道”了）相接，在鄂尔多斯高原上形成一个“人”字形的交通网。除了节省资源以外，还可以在后段路程，得以利用鄂尔多斯高原与陕北高原相接处的那些战略据点，为长途行军的部队尽早提给补给。

现在我们知道了，所谓的秦直道，并不是从头到尾就是一条直线，而主要是由子午岭直道和鄂尔多斯高原直道两部分相接（其分割点大约就是穿越长城的点了）而成的。这让整个直道工程呈现为“《”字形。虽然从感觉上来看，似乎是绕了点路，但以当时的技术条件，即使你选择在高原河谷中穿行，也无法在咸阳和九原之间走出一条直线来的。而秦直道的设计路线，不仅最大程度地让道路呈连续状态，更是在道路的平整度上有了地理保障。这一切，在秦军火速驰援河套地区时，都将发挥重要作用。

第五节 秦直道的沿线补给与起点位置

将穿越渭北高原的直道构筑在子午岭的山脊之上，最大的问题就是沿途的补给了。因为在这样的地理条件下，无论是古典时期，还是现在，都不会有进行成规模农业生产的可能。因此秦人即使用强制移民的办法，也无法在直道沿线布设定居点（没有实现自给的潜力）。唯一能够做的，就是用军事体制，在直道沿线离子午岭两侧河谷农业区较近的位置布设兵站，在平时进行战略储备。可以想见的是，这种需要依靠国家强制力执行的保障体系，一旦中央政权的控制力被削弱，很容易就会被打乱。更为悲剧的是，秦帝国仅仅维持了十几年，甚至没能坚持到直道工程完全完工的那天，便土崩瓦解了。

和子午岭的地理条件相比，维持鄂尔多斯高原上的那部分直道，任务会更为艰巨。因为前者在植被的覆盖上还是不错的，相比之下恶劣气候也较少。更为重要的是，离两侧陇东、陕北高原的战略据点也较近，兵站补给的效率和安全性都有保障。而鄂尔多斯高原腹地部分，就没有这些条件了。地理上的无险可依，以及地缘上的不利性（身处游牧区），都会让这部分直道的维护成本成倍的增加。如果不是秦帝国在灭亡六国之后，对于自己的效率和能量达到了迷信的地步，这种延绵八百公里、大部分路段没有战略补给地的战术通道，光想象一下都需要有足够的勇气。这也正因如此，在后世的诸多王朝中，虽然河套地区仍然是农牧博弈的焦点地区，但却看不到秦人的这项伟大设计整体发挥战略作用了（部分路段还是有可能使用的，只是从关中快速调军驰援河套的任务就难了）。

从战术的角度看，秦直道的设计其实是很不错的。除了可以借此向河套地区快速运动外，一旦边缘民族（不光是匈奴人，也包括西戎属性的边缘民族）经由陇东、

陕北高原的河谷通道向南攻击，关中的军队和物资也可借子午岭上的直道，快速向北推进。然后再沿子午岭两侧的河谷通道，运动至陇东或陕北前线。而之所以没能发挥它的终极任务，快速驰援河套平原，主要还是和鄂尔多斯高原的纵深太大有关。这样大的一块无法成为农业区的土地横亘在渭北高原和河套之间，使得华夏民族在战略上便已失分不少。如果不是因为河套平原（包括西套平原）有成为农业区的潜力，并且离华夏核心区较近，又总是被游牧民族用来作南侵的跳板（反过来，华夏政权也觉得够得着）的话，相信包括秦帝国在内的华夏王朝，甚至不会想到向河套地区渗透，而只要维护好渭北、山西高原北部这条防线就够了。



林光宫位置图

现在我们大致知道秦直道的战略作用和走向了，下面来谈一谈直道的起点问题。从大的方面来看，直道的起点应该是咸阳市。即使是在后来的汉朝，这个战略起点也不会有太大偏差（长安和咸阳市算是一河之隔了）。讨论从咸阳市到渭北高原的这段路程没有

什么实际意义。在平原之上，又是自己的核心区，怎么走都可以。实际上从军事的角度看，军队的主要集结地并不会是在都城之中，而是分散在核心区的主要出入口。

之前我们在解读秦初三十六郡时，也说过，秦朝在设立直属京都的“内史地”时，出于安全的需要，把渭北平原的南沿也划了进来，以让核心区在北线拥有自己的山体防线。而直道的战术起点，正是位于这条山体防线的中点。也可以说，在陕北高原和陇东高原的地理分割线南端。在这里，始皇陛下修筑了一座宫殿叫做“林光宫”，作为他的前敌指挥所。如果一定要为直道找个0公里位置的话，这座宫殿的所在处，是最有资格申请的。

鉴于秦帝国存续的时间太短，林光宫和秦直道都没有什么机会展现自己的战略价值。不过在后来的汉帝国时期，凭借陕北、陇东高原相接的居中位置，林光宫所在的地点，还是有机会显露出自己的地缘优势。只不过汉朝的统治者在重新修建行宫时，并没有延续秦朝的名字，而是将之命名为“甘泉宫”。在与匈奴博弈最为激烈的汉武帝时期，甘泉宫曾经作为一个著名的地标，经常出现在史书当中。至于说

甘泉宫所在的那段山体，其实也是属于子午岭山体的一部分，叫做“甘泉山”（偏西南，陇东高原方向的支脉）。

由甘泉宫出发，无论是经由甘泉山，东北方向对接子午岭主脊上的直道，还是向东或向西，沿泾、洛水系的河谷通道，进入陇东、陕北高原，都非常便利。所以不管穿越鄂尔多斯高原腹地，连通河套的计划有没有实施，最起码在秦汉第一帝国时期，以子午岭直道为干线，两侧河谷通道网为辅线（包括穿越连接这些河谷通道的道路），其共同组成的渭北交通网，都在为关中的战略安全发挥着重要作用。而甘泉山以及甘泉宫，就是这条张交通网的地缘核心（所以志在平灭匈奴的汉武帝，呆在甘泉宫的时间，不比住在长安未央宫的时间要少多少）。

第六节 西套平原在秦朝时未受关注

我们有必要交待一下西套平原的问题了。因为根据历史的记载，以及秦直道的战略价值来看，都是在围绕着河套平原的主体——前套、后套平原在进行的。作为离关中平原最近的西套平原，似乎没有理由淡出帝国的视线。也正因为如此，宁夏本地的一些研究者一直在寻找证据，以证明西套平原（银川平原）的开发，是始于秦朝。事实上从地缘关系上来看，西套平原应该已经纳入了帝国的管辖范围，只不过由于帝国的存续时间太短。而河套地区的主要矛盾又集中在阴山一线，因此没有成为博弈焦点的西套平原，所留下来的记录就很稀少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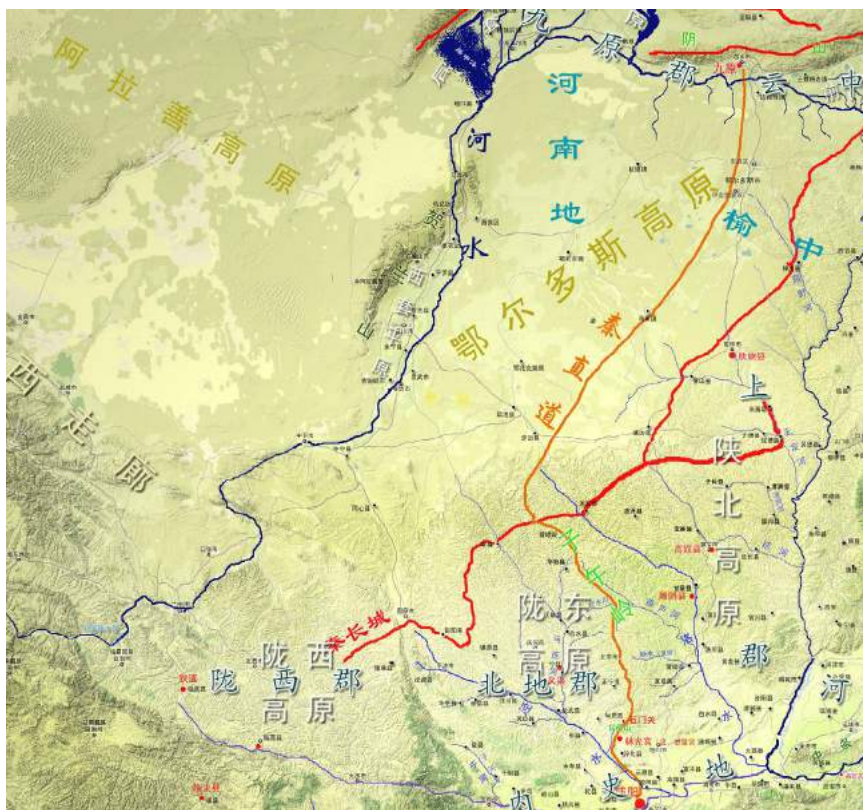
西套平原之所以在秦帝国时期没有成为博弈焦点，是因为它的地缘位置偏南，并不是游牧民族当然的势力范围。在大部分时候，来自青藏高原与黄土高原交汇地带的“西戎”系边缘民族（后来的族群标签叫“西羌”），更容易控制这块水草丰美之地。这一地缘特点在千年之后仍然可以看到。尽管建立西夏政权的党项族，其贵族体系中，有认定自己的氏族是属于南迁至此的鲜卑族（特别是王族“拓跋氏”），但党项族的基本成分是属于西羌系是没有问题的。

鉴于秦国当年的壮大、崛起，就是通过不断地征服、融合西戎系部落而完成的。在秦国将注意力集中在东线之前，基本上已经把西面的问题解决了。生活在陇西、陇东，乃至陕北高原的戎系部落，或直接或间接都已经在为帝国的建立出力了。至于说陇西高原以西，活动于青藏高原边缘的那些戎人部落（后来的“羌”），即使不臣服于秦国，也不构成威胁了。

在秦人整合这些原属戎系边缘民族的地缘板块时，陇东高原的“义渠戎”算是最反复的了。以前我们也说过了，秦国甚至是通过牺牲一位太后的色相，才算是彻底解决了义渠戎的问题，并在陇东高原建制了“北地郡”。而西套平原之所以没有成为一个独立的郡，并因此青史留名（如果不是作为化外之地，就是由北地郡管理），是因为在秦人的周边，已经没有戎系部落可以挑战秦国的宗主地位了。所以西套平

原在战略上对于帝国的安全暂时没有威胁，自然也就没有必要重点经营了。

如果不是受到边缘民族的威胁，中央之国的历代王朝其实都不愿意向外主动扩张的。这是因为在绝大部分古典时期，中央之国的人口与土地的矛盾，从整体来看并不尖锐。出于成本考虑，像河套平原、朝鲜半岛这类虽然有一定农业潜力，在地理上也能够与核心区形成脆弱联系的地缘板块，只要没有对中央之国的核心区构成威胁。华夏政权也不太会去花精力直接控制的。而作为最容易成为游牧民族南侵跳板的前套、后套平原，被赵国，以及后来的秦、汉帝国作为重点经营的地缘板块，就是因为它威胁到了核心区的安全，必须花大量资源进行军事占领，乃至移民将之变为农业区。



秦直道战略示意图

从地理关系上来看，西套平原的西面是“阿拉善高原”，东面是“鄂尔多斯高原”（两者可归为广义蒙古高原的一部分）。这两块高原的共同特点，就是地理条件比较差，其腹地不仅不能成为农业区，作为牧区，其所能承载的人口和牲畜也是有限的。而西套平原与陇东高原之间的这块缓冲地（算是鄂尔多斯高原的西南角），虽然直线距离看似不远，但却是鄂尔多斯高原中最干旱的地区，有“旱海”之称。

这样就使得西套平原更像是一个孤岛，与游牧区的联系不像想象中那么紧密；对于华夏核心区的威胁，也不如前、后套平原大。当中央之国核心区与蒙古高原的游牧民族的博弈进入白热化时，西套平原这块原本不处在博弈焦点之上的土地，也由于它宜牧宜农的地理特点（不缺水的平原大家都有兴趣），成为双方在河套地区争夺的战略支撑点。其区位优势更随着河西走廊的开发，以及青藏高原的地缘势力作为竞争者，进入华夏文明的视线更加显露出来了。

就西套平原和河西走廊的地缘价值，要在汉帝国时期才会真正体现出来，到那时我们再做详细的分析。在先秦和秦帝国时期，农牧博弈的焦点区域还是在阴山一线。

如果秦帝国能够像后来的王朝那样，坚持个二三百年的话，我们应该能够看到秦经营西套平原的成果。最起码北逐匈奴的蒙恬，在修筑直道这条军事高速公路时，已经着手在进行另一项工程了，即在将燕、赵、秦长城连成一线的基础上，在狼山以南的黄河沿线，经由西套平原直到陇西高原的西缘，又修筑了一条新的长城，以便于将整个河套地区包入帝国的直接控制区。这样的话，无论是来自蒙古高原的匈奴人，还是尚未臣服于秦帝国，退缩于青藏高原边缘的戎人，都被隔离在这道防线之外了。可惜的是，同直道一样，这项纵深与非农业区交集太多的工程，最终也没有被后世的王朝续写下去。

第三章 秦人对瓯越和闽越的管理方式

第一节 东瓯国和闽越的地理位置

说完了帝国北御匈奴的事情，我们要把视线转向南方，去看看帝国南扩的情况了。帝国在这个方向的手，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主要是分布在东南沿海丘陵之上的“百越”族。如果由北向南为这些百越之地大致做个划分的话，我们可以将之分为：于越、瓯越、闽越、南越。而百越之地的这四个地缘板块与中央之国的关系，也是渐次渐远了。

所谓“于越”之地，我们在吴越争霸时已经解读过了。从族群的角度来理解，就是越王勾践所引领的部族；从所控制的基本地区来看，则是位于现在浙江省的西北部，仙霞岭——大盘山——天台山这条分水岭的西北侧。其核心部分包括宁绍平原、金衢盆地两块主要农业区。越国之所以能够兴起于“金衢盆地”，兴盛于“宁绍平原”，灭吴于“江东平原”，进而称霸中原，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在杭州湾以南的根基之地，所包含的河流走向基本是由南至北注入杭州湾（绝大部分区域由“钱塘江水系”所覆盖）。

河流的这种走向很自然地决定了“于越”族的渗透方向，并通过与江东平原的吴国争霸，进而成为华夏体系的一员。相比之下，仙霞岭——大盘山——天台山西南的“瓯越”之地，就与于越之地的地缘属性有着显著的区别。在这个被视为“外越”的地缘板块中，所有的河流都是向东流入东海的，其中的灵、瓯两江为境内的主要河流。前者的核心区在于灵江的入海口一带，灵江冲积而成的“温黄平原”，当下属于“台州”市所辖；而后者的核心区，则属于温州市所辖。瓯江与其南面的另两条体量较大的河流——飞云江、鳌江的下游地区，共同组成了“温瑞平原”。

坦白说，像温黄平原、温瑞平原这样的微型平原，在农业为本的古典时期根本不值一提。你甚至很难在一般比例的地图上，观察到这类体量只有几百平方公里的沿海平原。而现在，情况却有所不同了，海洋经济的兴起，为这些拥有海洋优势的地区提供了发展、兴盛的契机。只不过，缺少大块平原，仍然是瓯越之地的困扰（不种地，也要搞房地产、工商业）。

在最初的时候，瓯越之地是作为越国的边缘地区存在的。而到了吴越争霸时期，越国则已经将其纳为直接控制区。正是借助瓯越族在海上的技术优势，越国才有机会在与吴国乃至齐国的争霸过程中，占据上风。可惜的是，并不成熟的政治体制和文化，让曾经有机会称霸中原的越国，在勾践死后不久就陷入了内部分裂的境地。瓯越之地作为一个与内越之地有着明显切割线的地缘板块，又一次陷入了半独立状态。只不过这次的独立是在于越体系内的分割，即建立于瓯越之地的“东瓯国”，其王族亦为勾践的子孙。



秦·闽中郡地缘结构示意图



福建水系图

东瓯国并不是唯一在越国体系下分割出去的地缘板块，在瓯越之地的南部，浙闽丘陵的核心地区，还存在着一个地缘板块“闽越”。如果说瓯越之地所对应的地区，是现在浙江省的东南部；那么闽越之地所对应的，就是现在的福建省了。其实闽越之地，不能说是从越国分裂出去的。因为与前者一直存在半独立的政治体有所不同的是，闽越是在越国为楚所灭之后，由败退的越国王族向南迁移所扩张的区域。

并不是说闽越之地之前就没有人居住了，只不过在越国王族南迁之后，闽越族得以在文化属性上归入了“越国”体系，并由部落时代跨入国家时代。这就相当于在百越体系内的“华夏化”，可以想见，当年获得“闽越国”身份的闽越族人，在遇到南面两广丘陵上整体被归纳为“南越”的百越族亲戚后，就可以骄傲地声称，自己是曾经的中原霸主——越王勾践的直系子孙了。

曾经有不少人问过我，从地形图上看，无法理解同属一片沿海丘陵的浙江、福建两省是如何分割的。而实际上，无论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浙江、福建两省，还是两千多年前的瓯越、闽越两地，都有着明显的地缘分割线。其分割之明显，使我们有理由相信，现在的省界可以视之为东瓯国、闽越国的国界。

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连续的山脉是最容易成为两个板块之间的地缘分割线的。这一点，在福建和江西两省的划分上就比较明显。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武夷山脉仍将会是它们之间的分割线。而在浙闽丘陵这样高密度的山地中，辨识一条连续的山脉就变得非常困难了。我们曾经在越国部分对密度相对较低的浙南丘陵作过分解，并提炼出雁荡山——大盘山——天台山，这样一条内、外越的地缘分割线。

而在福建境内，这项工作会变得更加困难，以至于我们很难找到一条横向的山脉，

作为浙、闽两省的地缘分割线。不过值得庆幸的是，影响地缘关系的直接因素其实并不是只有山脉。相比于山脉所主要起到的是消极的分割作用不同，河流则在地缘关系的形成中有些更为积极的作用。被同一水系所覆盖的地区，往往能够具有更多的地缘共性。从这个角度，我们不妨来看看浙南、闽北地区是否存在共同的河流。

仔细观察《福建水系图》，我们会发现，在浙江、福建两省交界处，河流呈鱼排状沿两省的边界向东南、西南两个方向分流，并最终注入东海。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很难在浙、闽两省边界找到一条连续的山脉作为分水岭，但事实上，这条分水岭是确实存在的。之所以不像武夷山、仙霞岭那样的知名，很大程度是因为瓯、闽两地的干流大体都为西——东走向注入东海。这也意味着，这一带的主要山脉基本都偏南北走向（也可以理解为和海岸线大体平行），以至于东西走向的浙、闽分割线被切割得不成体系了。

不管怎么样，通过观察河流的走向，我们已经知道了，瓯、闽两地虽然在地理特征上具有诸多相似之处，但已经没有机会共饮一江水了。山地的阻隔，加上水路沟通的缺乏，使得两地在两千多年前便分割为了瓯越、闽越两个地缘板块。

第二节 福建河流与沿海平原的分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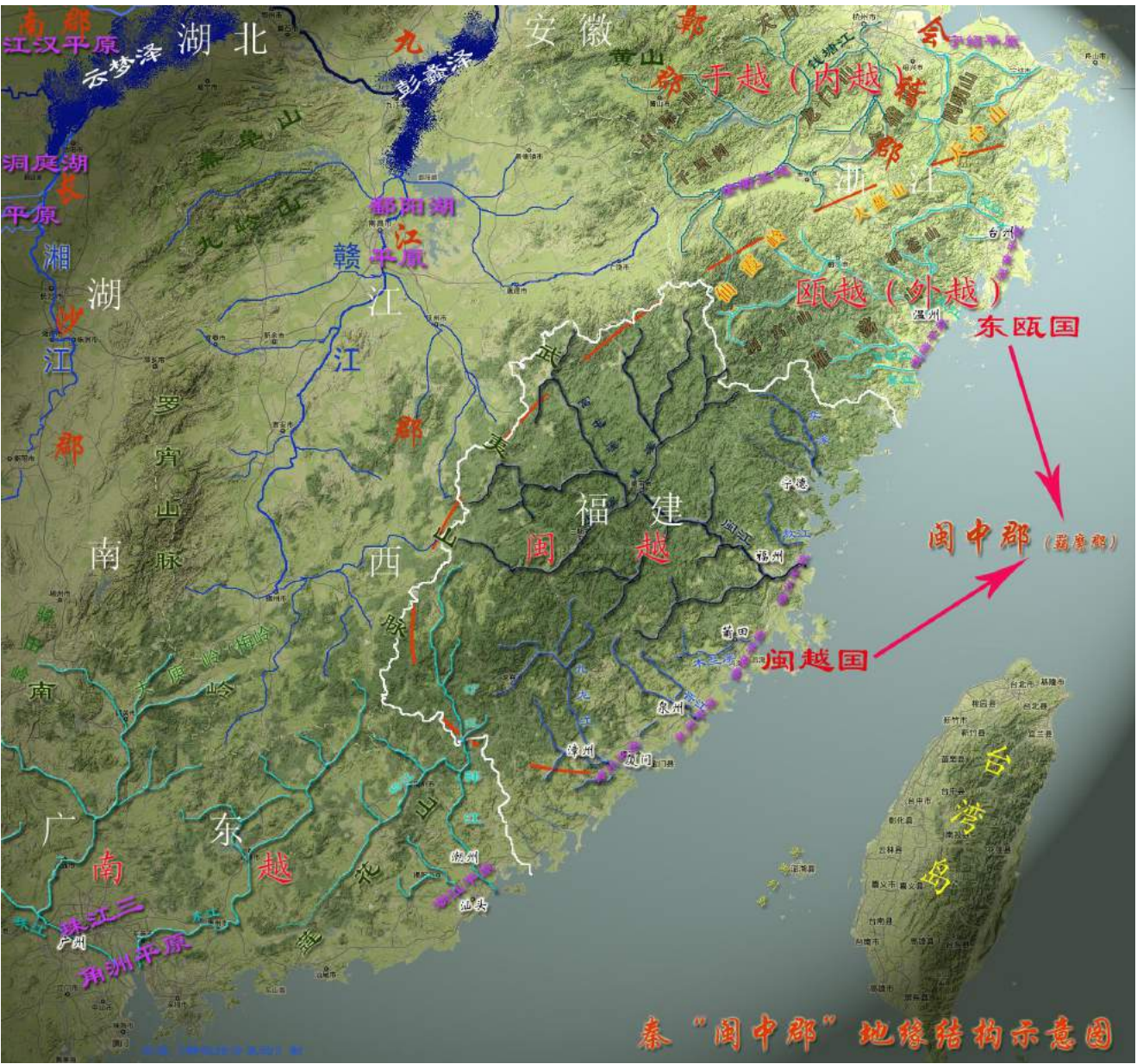
在中国各省的地缘划分中，有比较单纯而一目了然的。比如江西，东、西、南三个方向的山地环绕，加上北面的长江封口，使得它的地缘脉络用赣江水系来辨识就足够了；也有如浙江那样，稍显复杂，但各地缘板块之间有着明显的共性的（内、外越，以及向杭州湾以北扩展的江东地区）；更有如像江苏省这样，不知所谓的被强行切割在一起的。相比之下，福建的地缘关系是属于比较简单，且内部共性居多。

尽管从水系的角度看，福建境内有“五江二溪”之说（由北向南分布有：交溪、敖江、闽江、木兰溪、晋江、汀江，七大水系）。但居中的闽江水系，所呈现出的漂亮的树冠状流域，足以覆盖福建的中心区域；并使得如果你有机会控制住闽江的入海口，便可以溯江而上，沿着上游的诸多支流，将自己的控制区向腹地拓展。两千多年前的于越王族，就是由海路南下，并由闽越地区的那些河口开始他们的征程的（几百年前的西方殖民者，在新大陆上探险也是这样做的，无论水、陆，河流都是最好的方向指引者）。

虽然征服那么一大片高密度山地的想法，看着都让人感到不是一件那么容易的事（想想美国人在阿富汗的遭遇）。但征服闽越地区的难度，实际并没有想象之中那么高。由于所有河流无一例外的最终都指向海洋，而山地腹地又缺乏有足够农业潜力的盆地型平原。所以河流入海处的冲积平原，无一例外的成为所处流域的地缘中心。

鉴于这些和瓯越地区的温黄（温岭、黄岩）、温瑞（温州、瑞安）平原类似，

体量只有数百平方公里的沿海平原，本身并无可能支撑太多的人口。北方那些拥有大量人口和资源优势的政权，可以很容易地攻占这些具有地缘中心性质的“桥头堡”（所以时刻面临外部压力的缅甸军政府，才会把首都从临海的仰光迁到腹地临山的“内比都”）。唯一不利于外来征服者的就是在进攻路线上，也就是需要凭借海路，这需要有足够的海上实力。这对于已经融合了瓯越地区的“越国”遗民来说，已经不成为困难了。相同的族源和相似的文化，使得他们在进一步号令闽越腹地时，也不会存在太大问题。



秦闽中郡地缘结构示意图

从沿海平原的分布来看，福建沿海的主要平原，由北向南主要有：福州平原、莆田平原、泉州平原、漳州平原。虽然这些平原在中原政权看起来是那么的微不足道，

但他们的形成，除掉河流的自然冲积外，更是千百年来闽越族人不断围堤造陆的结果（不要以为只有荷兰人会这么干）。在整个东南沿海丘陵地带都缺乏与经济实力相对称的平原纵深的情况下，这类似的一幕仍然在各地上演。只不过原始的驱动力由农业转变为工商业了。

从整个福建省的地理特征来看，是中国诸省中少有的统一体。从地形图上看过去，满眼都是山，而且还是东南沿海丘陵中高度最高，密度最大的山地集合体。曾经有福建的朋友感叹道，与相邻的浙江、广东两省相比，那两个兄弟省份除掉山地之外，还能有些中等体量的冲积平原。而福建就只能在沿海那些河口去找点平整之地了。可以想见的是，在这样的地理结构下，平原的大小已经不是决定地缘中心的主要因素，能够由此影响多少腹地，才是谁能在这些沿海平原中脱颖而出的法宝。

由于闽江流域在闽越地区的核心地位，它的入海口处——福州平原，自然也就成为闽越地区的地缘核心，福州也由此成为福建省历史传承最为长久的城市。从闽江水系所覆盖、对应的区域来看，福建省的中、北（东北）部应该是最先受到外来族群辐射的区域。而相比之下，位于福建省东南角的“闽南”地区，以及福建省西南角的“闽西”地区，就有机会拥有更多属于自己的地缘特征了。

第三节 闽南和闽西的地缘特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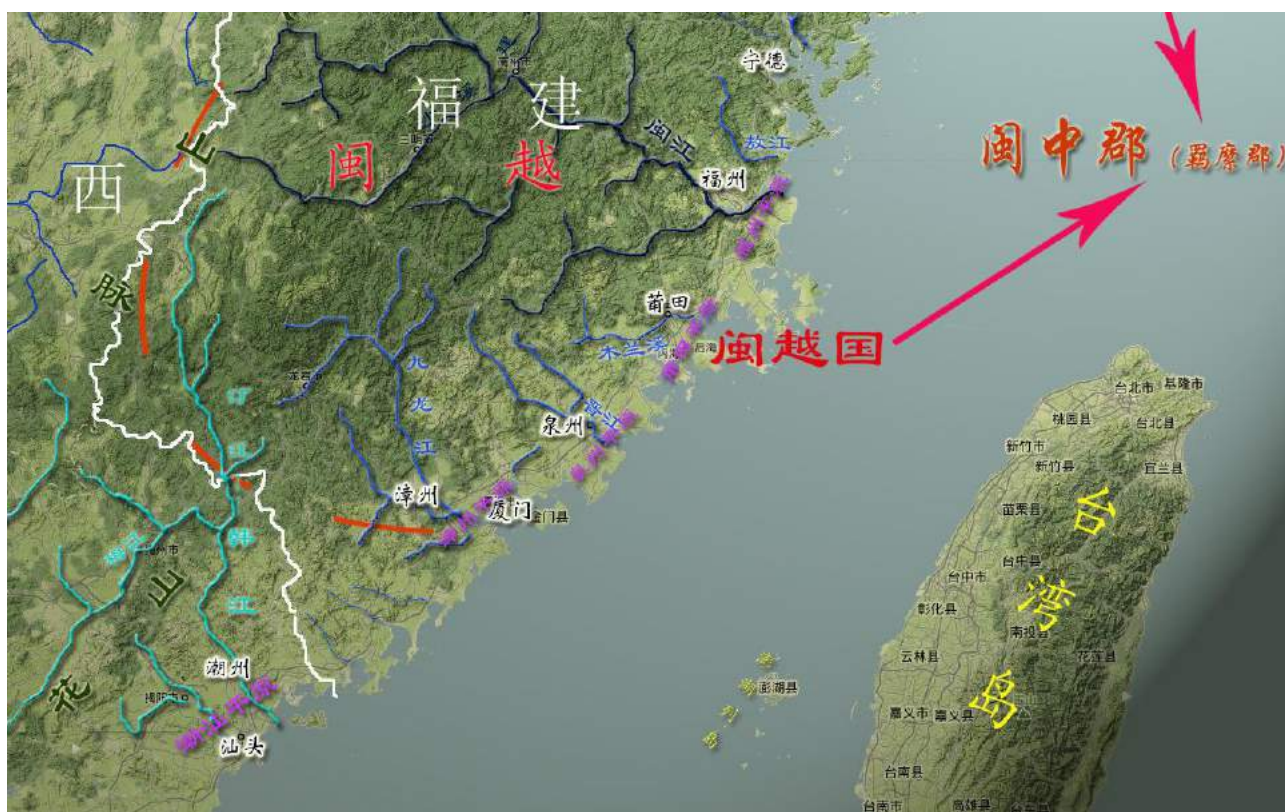
说起“闽南”这个地缘标签，在最近几十年中，算得上是出境率很高的一个名词。其之所以知名度大升，盖因为此地的海外移民时间长，数量多。其实在近现代的历史上，地少人多，又对海洋无恐惧感的东南沿海地区，向海外移民的情况是非常普遍的。而核心区为晋江下游的“泉州平原”、九龙江下游的“漳州平原”的闽南地区，其移民的历史和数量之所以最长、最多，很大程度是因为台湾岛的存在。正是因为这个与东亚大陆若即若离，地缘潜力巨大的岛屿存在，才开启了华夏民族大规模跨海移民的先河。

理论上，福建沿海的各地区，移民台湾岛的机会并不会太大差异。但实际上，闽南地区在这其中却占据了很大的地缘优势。这主要得益于，台湾岛的开发顺序是由南至北（原因在国际部分台湾岛一节中解读过了）；而与之相对应的闽南地区，由于与台南地区相对距离较近，中间又有位于台湾海峡南部的澎湖列岛以为中继。所以算是大陆地区与台湾地缘关系最为密切的区域了。在官方开启大规模移民，开发台湾岛之前，便已经有了频繁的民间接触。而到了官方招募移民入岛之后，有了上述地缘基础的闽南地区，自然也就成了移民的主要输出地了。

其实闽南地区的兴盛，并非始于台湾的开发。早在唐宋时代，闽南的“泉州”就成了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为什么历史选择了泉州，而不是福州这个传统的闽越中心地区，作为中国外海交流的窗口？并非因为位处闽南的泉州，有机会取代

福州在闽越地区的中心地位。恰恰相反，正是因为闽南地区不属于福州所在的闽江水系直接覆盖区，而没有机会成为外族入闽的第一选择。

当来自中原的汉族在西晋灭亡之后，第一次大规模地向长江以南地区全面迁移时，那些数量巨大的中原移民，只可能选择土著居民相对较少的地区进行开发（这和委派官员进行上任统治不同，一定要有足够的空间）。而之前属于次级地区的闽南地区，反而有机会借此机会，直接吸收技术上更为先进的中原文化（包括人口）。泉州所处的“晋江”水系，便是得名于这次南迁。正是有了这次中原文化的直接刺激，提升了闽南地区在闽越的地缘地位，在随后的唐、宋时代，泉州方才有机会成为帝国的海上贸易端口。当然，这种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由外部刺激所导致的地缘实力的提升，随着时间的推移，最终还是会和周边地区拉平的。



秦·闽中郡地缘结构示意图

也因为如此，我们现在看到的福州地区仍然是闽越之地的地缘中心。由此想想台湾岛，也是这样一个案例。如果恢复至正常的地缘状态，它的地缘潜力（特别是我们现在所看中的经济指标），并不会与东部沿海的任何一个省份，有着质的差距。

如果说闽南地区因为与台湾岛的地缘关系，在闽越的几个亚文化区中特点比较鲜明的话，那么由“五江二溪”中最西端的“汀江”水系所覆盖的“闽西”地区，所拥有的气质就会更特别一点了。闽西的特别，在于汀江水是唯一没有在福建省内自产自销的河流。闽越之地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独特的地缘板块，有一个重要的原

因，就是它的全部河流都是发源于自己境内，而这些河流的流出地，除掉汀江以外，也都是由自己境内注入东海。如果福建和周边地区都是平原地区的话，那么不能共饮一江水的影响也不会有那么大。可惜的是，面对这么高密度的山地，福建与大陆其他省份的交流会大受影响，这点在技术水平落后的古典时期，尤其明显。

从汀江的最终流向来看，它已经脱离了福建这块东南沿海丘陵中的高密度区，而是流入了一个比福建所有沿海平原加起来都要大的沿海平原群——潮汕平原。在这里，山地的密度已经没有福建地区那么高了。以潮汕平原的体量来看，以它为地缘中心，向北控制闽越的那些山地，也许是个合乎逻辑的想法。就像浙江的宁绍平原在越国时代，便可以控制浙南丘陵一样。问题是，潮汕平原除了一条汀江（下游广东境内称之为“韩江”）能够入闽以外，并没有其他河流可以将它的影响力渗透至闽越之地。而反过来，无论从地缘关系，还是体量上来看，以闽江为核心的闽越之地，要想南控潮汕平原也是不可能的。

如果不是在潮汕平原的西侧，紧邻着另一个更大型的三角洲平原——珠江三角洲平原的话，我们很有可能会看到一个以潮（州）、汕（头）为中心的省份出现，这在一些热衷于将中国细化为 50 个省级行政区的设想中，已经被很多民间规划家们设计过了。而就福建这块稳定而又自闭的地缘板块中，唯一会被认为有可能需要变动的，就是汀江流域了（被划入“潮汕省”）。作出这项设计的人，所基于的理由可能是汀江覆盖的闽西地区，与潮汕盆地北部的山地一起（下游韩江的另一条支流“梅江”流经的区域）都是客家文化的主要覆盖区。

其实我们刚才也说过了，自西晋时期开始的中原人口南迁过程中，闽南那些条件较好的沿海地区，也曾经是这些客居东南的中原汉族的栖身地。只不过随着时光的流逝，就只有位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处的这些山地，能够在地缘文化上形成鲜明的客家体系了（其他地区大都与当地融合了）。关于潮汕盆地与珠三角平原的结构，已经属于另一个大板块“南越”的范畴了，这也会是我们下一步的分析方向。之所以会在分析闽越之时，跨度这么大，主要是因为先秦及秦帝国时期，闽越并不是一个重要的地缘板块，所留下来的可供支撑的历史资料也少。

事实上秦帝国对于瓯越、闽越这两片沿海山地，并没有太大兴趣。更因为帝国在灭楚，并将内越之地划入直接管理的“会稽郡”后，原先臣服于楚国的瓯、闽两国也随之主动示好，在名义上成为帝国的一部分。假如没有已经华夏化的于越王族，将瓯、闽两地国家化，秦国也许要花费很大的力气，才能够彻底征服散落在这些山地之中的百越部族，就像秦军马上要在部落化的南越地区所做的那样。所以说，对于“入侵者”来说，一个地区拥有一个权威政权，并不是件坏事。如果这个政权不能强大到和你进行对抗的话，那么他就很可能帮助你顺利的接管政权（所以不要认为美国人就希望利比亚乱）。这也正是中央之国如此纵深的国家在王朝更迭时，往往很快就可以完成的根本原因（只需征服已整合好一方的割据政权即可）。

秦帝国对于瓯、闽两地的兴趣不深，还表现在行政区划的随意性上。秦人甚至没有花时间去区分两地的地缘差别，就将他们划在一起成立了“闽中郡”。而对这块帝国新土，帝国亦没有直接委派官吏，只是在名义上将他们的国王变身为管理地方的官员就够了。如果帝国有足够的时间，相信秦人在后来还是会花时间来整合、调整这片沿海山地的。毕竟在秦人高度集权的体制下，是不会允许有这样的化外之地存在的。只是帝国存续的时间实在太短了，在这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又有太多的事情要做。即使抛开北面的匈奴人，在百越体系内也还有“南越”这块，地缘潜力相对更大，却又不愿意臣服的土地需要去征服。也正因为如此，最终改变瓯越、闽越两族命运的时刻，被推迟了到了另一位伟大君主“汉武帝”时期。

第四章 秦帝国征南越选择的路线

第一节 珠江的广义概念及其水系

现在我们就来说说“南越”这个地缘板块。以现在的省级区划来对应的话，当年秦始皇所要征服的南越之地，基本上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广东、广西两个省级行政区。中国人在标记地名时，比较喜欢以方位来命名，而方位相左的同一组地名中，基本都会存在一个将之连接在一起的地理特征，以为纽带。像连接湖南、湖北两省的纽带是“洞庭湖”；区分河南、河北的河流则是“黄河”。至于说将广东、广西两省联系在一起的地理特征，是一条东西向横穿两省的河流：珠江。

说到珠江这个地理标签，情况其实有点小复杂，因为在不同的背景环境下，它所包含的意义并不相同。一般情况下，鉴于安于守土的古人往往并没有机会窥探一条河流的全貌，因此他们会依据自己的认知，为自己所处地缘板块的那段河流命名（山脉也是这样的）。而从现在地理学的角度来看，基本上会用下游最后一段河流的名字来代指整条河流。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规律，盖因为一条河流的下游是最容易认定的；并且在一般情况下，下游会因拥有较大型的冲积平原，而成为整条河流人口最密集，最具地缘潜力的区域。在这种背景之下，最后一段河流的知名度往往也就最高了。用在地理学中成为整条河流、整个水系的地理标签也是很自然了。

珠江的情况也是这样的，其最初所指的只是广州到“珠江口”这一小段的江水。而现在，我们所要分析的“珠江”，则是指珠江口以西，直至源头处的这段干流，也就是“广义”的珠江。事实上在广东人的理解中，“珠江”这个名字还有一层特定的含义。在这层认知中，珠江并不只是一条河流，而是三条由不同方向（西江、北江、东江）流出，最终汇入珠江口的江河总称（类似的地理概念，还有渤海湾的“海河”）。而其中的西江，则是我们所要重点解读的连接两广的广义“珠江”的下游（广东境内）。之所以要花时间做这个说明，主要是因为不想在地理认知上引起误会。如果没有特别说明的话，在接下来的内容中出现的“珠江”，会是将“西江”作为最后一段河道的，广义上的“珠江”。

整个珠江水系所涉及的省级行政区有云南、贵州、湖南、江西、广西、广东五省，其中的一条支流“左江”甚至还发源于越南境内。单从这个数字来看，会让我们感觉珠江水系是一条影响面非常大的河流。但从所附的“珠江水系示意图”上我们可以看出，云、贵、湘、赣四省所涉及的都是珠江的支流（包括现在被认定为正源的“南盘江”），而珠江的核心区域，也就是中、下游地区，无论干流、支流，绝大部分还是在两广地区。如果两广地区与湘赣地区的地缘分割线——南岭，不是由一系列偏南北走向的小型丘陵体所组成，而是由一条整齐划一的高大山脉的（如赣、闽边

界的武夷山脉）组成的话，那么相信湘赣两省与珠江水系应该不会有一丝交集。



珠江水系示意图



红水河（珠江上游）

不过也正是因为“南岭”的这种不算十分紧凑的地理结构，才为打通珠江——长江两大水系的运河工程提供了机会。而这一点，对于南岭以南的“岭南”地区能够稳定地成为中央之国的一部分，至关重要。开启这一伟大运河工程的，就是同样伟大的秦帝国和秦始皇帝。尽管它的最初用途充满着血腥和暴力，但战争却往往能够成为技术的催化剂。如果没有秦人开凿“灵渠”以征南越，相信岭南地区华夏化的进程会被大大推迟。关于灵渠的设计究竟是怎么样的，又是怎样影响了中央之国的地缘结构，是我们后面所要重点解读的。

第二节 广西盆地的地理结构

现在我们需要了解另一个问题，就是广东、广西是如何进行行政分割的，二者之间的地缘分割依据又是什么？单从水系的角度来看，我们并无法看出广东、广西的分割依据来。珠江这条东西纵横岭南，在中国排行第三的河流，本身并无法承担地缘分割的任务。而它的几条主要支流，也并没有成为二者的分割线。既然从“水”的角度无法为我们解惑，那么我们就需要从另一个重要地理特征“山”的角度来看看问题的根源在哪了。

作为“东南沿海丘陵”的一部分，两广地区的山地、丘陵分布密度并不像福建那样密集。从整体来看，我们可以看出整个岭南板块的西部（珠江中游地区），呈现四周高，中间低的“盆”状结构，这个相对处于封闭状态的盆地，地理名称便叫做“广西盆地”，也是广西作为一个省级行政区存在的地理基础；而珠江下游地区的山体，则以“珠江口”这个喇叭口为基点，大体呈扇形排列，由于东部地区的核心区“珠江三角洲平原”南面临海，相比于盆地状的广西来说，广东这种形态的扇形地理结构，更能呈现出一种开放的状态。

在我们以往的叙述中，一说到盆地，大家都会想到一个四面是高山，腹地为连片冲积平原的形态。这种类型的盆地，核心区不言而喻，就是它的中心平原区。要是用这种角度来观察“广西盆地”的话，估计会有些失望。因为这个盆地并非典型意义上边缘整齐，腹地一马平川的盆地，其边缘主要由一些南北向排列的山体组成（比较明显的，是临近云贵高原的，诸如青龙山、凤凰山、九万大山等山地）。这些山体的形态，使得“广西盆地”的边缘形态，更像是一个边缘被敲出很多缺口的面盆，而那些汇入珠江的河流，也正是由这些豁口处进入广西盆地，并冲积出相对独立的河谷平原。

一般情况下，不管周边山体的形态是否完美无缺，众多河流汇集到干流之后，总是能够冲积出大片的冲积平原的。不过广西盆地的情况比较特殊，除掉外围的一级山体之外，其腹地依然为体量次一级的山体所填充。这些山体的存在是那么的明显，以至于你无法直观的在地形图上找到一处大一点的、呈面状的平原区。占据广西地区四分之一强的平原地区，主要是由呈条状的河谷平原所构成的。而珠江两岸的河谷平原在与主要支流的竞争中，并不占据优势。

对于为广西地区做行政规划的政治家来说，为每一条河谷平原找一个地缘中心，并根据其体量设置一个行政级别并不算难事，难的是为整个广西地区找一个地缘中心。从直观的角度看，在广西盆地内体量相当的珠江一级支流（对应的河谷平原也同级），就有柳江、桂江、郁江等。无论你将行政中心放在哪里，都会有相当多的区域不会心悦诚服的接受这种安排。

单纯比较广西北部地形，并不见得比广东北部地形更加复杂。虽然广西的

北部由于临近云贵高原，山体的体量要更大、更高些。如果不是因为广西盆地的南侧，存在一系列由铜鱼山——罗阳山——六万大山等山体组成的分水岭，将广西腹地封口为一个盆地状结构的话，那么地势与广东同样呈北高南低的广西地区应该会广东一样，形成一个类似于珠江三角洲平原的沿海河口平原，并天然的成为地缘中心。即使广西北部河流仍然会汇入东西向的珠江，但起码南部的那些支流（比如左、右江）就有机会自成体系，汇集在一起自流出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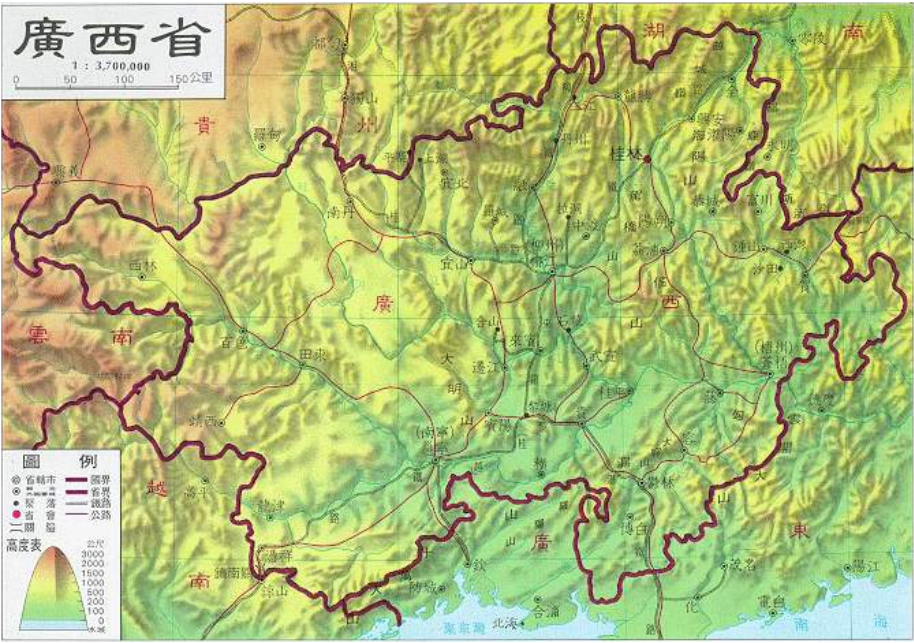


秦·南越地缘结构示意图

地形结构的差异，造成了广西盆地内的河流虽然占据了珠江水系的大半，但最终却不得不万宗归流的经由珠江汇入广东境内，并由珠江口出海。而由此造成的地缘现状，就是广东地区相比于广西地区更加强势。对于广西来说，并非不存在改善自身地理结构，并提升自己地缘潜力的机会。正如我们在《秦·南越地缘结构示意图》上所看到的那样，属于珠江水系的广西盆地，并非广西的全部。在整个两广地区，除掉珠江水系所覆盖的地区以外，最起码还有两个地缘板块呈相对独立状态，一个就是我们之前简单交待过的位于闽、粤交界处，以潮汕平原为核心的潮汕地区；另一个则是位于两广交汇处，广西盆地以南，珠江三角洲以西的沿海地区。这块北部由弧状的六万大山——云开大山——云雾大山——天露山所切割出来的，不属于珠江水系的沿海区域，如果加上其南部的雷州半岛，轮廓酷似一个蘑菇。

后面我们会分析到，这个次一级的地缘板块，对于拥有珠三角那样优越地理条件的广东地区来说，可能并不重要，但对于地形封闭的广西地区来说，却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能够从行政上分割到这一部分，广西地区所得到的不仅仅是成为一个

沿海省份的机会（基于广东地区的地缘优势，在民国时期，这个蘑菇基本全属广东所有，整个广西省被限定在广西盆地中）。



民国时广西省

（以当时的认知来说，蜀地的岷江，就是长江的源头了），为他们进一步向珠江流域渗透提供了多条战略路线。如何在这些战略路线中选择最佳方案，具体又要采用什么样的战术路线，是我们接下来的分析重点。

第三节 秦人没有从云贵高原征南越

如果以河流水系为辨识基础来划分中央之国核心区的地缘结构的话，那么江、河、淮、济，这四渚可以说是先秦时期的四条基础河流。中央之国的绝大部分河流都在归入这四条河流之后，再流入大海。唯一例外的，就是燕人在燕山以北的开拓，将自成体系的辽河体系纳入了中央之国的直接管辖范围。不过正如我们后来所看到的那样，辽河流域作为农、牧、渔猎三类族群所争夺的四战之地，华夏民族在此的存在并不是十分的稳定。相比于北线的不稳定，中央之国在南线的开拓却还算顺利。自从秦人开启向珠江流域的渗透之路后，这一地区的华夏化趋势就再也没有被逆转过。

从地理结构来看，南越所处的珠江流域，其北部自西向东分别是云贵高原、武陵山区、以洞庭湖平原为核心的湘江流域、以鄱阳湖平原为核心的赣江流域，以及同为东南沿海的浙闽丘陵。而从帝国建立之初的行政归属而言，西端的云南高原、贵州高原，分别为暂时未被秦国征服的“滇国”、“夜郎”国所控制。需要说明的是，

关于两广地区现实和未来的地缘结构变化，我们后面再来解读。在秦帝国准备南征“南越”之时，秦人还不会去考虑后世这些地缘政治上的问题。对于急于向南扩张的帝国来说，选择什么样的路线进入“南越”这块封闭的地缘板块才是当务之急。对于中央之国来说，整个长江流域作出核心区域的融入

这两个边缘国家只能说是云南、贵州高原的国家化代表，并不能用中央之国的政治结构方式来衡量。中央之国的主人对那些广布其间的“蛮夷”部落，用了一个“西南夷”的总称来进行概括。

至于说云贵高原这些“西南夷”和分布在两广丘陵的“南越”族群之间有什么样的亲缘关系，从古到今也有不少人在研究。坦白说，意义也不大了，往上数十万年，都是从非洲走出来的。以云贵高原和两广丘陵的地理结构差异而言，就算是源出一门，分离个几百年，也足以形成差异化的地缘文化了。从秦人的角度看，应该不太有兴趣去搞清他们之间的区别（两千年后倒是有人比较有兴趣，并且帮助现在的我们，在身份证上标示出了“法定”的民族归属）。始皇陛下所关心的，是这些地区是否能够成为帝国的一部分。

按照地缘关系的远近来看，秦人最开始应该对云贵高原比较感兴趣的。因为到帝国一统天下为止，秦人已经控制四川盆地达百年之久了。巴蜀之地后来作为中央之国核心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央之国在西、南两线的地缘扩张是非常重要的。正是有了这个农业、人口潜力巨大的板块以为基地，中央之国在云贵高原、青藏高原的渗透才能够进行下去。时至今日，前者的华夏化进程已经成功的结束了，而四川盆地在云贵高原华夏化进程中所打下的最为显著的烙印，就是让四川官话成功的覆盖到了云贵高原；至于说后者，现在的我们仍然要借助四川盆地这个基地来加以控制。单从军事地理的角度，也可以看出四川盆地在西南地区的核心地位，四川、重庆、云南、贵州、西藏五省（区）归入“成都军区”管辖，就是这种地缘关系的体现。

虽说在我们这些后人看来，四川盆地对于整个中央之国版图的形成，主要功绩在西、南两面。但在秦人一统天下的进程中，这两个方向却暂时还没有成为重点。因为作为战国诸侯之一的秦国，最需要的是借助四川盆地的地缘优势，去消灭他们主要对手之一的“楚国”。也就是说，秦国政治家们的眼光时刻朝向的是东方，是怎么样借助长江之利战胜楚国。在这种情况下，云贵高原这种山高水恶的地区，并没有被秦人列入主动征服的范围。真正让秦国意识到云贵高原战略作用的，是楚人试图在云贵高原开辟第二战场，派遣“庄筭入滇”的那次远征。只不过在秦国卓越的战略家——司马错的指挥之下，秦人通过南征武陵山区的楚“黔中郡”，而使楚国的战略构思破产，庄筭也只能留在云南高原做“滇王”了。

司马错的这招“釜底抽薪”，在战术上是极为成功的。但也使得云贵高原在秦国的统一进程中，没有机会成为博弈的主战场。也不能说秦人就没有为日后征服云贵做准备，毕竟这种战略上的威胁已经被秦人认识到了。秦人所做的努力，就是开辟一条进入云贵高原的道路，以为日后征服这些西南夷做准备。如果可以选择的话，沿现在的河谷水陆并进会是最佳方案。而从水系的分布来看，理论上由蜀郡溯金沙江入云南高原，和由巴郡溯乌江而上入贵州高原，是最有可能的选择。但在实际操作中，前者最大的问题是落差很大的金沙江河谷，无论是陆地道路，还是水面运输，

都很难成为交通大动脉。这一点直到现在都没有大的改观；至于说由乌江入贵州高原的方案，从距离上来说却是绕了个大圈子。并且依靠水道的话，并不能直达夜郎国的核心区（夜郎的核心区在北盘江一带，属于珠江流域了），这使得这条远征路线的价值大打折扣了。



秦征南越战略备选方案示意图

既然利用现成的河流通道不太现实，那么秦人倒不如尽量开辟一条由四川盆地出发的直线道路，到云贵高原的核心区去。这条道路的开发工作，在李冰做蜀地郡守时就在做了。可以想见的是，在云贵高原这样的山地环境下，又没有现成的河谷大道可以利用，这项工程有多么艰难。所以后来开辟出来的通道，其宽度只有秦驰道标准的十分之一，谓之“五尺道”。关于五尺道的走向，会放在南越部分之后。现在串联这些地缘背景，是让大家清楚，由于地缘政治和地理结构的原因，让秦人在一统天下之前，就向云贵高原渗透是不现实的。而在帝国统一之后，云贵高原也并没有成为帝国扩张的首选地区。毕竟要想依靠那条宽仅五尺的山路作为补给线，难度太大了。

既然秦人暂时没有由四川盆地南征云南、贵州的计划，那么在《秦征南越战略备选方案》的计划中，自然也就不可能走最西线“蜀郡起，南服滇国，顺江入南越”的方案了。也许沿着当年“庄研入滇”的另一条可能路线，由长沙郡起，沿沅水向西，过黔中郡先行征服夜郎，再顺北盘江而下入珠江干流，进而征服整个南越地区，也是一个可行的方案。但楚人当时这样走，是因为他们志在征服云贵高原核心区，

以开辟攻击蜀地的战场。而如果你把攻击目标定在两广丘陵的话，就会发现这实际上还是绕了个大圈子。比之由湘、赣流域的长沙、九江两郡，越过南岭直入南越腹地的方案，所欠缺的不仅仅是交通距离的问题。即使秦人有信心一战征服夜郎，也未必有信心把这块生地马上转变为稳定的战略基地，为他们的南征计划服务。

不过从地缘关系上看，由夜郎国入南越之地，始终也是一个选项。所以在后来的汉帝国时期，汉武帝试图重新征服更为强大且国家化的“南越国”时，也曾经想过打通过这条备选通道。只是后来的事实证明了，在没有直接控制一个地缘板块时，就将之作为征服另一个地缘板块的基地存在多么大的风险（那些原本答应归服帝国，并随之出征的部族们出现了叛乱，这路大军并没有发挥作用）。不过贵州高原与华夏核心区的这次交集，却为现在的我们留下了一笔“重要”的文化遗产。就是在汉朝使者出访“夜郎国”时，诞生了“夜郎自大”的典故。这笔遗产是那么的丰盛，以至于现在湘、黔、滇、桂几省都有地区为了做“正宗”夜郎传人而不遗余力。

第四节 秦人没有从海路征南越

理论上秦人南征“南越”，或者单纯从地理结构上说，从长江流域进入珠江流域，有五套备选方案（详见《秦征南越战略备选方案示意图》）。基于地缘政治和路线的问题，由四川盆地的蜀郡南入云南高原，征服滇国后，再沿南盘江（目前被确定为珠江正源）而下进入两广丘陵地带；或由巴郡或黔中郡，溯乌江或沅水而上，入贵州高原征服夜郎国，然后沿珠江支流北盘江而下，进入岭南的这两套方案，在帝国急于征服南越的时候，都不会考虑。如果秦国的国祚能够再长些，相信云贵高原迟早是帝国的盘中菜，就像后来的汉武帝在征服南越国之后，回头再溯北盘江而上，把贵州高原纳入帝国版图一样。不过有一个问题却是我们所感兴趣的，就是帝国为什么那么的急于征服“南越”，甚至在帝国刚刚建立后就着手准备了。

对于匈奴这个现实的威胁，秦人无论花多大代价都是值得的。毕竟如果让这些已经南侵的游牧民族得势的话，丢掉的可不仅仅是河套那块可有可无的土地了。而“南越”所属的这些百越族群，对帝国的威胁还只是潜在的。一般情况下，应该在北线战场已经稳定的情况下再展开的。但实际上，这两场战争是在同时准备的，并且最后结束的时间亦相差无几。也就是说，秦人是在同时用两个系统打互不影响的两场战争。

秦人这种急于南进的做法，其实也是有他的道理的。一方面，帝国虽然已经建立，并且将六国的大部分贵族都迁到了咸阳附近，以避免这些遗老遗少们作乱。但六国因为战争而建立起来的庞大军事力量，仍然有可能对帝国的安全造成威胁。单纯的将其解除武装，变身为民固然是主要的方式。不过用这种方式对付那些六国军队中的职业军人，难度就比较大了。比较两全的方案，就是为他们找到一个用武之地。

而将他们纳入秦军的体系,并立即投入战争状态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从地缘关系上看,南征的资源主要来源于吴、楚故地)。同样的问题,在两千多年后的日本也发生过。那些幕府时代留存在下来的职业军人——武士,最终也在日本的扩张中发挥了作用。所不同的是,这些冷兵器时代的军人,很难成为现代化的军队。因此以“浪人”的标签为日本军部所用,在日本扩张过程中充当准军事力量。而这个问题,在两千多年前的秦帝国就不存在了。



秦征南越战略备选方案示意图

另一个让南越迅速进入帝国扩张计划的原因，是因为“海”。我们曾经分析过，东亚大陆与欧洲大陆对于自身地理结构的认识有着本质不同，并由此引发了文化、制度上的差异。与欧洲人最初所感受到的“地中海”式的地理结构不同，中央之国的子民们，认为自己所在的世界是一种“海中地”格局。如果有机会将自己的核心区延伸到南海的话，其意义就不能单纯用农业潜力来衡量了。正是这种理想状态的地缘结构，让因高度集权而拥有空前力量的秦始皇，这么快地作出了南征决定。从地缘格局上来看，即使秦始皇当时不作出这个战略决定，后面的汉、晋时期，中央之国也会向南渗透，并最终尝试向中南半岛扩张的。但秦始皇的这个决定，无疑大大加快了这个进程。这也就是为什么云贵高原没有率先成为扩张对象的一个重要原因。

既然秦始皇南征“南越”，是为了将自己的版图南扩至海，那么另一个问题就出现了。海路有没有可能成为秦军南征的主要路线呢？单纯从地图上我们也可以看

到，以江东的“会稽郡”为基地，沿东南沿海南下，以“闽越”为中继，可以直接攻击南越重地“珠江三角洲”。得手之后，再溯珠江而上征服整个岭南地区。要是让现在的我们，或者是160多年前的英国人来选择的话（鸦片战争时期），这条沿海路线一定是主要的攻击路线。至于说两千多年的秦人，还没有勇气作出这个决定。

秦人没有选择海路，有两点考虑。一是从黄土高原走出的秦人，对海洋是十分陌生的（内陆河流就不同了，虽然没有吴楚地区对舟楫的熟悉程度高，但水路运输也是最重要的交通方式），让帝国准备三千童男童女去赌“长生不老药”是没什么问题的。但要是把几十万大军的安全交给海路，秦人在意识和技术上还没做好这个准备。更何况现在的瓯越、闽越地区虽然臣服于帝国，并规划了一个“闽越郡”的建制。可那是在你没有侵犯到他们实际利益的情况下作出的妥协。一旦帝国从海路出发，需要这些“越人”提供补给和支援时，瓯、闽两族和他们的“南越”兄弟站在一起的几率就非常之大了。

第五节 由湘江流域入南越的路线

既然海路和云贵高原都不是秦人的选项，那么就只剩下由湘江流域的长沙郡，以及赣江流域的九江郡穿越南岭的战略路线了。从基地的成熟度和直线距离来看，这两套方案无疑也是最佳的路线。所不同的是，前者可以在是先入广西盆地，还是直达珠三角的路线中做选择；而后者则是直指南越的核心地——珠江三角洲。

这样看来秦人可能要再花点时间考虑下他们的战略路线了，从基地的成熟度（楚人对湖南的开发肯定要早于江西，并且湖南可以直接对接长江流域的核心区“江汉平原”）和选择的余地来看，前者似乎（长沙郡）更具优势些。这也正是为什么南北交通大动脉的京广线，早在铁路进入中国不久后的1897年，便开始修建了（选择的是经由湖北武汉过江，再从湖南的郴州入粤的路线）；而穿越大别山，经由江西赣州入粤的“京九线”，直至一个世纪后为了迎接回归的香港，方告建成的根本原因。

比起今人在修建铁路时要考量再三，并且还要地区博弈一番，秦人当初可要大手笔得多了。兵多将广的他们并没有再去细分这两套方案的优劣，而是两个战略方向都成为出击的路线。这倒符合中国传统的军事理念，喜欢多路出击，既能遥相呼应，又能互相竞争。当然，这要在本钱足够厚的情况下才能做，否则很可能让对手个个击破。显而易见，岭南的那些越人部落，在正面战场并不具备这个实力。

战略方向已定，秦人再要考虑的就是战术路线了。从“南岭”的结构来看，要想穿越它并不算是千难万难的事。因为“南岭”并不是一条连续的山脉，而是由众多大致呈南北走向的山岭东西向排列组合而成的。这些山岭当中比较知名的有五条，即：越城岭、都庞岭、萌诸岭、骑田岭、大庾岭，所以南岭也被称之为“五岭”，两广地区也被叫做“岭南”了。如果不经人工开发，这些植被茂盛的低山、丘陵

之间并不会存在天然的道路；但如果要开发的话，山岭之间开辟道路的条件，要比在太行山脉中穿行好得多了。

尽管说山岭之间都存在通行的可能性（必要的话，从海拔最高点通过也可以），但从开发、维护的成本来看，秦人和以后入岭南的王朝并不需要这么做。一般情况下，他们只需要按照我们刚才所分析的三个战略方向（由湘入桂、入粤；由赣入粤），选择合适的岭口修筑三条官道即可。而影响最后结果的决定性因素，并不仅仅是岭口通行的难度，而是河流。在漫长的旅程中，河流不仅能够提供淡水补给，建立战略基地，更能够直接成为交通路线，以水力运载大批的人力和物资。这点对于在平原丘陵相间，河泊众多的长江以南地区，尤为重要。需要注意的是，秦人所要考虑的，不仅仅是要依靠水力运输尽量的走完到达南岭的道路，也要考虑在穿越五岭之后，是不是能够尽快到达另一条河流，以为他们在南越腹地的行动提供便利（即使不考虑下一步也走水路，河谷通道也更容易通行和建立补给基地）。



秦入岭南路线示意图

鉴于河流在道路通行上的重大作用，秦人选择了三条路线作为进入“岭南”的战术路线：一是由湘江南下，在西南方向由现在的永州（柳宗元笔下很多蛇的那地方），溯湘水而上直至湘江源头处（广西兴安县）；由此弃舟登岸，穿越长江、珠江水系的分水岭，到达珠江支流——桂江的上游（漓江），然后沿珠江水系扩张。需要指

出的是,这条路线在穿越分水岭时存在天然优势,即存在天然的孔道拉平两端的地势,所以自古以来都是湘、桂之间的主要通道。在秦人的南征过程中,它还将要发挥更为重要的战略作用。

第二条线路也是沿湘江南下,在衡阳与第一条路线分道,入耒水至郴州,然后沿骑田岭西麓过岭,再进入珠江(北江支)支流“连江”,最后直入珠三角。其实这条路线并非是这一带唯一的路径,沿着骑田岭东麓过岭的话,也很快能够看到另一条珠江支流“武江”。如果顺江而下或沿河而走的话,与前者的距离相差无几。为了断绝这种可能性,后来封关以立国的“赵陀”,在武江由岭上进入河谷平原之处也设立了一座城邑,后人称之为“赵陀城”(现广东乐昌市西南);至于武江与珠江(北江支)的合流处,后来则有一个更为知名的战略据点“韶关”。

由于现在的京九线选择走的是武江通道,而非连江通道,所以大家对于前者的熟悉度应该更高些。之所以今人的选择和两千多年前的秦人略有不同,主要是因为韶关这个位置更具有战略性,也更有条件成为粤北的门户。前面说过了,路线其实可以有多选的,但主要通道(或者说官道、驰道)一个时期一般只会修建一条。像如果要由湘入桂的话,从永州向南,选择湘江的另一源头“潇水”,走都庞岭口也可以入漓江;或者从萌诸岭以西通过,亦可入广西境内的另一条重要珠江支流贺江(河谷中心为贺州市)。

可以说,五岭之所以能够在南岭的诸多山岭中脱颖而出,成为知名的地理标签,就是因为它们都对应有沟通南北的道路。虽然这些道路并不一定在同一时期都会使用,具体修筑的时候,选址也可能会略有偏差。韶关之所以在广东享有“粤北门户”之称,并成为最初南北铁路大动脉的选择,是因为它能够据守连通湘——粤、赣——粤的两条通道。

第六节 由赣江流域入南越的路线

如果说由湘入粤,还能在武江、连江两条路线中摇摆的话,那么由赣入粤的通道,长期以来就由北江的另一条支流“浈江”所垄断了。而韶关所处的位置,正是武、浈两江的交汇处,并由此合流成直入广州的“北江”。相比于广东境内的浈江,这条赣——粤通道的另两处地缘坐标:大庾岭(梅岭)和梅关,知名度要高上许多,也更容易唤起大家的记忆。

在中国,“梅岭”之名,应该说是随着陈毅的《梅岭三章》被选入初中课本而普及开来的。所谓“梅岭”指的就是五岭中最东端的“大庾岭”,因岭上植满梅花而得名。当年留在江西打游击的陈毅,之所以活动于此,应该并不仅仅是因为当地的地形易于躲藏,还因为梅岭一带跨两省的地理位置,有利于寻找到政治空隙。这就像在城市中谋生的小贩,喜欢在两区交界处摆摊一样,一旦有中国战斗力最强的“纪

律部队”——“城管”出现，便可以迅速跑到他们无管辖权的地方去，让城管们干跺脚。所以大家不要觉得“地缘政治”这门学问只能是政治人物的专利，它其实随时随地可能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只不过大部分人没有意识到罢了。



梅岭古道

大庾岭上的“梅关”最早就是秦人所设，因此也被称之为“秦关”。在秦人南征岭南的故事中，它的正式名称叫“横浦关”。至于此关南北所呼应的河流，则分别是岭北的赣江正源“章江”；以及岭南的北江源头“浈江”。作为江西的母亲河，赣江水系可以说是在诸多省份中和行政区贴合得最紧密的。河流基本上自产自销，且为同一水系的结构，加之长江北岸横亘着“大别山”的腹地，使得江西要比它的邻居“湖南”显得更为封闭，在地缘政治舞台上亦算不上重要地区。这在战乱频繁的古典时期，其实也是一件好事，至少每每在战乱之时，赣江两岸总是能够更大限度地保存人口，并在战后或主动或被动地为南方兄弟省份输入人口。

我们都知道，江西的简称是“赣”，这个“赣”字以前也写作“𣸵”，由“章”、“贡”二字组成。其所指的就是章水和另一条河流“贡水”合流而成了“𣸵水”。两水合流处，便是在现在赣南的地缘核心“赣州市”。可以想见的是，以赣州的地缘位置，秦人当年必定也会在此设立南征的战略基地。两千多年后，为了清剿覆盖于章、贡两水之侧的红色政权，赣州又一次出现在了地政治舞台之上，成为国军的前线指挥中心。

溯章水而上，翻越大庾岭的秦军，很快可以顺浈水而下入北江，直指珠江口。在那里，始皇陛下的战士们就可以看到帝国理想中的南部边界——南海了。在浈水汇入北江之前，它会与我们前面的介绍过的，承担由湘入粤任务的“武水”汇合，并形成一定体量的冲积平原。而从防御的角度看，浈、武两水的汇合点可以作为支援南岭防线的战略基地（从珠三角的政权角度来说），并构筑第二道防线。这个点，现在也就是粤北门户“韶关”的所在地。

现在我们应该清楚，具有双重交通优势的韶关，为什么能够成为京广铁路入粤的重要站点了。不过我们前面也说过，秦人最初所选定的湘——粤通道，并不是走武江一线，而走与之隔山相望的“连江”。这样的话，最起码秦人和后来的南越

国时期，韶关这个位置的战略作用，就不如后来这么重要了。如果也同样要为湘——粤、赣——粤两条交通线，再寻找一个交点，并建立军事据点以为支撑的话。那么连江汇入北江的这个点，会是最好的选择。选择这个点建立第二道防线，同样能够抵挡由浈水入北江而来之敌。

处于进攻方的秦人，暂时可能还不会关心这些战略要点在防御上的重要作用。但后来封关以自守的南越国，就必须关心这点了。依据我们刚才所分析的情况，断绝与中原往来的南越国，封闭了大庾岭上的“横浦关”，连江上游的“阳山关”，并在连江入北江处（连江口镇）构筑了“湟溪关”。有了这样一个互为依托的三角形防线，南越国在珠江三角洲的国都，安全就有了保障。



秦入岭南路线示意图

唯一让人感到担忧的是，连江口“湟溪关”这个位置，过于深入南越腹地。一旦对手突破了横浦、阳山所组成的第一道防线，他们在岭南地区所获得的纵深就太多了（从当地获取资源的范围也更广）。正因为如此，在后世中，位置更偏北，同样能够控制两条南北交通干线的武、浈两水交汇处“韶关”，更容易受到青睐，承担北方门户的重任。

第五章 秦帝国征南越时修筑灵渠

第一节 秦人为运送补给而修筑灵渠

有了进入岭南地区的路线，并不代表秦人的南征就会一帆风顺。无论是当年试图征服南越的秦人，还是后来想要肃清赣南的国军，所面临的问题其实都是一样的。那就是拥有更多资源的他们，能够很容易的占据那些处在地缘核心位置的平原地区，并控制交通要道。但要想进一步肃清分布于山地、丘陵之中带有游击性质的武装力量，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必须要做好持久战的准备。为了做到这一点，后来的国军用了差不多四年时间，方才迫使红色政权从中央苏区退出，并走上“长征”的路程。相比国军在赣南“围剿”红色政权的行动，秦人在岭南所遇到的困难则要更为复杂。

秦人的困难主要在于他们无法保障前线部队的补给，以至于在与南越部落的不对称战争中，无法步步为营的展开持久战。说到这里，我们要分析一下秦军当时的状况。有一个误区认为，秦人一开始就以战役的形式，向南越地区派遣了 50 万大军进行征伐。而事实上，秦人最开始并没有去做好持久战的准备，也没有一次性地准备这么多的人力资源。面对“南越”这样以分散的部落形式覆盖的地区，秦人最开始的进入，并不会像攻打正式国家那样遇到逐级抵抗，需要沿路恶战方能攻至对方的核心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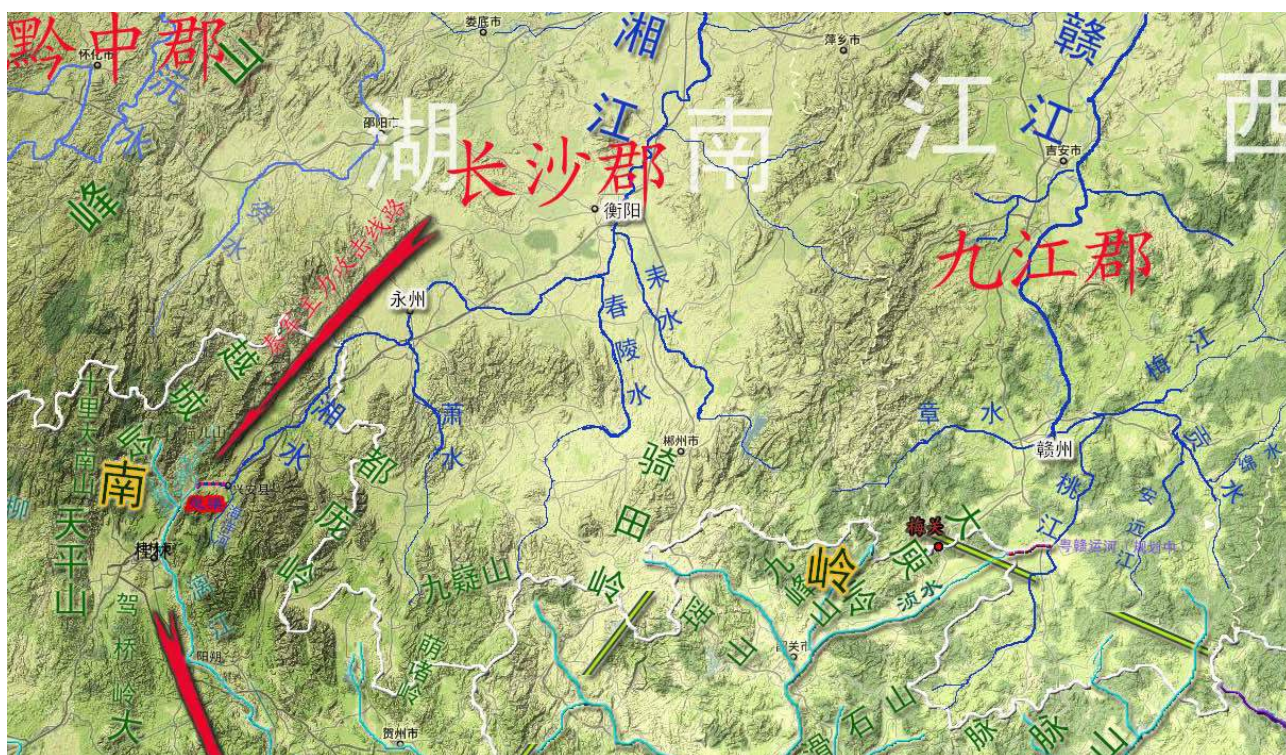
因为那些散居于河谷之中的南越部落并没有统一的指挥系统，也不会有意识的将南岭一线作为第一道防线，并筑关以自守（后来国家化的“南越国”就会封关以自守了）。在强大的秦军到来之时，如果不想投降的话，他们甚至会很快放弃在河谷平原上的聚居区（缺乏防御能力），并退入山地之中。也就是说，秦军可以很容易占据沿线的河谷平原，并建立军事基地，直到达南越的核心区——珠江三角洲。对于秦军来说，真正的战争是在他们进入南越，顺利占据各条河谷，并建立据点以后才开始的。

征服权力集中的国家化区域和权力分散的部落化地区（包括封建分割的“国家”），最大的区别也在于此。前者往往是“先难后易”，在你攻占对方的地缘中心后，便可以快速地通过之前所建立的管理体系控制这个国家了；而后者更多的却是“先易后难”，当你顺利地取得战略要点之后，还需要通过持久战来各个击破那些互不隶属的部族。也许融入更高一级的文明，对于边缘民族来说也是不错的选择。但面对集权管理强度空前绝后的秦帝国，不要说那些自由惯了的百越部落，就连已经国家化数百年的山东诸国也难以适应（后来的汉帝国就不敢把弦绷得那么紧了）。因此，秦军在南越地区的统治不被当地部族所接受，也就不足为怪了。

从简单的实力对比来看，秦帝国对于南越是呈压倒性优势的，帝国所能够组织

起来的军队数量，可能都要高于南越的人口。问题在于你必须有足够的耐心，来消耗掉这些占据地利优势且有自给能力的手。而要支撑这份耐心的前提则是你必须有足够的补给。“以战养战”固然是一种方法，但在生产方式严重依赖渔猎这种原始方法的南越地区，秦军很难从当地掠夺到足够的补给以维持自己的存在。

已经统一了中央之国的秦人，并不缺少资源来打这场不对称战争。他们所需要的，是有一条运量足够大，运输成本足够低的交通线，来将核心区的资源送至前线。之前“水——陆——水”的交通形式在应对长期补给的后勤保障上，显然需要耗费更多的人力、物力以及时间（全线都为水运显然更占优势）。最初没有成为秦军南征障碍的南岭，终于还是为南越各族发挥了天然的防御效果（阻断了分水岭两侧的河道运输）。依据当时的技术条件，秦人唯一能做的，就是看看有没有办法在五岭当中找到一条海拔较低的谷地，挖通一条沟通长江、珠江水系的运河了。



秦·南越地缘结构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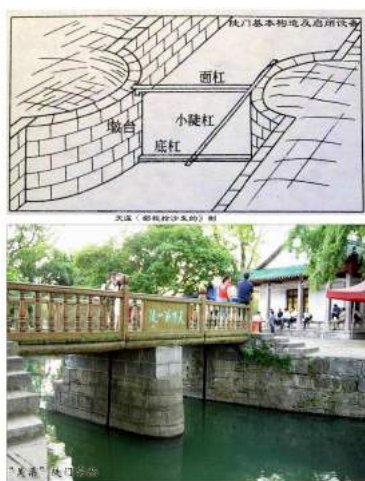
在修筑运河之类的水利措施方面，华夏民族可以说是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了。不算大禹当年治水的事迹，春秋战国那些诸侯们也没少在“水”上做文章，以此来改善自身的地缘结构。特别是吴人所修筑的沟通江、淮的“邗沟”、沟通淮、济的“深沟”，以及魏人开挖以通淮、河的“鸿沟”，成功的将华夏核心区的四条独流入海的河流连接起来（四渎），从客观上促进了黄河、长江文明的地缘整合。而现在，秦人出于南征“南越”的目的，又准备将四渎之外的又一条独流入海的河流——珠江，纳入华夏核心区的水路交通网中了。其意义绝不仅仅限于秦人这次南征的军事行动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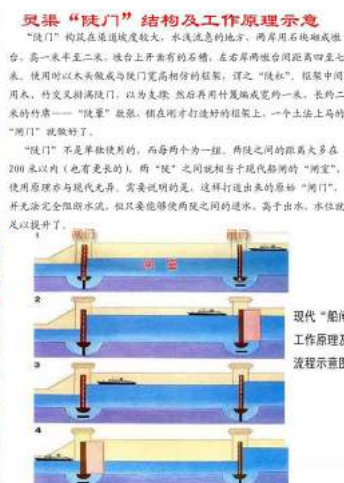
与之前在江淮、黄淮平原连通江、河、淮、济四渎的工程相比，连通长江、珠江水系的工作要困难得多。如果两大水系的地理分割线“南岭”是一条连续山脉的话，依当时的技术条件，这项工程甚至会无从下手。毕竟人可以往高处走，翻山以通陆路。水却只能往低处自流，你只能在南岭诸岭之间，看看有没有海拔与两侧河流基本持平的缝隙可以利用，来进行这项伟大工程。就秦人目前所选定的：章水——浈水（赣粤）、耒水——连江（湘粤）、湘水——桂江（湘桂），三处“水——陆——水”交通线来看，有着天然孔道的“湘桂走廊”是最有条件承担这项历史使命的。



灵渠工程示意图



灵渠陡门结构及工作原理示意图



所谓的“湘桂走廊”，是一条位于“越城岭”（五岭中最西端）东南侧的狭长平原带。这条穿越南岭的平原带，可以分为三部分。即北边湘水河谷，南边的漓江河谷，以及二者之间的过渡区。其实由于南岭整体呈“卅”字形的地理结构，岭的南北两面都有对应河谷的情况是很多见的，穿越南岭所最常用的“水——陆——水”方式也正是利用了这种地理结构。不过包含湘、漓二水上游河谷的“湘桂走廊”比较特别一点，即两条河谷之间的过渡区是一处平原丘陵区，这也就为构筑连接湘、漓二水，乃至整个长江、珠江水系提供了地理基础。秦人所需要做的，主要就是在这些丘陵之间，探寻地势平整的区域来挖掘河道。可以想见的是，由于要在丘陵之间穿行，可以知道最终完成的河道并不会是一条标准的直线。

事实上在秦人最初构筑“灵渠”时，所选择的路线比我们现在见到的还要曲折得多。这样做的目的，并不仅仅是为了绕过那

些海拔较高的丘陵，而是为了减缓河道的坡度。这是因为，虽然从整体海拔上来看，这片湘、漓河谷间的过渡区，有可供开挖运河的低海拔地区。但那些相间在丘陵间的低地之间，也并不总是水平的（在坡度最大处，每160米的河道距离，水位整体就要升降一米）。这样的话，即使能把水引过去，也不能行船。为了应对这个问题，现代比较通行的办法是修筑“船闸”，船行至由两道船闸组成的“闸室”后，通过封闭船后，打开船前的闸门，以使得船只平稳过渡到前方河道中去。而这项设计的最早运用，便是在灵渠之中，当时谓之“斗门”（陡门）。



灵渠

在秦人的历史中，他们一共建筑了三处大型水利工程，即关中的“郑国渠”；蜀地的“都江堰”；以及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灵渠”。从工程技术角度来看，都江堰巧夺天工的设计，堪称伟大；而如果从地缘价值来看，能够让华夏文明更顺畅地向岭南渗透的“灵渠”，则要更有战略意义。其“斗门”的设计，亦为之在技术上加分不少。在现在水坝林立，为了获得电力而人为制造高落差的时代，船闸的运用尤为普遍，更加凸显了灵渠斗门的首创价值。

不过和都江堰的诸多结构是由一代代水工不断完善而定型一样，灵渠也并非一开始就是现在这样的。就目前考证的结果来看，灵渠加入斗门应该还是始于唐代。当年秦人

初通灵渠时，所用的方法主要还是将河道拉长修得曲折一点，以减缓坡度，只是工程量就要加大很多倍了（和盘山公路的道理是一样的）。鉴于修筑灵渠的时间紧迫（前后不过三年时间），暂时没有想到这样精巧的设计也是可以理解的。至于说工程量的问题，在帝国的统治者看来，从来就不成为问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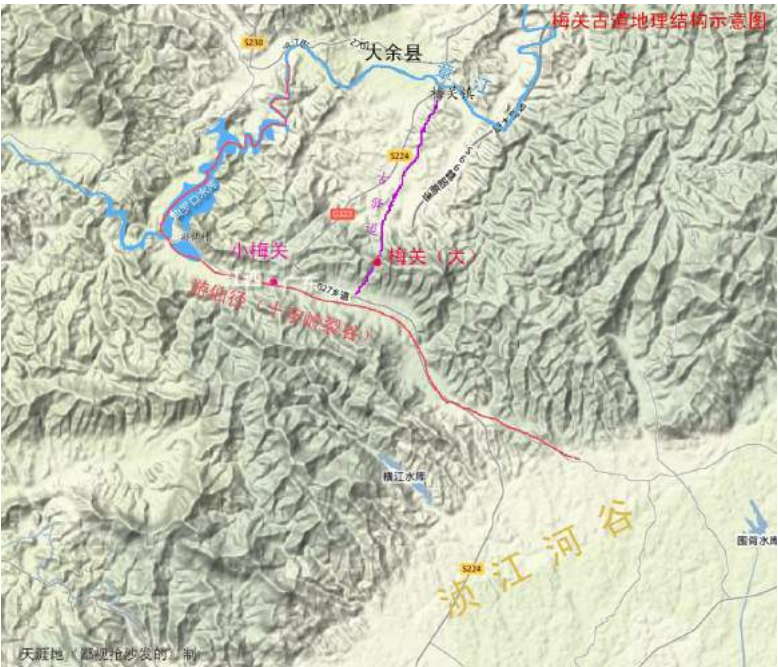
从秦人开始修筑灵渠之后的两千多年历史中，就再也没有第二条连通长江、珠江的水道了。但这是不是意味着，只有湘桂走廊这一条通道有可能构筑穿越南岭的运河呢？答案是否定的，至于说为什么没有出现第二条运河，又有什么地点可能再造“灵渠”，我们接下来会说明。其实“灵渠”还有一个比较现代化的名字，叫做“湘桂运河”。顾名思义，体现的是它的地缘意义。与“湘桂运河”这条越岭水道

相对应的，其实还有一条“赣粤运河”。只不过前者在两千多年前已经付诸实施了，后者则到现在还是一个远期规划。

第二节 赣粤运河修建的选址处

我们之前也说过，其实南岭南北源头相近的位置，相对的河流有很多。“湘桂走廊”之所以脱颖而出，成为运河的挖掘地，是因为湘、漓两水的过渡区不是一条明显的分水岭，而是一片低密度的丘陵区，使得修筑运河成为可能。事实上类似这种低海拔过渡区，在五岭当中并非是特例，最起码在赣、粤边境一带，还能找到类似的走廊。这条走廊并非我们所熟知的通行于大庾岭之上的“梅关”古道。因为这条知名度最高的通道，是从大庾岭分水岭之上翻越而过的。

尽管大庾岭的平均海拔只有四、五百米，与章水河道的高度差也不过二、三百米，但让习惯于往“高”处走的人过去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让凭借自然力只能往低处流的水越岭而过却是不可能的。其实古人在不同时代修筑关址的地点，以及通行的道路，并非总是固定在一处的。即使是在同一交通路线上也会略有偏差。我们目前所能看到的构筑于大庾岭分水岭之上的“梅关”，也并非古人的唯一选择。在它的西、南方向有一条“<”型的裂谷贯穿于梅岭之中。古人谓之“游仙径”（现在叫“十字径裂谷”）。从地形图上看，这条裂谷如果引水的话，倒是有条件建成一条穿越梅岭的河道。而在历史当中，这条裂谷也曾经长时期承担了南北通道的作用，古人也曾经于当中地势较高处设立过关卡，并被称之为“小梅关”。



梅关古道地理结构图

即使是在现在，裂谷的北端蓄水成为水库，其南部依然成为沟通赣粤两省的重要通道（323国道就是经由此出岭，入浈江河谷）。虽然我们从地形图上看，小梅关所在的这条裂谷看似有机会成为一条河道。但实际上，裂谷当中多处的海拔还是超过了四百米。这些高点在古典时期也都有可能成为据守此道的关卡（包括现在南雄境内被确定为“小梅关”旧址的那个点）。如果这不是一条狭窄的裂谷，而是像湘桂走廊那样纵深的平原丘陵带，

能够为运河提供足够的迂回空间的话，当年的秦人在为运河选址时也许会考虑这里的。而现在，秦人更现实的选择，还是将之作为一段相对平坦的陆地通道。也正因为如此，也有人认为秦人当日所构筑之“横浦关”，并非现在我们所看到的“梅关”（现存驿道为唐代扩建，关楼为宋代重建）。真正的秦关应该是裂谷（游仙径）中的“小梅关”。



赣粤运河地缘结构示意图

十字径裂谷的谷底并非在一个水平面上，这也可以从现在章江上游的蓄水情况看出。经由裂谷北段的章水已经筑坝蓄水成为“油罗口水库”时，在水面抬高的情况下，水库的南面依然存在高点将之分割，并不再向南覆盖整个峡谷。比较让人感到奇怪的是，有了这样理想的裂谷通道，为什么古人还是费力在大庾岭的分水岭之上修筑翻山驿道，并构筑关卡（梅关）。

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裂谷的北部为章江所据，且北端较南部更为狭窄（现在蓄水之后，北端谷口处依旧呈峡谷状）。这种结构使得沿河道路即使修筑好了，也处在不稳定状态，尤其是到了汛期就很可能被淹没了。鉴于梅岭通道承担着沟通岭南的重要任务，与道路的稳定性相比，翻越一处落差二三百米的丘陵，绕过不稳定的北部河谷（宽度较宽的裂谷南部，还是会承担出岭的任务），所增加的工作量是完全可以接受的。也正因为如此，我们现在才能够看到千年以前修筑的古驿道。

既然由于纵深的问题，梅关脚下的十字岭裂谷难以成为运河的越岭通道，那么我们就需要在赣粤边境再看看，有没有纵深足够宽，海拔足够低的区域，来作为设计运河的越岭过渡段。当我们的目光在地形图上掠过时，在大庾岭的南端，我们很快就能够找到一条很明显的平原带。这条平原带的西南端，正是从江西翻越大庾岭后，借以入珠江流域腹地的“浈江”所冲积出来的河谷。由于这一区域属于广东省的南雄市管辖，因此也被称之为“南雄盆地”。至于说平原带的东北部，也就是江西境内，则是由信丰县所辖。它那较为平整的地形，是由一条叫做桃江的河流冲积而成的。

“桃江”是赣江的一条支流，准确地说，它是“贡江”的一条支流。这条由南至北，

纵穿赣南东部地区的河流，其实有很多点（包括它支流）与广东境内的珠江水系，特别是浈江水系地理距离很近（最近的还不到十公里）。只不过如果要挖掘运河的话，直线距离只是要考虑的一个因素，更重要的还是地势问题。要是两者之间存在海拔又高，纵深又大的分水岭，那就不好挖了。湘桂走廊之所以被最终选定，是因为它的越岭段丘陵密度较低，海拔也不高，有空间为运河选址。相比之下，大庾岭南面的浈江与江西境内的“信丰”段桃江之间，算是赣粤之间最有条件开挖运河的了。



浈江与桃江邻近地区卫星图

通过这一区域的卫星图，我们会发现，浈江、桃江河谷之间的分水岭纵深并不大（阻碍少）。与湘、漓之间的过渡区相比，主要弱点就是这一地区的小片丘陵的密度有点大。如果能够在其中寻找到合适的裂谷，还是有可能挖掘出河道的。目前浈江源头处筑坝而成的“孔江水库”，已经使得抬高的水位基本渗透过这片丘陵了。在工程技术高度发达的今天，再一步把两江连通并拓宽原有河道，其实都已经不是问题了。即使是一定要在十字岭裂谷中挖出运河来，也不是做不到的事。只不过在两千多年前，越岭难度相对较小的湘桂走廊被选定承担这项历史使命了。

秦人选择湘桂线作为南征百越的水路补给线，还有两个很重要的原因：一是两湖地区是楚人的中心区域，经营日久，基础比较好；二是如果先进入珠江中游的广西盆地，秦人下一步就可以顺流而下，将军力和补给快速覆盖到珠江中下游地区。而如果把精力放在开拓赣粤运河上的话，即使能够将赣江水系与珠江的北江相连，那么这条运河所能够直接攻击的重点也就只是珠江口的珠三角地区了。在稳定珠三角之后，秦人再想向西控制南越腹地的话，溯江而上的行进方式，会将秦人的征服时间拉长数倍，人力也要多出许多（逆流而上的动力要求高）。这对于客地作战的秦人来说，是十分不利的。

第三节 灵渠在后世作用有限的原因

有一个问题是大家所关心的，就是灵渠在历史当中并没有发挥长江、珠江流域主要交通路线的作用。在这点上，大庾岭上的梅关驿道所承担的任务似乎要更重些。而像先秦所挖掘的邗沟、深沟、鸿沟，以及江东平原的诸多运河，后来则演变为了“京杭大运河”，并一直承担南北交通动脉的作用。之所以会有这种差别，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地理结构的因素；二是地缘政治的原因。

首先灵渠修筑的地点，其地理条件较之修筑于江东、江淮、华北平原的大运河，要差得多。能够在丘陵纵横的区域，找到一个水平面来开挖河道以通行船舶已是不易，再想把水道拓宽、挖深，难度就大很多了。因此相比那些平原运河通常可行四、五十吨（水量大，河道好的时候，百吨船也可行）船的河道，灵渠中河道窄的地方只有数米，行驶的船只载重一般最多不超过十吨。这种单位运量自然拉低了灵渠在越岭通道中的物流比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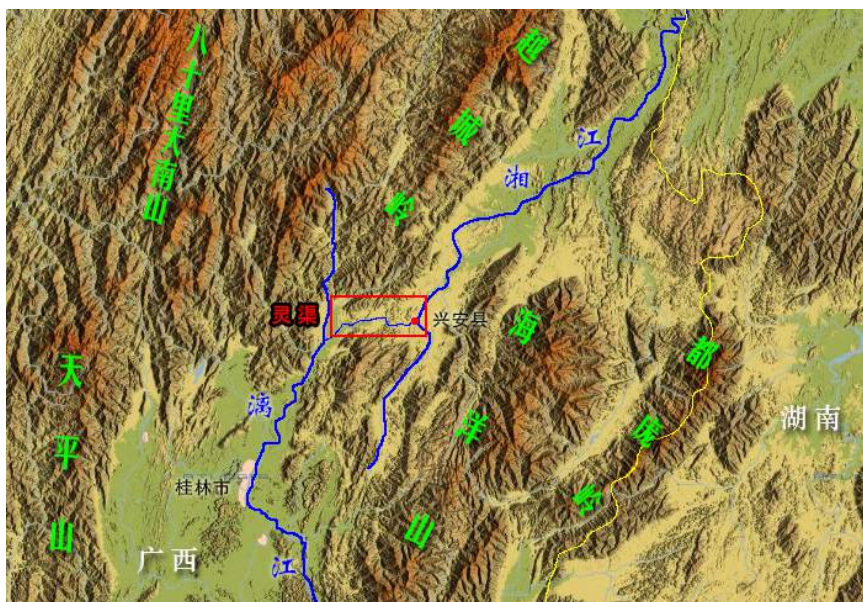
灵渠卫星图

经常会有人讨论国都的迁移问题，并想知道为什么古典时期后期的帝都由黄土高原东迁至华北平原。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水”。以古人的生产力而言，固然不需要现在这么大的用水量，但为维持帝都的绝对地缘优势，而必须保有超出其所在地缘板块所能承载的人口数量，却是共通的。也就是说，无论是古典时期，还是现在，中央之国的地缘中心都需要有足够通畅和足够运量的交通线，来将资源（古典时期最主要的就是粮食）运载到都城。

在古典时期，能够承载这项重任的，非通过内陆河流所进行的“漕运”莫属。

在这方面，关中平原的辐射力就有很大的缺陷了。当你将东部的资源通过天然河道、运河进入黄河，运抵至洛阳盆地后，再想穿越礁石错落的“三门峡”西进就很困难了。为了规避这段水路的风险，通常的做法是在此弃舟登岸，绕过三门峡之后再寻找合适的水道，将资源送入关中。这种周转方式，自然极大加重了物流成本。也使得后世很多想迁都至西安的政治家不得不放弃这个想法。

地理条件的限制，固然是影响灵渠地缘影响力的一个方面，地缘政治方面的因素也不容忽视。华北平原在地缘政治上的优势，其实是能够维持其运河体系持续运转的最重要因素。这个地缘政治的影响力，并不能单纯的理解为都城为了维持其地缘中心地位所谋求的额外补给。更因为中央之国的地缘压力绝大部分时候是来自于北方，在这种情况下，能否快速、持续地将江南一带的物资运至华北，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可以试想一下，如果帝国的压力是来自于中南半岛，特别是越南地区，那么灵渠在历史上的作用，以及维护的力度将会远高于现在了。



灵渠示意图

地缘政治因素对于“灵渠”的影响，还在于岭南地区自身的地缘结构。无论是古典时期，还是现在，据守于珠江入海口的“珠三角”地区，都是整个两广丘陵地区的地缘中心。秦人在为灵渠选址时，会着重考虑覆盖面的问题。也就是说，如果由广西盆地所属的中游地区切入的话，能够顺流而下，快速覆盖的区域会更广些。

而在这一区域国家化之后，珠江口地缘中心的控制权，就变得更为重要了。事实上在秦人征服部落化的南越地区过程中，分布于广西盆地直至现在中越边境一带的西瓯、骆越等族，抵抗也是最为激烈的，秦人在征服这些岭南“边缘地区”时所需的补给力度也是最大的。而到了汉武帝征南越时，珠三角的南越国都“番禺”（现广州）的陷落与否，则决定了南越国的终极命运。

这种因内部组织结构而造成的差别，也是时下政治家所必须考虑的因素。比如利比亚地区，如果卡扎菲能够和平的向反对派移交政权，那么对于欧、美控制利比亚是非常有利的；而一旦利比亚陷入分裂，那么要想逐个收服那些部落化的地区，所需要花费的成本就要成倍增加了。正是因为考虑到这点，西方在利比亚的行动才



粤赣运河示意图

显得犹豫不决。

相比于湘江——灵渠——漓江（桂江）——西江——珠三角，这条由湘入桂，再入粤的路线，赣江——大庾岭——北江——珠三角的路线，在地理距离上更具优势。而大庾岭上的梅关古驿道之所以成为最繁忙的过岭通道，还在于它越岭的难度最低。当你溯赣

江——章水而上，到达现在的江西省大余县，弃舟登陆后（具体为梅关镇），翻越大庾岭的难度其实并不高。即使是现在，当地的游客也可以乘着休息天步行由岭下到达梅关，并体会一脚跨两省的乐趣。而翻越大庾岭的难度较低，更在于岭南有我们之前介绍过的“十字径裂谷”，正是有了这条天然裂谷存在，才使得这条沟通赣粤的通道，真正在山地盘旋的时间大为缩短。

第四节 粤赣运河修建面临的问题

现在我们回头再说说赣粤运河的问题。从地理结构上来看，目前所选定的桃江——浈江河谷的越岭通道，是最为可行的选址。而它之所以鲜为人知，并非是因为技术的原因，而是因为需求和地缘政治的原因。由于工业技术的发展，公路、铁路运输作用的提升，内河水运在交通、物流方面的作用已经大不如前了。即使是灵渠，在 1956 年之后，也基本停运了。不过从成本方面考虑，水运终究是最低的，也有规模化的基础。在沿海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今天，国内交通网所承担的重点逐渐由人向货转移了。因此打通内陆与沿海的黄金水道网，成为目前中国发展的战略重点之一（战略上，之前的重点是把中西部的人力资源，平均一年两次送到沿海地区去，所以春运的问题比较突出；而如果产业转移到中西部的话，物流成本就更重要了；物流成本太高的话，产业会更倾向于向东南亚沿海地区转移）。

在珠三角地区意图向北延伸腹地，而湘赣两省也有意通过沟通边缘地区扩张自己的空间时，沟通湘桂的湘桂运河与沟通赣粤的赣粤运河，被五岭南北的四个省区纳入了视野。相比于已有两千多年运营史的湘桂运河而言，从未被实现过的赣粤运

河所遇到的问题会更多一些。而这个顾虑，更多的是来自于江西方面。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赣江与长江的天然关系，使得江西与长三角的整体关系会更为紧密，而赣南地区与隔岭相望的广东地区，亦存在密切的地缘关系。



赣粤运河示意图

从积极的层面看，如果打通了赣粤运河，江西方面的水运货物就可以拥有两个出海口的选择（湖南方面打通湘桂运河也是一样的）。对于地理位置更接近于珠三角的赣南地区，经济上的带动会更大些（货物出口成本会降低，承接珠三角产业转移更方便）。比较让江西方面顾虑的是，如果打通了珠江、赣江水系。那么无论是从水量还是地势上看，都会让江西境内的水资源流入广东地区。在水资源日益匮乏的今天，这其中所牵扯到的利益问题，是绝对无法忽视的。即使不考虑利益问题，假如赣南的水资源最终通过运河部分补给给了珠江，那么赣江干流以及鄱阳湖的水位也势必会受到影响。其对江西本身的地缘结构的影响，是必须考虑的。

相比于湘桂运河有灵渠的运行经验，而从心理上更容易接受。赣粤运河即使在技术上能够解决掉北水南调（让桃江水不过多地流入湘江），对赣江水系的影响（以船闸的方式，分段航行，互相补给的水量并不会太大），没有实际运行经验的江西方面，

也需要更加慎重的考虑和计算。正因为这些因素，目前在国家层面的战略上来看，重开湘桂运河（灵渠线并不是唯一的选址）与新开赣粤运河的方案，前者的执行位置更靠前。至于说其中的利益分配，以及技术、环保因素，还需要更多的论证。

只从地缘关系上考虑，如果跨越五岭，沟通长江、珠江的水运通道打开的话（设计为千吨级），对于拉近赣、湘两省与两广地区的地缘关系，会起到积极作用。而从腹地的争夺上来看，珠三角与长三角在地缘辐射力上的劣势，也会被对冲不少。有鉴于此，能够将由水系而扩散的地缘影响力，透过运河向北辐射至湘、赣两省的

广东省，会更乐见其成。

至于说广西，它目前所关注的重点是如何为自己境内的珠江水系，开凿出一个独立的出海口，以摆脱对于珠三角的千年从属关系。如果广西方面做到这点的话，不单自己的海洋经济可以自成体系，湘桂运河所带来的海洋利益亦可能被广西所消化。更为重要的是，同被珠江水系所覆盖的云、贵两省的南、北盘江地区，也有可能成为广西海洋经济的腹地。这对于一直想凭借海洋、边境两大优势成为强势省区的广西来说，意义不可谓不重。至于说广西方面在这方面有什么样的举措，我们后面再分析。

做了这些分析，相信大家对于岭南的基本地理结构，以及秦人南征的路线有了基本认识。简单点说，问题归结于“一岭一水”。即秦人如何穿越南岭征服散布于珠江中下游地区的“南越”族的问题。而最终得以让秦人完成征服任务的，还是他们开创性的通过灵渠，将湘、漓两水连接起来，以使得华夏核心区的人力、物资补给可以快速覆盖南越地区。

根据历史记载，秦人用来征服南越的军队被确定为 50 万。但实际上，这 50 万人并不能单纯地理解为战斗兵员。这其中的大部分人员应该是用来做后勤保障，以及屯垦南越的，实际用来作战的估计在 10 万左右。这些数字对于我们来说，只可能是个概数了，除非我们真能有办法穿越回去。其实这几十万人里面究竟有多少是用来直接作战的，又有多少是隶属军队的后勤人员，还有多大比例是纯粹用来移民固边的，并不重要。

对于我们所要解读的大历史来说，清楚三点就行了：一是凭借强大的资源，以及对地理结构合理的改变，秦人用武力超前地征服了两广丘陵地区；二是秦帝国前后有总数达数十万之巨的人口，南迁入了岭南；三是这些南迁的华夏人口中的绝大部分是男丁。基于原始的生存法则，以及社会结构，南越之地的华夏化可以说自此全面铺开了。

第六章 秦人在南越设郡与广西的出海口

第一节 秦人没有进入红河三角洲的原因

既然秦人已经初步完成了征服南越的工作，接下来要做的就是将之直接纳入中央集权的管理机构中了。为此，秦人在南越划定了三个郡：南海郡、桂林郡，以及象郡。如果与地理结构及现在的行政区划相对应的话，南海郡大致可以和现在的广东省相对应，包括以珠三角为核心的珠江下游地区，以及相对独立的潮汕平原，其治所“番禺”就是现在广州市的前身；而桂林郡所对应的，就是广西盆地了，也就是现在的广西自治区腹地，治所叫做“布山”（广西桂平市）。

与南海、桂林两郡相比，问题比较复杂的是象郡。从地缘结构、文化一脉相承的角度看，我们可以认为现在的广东是当年南海郡的延续，广西是桂林郡的化身，并可以为之找到地理结构上的支撑。可是象郡，却似乎没有一个独立的地理板块来承载。如果把越南北部的红河三角洲与象郡相对应，也许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问题是秦帝国真的在那么短的立国时间里，就把实际控制区延伸进了中南半岛吗？为了解答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再把视线放在水系之上，看看红河水系与珠江水系之间的关系；以及岭南地区，除了珠江水系之外，是否还存在其他自成体系的地理单元。

说到越南，很多人都会有一点叹息，为什么这块与东亚大陆紧密相连的土地，最终没有被纳入中央之国的范畴？的确，无论秦人是否真的渗透入现在的越南境内，后来的汉帝国在收服南越国之后，却的确控制了越南的北部。但无论是什么时代，中央之国都没有完全控制过现代意义上“越南”的全部国土。在国际部分分析中南半岛时，记得分析过越南的基本地缘结构。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越南，其实也是经过千年的扩张而形成的。其大致可以被分为三部分：北部以红河三角洲平原为核心的区域，国家化之后，曾经长期使用的名称为“安南”（唐帝国时代）；中部狭长的沿海平原以及山地，古称占城；南部则是从高棉人（柬埔寨的主体民族）手中夺取的湄公河三角洲。

在华夏族渗透到此之前，“百越”之族的覆盖区域主要是北部的红河流域。基于地理的独立性，居于其上的百越族与广西盆地、珠三角地区的百越族，会有所差别，但整体的亲缘关系应该还是非常紧密的。在以高级文明自居的华夏族看来，他们并没有兴趣去搞清这其中的细微差别。只会在历史记载中，对留给其印象深刻某些部落留下一笔。通常这些部落都是对华夏族南征反应最为激烈的，比如史书中记载的西瓯、骆越族。正因为留下了这类记载，很多研究者也试图为他们找到准确的活动区域，并将之从“南越”这个概念中独立出来。其实大可不必这样做，当日分布于五岭以南，直至红河谷地的“百越”部族，何止千百。以中央之国的视角，用“南越”

这个地缘标签来概括就可以了。

相比广西盆地与珠三角地区的地缘关系，红河流域的地缘独立性显然要强出许多。这是因为前两郡是由珠江水系所串联起来的，无论是从族群自然迁移，还是相互交往的角度看，地缘关系都会更加紧密。而红河却是一条独立于珠江的大河，它与珠江流域之间还存在着类似“五岭”地形的分水岭。以地理的视角来看，这片以“十万大山”为代表的分水岭，正是广西盆地与红河三角洲平原的分割线；而从现在行政分割的角度看，中、越边境线也正是划界于此。也就是说，经过两千多年的地缘博弈，中越两国最终还是以一种符合地缘规律的状态，走出了古典时期。



红河三角洲示意图



红河三角洲

在秦人南征的过程中，他们在主要包括广西盆地、珠三角地区、红河三角洲在内的“南越”之地进展得并不顺利。湿热气候以及由此引发的一系列疾病，加上山地河谷交错的地形，部族分割的地缘形态，都使得秦人无法像在中原作战那样，寄希望于通过一场决战来解决问题。而挖通连接湘、漓两水的“灵渠”，是秦人取得最终胜利的重要保证。有了这条大运量的水上补给线，秦人可以方便、持续地将核心区的人员、物资补给至他们在珠江中下游流域的诸多据点中，并最终消耗掉南越部族们之前所积累的资源。

灵渠固然是秦人入主南越的有利保证，但问题是，红河水系与珠江水系之间是相互独立的。秦人可以通过水网，保证珠江水系与核心区的物流网交通顺畅，却无法将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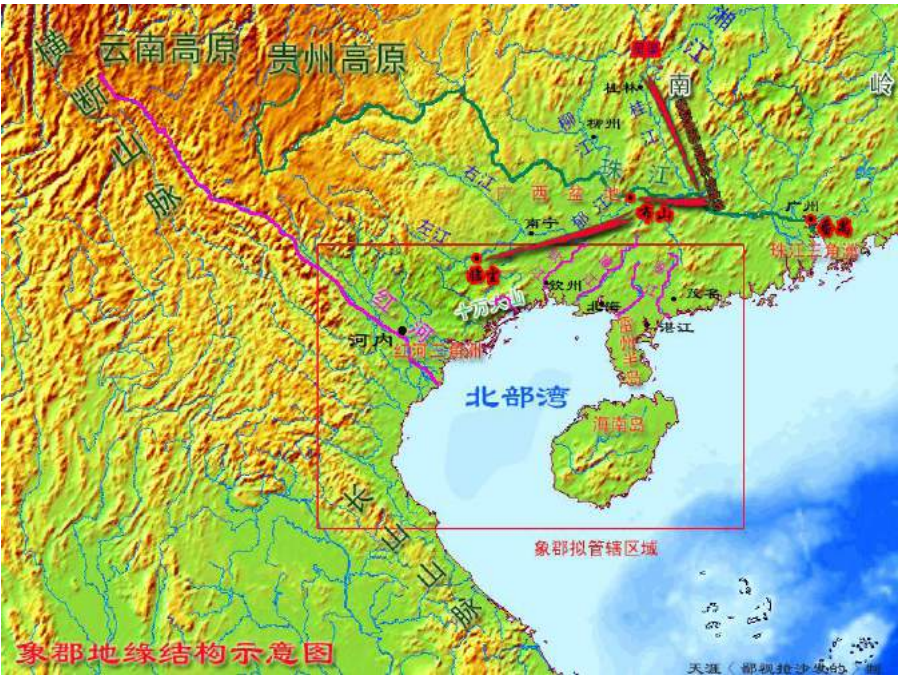
河水系纳入这张网内。也就是说，如果秦人想直接控制以红河三角洲为核心的越北地区，他们需要花更多的时间，甚至考虑打造一条新的运河来沟通珠江、红河水系。

事实是，秦人并没有这样做，后来的汉帝国也没有这样做。

第二节 秦帝国没能实际控制象郡

毋庸置疑的是，秦人为帝国划分郡县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使帝国的每一寸土地，都纳入中央集权的管理体系中。只是秦人设置郡县之时，并不代表就已经可以直接管理这一区域了。在诸侯们经营日久的熟地，利用原有的管理体系来做到这点，应该说并不是件难事。而在战国诸侯们也没有政令直达的边缘地区，要做到这点就比较难了。之前只是在名义上暂设的闽中郡便是这样的典型例子，我毫不怀疑秦人以后一定会去直接管理这块土地，但最起码他们在帝国的版图上划出这个新的行政区时，心里应该十分清楚，它与核心区内郡县的实质区别。

如果南越之地已经初步国家化了，秦人向南渗透的步骤也许会和闽中郡一样，先换汤不换药（不更换管理结构）的将之归化，然后通过政治、军事手段对其实施换脑计划。虽然秦帝国的国祚太短，没有时间完成这些步骤。但在后来的汉帝国，瓯越、闽越，以及国家化后的南越国都最终成为帝国的一部分。问题是现在的“南越”，秦人并无法找到一个（或几个）代理人来帮助其完成这个过渡阶段。更何况为了应对那些叛乱的部族，帝国已经耗费了太多代价，派驻各级官吏进行直接管理已经是理所当然的事了。现在摆在秦人面前的主要问题是，这种管理是需要帝国核心区源源不断地输入人口，以及资源，才能够有效完成。在没有使南越的基本人口华夏化之前，一旦核心区的补给不到位，叛乱随时有可能发生。



象郡地缘结构图

在秦人为整个南越之地划定的：南海、桂林、象郡三郡当中，秦人有把握直接控制的是整个珠江中下游地区，也就是广西盆地和珠三角（包括其辐射的周边山地）。而整个南越之地，却并非全部是由珠江水系所覆盖的。这其中主要包括两大地理单元，一块就是越南北部的红河流域；另一块就是雷州半岛及其

北部呈弧状的沿海地带。这两个地理单元的共同特点就是：首先都是沿海地区；其次板块内的河流都不隶属于珠江水系，而是独流入海的。也就是说，与珠江水系存在明确的分水岭。如果要为这一板块找个统一的地理名称，我们可以称之为“环北部湾地区”。而象郡的设立，就是秦人为了进一步向南渗透，而以环北部湾地区为主设立的行政区。

从环北部湾地区与珠江流域的地缘关系来看，它在秦人的整合过程中，应该是属于次一级地区。有可能的情况是，像闽中郡那样，给当地大小部落授予名义官职，暂时不打破他们的社会结构。等到帝国在珠江流域的南海、桂林二郡站稳脚跟后，再寻找时机将象郡直属。从战术的角度来看，秦人之所以会这样做，是因为要想通过已经打通的“湘桂运河”（灵渠）将帝国的控制力直接辐射至环北部湾地区，还是有一定难度的。最起码，你的补给效率决定了你即使进入了这一区域，一时也很难在实力上对当地部落有绝对优势。这一点，对于没有水运直接补给之前，在南越举步维艰的秦人来说，是有非常大的教训的，先期被派驻过来的军队几乎被消耗殆尽。

正是因为象郡只是一个带有过渡性质，并且没有实际控制的行政区。史书中对它的记载才更加模糊，以至于今天大家还在争论到底是雷州半岛一带，还是越南北部，抑或整个广西的西部才是真正的“象郡”。而沿着地缘的轨迹，我们站在秦人的角度，应该可以尽量接近事实的真相。也正是因为这种过渡和边缘性质，秦人在划定其区域时，才没有很明确它的边境。事实上整个环北部湾地区，甚至隔海相望的海南岛，都应该会是象郡用来整合的区域。不过由于环北部湾的这几个板块，相互之间的地缘关系并不紧密，或者说没有一条贯穿始终的河流将之串联起来，亦无法认定谁才是这个行政区的地缘中心。后来的汉帝国在直接控制上述区域后，并没有将象郡保留下来，而是重新按照各板块的地理结构，划出了越南北部的交趾郡以及雷州半岛及其北部地区的合浦郡。

象郡在中央之国地缘结构的演变过程，倒是和秦人初设的包括瓯越、闽越两大板块的闽中郡很类似。所不同的是，秦人在划定象郡的行政区时，已经考虑了战略上的连续性。或者说象郡在划定之初，帝国就已经有了明确的计划对之进行融合了。一切只是在等南海、桂林两郡安定下来罢了。这一点，从象郡、桂林两郡的郡治设立，亦可以看出。

第三节 秦人将布山设为桂林郡郡治

与象郡的神秘消失相比，桂林、南海两郡的地缘文化影响一直延续至今。特别是“桂林”，我们至今仍然可以在灵渠运河西端的漓江之上，看到“山水甲天下”的桂林市。也许有人会问道，秦人选择由漓江入南越，是不是看中了漓江的山水。我不是秦人，只能站在秦人的角度考虑。在战事那么紧张的时期，相信秦人没有那

个心情为了看风景，而去影响一项战略工程的选择。更何桂林一带溶岩峰林的地貌，并非此地所独有，在广西的诸多地区都存在。最起码位于漓江——桂江西面的“柳江”，其实风景也不错。如果柳江不是发源于贵州高原，并且存在天然的孔道，相信也有机会被秦人看中的。要是那样的话，柳江和柳州就应该会取代桂林和漓江的地缘地位了。即使不在山水方面胜出，广西地区政治中心地位也会由桂林向柳州转移了。

桂林后来曾经长期成为广西地区的治所所在，也就是地缘中心了。这点并不难理解，一般而言，成熟的核心区，其行政区在选择地缘中心时，会倾向于往地理中心靠，以尽量均匀的辐射整个地区。如果设置得过于边缘，或者由于地缘中心的辐射力不足以辐射全境，那么行政区的设置就有可能变化。就像现在的重庆，最终还是把握住机会，从“成都府”的管辖中脱身一样；而像广西地区这类长期处于融合状态的边缘地区，中央之国的统治者们往往更愿意把其地缘中心，放在靠自己核心区较近的地点。无论从交通，还是华夏化程度来看，这种设置都会被看作比较安全的。

“桂林”这个名称是继承了秦“桂林郡”的文化遗产，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不过在秦人设置桂林郡之时，它的治所却并不在现在“桂林市”这个点上。对于志存高远的秦人来说，桂林靠北的地理位置，并不利于帝国控制整个广西盆地。要想做到这点，在珠江干流两岸寻找一个点会更为合适。如果有得选择的话，干流与支流交汇的那个点，无论从交通，还是从平原发育程度的角度来看，会更容易被看中。以这个标准看，桂江与珠江交汇处的“梧州”市会更合适。而作为现在广西东大门的“梧州”，要是成为整个广西地区的地缘中心，位置却又有些偏东了。后来的汉帝国将广西盆地的东部，以漓江——桂江为中心（包括相对应的，珠江以南地区）划出“苍梧郡”时，梧州在广西东部地理中心的地位，才得以体现出来，并被设置为郡治（其名也得于此）。

之前也说了，广西盆地河谷纵横，并没有沿珠江两岸发育而成大块的中心平原。要想为整个广西地区找一个地缘中心并不是件容易的事。而很多人会比较奇怪，为什么现在广西的首府是在盆地西南的南宁，而不是传统上离华夏核心区更近的东北地区呢？其实究其根源，还是与一个“民族自治”有关。既然整个广西盆地都被划归为“民族自治区”，那么其治所的选择，自然要选择主体少数民族居多的城市（既然桂东北地区与华夏核心区的交流更密集，那么能够留存当年本土文化的地区，自然也就偏西南了）。而这种选择方式，正好与大部分古典时期的标准相反。

南宁成为广西的治所，固然有地缘政治方面的考虑，至于它是否符合现在的地缘标准，我们接下来会有分析的。至于对秦人来说，桂林、梧州、南宁都不是他们在选择地缘中心上的选项。帝国为桂林郡，或者说广西盆地所选定的地缘中心——布山，要更接近于地理中心。秦人为桂林郡所设定的地缘中心布山，在现在的广西桂平市。要想理解秦人的这个设置，我们还是要回过头来看看广西盆地的水系分布情况。

首先珠江干流肯定是由西至东贯穿于广西盆地的主干线，或者说是中轴线。之前我们也说过了，狭义的珠江只是指珠江三角洲入海口的那段江，而广西境内的珠江干流又自西向东分别被标注为：红水河、黔江、浔江三段。根据地缘规律，如果一条河流被分段打上不同的标签，那么相互之间必然存在明显的地理分割线，并由此在地缘特点上有一定差异。珠江干流在广西盆地内的这三段划分，与它所对应的主要支流有密切的关系。与珠江干流共同构成广西盆地水系网的主要有：珠江北部的柳江、桂江、贺江；南部的郁江。所谓的红水河，指的就是珠江在云贵高原的两个源头南、北盘江汇合后，直至柳江的河段；而黔江则是柳江到郁江的河段；最后，郁江一直到贺江（中间跨越了桂江）的河段，被称之为浔江。



秦·南越地缘结构图

之所以花时间去解释这同一条江不同的标注方法，是想让大家清楚，广西盆地的主动脉究竟是如何分布的，又造成了怎么样的地缘影响。这些体量较大的河流所冲积而成的几处较为开阔的河谷，亦孕育出了广西盆地内的全数较大城市（地区级别的城市都在这些河谷中，包括珠江干流）。秦人设置桂林郡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控制广西盆地，而控制广西盆地乃至整个岭南地区，关键又在于控制水路交通线。因此秦人为桂林郡所选择的地缘中心，就要能最大限度地兼顾各个方向。

要想沟通广西盆地的东、西方，在珠江干流这条中轴线上设点自然是最可取的；而要想兼顾南北，就主要看南部郁江是在哪里与珠江交汇的了。因为相比北部有柳、桂、贺三条主要支流汇入珠江不同，南部的支流就只有郁江了。更为重要的是，

郁江口的位置在黔、浔两江中间，地理位置易于兼顾桂北地区。无论从军事的角度，还是从辐射力的角度来看，秦人力图以一个高等级行政区消化掉广西盆地时，郁江与珠江的交汇口都是最好的选择。而这个点也就是桂林郡的郡治“布山”所在地，也就是现在的桂平市。

尽管广西盆地南部看似只有郁江一条主要支流，但这条支流所覆盖的区域却并不逊于北部三江。这很大程度是因为郁江的上游又可以分为两条体量颇大的支流：左江和右江。其中右江的长度甚至比合流之后的干流“郁江”更长（左江也不差多少）。这种“人”字形的结构，亦使得它的腹地，也就是左、右、郁三江交汇处，同样会是一个战略要点，并成为广西盆地南部的地缘中心。目前这个地缘中心已经升格为整个广西地区的政治中心了，它就是南宁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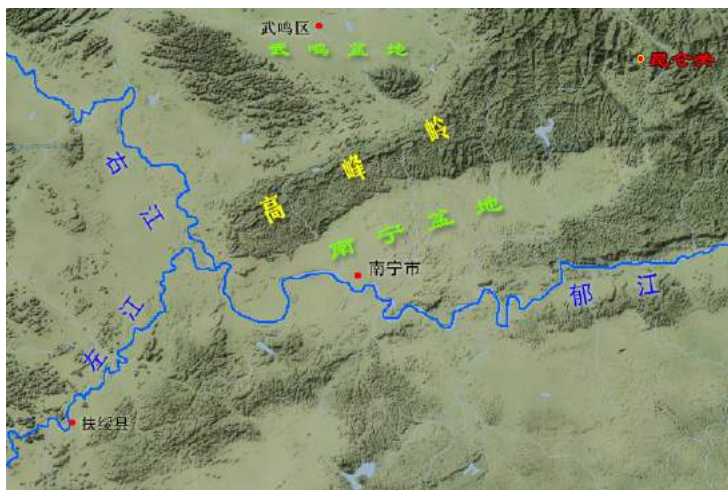
基于广西的地理结构，其实是找不到一个点既有足够的体量来压倒其他城市，并且能将地缘影响力辐射至全境的。不过就南宁的地理位置来说，成为广西南部的地缘中心还是没什么问题的。在秦帝国之后，鉴于广西盆地复杂的地理结构，为了便于管理，各王朝基本上也将之依地理结构，再加细化成同级的数个行政区，而南宁也有机会在这类缩小版的郡级行政区中成为政治中心。需要说明的是，由于唐朝时，南宁地区曾经被设置为“邕州”，因此左、右两江合流之后的这段江（南宁段），也被当地人称之为邕江。只不过依规则，下游的郁江之名成为了整个干流的地理学名称。我们从当地人的这种细分方式，亦可看出广西盆地内部山地丘陵分割严重，使得即使是一条大河两侧也无法冲积出连续的河谷平原来（就像桂江的上游又被叫做漓江一样）。

虽然南宁区域性地缘中心的价值在后来体现出来了，不过在秦人为南越划定郡级行政区时，南宁这个点却没有成为郡治所在。也就是说，它并不是秦人所看中的战略要点。在秦人粗线条的战略规划中，“布山”这个点在整个珠江中游地区显然更具地缘价值。虽然南宁没有机会被秦人看中，但它西南方面，位于左江腹地的崇左市，却有机会跻身郡治的行列，而促成这一切的，就是那个处于计划开拓阶段的象郡（崇左当时是象郡的郡治，名叫临尘）。

第四节 象郡郡治设在临尘的原因

秦人为什么要设置象郡，象郡的目标渗透区域又包括哪几块地理单元，我们之前已经分析过了。那些沿北部湾分布的越人覆盖区，包括红河流域、雷州半岛及其北部沿海地区，甚至海南岛都是象郡的管辖目标。之所以说象郡在秦人的计划中，战略高度要低于南海、桂林两郡，是因为秦人的水路补给系统暂时无法直接覆盖至此，只有等到珠江流域稳定后，才能再作打算。但这也并不代表秦人设置象郡就是像虚设闽中郡那样，纯粹用羁縻的方式来实施管理。

秦人对于象郡的战术设置，就是把珠江水系的最南端最靠近北部湾的区域，划入了象郡。这条珠江补给线的末支，就是左江。秦人把左江流域划入象郡，并作为象郡的中心区域，一则可以在地理上连接越南、雷州半岛北部地区，使得整个行政区的轮廓更加饱满；二则可以凭借珠江补给线的支援，以其为支点向两翼渗透。至于说郡治为什么选在临尘或者说现在的崇左市这个点附近，还是因为河流。就像左、右两江合流而成郁江（邕江），造就了南宁一样，左江也是由黑水河和丽江两水汇合而成的，而临尘不出意料地位于两江合流之处。



南宁位置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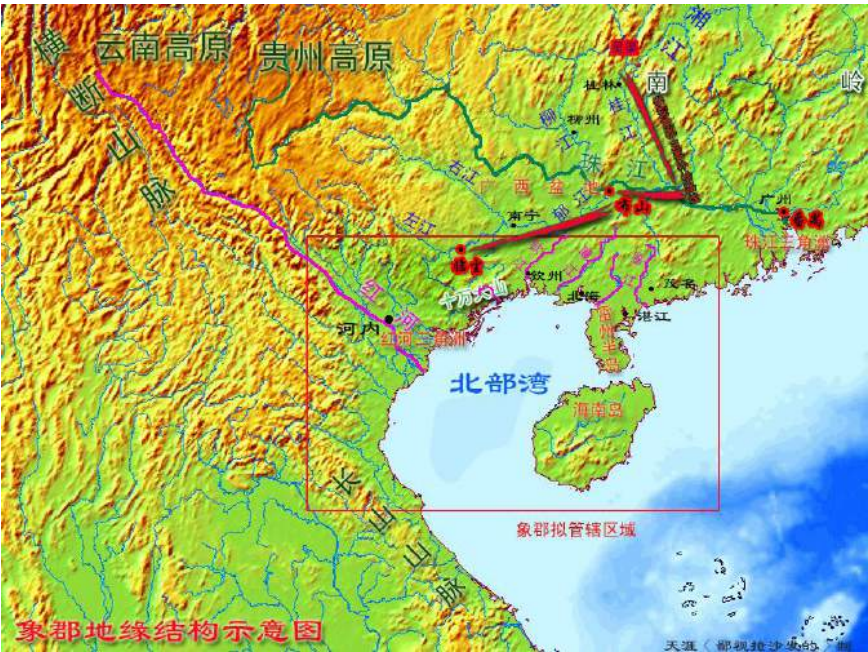
崇左位置图

需要说明的是，这类带有战略性质的城邑位置不一定正在那个点上，如果交汇点正好是处于峡谷地带，那么就会在干流附近选择一个更为开阔的地方建城，以符合战略基地的要求。像崇左和南宁的位置，都因此而略有偏差。既然我们已经把象郡的覆盖区定义为环北部湾地区，那么这片区域的天然联系纽带其实就应该是北部湾了。要想将这样一个海湾沿海地带整合成一个行政区，依靠陆地通道并不是最好的方式，特别是在这些地理单元没有一条贯穿始终的河流时。真正能够将之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是海洋。就像地中海文明的周边板块有机会整合成为罗马帝国一样，如果罗马人没有强大的海上力量，以及海洋意识，是绝对无法做到这点的。问题是从黄土高原走出的秦人，并没有什么海洋意识。即使是始皇陛下本人在东

临大海之后，也更多的是感慨于海洋的神秘，并因此而幻想那是神仙居住的地方。

其实这也不能怪秦人固步自封，没有向海洋开拓的意识。事实上在整个华夏文明的历史中，虽然也曾经有过诸如唐朝跨海入朝作战、郑和下西洋之类的案例。但将维系一块领土的希望，或者说交通补给线寄托在海洋上，却是非常鲜见的。台湾岛在古典时期末期能够成为华夏核心区的一部分，可以说是一个特殊案例，算是徕

徊了五千年的大陆农耕文明迟疑的迈出的第一步。而其政治上的问题，至今仍然像我们所看到的那样，处在待解决状态。不过在这个世界整体都进入工业文明之后，中华文明在海洋意识上的掣肘已经逐渐消失了，并不担心台湾岛会一直这样孤悬海外。（说句题外话，两岸统一之后，最首要的是战略目标是修通海峡隧道。如果能够在政治解决之前做的话，会加快地缘整合和政治解决的步伐）。



象郡地缘结构图

在很多人眼中，在内陆行船和海中扬帆并没有什么区别。其实这二者的区别还是很大的，其中最主要的是气候问题。对于在内河中行船，治水而生的华夏文明是完全有能力掌握水文资料，并保证安全的；而对于海洋来说，天气变化的规律就非常难以预测了。并且由于远离陆地，在海上一旦发生危险，所能实施的救济手段是很有限的。

而这类动辄全军覆没的风险，正是习惯步步为营，循序渐进的华夏文明所不愿承担的。由此而认为东亚的华夏文明趋于保守，而大陆西侧的地中海文明更加开放也不无道理。不过凡事都是两面看的，保守与稳定往往是联系在一起的。我们现在所解读的两千多年前的中央之国，和现在的中国一脉相承，正是得益于这种态度。

华夏文明中所固有的一些东西，是否应该随着时代改变而彻底转变，是一个很大的课题了。我们现在暂时讨论不到这么深，只需要清楚，在秦人的选项中，海路并不是值得考虑的方向就行了。不过秦人出于农耕文明的本性，没有运用海路快速消化掉象郡，并不代表越人做不到。要知道，在越人的文化中，海洋属性是非常明显的。越人之所以能够沿东南沿海迁徙，也正是依靠了海路。因此在后来南越得以国家化，并封关以自守后，南越国得以真正控制越南北部及整个环北部湾地区。

第五节 桂滇两省与红河平原的地缘关系

之前曾经有人讨论过一个有趣的问题，即如果南岭是一条高大山脉，将岭南与长江流域切割开，那么岭南地区有没有可能成为一个强大的海洋国家，并统一环南

海地区。我个人的看法是，将整个南海诸岛，包括现在越南全境归入一个国家，难度还是很大的。即使是在地缘条件更适合发育高级文明的地中海，这种环海地带的统一也不是常态。不过环北部湾地区和珠江中下游地区整合成一个国家，并延续至今还是有可能的，就像当年南越国的最终控制区那样。所以后来的“安南”国很想得到中央之国的授权，得到“南越”这个国名。只可惜在强大的华夏文明眼中，任何因为文字而引发的政治变数，都是需要被特别关注的。因此安南人最终所能得到的，只能是“南越之南”，也就是“越南”这个名字了。

从地理形态来看，越南北部的红河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很类似，都是由一条主要的干流加几条发源于周边山地的次一级河流冲积而成的。所不同的是，珠江中上游的广西盆地、云贵高原，本来的地缘潜力也不错，可以横向形成一个联系紧密的，大的地缘板块；而蜿蜒于横断山脉中的红河上游（中国境内称为元江），地缘潜力就要差很多了。横断山脉那落差极大的纵谷，直至今日都还更适合成为动植物的乐土。

红河流域的这种地理结构，使得越南方面东西横向发展的潜力很小。加之西侧有南北向的长山山脉分割，最终越南才形成这样南北纵深很大的国土形态。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红河的上游——元江所处的地理单元不是横断山脉而是丘陵相间的广西盆地，或者地势相对平缓的云南高原，那就不是越南能不能向西北方向扩张的问题了。中央之国完全可以在消化掉上述地缘板块之后，依靠水利之便稳固在红河流域的统治，并最终将之完全融为华夏核心圈的一员。

云南高原和广西盆地没有天然的内河通道连接红河流域，是红河三角洲最终没能融入华夏的一个重要原因。要是让强大而又自信到了极点的秦帝国再坚持个几十年，也许秦人真的会考虑勘测一下，看看广西盆地与红河三角洲之间，有没有再造灵渠的可能性。不过在秦帝国之后，疲于应对北方马上民族的入侵已经成为中原王朝的首要任务了。像两广这样现在看来无比重要的地缘板块，都没有特别在意的经营，更别说“劳民伤财”地搞人工运河来控制一块在中原政权看来可有可无的土地了。

在古典时期，河流所带来的淡水资源，主要可以为人类提供两方面的服务：即农业用水和内河航运。由于流域内平原的比例很低，像元江这样峡谷纵深大，水流湍急，地质条件不稳定的河流，能够为农业乃至现代工业直接所用的量仍然很少。最好的利用方式，是利用上下游的巨大落差，分段构筑多级水坝，用来发电了。而这种蓄水、发电两便的利用方式，在水资源日趋紧张的今天，已经成为上游地区对下游地区施加地缘影响力的主要方式了，其战略意义绝不亚于古典时期的航道开发。并不是说中国就一定要用水资源这根大棒来挤压包括越南在内的中南半岛的生存空间。但即使是在合则两利的双向选择中，掌握战略主动权的感觉总是更好的。最起码当日本或者印度希望中南半岛成为自己的地缘利益区时，他们所能寄托希望的地缘纽带基本只有海洋了（而这方面，拥有漫长海岸线的中国足以对冲）。

就目前的技术而言，在落差较大的河谷地区建造梯级水电站进行蓄水发电，不

仅能够提供清洁能源，水位抬升后的河流亦可通过船闸的方式进行航运了。因此苦于没有出海口的云南，也有意与越南打通元江——红河航道。其意义不仅在于为云南备选了一个出海口，更在于能够将自己的地缘影响力更为有效地渗透至越南。需要说明的是，在古典时期，红河流域的航道利用并不仅限于下游的红河三角洲，其中游河道也有通行条件，这些通行河道甚至延伸进了中国境内一部分。只是这对于中央之国凭借水利之便向红河三角洲渗透，并没有什么意义。



红河三角洲示意图



云南元江

因为从地理结构上来看，即使横断山脉中的河道全部能够通航，在河道两旁没有足够纵深的河谷平原以为战略基地，又无相应的运河将之与珠江、长江水系相连的情况下，中央之国并无法通过水路，有效的将地缘影响力渗透至红河三角洲。与云南希望通过打通元江（包括境内支流）——红河航道扩张腹地相比，广西与越南的地缘联系就更加有天然优势了。这不仅在于广西盆地与红河三角洲之间的地理分割线（以“十万大山”为代表），其海拔和密度是中央之国与中南半岛之间最低的，更在于有北部湾这个天然的海上纽带。

正是由于在西南地区得天独厚的拥有海洋优势，所以广西方面在陆地上并没有去想办法打通与越南的内河通道，而是试图打造一个继环渤海经济圈、长三角经济

圈、珠三角经济圈之后的中国第四个沿海经济圈：环北部湾经济圈。这种构思，倒与两千多年前秦帝国设置象郡的构思有着异曲同工之妙。二者之间的不同点在于：秦人缺少有效的手段将环北部湾地区紧密地结合为一个整体，也就是说地理基础不

成熟。但有机会通过帝国强大的力量，将之归入中央集权的管辖范围；而现在的中国方面有条件利用海洋影响力，并打通陆地交通线（铁路、高速），使之成为一个整体的地理基础成熟起来，但在地缘政治方面的掣肘却比两千多年前还要多。

之所以说现在环北部湾经济区的地缘政治基础不成熟，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方面是由于目前的红河三角洲已经不可能成为中央之国的一部分了。而在目前的国际框架下，中、越两国的地缘实力对比，并不能充分反映在政治层面上。简单点说，就是小国在名义上也拥有和大国平等的地位。这种跨越国境的经济圈在整合起来，效率肯定要比前三个经济圈低上很多；第二个方面就在于中国的地缘政治结构了。从行政区划来看，整个中国境内的北部湾沿海地区被三个省区所瓜分，分别是广西、广东和海南。



秦·南越地缘结构图

这种分割本身并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因为在长三角、环渤海地区也是这样的情况。问题主要在于，这个经济圈并没有天然的地缘核心存在。广东方面由于有珠三角这个核心区的存在，对于在北部湾另起炉灶并不会有太大的热情；而广西方面虽然想就此成为环北部湾地区的核心，但对内无法影响广东，对外无法掌控越南的情况下，靠北部湾的海岸线提升自己的地缘实力固然可以，想打造一个互有分工，而又联系紧密的经济圈却不是件容易的事。而在解决这个问题上，地理优势明显的上海在长三角的核心地位就没有异议了。至于说海南方面，居于北部湾与珠三角中间的地理位置，使之更有机会左顾右盼。事实上作为中国未来的“夏威夷”，海南

岛完全有机会凭借自己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以南海为腹地打造出属于自己的体系。

既然环北部湾经济圈的构想,操作到最后很可能是广西唱独角戏,那么广西真正能为这个经济圈所寻找的可以资源整合、优势互补的腹地就只有自己了。而除掉外部的两个问题,广西在内部整合方面也并非一帆风顺。这其中,南宁作为省会,对于整个广西地区的辐射影响力,以及广西盆地与北部湾沿海地区两个地缘板块之间的地缘关系,都是需要讨论的问题。而从最原始的地缘基础来审视这个问题的话,打通一条连接广西盆地与北部湾的水上通道,或者说为广西境内的珠江水系寻找一条属于自己的出海口,应该是一项改善自身地缘结构的积极举措。

尽管在目前各地缘板块之间的交流沟通中,陆地交通线因为铁路、公路的加入而得到很大提升。但一张能够覆盖境内所有板块的水网,其地缘价值是综合性的,并且不能单纯的从运力上来衡量。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广西所能操作的,战略意义最大的一项工程当属“平陆运河”了。

第六节 广西规划平陆运河打通出海口

我们在分析珠江水系时曾经说过,在两广地区当中,广东一直是属于强势方。而这种强势的地缘基础,很大成分是来自于广东可以控制珠江口的原因。这不仅让珠三角地区可以掌控珠江航运咽喉,更可以拥有一块体量较大的冲积平原以供发展。因此后来的南越国立国之后,原来的南海郡郡治“番禺”也升格为了南越国都。这种由地缘优势所带来的影响一直延续至今,不仅“番禺”之名得以保留,并成为广州的一个区,珠三角也得以在宁绍平原之后,成为又一个百越族的地缘核心。

只不过由于最先国家化的“于越”族,已经为浙江地区占得了“越”这个文化标签。后发的南越之地,只能退而求其次的以“粤”这个同音字为名了(广东简称“粤”)。至于说没有机会成为百越地缘中心的广西盆地,自然也就没有太大机会参与百越文化的争夺了。将自己的历史高峰追溯到秦帝国时期,会更有成就感。毕竟无论从帝国的角度,还是南越各族的角度看,湘桂走廊和广西盆地才是秦征南越的关键地区。这场战争为广西盆地所带来的行政标签“桂林郡”,也由此成为广西的地缘标签(广西简称“桂”)。

尽管现在的地缘特点与古典时期已经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水资源紧缺的状况,让上游地区也有机会对下游地区施加重要影响力了。但在全球化的今天,沿海的下游地区在物流和对外交流上的优势,还是能够带来重大的经济利益的。这在以对外贸易为主导的中国经济中,尤其明显。以至于大家一提到沿海地区,脑海中就能与“经济发达”的概念相挂钩。基于珠三角在岭南一直以来的优势地位,岭南的几个非珠江流域板块,包括雷州半岛及北部沿海地区、海南岛、潮汕地区,长期以来都被划入广东,由珠三角地区进行管理辐射。

而广西的行政管辖区域,则长期被限定在广西盆地之内。值得广西方面庆幸的是,在 1949 年以后,广西终于在环北部湾的象郡故地中分得了一块沿海地区。尽管由于广东的地缘优势,使得当时的海南岛仍然在其辖区之内,并因此继续保有雷州半岛这个突出部。但就广西所获得的那段海岸线来说,已足以保证广西的轮廓完整(通常突出部都有较强的分离倾向,完整的轮廓相对容易保证结构稳定),并跻身沿海省区行列了。



广西盆地江海通道示意图

现在的问题是,广西的这条海岸线很长时间并没有给广西带来太多的海洋利益,或者说改变它与广东的实力对比。从地理结构的角度看,广东的西、北、东三江共汇珠江口的结构,可以使得珠江三角洲当然的成为广东的地缘核心,并自然辐射到广东省的大部分地区(辐射不到的海南,后来就分割出来了)。而桂南沿海虽然与广西盆地地理相连,却并不属于珠江水系,而是由多条南北向自流入海的河流所覆盖。也就是说,广西腹地如果想通过珠江水系进行对外贸易的话,还是必须经由广东让对方获利。尽管这从整体的角度来说,并没有什么不妥。但牵扯到地区竞争的话,这种“利人方利己”的方式,显然无法让广西方面满意。要想彻底扭转双方的地缘关系,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广西盆地内的珠江水系,在桂南沿海地区打通属于自己的出海通道。而平陆运河也正是在这种地缘背景下被提上议事日程的。

说到平陆运河,就不得不再提下南宁的地缘价值了。尽管长期处于优势地位的

桂东北地区，对于南宁成为区内的政治中心颇有微词，并认为这是民族政策的产物。但从当前地缘关系的特点来看，中央之国已经彻底将岭南融为核心区了，桂林这个离长江流域最近的战略要点，战略价值已经大为下降了。相比之下，做好中国经营中南半岛的桥头堡，变成了广西今后的首要战略任务。从这个角度看，在珠江干流沿线选择一个地理中心作为区内政治中心的话，反倒不如在珠江以南找更有战略性。而地处左、右江合流处的南宁倒是个很合适的选择。从战略位置上来看，对内可以更有效的经营得来不易的南部沿海地区；对外能够更方便的将影响力辐射至越南。这和当年秦人把象郡的郡治设在左江之侧的崇左，有着同样的战略意义。

单纯从地理位置来看，在设计广西盆地内的珠江支流与桂南沿海地区的河流对接时，可以有多种选择。相对而言，选择哪个方位挖通运河，那一带就更容易直接受益。考虑地缘政治的因素，运河的选址优先放在了西侧，即以广西盆地西南方面的首府“南宁”，对接桂南沿海地区西侧的海港城市“钦州”。双方所处地理单元提供的对接河流为，钦州方向的钦江和南宁方向的邕江（郁江）。而跨越分水岭的运河，就是“平陆运河”了。

事实上单从地理结构来看，郁江——钦江方向跨越分水岭的方案，并不是最合理的选择。正如珠江流域与长江流域之间存在“湘桂走廊”这样的低海拔通道一样，广西盆地与南部沿海地区之间，其实也存在类似的通道。在地形图上我们很容易看到这个由六万大山、大容山、云开大山所围就的过渡区，其地理名称叫做“玉林盆地”，行政标签也就是“玉林市”。在广西盆地内部所分割出的众多小型盆地中，玉林盆地的体量算是很大的了。更为重要的是，盆地内侧山地上既有向北流入珠江水系的河流，也有向南独流入海的河流。前者被称之为“北流江”，后者则被称之为“南流江”，所连接的出海口为“北海市”。以玉林盆地的地理条件而言，即使是让两千多年前的秦人来考察的话，他们也同样有信心在此再造“灵渠”。

如果为广西打通出海口的重任，交给了南宁——钦州线的平陆运河，那么最容易受益的应该是桂西地区了。即使桂北的柳江流域，由此出海的话，直线距离也会比经由珠江口要短；而如果是玉林——北海线的“南北运河”开通的话，那么桂林、梧州、玉林一线会是直接受益者。也许两条路线都应当开通，以让广西境内的所有地区可以按经济规律自然选择自己的出海口，而不需要行政干预。

不管怎么说，如果广西最终打通了自己的腹地出海口，对于两广之间的地缘关系会有很大的影响。不仅在于广西终于有机会自成体系，而不必仰广东之鼻息，更在于有可能会弱化掉广东向西北方向延伸的地缘影响力。另一方面，运河的开通，势必会影响珠江下游的水位（平陆运河开通的话，水量巨大的左右江流入珠江的水就少了），对广东的发展也会有深远的影响。从这个角度看，已经受益于原有地理结构长达两千年的珠三角地区，应该是最不愿意看到这种改变的。

相比于铁路和公路，河流所造成的地缘影响是综合性的，也更加深远。如果两

个地缘板块能够由一条共同的河流串联起来，那么它们之间的地缘关系就不仅仅限于水路运输这一个层面了。水资源的分配、灾害的防治、环境的治理等，都会促使各板块之间必须协调好相互之间的关系，并最终达成平衡。因此，打通封闭的广西盆地与桂南沿海地区的水路网，对于广西内部的地缘融合有着积极而又深远的意义。

第七节 广西未来发展的战略方向

很多广西地区的人为广西长期以来的弱势地位而感到无奈；而广西以外的人单看地图，又觉得广西也算沿海省区，经济上应该有条件成为发达地区。这其中的历史、地缘原因我们之前已经分析过了。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广西”的行政区，和历史上长期存在的“广西”这个地缘概念，并不是等同的。历史上的广西，其实是封闭于广西盆地内部的一个内陆、边缘省份。无论是从中央之国的整体结构，还是岭南这个大地缘板块来看，都没有机会成为重要的地缘板块。直到鸦片战争以后，由于珠三角率先成为西方文化的强势渗入区，广西地区才有机会在时隔两千多年后，又一次发挥较重要的地缘影响力。而太平天国以及桂系军阀的崛起，就是这种影响力提升的表现形势。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1949年以后的广西得到了一块沿海地区，并拥有了自己的海岸线。而这条海岸线，将会是广西地区突破的资本所在。问题在于，广西盆地虽然内部分割严重，没有大块的核心区，但历经两千多年的经营，其重要城市都是在沿珠江水系分布的（缺少水路的沟通，使盆地内城市和沿海地区经济上联系不紧密）。而整个雷州半岛及北部沿海地区由于地理上呈独立状态，并没有成型的大块三角洲平原；因此在以农业文明为主的中央之国，并没有受到重视；而地理单元上的独立、边缘状态，使之在陆地上亦没有区位优势；至于说海洋优势，在东亚大陆，历来是用来服务于大陆腹地的，并不会像地中海沿线文明那样，凭借多点文明的分布，单纯的以商业便能强大。

相比于珠三角地区，因珠江水系的延伸可使其海洋属性，服务于岭南腹地。雷州半岛北部地区对于古典时期的中央之国来说，至多也就是能够自给自足的龙套地位了。雷州半岛及北部沿海地区，在古典时期的这种“鸡肋”型地缘地位，对于天然确立了以珠三角为地缘核心的广东地区来说，并没有什么影响。但对于长期以来，以内陆板块定位的广西地区来说，就需要花时间来经营这块来之不易的“鸡肋”了。由于海洋经济是目前全球地缘经济的重心所在，桂南沿海地区的地缘优势，迟早是会转变为经济优势的。特别是在中国经济重心已经由东部沿海向中西部倾斜，并且将中南半岛作为扩张地缘影响力的腹地时，整个环北部湾地区还是很有机会在可以预见的将来成为经济热土的。

对于整个广西地区来说，当年朱元璋的九字真经“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

也许是最为合适的。所谓“高筑墙”，当然不是说让广西把自己封闭起来，而是要专注于自己的内部地缘整合。毕竟以我们之前的分析来说，这方面广西还有很大的空间，也是有机会定位出自己的地缘层次来的。而从最原始的地理结构，以及最现实的物流需求来说，为广西境内的珠江水系寻找一个甚至两个北部湾的出海口，会是最有效的方法。

有人会说，这种整合对于桂东，特别是桂江流域没有太大吸引力。仅从进出口的角度来看，即使打通了“南北运河”，也不见得比珠江口更有距离优势，更何况珠江三角洲的港口优势目前是非常大的。这其实还是牵扯到一个地区资源整合的问题，尽管东亚大陆独树一帜的大一统方式，让我们更倾向于用同一个声音，同一种文化，甚至一盘棋局的概念来理解这片土地，但统筹和竞争从来是有矛盾存在的。地区之间的适度竞争，更利于中国的整体发展。更何况在这种集中、统筹的文化背景下，你的行政归属决定了你很难被你地理相近，而又行政归属不一的地区列入计划之内。

“广积粮”是相对于广西的底子较薄而言，至于如何在经济上积累，则不是一个地缘就能够解决的。不过作为基础，各地区根据广西目前的地缘格局，以及自身的地缘特点，合理布局却是必需的。正如有人觉得打通湘桂运河固然会有物流上的好处，但就以旅游经济为主的桂林而言，却未必是最好的选择。事实也是这样的，所以湘桂运河的选址，并不一定会是在灵渠附近。以湘桂边境的地理结构，以及现有的技术而言，还是会有其他选择的。所以“广积粮”与其说是单纯的积累经济总量，不如说是合理的配置“粮”的种类。

以地缘战略上的建议而言，不要出现没有青山绿水、人文历史，却要造点假文物来开发旅游；没有交通、资源优势却要上大型工业区之类的战略性错误，便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了。至于说“缓称王”，却也是非常重要的。曾经多次说过，以西南地区 and 北部湾的地缘结构而言，目前是很难找出地缘中心的。与其大家都划个圈，想做核心把别人当腹地，不如专注于利用自有的地缘资源做大、做强。假以时日，你的实力上升了，又能给周边地区带来利益，自然会形成所谓的“经济带”、“经济圈”。这点和目前中国的整体战略也是一致的。

最后说一说广西的地缘中心问题，以目前的地缘格局而言，广西盆地与环北部湾地区的地理中心，正好是在南宁这个点上。以当下广西所要整合的内外资源而言，应该还是符合需要的。至于若干年后，广西内部真正成为一个通江达海的沿海省份后，有没可能会有所变化，那就暂时不可测了。只能说，希望上位的城市，肯定需要在经济上足以和南宁形成“双城记”的局面。

第七章 广东珠三角城市的发展特点

第一节 广州成为地缘中心的影响因素

说完了广西，我们要来说岭南的另一个大板块——广东了。我们一直也在说，广东地区在岭南的地缘优势可以说是一直存在的。相比广西盆地内部错综复杂的地理结构，珠三角之于广东地区，以及整个珠江流域的地缘中心地位，并没有旁落过，即使是在两千多年前，珠江三角洲的平原面积远不如今天那么大的情况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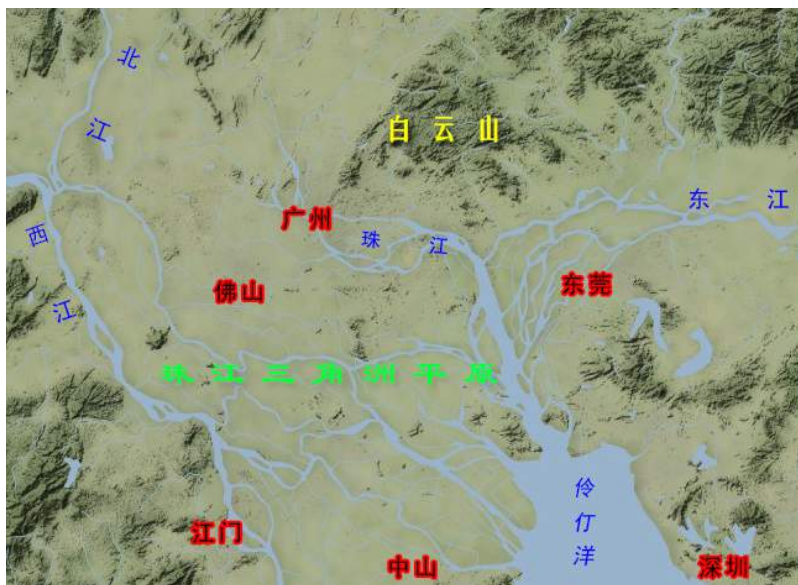
就“珠江”这个概念来说，我们之前一直是定义为广义的“珠江”水系，而在广东部分，这个概念就需要收缩了。因为在广东这个地缘板块中，真正与之产生联系的，是那条在中央之国位列第三的大河的下游。就像广西内部的各地理单元将广义的珠江干流，分解为红水河、黔江、浔江等河段一样，广东境内的下游河道也被单独命名为“西江”。以中国人的命名习惯而言，既然有了西江，自然也会有东江了。不过只猜到这点的人，至多只能算及格，因为除掉东、西二江之外，还有条与之并存的北江。这三条江共同组成了广东境内的珠江主干，如果要与广义上的珠江区别的话，可以称之为中义上的珠江。

从地理关系和覆盖面积上来看，整体呈“⊥”状排列的中义珠江水系，覆盖了广东的大部分区域。而将这三条河流紧密联系起来的，就是珠江三角洲。也就是说，珠江三角洲平原的形成，并非只是由下游为西江的广义珠江单独冲积而成的，而是由包括发源于南岭的北江、东江，共同作用而成的。从原始的情况来看，西、北、东三江都应该是互不隶属而独流入海的。只不过由于西江的流域面积明显要大于其他两个兄弟河流，所带来的泥沙也要多出许多，因此江口西侧的成陆速度明显要高出东侧许多，并最终使得北江在地理关系上成为西江的一条支流。

由于西、北两江位于珠三角的西侧，所以珠江口西侧的平原纵深比之东侧要大得多。而在我们所叙述的年代，支撑目前珠三角大半壁江山的佛山、中山、江门、珠海等城市，都还是以海水、沙洲、岛屿的形式存在。相比之下，东侧的海岸线则变化较少，所带来的后果就是平原纵深及城市数量不如西岸（东侧：香港、深圳、东莞；西侧：佛山、江门、中山、珠海、澳门）。至于说广州的位置，一如两千年前一样，位于珠江三角洲的中心。

在两千多年前，秦人为南海郡设置郡治“番禺”（原始位置在目前的广州老城区，而非现在广州市中南部的“番禺区”）时，其实也意识到了，控制珠三角这个地缘板块的意义，并不单纯在于可以将辐射力，顺西江向西延伸至广西盆地，北江、东江两水的流域也属于它的腹地。因此番禺城并没有像大多数入海口城市那样，设置在江口，而是在西、东两个江口之间择地造城（当时西、北二江在珠江口已经合流了）。

至于说选址的标准，除了与东、西两个河口的地理距离相当之外，能否背山面海是更重要的标准。唯有这样，才能得水利之便，既能向外控制沿海地区，又能向内辐射三江。正因为如此，具有明显海港功能的“番禺”城在两千多年前的海洋属性便已经被定下来了（所以广东地区才被设定为“南海郡”）。



珠三角地区示意图



广州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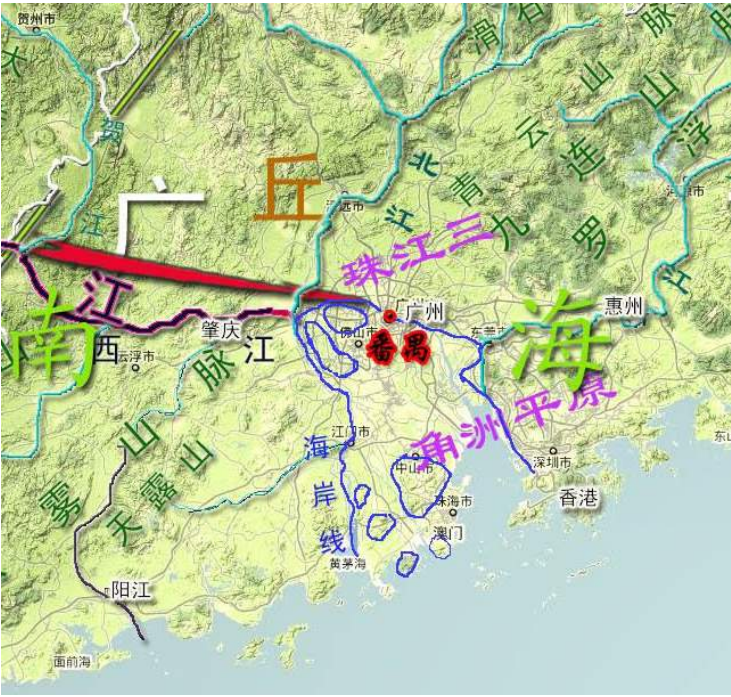
除掉珠三角以外，广东的海岸线上还有潮汕地区、雷州半岛等重要的地理单元。要想控制这样漫长的海岸线，地缘中心是否能够直接临海，依然是影响其辐射力的重要标准。所以我们会看到，即使在后来，珠江三角洲的陆地面积越来越大，广州老城也已经被封闭在三角洲的腹地，只能靠狭义的珠江水道沟通大海。广州这个地缘中心的直接管辖区域，却也随着地理的变化，同样执着地向南推进，以在三江入海的这个喇叭口中，获得一段真正的海岸线。

在两千多年前，秦人到达南越之地时，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大部分珠三角平原还处在发育阶段，就像当今中国的另一个经济重心长三角

平原那样。因此得山、海之利，可控三江入海口的广州，理所当然地取得了广东，乃至整个岭南地区地缘中心的地位。在后来的南越国以及诸多王朝时代，这一点始终没有变化过。直至 20 世纪后半叶，这种情况才有变化。对广州地缘中心地位造成威胁的，是来自于一个殖民时代的遗存——香港。由于特殊的政治地位，香港对于岭南地区的影响并不是体现在行政上，而是文化和经济上。事实上，香港的地缘影响力并不仅仅限于岭南，在其鼎盛时期，整个中国都曾经为之倾倒，并接受它的影响力。而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就是从地缘背景上来解读这其中的根源，以及粤、港地缘关系今后的走向。

首先我们还是要从最原始的地理结构着手。正如我们在《秦·南越地缘结构图》

上所看到的那样，两千多年前南海郡的郡治“番禺”，也就是现在的广州老城区，是一个背山面海的海港城市。内陷于两广丘陵腹地的位置，可使番禺城在海湾深处最大限度地躲避海洋气候所带来的灾害。比之东南沿海丘陵的其他沿海平原（包括瓯、闽、潮等地），这种优势是十分明显的。而经过两千多年的河流冲积，当日秦人所见到的那个珠江口已经大为缩小了。而地缘标签变化为“广州”的番禺城，也由海港城市变身为河港城市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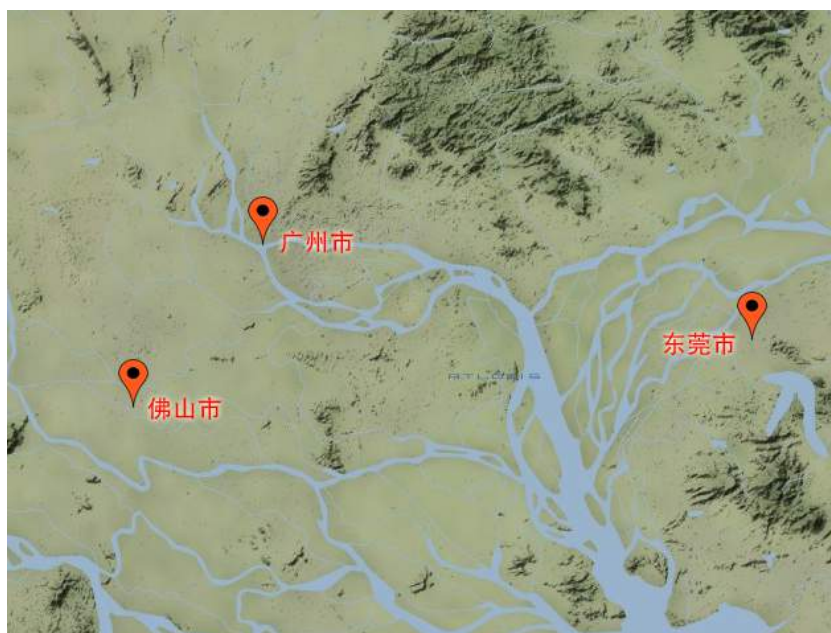
秦·南越地缘结构图



广州越秀山卫星图

实际上从农业文明的角度来看，是十分乐见海湾中沧海桑田的变化的。为了获得更多的农田，人类甚至会主动在内湖、海湾处围堰造田，加速这个进程。而珠江三角洲平原的发育，也使之成为中央之国主要的粮食基地之一；其农业生产效能，在同纬度地区也居于首位。因此，在古典时期的珠三角地区，其在中央之国的地缘影响力也伴随着平原面积的扩大，而逐渐提升。与珠三角平原的不断变化相对应的，却是“番禺——广州”的地缘中心位置，两千多年来一直没有什么变化。

广州地缘中心位置得以稳固，得益于它建城时的另一项优势——临山。在古典时期的平原地区，无论是出于规避内（河）外（海）水患的需要；还是军事防御的要求，山地与平原相交处，都更容易受到政治家和风水大师们的青睐，而广州的北部恰恰有一个凸入平原内部的山体——白云山。有了这座靠山，广州城址的脱颖而出就不足为怪了。这点和关中平原上，长安城址与骊山的依存关系是一样的。说到白云



广州位置图

山这个名字，相信珠三角以外的很多人也可能听到过。以之为名的药厂、机场经常会出现在我们所接受的信息中。而喜欢足球的人，应该会对“越秀山”这个名字有所耳闻。作为曾经辉煌一时的广东足球的见证者，越秀山体育场经历了太多的风雨，其最近一次出现在大众视野中，便是 2010 年成为广州亚运会的主会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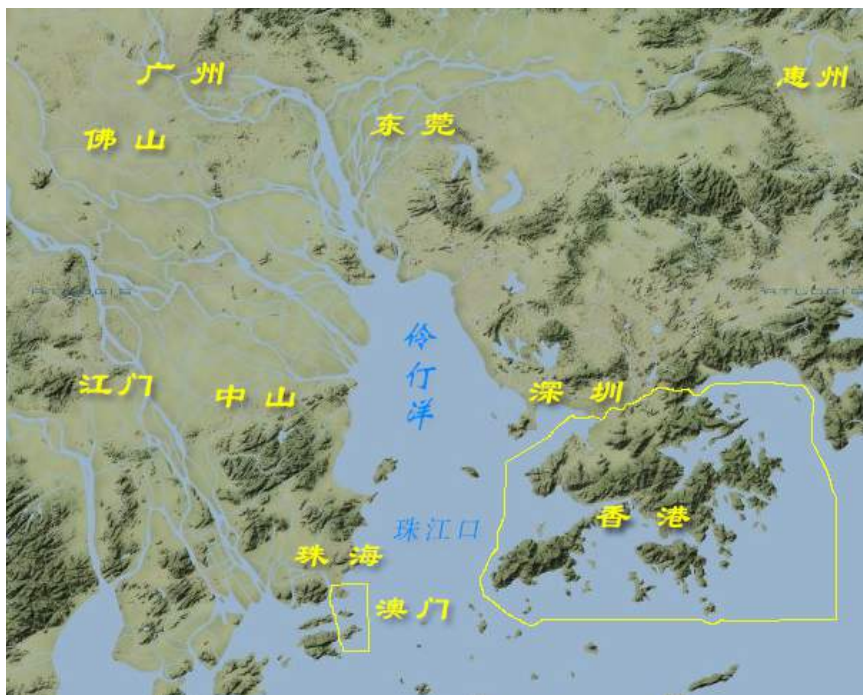
从地理关系上来看，越秀山是白云山南侧的支脉。山脉延伸到此，已经变得很低了，变得适合于圈到主城之内了。对于生活在山地之中的人来说，像越秀山这种海拔只有 70 多米的山体，只能算是小土包了（白云山的体量和海拔，在那些分割大块地理单元的山脉面前，也只能算是丘陵）。不过也正是有这种最边缘高地的身份，才能够直接被圈到政治中心中去，成为著名的地标。在两千多年前，越秀山并不是番禺城内唯一的高地，比之更为知名的两个山包是番山和禺山，城市最初的名称也因此而来。只不过随着人类活动的加剧，与越秀山合称“广州三山”的这两座山体，已经被平掉了（禺山湮灭于唐宋之交；番山则一直支撑到了明朝）。时至今日，广州固然不需要靠这些高地来提升自己的地缘价值，但从文化的角度看，却是颇为可惜的。

第二节 香港与澳门发展差异的背景

真正引发广州和珠三角地区的地缘影响力发生质变的，并非是它那日益增长的平原面积，而是海洋。至于其诱因，却并非来自于中央之国内部，而在于欧亚大陆的另一端。当欧洲人凭借地理大发现，将他们的海洋文明扩散到整个星球时，一直以封闭的独立世界存在的中央之国，也随之受到了很大影响。最为根本的影响，就是一直被视为可有可无的海洋，变得无比重要了。率先为古老的农耕文明带来影响的，并不是给中国人影响最为深刻的英国人，而是地理大发现的先行者——葡萄牙人。当葡萄牙人把他们的海洋贸易触角，经由印度洋——南中国海，延伸到中央之国时，作为岭南的地缘中心：广州，是他们所能接触到的最直观的“中国”。由此，广州城又一次凭借它的地缘优势，在中央之国的内部的竞争者中，额外从海洋获得了力量，

提升了自己的江湖地位。

以海洋文明的视角来选择地缘支点的话，已经内陆化的广州并不是唯一的选择。相比之下，那些依山伴海，缺少大片耕地，却又有建港条件的地点，往往更为符合海洋贸易的需要。当然，出于对外来文明的防范，中央之国的统治者们也不愿意这些长得奇形怪状的外夷，进入到自己农业文明的腹地。正是在这种“你视之如鸡肋，我纳之如珍宝”的心态之下，葡萄牙人奇迹般的在 450 多年前（公元 1557 年，明帝国时期）就在珠江口取得了一小块租界，也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澳门。



珠三角地区城市分布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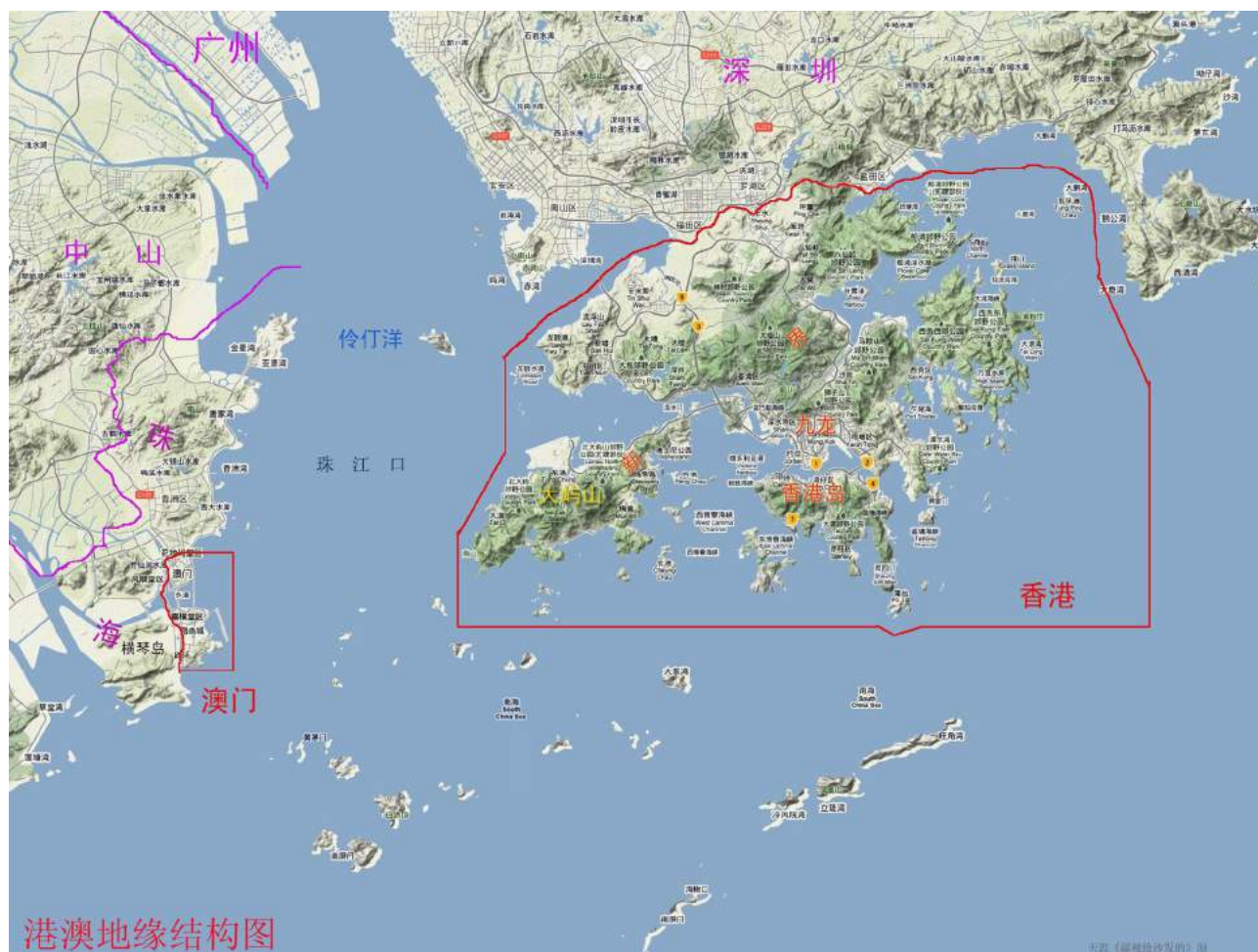
与后来那些在中央之国战败之后，基于武力威胁而割让的殖民地有所不同的是，澳门这个欧洲文明的切入点，是在公平的外交原则下设立的。在中央之国看来，让这些西洋人住在这种不入流的土地上，为政府带来额外的海洋贸易收入，是一笔非常划算的买卖。从地理位置上看，位于珠江口西南角的澳门，是有条件扩张为一个不错的港口城市的。不过在后来的

历史中，它并没有获得太大的发展。无论是在葡据时期，还是在四百多年后的回归中国之后，澳门所扮演的角色，都更像是当年明帝国所设定的那样，做一个有可能带来额外利益的鸡肋。这种情况的出现，和澳门的面积狭小，没有足够的发展空间有关；也和伊比利亚半岛（西、葡）对海洋的控制力被削弱有关。而更为直接的原因，则是英国人作为强大的海洋利益争夺者，出现在了珠江口的另一端。

尽管英国人最初取得香港的手段，比葡萄牙人要来得暴力些，但二者选择登陆点的理由却是相同的，就是希望能够在珠三角的海陆结合处形成一个新的贸易中心。把广州、香港、澳门三个点连接起来，我们会看到一个把珠江口完美封闭起来的三角形。从地缘结构上来看，这也是珠三角地区的三个战略要点。事实证明，英国人对于中国的胃口，要远大于当年的葡萄牙。与地处平原的广州相比，香港岛和澳门最大的劣势在于纵深太小，没有足够的发展空间。由于葡萄牙在欧洲内部的竞争中失败了，他们并没有机会像英国和后来参与瓜分海洋的诸多欧洲国家那样，持续

扩张海外领地。这在中国方面所体现出来的就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澳门和四百多年前的澳门，在控制区域上并没有什么质的变化。

目前澳门约 30 平方公里的土地，虽然比当初大了近一倍，却仍然显得捉襟见肘。其所增加的土地面积，是通过不断的填海造陆而获得的。所造成的地理结构上的变化，就是组成澳门的：澳门半岛、氹仔岛、路环岛三个地理单元中的后两个，目前在地理形态上，已经合二为一了。纵深的缺乏也使得澳门成为世界人口密度最高的区域之一（每平方公里 1.8 万人）；另一个后果则是，缺乏土地的澳门无法获得与香港对等的发展机会，只能剑走偏锋的靠博彩业和旅游业来发展经济。一个本来有机会单独成为珠三角一极的战略要点，却成为香港的后花园。



港澳地缘结构图

相比之下，日不落帝国背景下的英国，为香港所获得的发展空间就要大得多了。尽管英国人在 1842 年通过鸦片战争所获得的香港岛，面积已经超出了澳门的数倍（最初的面积约 70 平方公里左右），但仍然无法支撑英国挑战广州贸易中心的地位。因此在随后的 1860 年、1898 年，九龙半岛和深圳河以南的新界地区（地缘概念包括周边岛屿）相继成为香港的组成部分。1100 平方公里的总面积，使得香港有机会在

后来抓住历史机遇，一跃成为世界级的经济中心。

香港的历史机遇是在 1949 年以后，中国大陆的政权轮换使得香港成为人才和资本的避风港，这为香港的下一步发展打下了基础。虽说从实力对比和地缘关系上来看，如果红色中国想乘势从英国人手中收入回香港的话，并不会碰到有如台湾问题那样的难度。但对于当时已经决定站在铁幕之后，之后甚至又想自成体系的中国来说，留下香港这个与西方世界接触的窗口，是非常有必要的。

而对于香港来说，这个历史机遇的价值则在于，它居然有机会将整个中国作为辐射的腹地（英国人最初的设想，也无非是让它能够辐射广东地区）。这种因地缘政治因素而获得的机会，使得弹丸之地的香港在经济上获得了迅速的发展（想象一下在长达三十年时间里，大陆地区进出口西方的货物，大部分都需要跑到一个点上去转口是什么概念），并有机会让粤语和香港文化长时间风靡整个中国。

当历史恢复到常态，中国可以重新融入世界贸易体系后，香港的地缘地位不可避免的下降了。从绝对值上看，并不能说因为大陆地区的发展而影响了香港的经济。事实上更为强大的中国，只会拉升香港的经济（单从转口贸易量来看，1972 年为 41 亿港元；2004 年则为 18931 亿港元）。只不过之前那种一枝独秀的局面，不会再有了。香港未来的地缘定位，要更多地着眼于珠三角了；也就是说，香港需要和珠三角的其他城市，来放在一个框架内考虑未来的发展计划了。

当历史走到 1979 年时，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桥头堡——珠三角地区，也开始了历史性的地缘结构调整。突出的变化则是，除掉位于三角洲三个顶点的穗（广州）、港、澳三地外，珠三角平原开始高密度地崛起了一批城市。这些城市在经历过多次行政调整之后，目前分别有：佛山、江门、中山、珠海、东莞、深圳，加上那三个基本点，九个城市共同组成了覆盖珠三角地区的城市群。至于说这个城市群在今后有没有可能重新整合，也是当下珠三角地区和我们所感兴趣的话题。

第三节 香港和澳门对外影响力的差异

从地缘特点来看，广州和珠三角在岭南的地缘中心的地位，以及鲜明的海洋属性，让其有机会承担为中央之国沟通海外的任务。在古典时期，这项任务是以“海上丝绸之路”的形式出现的；而在上个世纪，让中国正式融入世界的改革开放，也成就了珠三角最为辉煌的历史。历史之所以选定珠三角，战略上固然是因为它的地缘优势；而战术上则是因为香港的存在。英国人在 100 多年前从中央之国分割出的这个地缘切入点，成为红色中国近距离观察、学习外部世界的对象。为了完成这一目标，与香港一河之隔的深圳，所涵盖的地缘标签，由一个小渔村变身为了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许多年以后，这一转变被用歌曲形象地诠释为在“在中国的南海边画了一个圈”，其结果就是“神话般地崛起座座城”。

相信这首《春天的故事》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就当初作者的本意，其实就是想抒发下对于深圳崛起的感想的。只不过后来为了显得更大气，而把立意提升为歌颂整个中国的改革开放，其中所做的改动，就包括将“崛起一座城”，变为“崛起座座城”。事实也的确如此，就珠三角这个地缘板块而言，虽不能说是由“总设计师”在南海边全部圈出来的，但地缘关系使然，在深圳成为特区之后，也的确由最初穗、港、澳的三城记变身为现在的“九龙出海”了。

事实上就地缘影响力来说，广州、香港和澳门是不能并立的。与其说是三城记，不如说是双城记。这也就是香港方面一直习惯于把“省港”二字并用的原因，其中的“省”指的就是省城“广州”（比如电影《省港旗兵》）。而大陆方面，则从政治的角度，通常把“港澳”作为同级别的地缘板块，并给予了相同的政治待遇。享有同等待遇的，还有“台湾岛”。不过政治的认定，始终是要和地缘结构和地缘关系相符的。以台湾岛的体量，以及和东亚大陆的地理距离而言，将来的政治待遇应该会有所区别的（纯技术分析，不带任何政治倾向）。

就香港和澳门二者而言，双方在地理纵深上的差距，虽然没有在政治地位上体现出来，但更为客观的经济数据，已经使得二者的地缘影响力不在一个数量级上了，这甚至直接影响到与二者对接的深圳和珠海两地的地缘潜力（深圳与珠海目前的GDP相差近七倍）。在网络上我们经常会看到有关制度的争论，比较典型的观点是认为制度决定一切，或者说只要有了合适的制度，就一定与其他奉行同等制度的区域取得同样的成就。就这个贴子所秉持的主线而言，并无异于加入这种看不到结果的论战中去。不过就目前所分析的内容而言，倒是可以涉及一点这方面的内容。

在政治层面上，深圳和珠海其实都是特区，二者设立的时间也都是在1980年。就当时决策者的决策背景而言，也正是将香港、澳门定位为同级的地缘板块，只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地缘结构的差异逐渐在经济发展上显现出来了。也许再过若干年，珠江口两侧的这两个点在经济及地缘影响力上会趋于平衡（前提是整个珠三角在政治制度上无差异）。毕竟二者在地理位置和形态上的确是对应而生的。但就目前这个历史阶段而言，香港因为地缘政治优势所累积出来的优势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并将因此而影响到珠江口两岸的地缘实力对比。

另外说一下，目前中国已经设立有6个经济特区，分别是深圳、珠海、汕头、厦门、海南、喀什。每一个特区的发展前景好坏，并不在于自身的条件如何，而在于它所对接的地缘板块有多大的潜力。从这个角度上看，当年曾经被寄予厚望的“海南”特区之所以成为一场泡沫，就在于它并没有与之互补、对接的强势地缘板块。而海南今后由于它得天独厚的气候、地理位置，还是会找到自己的发展之路，但这时的发展思路，已经与当日所设定“特区”制度的初衷无关了。

既然从地理结构上看，珠江口两岸的地理优势是同级的，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做一个有趣的假设：即当年葡萄牙人看中的是珠江口东岸的香港岛，而后来的英国

人则相应地把目标锁定在现在的澳门一带，那么现在珠江三角洲的经济结构会不会相应的发生变化呢？理论上的确如此。这种假设也许会让珠海的人感到兴奋，虽然将一个区域的经济发展与殖民者实力的高低相联系，会让我们在民族自尊心上有些接受不了。但不妨从地缘经济的角度来看待一下这个问题。毕竟就经济的角度而言，现在没有人会认为红色中国的前三十年走的是一条正确的道路。

不过如果这个假定成立，或者说葡萄牙人始终能够保持在欧洲的江湖地位，哪怕是尚有能力和在东亚扩张自己的势力（最少要能够成为八国联军的一分子），那么他们首先要做的就当然是扩张“澳门”这个殖民地的行政范围了。从所附的《珠江三角洲地缘结构图》上可以看出，就地理结构而言，英国人经过三次扩张所形成的“香港”，在珠江口西岸所对应的区域，其实等同于澳门+珠海。也就是说，如果葡萄牙人和英国人的登陆点对调的话，那么现在的珠海应该就会与九龙、新界的命运相类似了。



珠三角城市分布图

只是和葡萄牙人的“和平”登陆相比，有炮舰支撑的英国人起点想来不会止于现在澳门这点土地，最有可能的是在《南京条约》中，把珠海南端，澳门西侧的“横琴岛”一起作为他们的登陆点。如果整个珠海地区（当然，如果历史真的这样选择了，最终的结果也不会在行政范围上完全对应，但从板块上是可以对应的）真的取代了“香港”的历史地位，那么

当中国决定真正打开国门时，创造发展奇迹的，也就应该是与珠海接壤的“中山”了（中山与深圳的位置是相对应的）。

关于香港和澳门的历史角色互换，只能做为一种假设来探讨了。现实是二者地缘背景的差异，使之在可以预见的将来，在包括经济数据在内的地缘影响力上，都会存在质的差异。受到这种差异影响的并不只是深圳和珠海，珠江口两岸的其他城市也同样由于与两地的地理距离，影响到了自己的地缘结构。单从地理形态上来看，由西、北两江共同冲积而成的西、北江三角洲（珠江口西侧），显然拥有更多的发

展空间，也因此而拥有更多的城市。而东江三角洲所能承载的，就只有东莞这座争议颇多的城市了。

东莞的知名度，很大程度是建立在密密麻麻的工厂和“性都”的别称上。而这两个地缘特征的产生，和它与香港地理关系有着密切关系。当香港的产业开始向内地转移时，珠三角当然是“首当其冲”的选择。这甚至也带动了深圳成为改革开放的试验田，并神话般地崛起，不过仅仅是一个深圳是无法完全消化掉香港所辐射出来的能量的。因此与香港在陆地交通上更占优势，并拥有足够发展空间的东莞成为香港产业转移的优先选择地。

东莞与香港同处于珠江口东侧的地理关系，甚至为之带来了额外的发展机会。尽管从地理关系上来看，大陆地区寄予厚望的另一个产业输出地“台湾”，似乎更应该由地理位置相对应的闽南地区来接受它的影响力，并因此同样而给予厦门“经济特区”的定位。但沿海平原的狭小，使得闽南以及整个福建地区，并无法消化掉所有从对岸转移过来的产业。拥有更多腹地和发展空间的珠三角，在同时起步的情况下，同样也接收到了相当数量的台湾产业。就与香港同处自由经济背景下的台湾来说，有香港这个中继站存在，对于跨海而来，且政治上处于对立状态的台商来说，无论从实际业务，还是心理上都会有更多帮助。所以地理上更接近于香港的东莞，在承接香港产业转移的同时，也成为台商在珠三角的重要投资地。只是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随着产业和人员的高密度涌入，东莞的行政管理水平显然并没有跟上这个速度。随之带来的就是在城市结构和文化上的无序了。

第四节 珠三角城市圈未来整合的方向

历史发展到了今天，包括深圳、东莞在内的整个珠三角地区，因历史背景而产生的相对于整个内地的先发优势，已经趋于平淡了。因为这一波热潮而兴起的新老城市体，需要立足于珠三角原始的地缘辐射能力，而重新审视各自的定位了。换句话说，就是珠三角需要进行新一轮的内部整合，以应对来自长三角，以及内地其他地缘板块的竞争。在这种背景下，之前因外向型经济而各自赚得盆满钵满的珠三角城市们突然意识到，要想形成合力，进一步提升珠三角的竞争力，它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是两千多年来的历史中，从来不成为问题的问题，那就是谁才是珠三角的地缘核心？

不管珠三角的地缘政治格局有多么复杂（又是特别行政区，又是经济特区，又是省会的），依照珠三角的原始地理结构，以穗、港、澳这三个政治地位最高的城市为基点的区域，在竞争地缘中心这个问题上有着同等的机会。而就目前的地缘整合中，也在按照这个规律在进行。处在珠江口顶点的广州，它的自然融合对象，是定位为其西侧的佛山。目前这两者的融合，即“广佛同城”的计划，在珠三角地缘

融合的诸多方案中，也是最靠前的。其地缘背景，自然与广州省城的政治地位有关。要想维系自己的地缘中心地位，行政区域的大小和综合实力是息息相关的。

而从地理关系上来看，深、港两个城市的一体化，其实也是势在必行的。这也是深圳、香港两地目前都遇到瓶颈的必然之路。只是在政治层面上，要想完全整合成一个城市，却是难上加难。也许最终的走向，也是一城两制的特殊形式。这个一城倒不一定要像“一个中国”的提法那样，有一个共同的名称。但却意味着可以在非政治层面上做最大的统一协调（交通、产业结构等）。而对于生活在深港两地的居民，似乎也能在这种特殊政治结构下得到不一样的感受。就像年初内地物价上涨得厉害时，有深圳的朋友得意地表示，我们可以到香港去享受低价“酱油”一样。



珠江三角洲地缘结构图

从地理位置上看，位于东江口的“东莞”，可以选择向西与广州融合，也可以向南与深港走得更近。而从实际地缘关系来看，同属于珠三角东部，共饮东江水的港、莞两地，更有机会率先走到一起。为了使这个以“东江”为纽带的地缘板块具有更多的层次和合作空间，位于东江中下游分界点的惠州，也被作为腹地一并列入了整合计划。其实像惠州这样的珠三角外围城市，还有位于北江的清远、西江的肇庆，它们共同的地理特征，就是都位于所在流域的山地向平原的切换点，地理条件

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在珠三角向内陆纵深进行产业转移时，也最有机会最先受益。不过政治层面的因素，并不总是和地理结构完全合拍的。

在广东省 2003 年所做的“珠三角经济区”规划中，惠州和肇庆两个外围城市依照地缘规律，被吸收进了这个大珠三角的概念中，而清远却暂时被挡在了外面。究其原因，还是因为北江流域与西、东两江相比，在地缘影响力上要弱上许多。西江作为珠江流域的干流，其辐射力甚至可以覆盖到广西盆地、云贵高原，被珠三角先富起来的的城市们看中，并不会让人感到奇怪；而东江流域则有另一个独特的地缘标签来扩散它的地缘影响力，那就是“客家”，因此也有资本与珠三角核心区的城市坐在一起规划未来。相比之下，清远以北的粤北山区，所能提供的资源就相对少了。



珠三角二级城市圈地缘结构示意图

我们可以认为这是一种嫌贫爱富的表现，毕竟广东目前所规划的珠三角经济区（2004 年——2020 年规划），是希望保住珠三角在全国，乃至世界的影响力，优势互补程度的高低是会被优先考虑的。如果清远这个点仅仅是一个城市，而不需要按

照地级市的标准，向北管辖大片经济潜力较弱的粤北山区的话，那么珠三角这个地缘板块应该还是很愿意将之吸收进来，并作为广州向北发展的腹地的。而现在，在城市一体化的计划中，能够以外围城市身份跻身“广佛同城”圈的，就只有西江的肇庆了。以地缘关系来看，如果广、佛、肇一体化最终能够实现的话，那么清远应该还是会在下一期规划中被主动吸收进这个城市圈的。

顺便说一下，就闽南的厦门这个经济特区的机会而言，是肯定会在台海关系正常化中率先受益的。而地缘上将地理位置相对应，且经济在台湾相对落后的台南地区作为腹地，也并非幻想。现在比较现实的情况是先把金门消化掉，基础就是金厦大桥的修建，以及金、厦同城化的实现。如果能够做到的话，必将成为国家级的战略试点（地缘政治意义重大）。并且为将来在台海隧道南、北两线的竞争中获得筹码（目前看，连接福州——台北两个政治中心的北线方案，在直线距离和政治上更有优势）。

其实就我个人的看法而言，台海隧道的南线计划比之北线更有地缘意义，因为这可以将离心力最强的台南地区与大陆的地缘关系直接拉近，对于拉平岛内的经济差也有好处。不过政治因素始终是很复杂的，还是走一步看一步吧。就台湾和福建的南北纵深而言，其实南、北两线，甚至中线都应该修的，只是一个先后次序罢了。

如果说将珠江口东侧的“港深莞惠”城市圈串联起来的是东江，那么“广佛肇”城市圈，包括以后可能加入的清远，就是处在西、北两江三角洲的中心地带了。这倒是符合广州岭南地缘中心的定位，加上广州的政治地位，应该是最有可能在技术和行政上成为现实的。两个城市圈的地缘特点，一如现在香港和广州一样，前者有的是港口优势；后者则有着地缘政治优势。其实香港也不能说没有地缘政治优势，最起码它那自由港的定位，可以让这个城市圈的属性更加国际化；而广州则凭借它政治中心的地位，执着的在珠江口西侧向南扩张，以期为自己在增加在海洋上的话语权。

正是因为广州、香港，包括以经济特区而存在的深圳，在珠三角各具特点的强势地位，因此珠三角内部的竞争色彩十分明显。而这三个城市中谁最终能够真正胜出，也是人们所津津乐道的。不过依照地缘结构分析，我们其实应该已经清楚了，深圳这个本来就因香港而生的城市，与香港之间并不存在本质的竞争问题。即使现在有制度的分别，二者以互补的形式走到一起也是必然的。真正的核心竞争形式，应该是会演变为“广佛”——“深港”之间的双城记。

有一种说法是，广州有可能成为直辖市，这种说法的出处在 2010 年的《全国城镇体系规划》中公布了全国五大中心城市，分别是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和广州，其中只有广州不是直辖市。如果广州真的成为直辖市的话，那么我们刚才为之所设定的城市圈，就很可能是它的辖区了。只是依照广州的地理位置，如果把它抓出来做直辖市的话，那么珠三角周边的山地归属势必会成为一个问题。直辖之后的广州，

应该还是会愿意接受肇庆所辖的西江流域的粤西山地，就像他们现在也愿意将之拉入珠三角这个圈子，和带入一体化的计划中一样。但对于清远以北的粤北山区，却未必有这个兴趣了。

实际上，要是真觉得珠三角的双城记可能会影响到内部和谐的话，从地缘结构上来看，将深圳所属的东江城市圈直辖出来，倒不失为一个方案。虽然这样做，有可能使得潮汕地区也会有从广东分离出去的风险。但像长三角那样，由沪、苏、浙三省瓜分，同样也可以很好的合作。所以重点并不在于行政如何划分，而在于大家各自的定位是否清晰。从这个角度看，珠三角目前的地缘格局，置于某一个核心管辖之下来统筹，也许并不利于整体的发展。就像很多珠三角的朋友会觉得广州总是不自觉的会利用它的政治地位，来加强它已经弱化了的核心地位一样。

从技术角度看，现在谈珠三角地区会不会出现直辖市，还为时尚早。依照各自的地缘特点，寻找合作对象来统筹出三个城市圈，会是更稳妥的方案，最起码在这被细化了的珠三角二级城市圈中，核心区和腹地的定位会比较明确。至于说直辖的机会，等到香港那 50 年的政治保证期过后，应该会是一个不错的机会。毕竟这样一个国际化的城市，置于广州的管辖之下是不现实的。而那时候深、港同城化在非政治层面，也应该取得了不错的进展了。至于说这个由经济特区和政治特区组成的新直辖市，需要从东江流域割取多少腹地，则要看当时的情况了。现在的“港深莞惠”城市圈如果能够成型，倒有为之打基础的意思在里面。

第五节 珠海和澳门提振经济的方案

相比于广州、深港各具特色的地缘优势，珠江口的另一个基点，珠、澳就显得弱势了许多。与广州这个政治中心在地理位置上同处于珠江口西侧，是其弱势的内部原因。最原始的影响就是，当广州希望增加自己的海洋影响力时，无论从地理位置，还是政治角度考虑（深、港都有特殊的政治地位）它所能挤压的空间，更多的是集中在珠江口的西侧。而影响珠、澳地区地缘实力的外部原因，我们之前也分析过了，就是澳门本身的弱势地位，不能为之带来更多的国际化的地缘优势。同为特区的澳门，在清楚自己地缘实力的同时，所选择的定位甚至是伴生于珠江口东侧的香港。在这种情况下，能够为对它寄予厚望的珠海，能带来多少实际利益就可想而知了。

既然珠江口两岸经济发展冷热不均的情况，是因香港这个强势基点的辐射力不同而产生的，因此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所想到的方案就是：建设跨越珠江口的“港珠澳”大桥。从技术上看，像连接珠海、澳门、香港的这类跨海湾大桥，是很有必要的，它能够使一个两向的“V”型交通线，变成一个三角形的环路，从而降低整个地缘板块内部的交流成本。这种用技术改善地理结构的努力，在拥有长江口、杭州湾两个喇叭口的长三角地区也在进行着。已经建成的杭州湾大桥、上海长江大桥和正在施

工的，连接上海（崇明）与江北的南通（启东）的“崇启大桥”，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而实施的具体措施。以珠三角的先发优势来说，跨越珠江口的“港珠澳大桥”其实早就应该建了。之所以到现在才开始正式立项，还是因为和珠三角错综复杂的地缘关系有关。

建设这样一条加强东、西顶点的交通线，对于整个珠三角板块的意义不言而喻。而受益最大的，还是本被寄予厚望，却在更具地缘优势的穗、深两地挤压下，而发展迟缓（相对）的珠海地区了。通过这样一条交通线，香港与珠海的直线距离甚至要短于东莞。如果在改革开放之初就有这样一座大桥的话，那么珠海在承接香港甚至台湾的经济辐射、产业转移方面，和现在会有质的区别。当然，这样思考的前提，是承认珠海也必须和深圳一样，定位为香港的伴生城市。而在当初刚刚开放时，对外向型经济不甚了解的人们（包括决策者），很自然的会觉得港、澳地缘潜力并不会有质的区别。但时至今日，这种差异所造成的后果，已经让人不得不正视了。



开平碉楼（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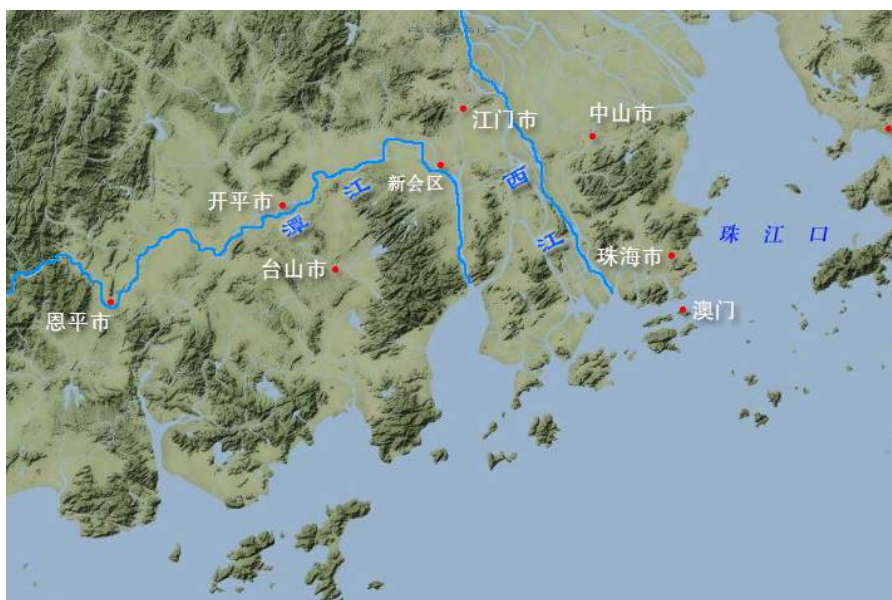
开平碉楼（二）

以目前珠海的现状和澳门的体量，要想做到珠澳同城，相伴发展还是可以的。但要想以其为核心，与北部的中山、江门两市共同打造出一个能与广佛、深港相抗衡的城市圈，却是非常难的。但这并不妨碍以西江下游为联系纽带的江门、中山、珠海、澳门四地，在交通、规划等方面建立起协调机制，以一个城市圈为战略目标共同发展。至于说这个城市圈最终是会被政治上更为强势的广佛（肇）城市圈所融合，还是能够自立门户，摆脱两个

强势地缘板块的阴影，倒在其次了。基础设施建好（比如大桥、港口），经济搞上去，才能为自己获得更多的筹码。

既然从地理结构上看，珠海、澳门、中山、江门所占据的西江下游地区，还是有可能成为一个强势地缘板块的，那么我们倒也不妨试着来为这个城市圈寻找一个向外拓展的腹地。比较悲剧的是，即使珠澳能够成为新的核心，并打造出西珠江口城市圈，他们也会发现，西、北两江流域的腹地已经是广佛盘里的菜了；而东江流域，很自然是由共饮一江水的港深所辐射了。唯一有可能成为这个城市圈外围地区的，就是它西侧的“潭江”流域了。

说到潭江，绝大部分人会感到陌生。而说到开平“碉楼”这个世界文化遗产，应该会有一部分人有印象了。如果再提起姜文的《让子弹飞》，那么相信大部分人都应该听说甚至看过了。在《让子弹飞》这部电影中，那中西合璧，让人耳目一新的“鹅城”就是在潭江两岸的开平、台山两地取的景。而整个潭江板块，还有一个更能代表其地缘特点的标签“四邑”。



潭江四邑位置图

所谓四邑，指的是潭江流域的开平、恩平、台山三个县级市，以及代管它们的江门市（地级）中的“新会区”。我们知道，在珠江三角洲以西，直到北部湾北部的区域，都是由一些独流入海的小型河流所覆盖。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这一沿海地区以及其南边的雷州半岛、海南岛，在古典

时期一直都被帝国的统治者视为边缘的边缘，亦没有在中央之国的内部博弈中发挥过突出作用。只是在现在，其北部湾沿海部分由于被划入了广西，才有机会将自己的海洋优势向内地辐射。

作为一个拥有独立水系的区域，四邑板块在地缘特点上很自然的也会与珠三角的主体文化有所区别。这一点表现在语言上，就是“四邑”方言虽然也被划入粤语范畴中，但却与珠三角地区通行的广府话有很大区别。如果东西向的潭江没有在即即将汇入西江之前，因为山地阻隔而拐向南方而独流入海的话（两千多年前也是这样），那么成为西江支流后的潭江，与珠三角的地缘关系应该会更进一步加深。

而现在的问题是，潭江的独流入海与四邑板块的沿海属性都增强了这个板块的独立性。其在近代史上的表现就是，使之成为著名的侨乡（那些中西合璧的碉楼，就是那些华侨带回来的），能够独立与外部世界交流的板块，总是会有更多的想法的。所以尽管目前在行政上，西江岸边的江门市在行政上代管了开平、恩平、台山三市，并将四邑中的新会市变身为直属的“新会区”，以加强对整个潭江流域的地缘联系。但这种跨流域的行政结构，在统一管理时总是会遇到更多困难的。

“四邑”地区较强的地缘独立性，对于本处弱势的“珠、澳、中、江”城市圈的独立前景，会有更加深远的战略影响。因此珠三角地区目前所能够上演的，应该还是广（佛）、港（深）的双城记。不过在整个广东地区，珠三角这个核心板块并不是唯一的地理单元。除掉四邑及其以西那片沿海边缘地区以外，南越的核心区和闽越之间还存在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缘板块“潮汕”，而这个板块也是我们下一步的分析方向。



广东地缘结构图

第八章 潮汕与海陆丰地区的地缘特征

第一节 秦帝国重视经营潮汕地区

“潮汕”这个地缘标签，在近现代史上是很有知名度的，这一方面是由于明清以来就位列中国三大商帮之一的“潮商”（另两个帮为“徽商”和“晋商”）存在；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潮州商人的海洋属性明显，以至于潮州人现在遍布世界每个角落。以现在的行政区划来看，潮州、揭阳、汕头这三个呈紧密三角形状分布在潮汕平原上的城市，是潮汕地区的核心区。由于历史上这一地名的行政区划为“潮州”，因此在一般概念中，“潮州”与“潮汕”具有同等的地缘含义。

从地理结构上来说，“潮汕”所对应的是主要由韩江、榕江、练江等河流冲积平原组合而成的“潮汕平原”，其中核心平原就是流域面积最广的韩江所冲积而成的“韩江三角洲平原”。曾经开玩笑说过，韩国在将汉城更名首尔后，应该还得需要把“汉江”更名“韩江”，才够去中国化。只是那样做了，汉中、湖北人民倒是会开心了，潮汕人民估计又不愿意了。

虽然潮汕平原的高峰期是在古典时期末期到来的，但在两千多年前，秦人入主南越时，这一地区就已经明确的成为帝国所重点经营的区域，并以重兵戍守了。也可以说，除了南越郡治所在的珠三角地区以外，潮汕平原在广东地区的战略地位是最为重要的。之所以会有这种地位，直观的感觉当然是因为潮汕平原在东南沿海那些小型平原中，发育状况算是相对较好的，也因此能够容纳更多的人口和资源。不过瓠越以南直至北部湾的整个东南沿海地区，都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受海洋气候影响非常大，台风甚至雷暴一类的灾害可以说是非常频繁的。

这种情况下，想稳定的经营农业生产是很困难的，因此以海洋为载体的渔、商生产方式，会占有更重要的比重（农业生产最多只能以自给为目标，无法生产出多余的资源供给战争或者调度了）。这也正是为什么珠江口这个深入沿海丘陵腹地，能最大程度规避海洋恶劣气候的海湾，即使在两千多年前远没有现在规模的平原面积，依然能够被帝国选定为南越的地缘中心，并一直持续至今的重要原因。而看似地势较平，体量也不小（相对）的雷州半岛，却因为没有合理的地形保护，使其免受海洋灾害的影响，变得无法成为地缘重心。

潮汕地区之所以会受到秦人的重视，是因为它位于南越核心区与闽越核心区中间的地理位置。如果你想从南越出发攻击闽越的话，潮汕可以是前进基地；而如果南越是防守方的话，那么它就是防御前线。这样的地理位置，很自然会最先被军事家所看中。回过头来看看闽越这个大地缘板块。其位于闽江水系西南侧，由完全置身于闽江水系之外的晋江、九龙江水系所覆盖的“闽南丘陵平原”区，也在承担类

似的缓冲功能（行政为厦门、漳州、泉州，沿海平原可分解为“泉州平原”和“漳州平原”）。而代表这一区域的地缘标签“闽南”，无论从地理、地缘结构，还是整体的地缘位置都非常类似。



秦·闽中郡地缘结构示意图



潮汕平原示意图

在一些民间为中国重新划定省级行政区的方案中，潮汕和闽南合并为一个行政区也是一种选项。不过有时候各方面条件接近的两个板块，也未必适合合并在一起。因为你无法判断到底应该把行政中心放在哪里，才不至于造成厚此薄彼的后果。这也是经过两千多年的历史演变，闽南和潮汕依旧由与它们地理位置相邻，地缘优势更明显的闽江、珠江流域所管辖的根本原因。

事实上在短命的秦帝国之后，重新统一中央之国的汉帝国曾经尝试过将潮汕、闽越两个板块合并为一个新的行政区。而这种尝试的地缘背景就是当时的汉帝国，还没有精力和时间来直接征服已经国家化的南越国和更早国家化的闽越国。这两个百越之国与汉帝国的共生方式，就是承认汉朝的宗主国地位，并在不影响他们实际统治的前提下接受帝国的间接领导。控制这种核心区以外的土地，最为普遍的做法，就是所谓的“以夷制夷”和“分而治之”之术。为了让帝国在东南沿海有更多的回旋空间，由南越所分出的潮汕地区与闽越割出的闽南地区，成立了一个新的越人国家——南海国。

就当时百越之地与中央之国的政治关系而言，南海国在闽越和南越两国之间独立出来，并无可能是汉帝国直接操作的结果，而应该是越人内部斗争的结果（汉帝国只是顺势承认）。从史书所遗存的蛛丝马迹中可以看到，南海国最初是由闽越国系统中独立出来的，并向南蚕食了南越国的潮汕地区。

深究潮汕话和闽南话之间的渊源，其实也有个由北向南演变的过程。倒不一定说这就是当年的这次渗透所造成的后果，但在后来的历史中，土地资源更为紧张的闽越地区，的确是更为主动地沿海岸线向南持续的进行人口迁移。由于东南沿海地区对海洋的依赖，控制了沿海平原，基本上就等于控制了河流的中上游地区。因此与潮汕平原、闽南丘陵平原对应的上游山地，也自然成为南海国的国土。最终这两块次一级的地缘板块整合成为一个在体量上，可以与闽越、南越相抗衡的独立王国。

从战略上看，对于远在千里之外的帝国统治者来说，认可这样一个新的国家，应该可以为今后直接征服百越之地找到一个可以利用的棋子。就像当年作为四川盆地第三股政治力量出现的苴国，所起到的战略作用一样。不过后来的南海国并没有成为百越的第五纵队，而是希望保持自己的独立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帝国当然没有必要成为它的保护者了，在其独立 20 年之后（约公元前 195——公元前 174 年），南海国就为帝国所灭（人口内迁，土地则由于成本问题没有占据，重归南越、闽越）。东南沿海地区的地缘政治结构，又恢复了南越、闽越并存的格局。

第二节 海陆丰地区的地缘文化

一般情况下，连续的山体是划分地理单元的重要标志。虽然并不是每一个地缘板块都一定拥有这样明显的地缘分割线，但潮汕地区与广东境内的其他地区之间，还是有一条明显的山体做分割的。这条叫做“莲花山脉”的山体，是东江与粤东各条独流入海的河流之间的分水岭。其东起闽粤边境，西至南海的走势，将潮汕地区有效的从东南丘陵中切割出来，并将之封闭为一个“锐角三角形”状的边缘板块；而作为这个三角形的另一条边——海洋，却又让潮汕有机会对世界展示它的开放性。山、海两种地理特征，看似矛盾的相互作用，使潮汕地区成为一个特点鲜明的地缘

板块。

在两个地缘特点鲜明的板块之间，总是会有一些亚板块存在着文化交融，或者说认同之上的困惑。就像夹在长江、黄河两大强势文明之间的淮河流域一样。莲花山脉与南海之间的这个三角形地带，也存在这样一个亚板块：海陆丰地区。与潮汕地区的核心区“潮汕平原”有一定的距离，又远离珠三角的地理位置，加上自身的体量，都足以保证了海陆丰地区的文化独特性。而作为这个三角形的东部顶点，就不可避免地会与珠三角地区发生文化交融了。

就建制而言，潮汕平原目前是由潮州市、揭阳市、汕头市三个地级市所覆盖；而海陆丰地区则是由海丰县和陆丰县，加上 1988 年所析出的“汕尾市”而组成（目前汕尾是地级市，辖海、陆丰地区）。从地理结构来看，汕（尾）海、陆这种“一港两城”的三角形格局，像是缩小版的汕（头）、潮、揭的三角关系。而“汕尾”市的得名，也正是来源于这种对应关系。



海陆丰地缘位置示意图

如果不考虑其他板块对海陆丰地区的影响，海陆丰应该会明确成为潮汕文化区的一部分的，虽然不是核心区。只是这个亚板块虽然体量很小，却正好处在广东三大民系（广府、潮汕、客家）的交汇点，并且又有海岸线来与世界其他地区交流，以保持它的独立性，所以才显得有些特别。当然，一定要为它在广东三大地缘文化中归附一个的话，那么将之归入与其地缘特点更为相近的潮汕地区，应该是最符合地理结构的方式了。就像之前提过的“四邑”地区，虽然有着自己独立的地理结构和地缘特点，但与珠三角紧密的地理关系，还是让其成为广府文化区的一部分。

对于广东以外的人来说，这么细化地了解广东文化的每一部分，似乎没有必要。

像东南沿海地区这样的地理结构，其实是很容易诞生体量较小，却又特点鲜明的地缘板块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方言的差别）。如果日本列岛的位置移到台湾岛与海南岛之间，而东亚大陆腹地又没有华夏文明这样的强势文明的话，这一带的地缘特点，应该会 and 大陆另一端的“地中海”地区颇为相似。问题是，造物主似乎更希望地球上出现多样性的文化，并没有在东亚地区再造一个“地中海”文明，而是在它的大陆腹地造就了一个封闭性的“海中地”文明。而这个文明强大性在于，足以让整个东亚大陆，包括有着更强独立性的东南沿海地区，淡化它的海洋属性，而成为农耕文明的一部分。

作为东南沿海的重心所在，广东地区所呈现出来的地缘结构，正是在华夏文明的一次次冲击下所形成的。单从本身的地理结构上看，珠江三角洲平原与潮汕平原，这两个体量最大的沿海冲积平原是形成广东文化的两个地缘核心（前者为主），而其他沿海、山地的小型地理单元，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它们的辐射区。但事实上，广东地区在这两者之外，却出现了第三个地缘标签“客家”。而“客家”这个没有明确地缘核心板块的标签的出现，正是在华夏文明向南潮汐般地渗透作用之下形成的。换句话说，如果岭南地区是一个完全独立的地区，那么是肯定不会出现特点如此鲜明、覆盖面如此之广的“客家”文化的。之所以要把海陆丰这个体量颇小的点单独提出来，其实主要是因为在分析客家核心区内部的几个亚板块时，还会涉及它。所以说“海陆丰”部分只能算是说了一半。

第九章 客家先民在江西的迁移方向

第一节 客家的核心区域及其形成背景

相信无论是自认为“客家人”的朋友，还是很多对汉族南迁感兴趣的朋友，都对客家族群的形成抱有深厚的兴趣。从族群的源流来看，客家的先祖无疑是从黄河流域的华夏核心区向南迁移而来的。在中国历史上，由于北方游牧、渔猎民族的不断南侵，随着北方汉族政权的覆灭，曾经发生过几次大规模的民族迁移。这种由政权组织的迁移，与一般的自然渗透最大的区别就是：后者的规模一般较小，迁移者的社会结构单一（比如商人、失地农民、罪犯），很容易被更占据人口优势的土著族群所同化；而前者却是一个完整的社会迁移，从政治结构，到氏族完整性，都能得到最大的保存。这也就让特点鲜明的“客家”文化诞生成为了可能。

当然，并不能说华夏民族的每一次大规模南迁，都是因为那些马上民族的入侵，最起码第一次和最后一次不是因为这个原因。第一次是因为秦人征服南越，有组织的向岭南迁移了60万人口；最后一次则是在60多年前，因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失败，向台湾转入了上百万人口。从迁移特点来看，民国政权入台的那次，倒是和东晋及以后那些南迁的中原政权有些共同特点，即迁移的组织结构完整，易于形成新的族群。只是客家这个族群概念，在古典时期就已经形成了，所以这批最后南迁（入台）的北来人口，被贴上“外省人”、“新住民”的标签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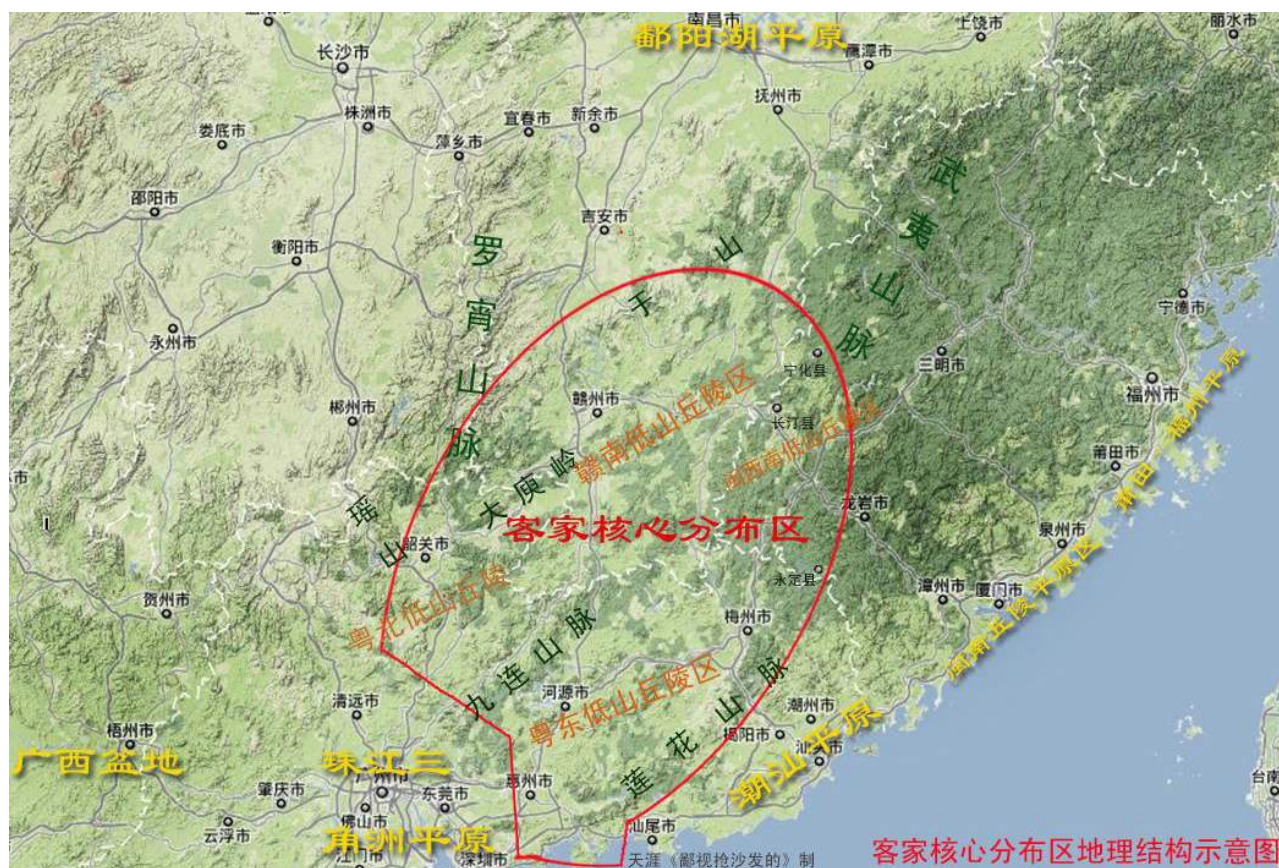
1949年的那次迁移，所造成的台湾岛内部地缘结构变化的后果，现在仍在消化之中。抛开政治层面不论，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这可以算得上是华夏民族的又一次成功扩张。尽管台湾岛的华夏化在明清时期就已经开始并成熟了，但在被日本占据将近50年后（算二代了，三代基本可以融合了），为之补充入新的华夏血液，对于中央之国将台湾岛稳定的纳入核心区，是非常有必要的。

回头我们还是来说“客家”的问题。就客家这个族群现在的分布范围而言，应该算是全球化了。不过正如我们在《客家核心分布区地理结构示意图》中所圈定的那样，赣粤闽三省交界的几个地区是属于客家的核心聚居区，也可以说是族系形成的原始区域。这样的话，就有一个问题出现了，即就中国的南北朝政权而言，南朝所控制的区域并不至于只是上述几个省份。一般情况下，四川盆地、两湖平原（包括江汉、洞庭湖平原）、江东平原这几个重要的地理单元，也都在南朝的控制之下。那么为什么在这些地区没有形成“客家”文化呢？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首先要明确“客家”这个概念的含义。所谓“客”自然是相对于土著民族而言的，而“客家”中的“客”所对应的土著民族，却并非是我们理解中的边缘“少数民族”，而是同为汉族的成员。也就是说，按现在的民族划分

标准，客家并不是一个民族，而是汉族中一个有着自身特点的亚族群。现在大家用行政区域所认知的“东北人”、“广东人”等地域概念，其实也可以看作是一种亚族群的划分。只不过客家分布区特殊的地理结构，使之无法形成一个“客家省”，而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罢了。

仔细观察客家分布区域，和我们刚才所提到的南朝政权还会包括的几个地缘板块，我们会发现，后者在历史上一直都是中央之国的博弈焦点。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被纳入中央之国的核心区，并开始华夏化了。也正是由于它们处在南北博弈的前沿，这些地区在长达两千多年的历史中，能够持续不断的与中原政权进行大规模的交流。这使得居住于其上的族群，在自我认知上都形成了带有自身地缘特点的汉族民系。



客家核心分布区地理结构示意图

这些居于长江流域以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为标签的亚族群（吴、楚、蜀等），由于一直能够直接参与中央之国核心圈的博弈，也因此而拥有更强势的同化能力来吸收、消化掉那些来自北方的人口。当然，在这持续不断的融合过程中，北方族群不断南迁也为长江流域的这些地缘板块注入了新的文化，从而某些方面改变着他们的地缘特点。比如四川盆地就没有和其他几个板块那样（如江东的吴语）保留自己独特的方言，而是成为官话区，并因此而影响了更为边缘的云贵高原。

按照迁徙的顺序，会从“客家四州”中的赣州写起。了解客家这个地缘概念，有助于加深大家对于闽、赣、粤三省交界处地缘结构的认识。尽管这个以丘陵地貌为主，跨越三大行政区的边缘板块，在古典时期并没有机会成为博弈的焦点。但如果你对红色政权的历史感兴趣，并希望了解其中的地缘脉络的话，看过“客家”这个地缘板块的解读，相信一定会有所得。

就岭南地区的华夏化来说，首征南越的秦帝国应该算是首功了。秦帝国以强制力向岭南输送的数十万男丁，开始改变了岭南尤其是广东地区的地缘属性。不过对于华夏文明的传播而言，秦人这次带有军事目的的大迁徙，只能算是一个开始，并不能算是大功告成。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次迁入的人口成分比较单一，缺少以家族为单位的民族的整体迁入。那些经历过战争、疾病而残存下来的男丁（虽然没有具体数据，但以当地的环境和情况来看，消耗掉的会是大多数），尽管还能够军事上和政治上控制南越，但从族群结构上将之完全同化却是不可能的。假如后来的诸多帝国没有持续的向岭南迁入人口的话，可以肯定的是，独立之后的“南越国”会不可避免的彻底本土化，即使他们的贵族阶层可能仍然会以自己的华夏血统为荣。

真正让岭南成为华夏之地的，并不是像秦汉这样的强大帝国时期，而恰恰是两晋、五代这样的乱世。由于中原地区的持久动荡，汉族开始了周期性的，大规模的“衣冠南渡”。在这种情况下，长江、珠江流域的华夏属性都一次次的得到了加强。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珠江流域并不是北方人口迁入的第一选择。或者说，在大多数情况下，珠江流域其实是在接受长江流域的二次移民。那些先期在长江流域落脚的华夏移民们，在稳定并实现人口增长时，很自然地会向外进行渗透，而珠江流域正是在这种波浪式的移民过程中真正实现华夏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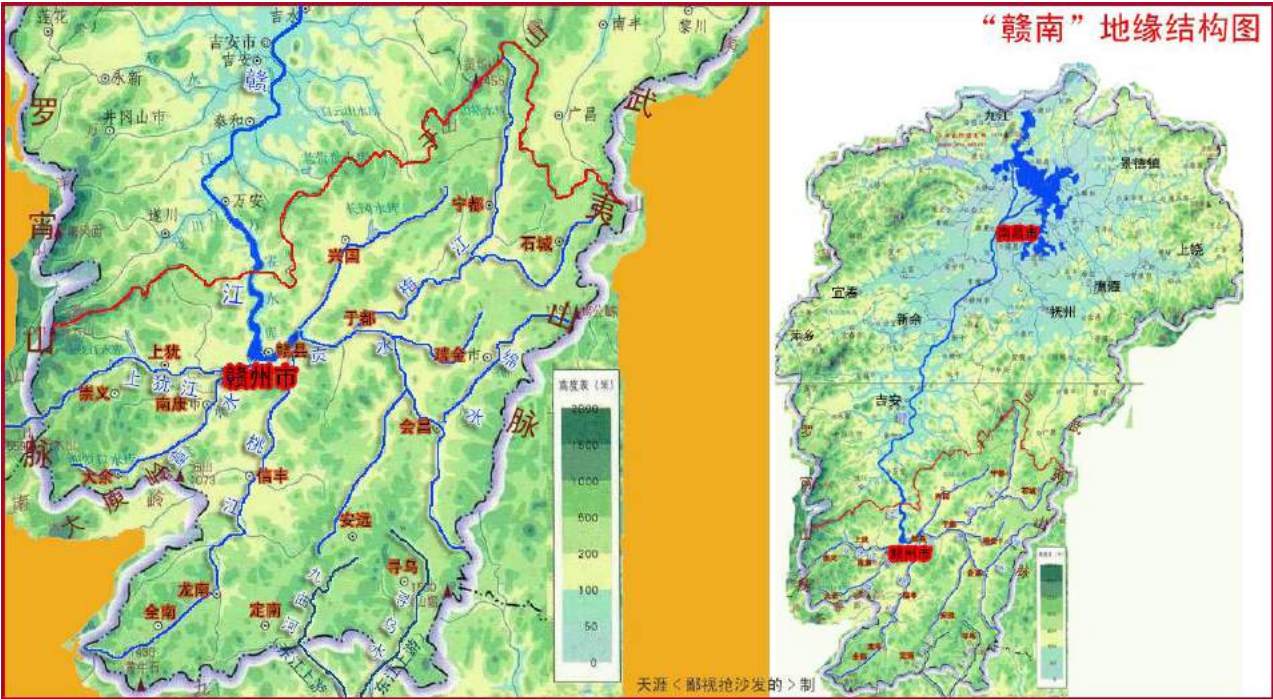
第二节 赣南成为客家先民南下的首站

华夏民族在长江、珠江流域的转进过程中，江西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中转站。说到这里，我们肯定会想到，这是因为大庾岭上的“梅关”通道在沟通岭南中的重要作用。但其实在民族的缓慢自然迁移过程中，这并不是最重要的。基本的原因，还是在于江西封闭的地缘结构有利于成为一个人口储备库。就这一地缘特点，我们曾经不止一次的提及过。在最能反映出中央之国核心区内诸板块特点的春秋战国时期，这一特点就表露无疑了。

当江东因他们的吴越文化而自豪，两湖孕育了楚文化之时，江西这个由大别山、罗霄山、南岭、五夷山等山脉合围起来的地缘板块，只能在两个强势文化区中间以“吴头楚尾”的模糊定位自居。即使是现在，两湖之地暂时已经退居二级地缘板块，长三角和珠三角因为经济原因成为地缘重心之后，江西的地缘位置依然是摇摆不定，

无法明确自己究竟应该成为哪一方的腹地。当然，也不能说赣江流域就完全是一个封闭的地缘板块，所谓的封闭只是相对于它周边的几个省份而已。最起码赣江下游的鄱阳湖及其周边地区，在长江成为博弈主战场时，还是能够发挥枢纽作用的。

赣江下游的鄱阳湖平原，成为中央之国核心区的时间，并不会比江东、两湖地区晚多久。当年的吴、楚两国在发展壮大后，都会很自然地沿江向此渗透。与赣北的鄱阳湖平原相比，赣南的那些丘陵区就要边缘许多了。但历史还是给予了赣南地区登上地缘博弈舞台的机会，比较知名的有两次，一次就是我们这一时段所分析的对象“客家”；另一次则是红色政权的诞生了（如果仔细对比二者的地缘背景，我们就会发现，他们所覆盖的区域、重心基本雷同）。



赣南地缘结构图

从地形图上看，江西的北部是一个完美的盆地地形结构。赣江下游和发源于周边山地上的众多支流，共同汇集成鄱阳湖，并为之带来了大片的平原区。而东西纵深稍短的江西南部，情况则正好相反，丘陵地貌为主的地形，相间着由赣江上游诸多河流所冲积而成的河谷平原。其地缘中心赣州，及其所辖的 19 个市县（区）都是依这些河谷平原而生。而赣州这个地缘中心，正是这些扇形的赣江上游支流所汇集的中心，像是一个扇柄一样，牢牢地控制着江西的南部。

在现实的生活中，行政区域并不会总是按照地理结构来划分的。不过在江西这个与世无争的地缘板块中，二者的贴合度还是很高的，特别是在赣南地区。如果在地形图上观察赣州地区边界的话，我们会发现，它的边界就是在赣江上游支流（所有汇入赣州这个点的河流）与赣江中游地区支流的分水岭上。这种能够真实反映地

理结构的行政划分，往往也是最稳定的。由于赣州这个地级市的行政结构与地理特点高度吻合，因此“赣州”这个行政名称，与“赣南”这个地理名词，往往有着共同的地缘含义（除非特指赣州市这个点）。而在“客家四州”这个地缘概念中，所指向的其实也就是整个赣南地区了。

不管是像秦人那样的武力征服，还是像东晋、南宋那样有组织的“衣冠南渡”，抑或以家族为单位的自然渗透，农耕属性的华夏民族所最先选择的肯定是平原纵深较大的地理单元。以我们这阶段所涉及的地理单元而言，赣江下游的鄱阳湖平原，以及珠江下游的珠三角平原，肯定是最先被覆盖的。如果这种迁移是在一个较短的时间内完成的，那么这些来自同样方位的移民之间并不会出现主客之分。就像古典时期末期的“蓄水开闸”式的“闯关东”一样，当时的移民，以及他们的后代，就不会去深究移民时间的问题；而像台湾这种前后拉锯时间较长，且分段式的集中移民，就容易形成主、客之分了。

相比于后期的北方移民，早期的移民所遇到的困难其实要更小些。这个困难指的是获得赖以生存的土地。毕竟这些在政治和技术上都更为成熟的华夏移民，在面对这些地区的土著民族时有着综合性的优势，更何况在那些中原王朝南退时的大规模移民，本身还有着国家强制力在后面作支撑。这其实也是个地缘规律了，并不能单纯的从现在流行的“人权”角度来解读。否则要深究起来的话，台湾的所谓“高山族”最初也不是居住在高山之上的，所谓的本省人其实也是外来之客了；而建立美国的欧洲人，更应该把土地和野牛还给印第安人了。

当鄱阳湖平原、珠三角平原已经被先期到来的北方移民消化殆尽后，后期再因为战乱而大规模南迁的北方移民，在面对有着共同文化背景和技术特点的本地居民时，就没有优势可言了。如果他们的数量较少的话，很自然就会选择以个体的形式融入到当地的氏族中去；但如果是大规模的移民，就只能到早期移民还没有完全覆盖的区域去寻找机会了。

这种时候，在大平原之外次一级的丘陵地带，便是这些无法融入当地氏族的“新移民”的立身之处了。在赣江流域，并不能说鄱阳湖平原周边的山地丘陵之中，就不会成为这些急于寻找土地的新移民的开发区。但在历史的推进过程中，远离地缘博弈中心，地理结构上又封闭自成体系的赣南地区，却是最有机会让这些后来移民保持住原有自身文化特点的板块（想保持住自己的族群特点，必须有一定的人口规模支撑）。

如果赣江上游地区就是北方移民的最后一站的话，那么作为一个地缘死角，赣南最终的命运还是会被更强势的上游文化所同化，或是在保留自身特点的情况下处于附属地位。就像珠三角的直接辐射区里，其实还有很多次一级的地缘板块，但都被归入了广府文化区这个大板块（如四邑）之中一样。事实上整个江西的情况也的确如此，外部对于这个地缘板块的感觉，除了“赣”这个文化标签外，一般并不会

认定它还有另一个与之等量的文化。而另一个相反的例子，则是四川盆地内对立了三千年的巴、蜀文化。

赣南地区因为“客家”文化而提升了自己的地缘影响力，其实并不是在自己的直接作用下。如果后来以“客家”自居的那些晚期移民没有持续地向沿海地区渗透，客家文化是绝对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知名度的。也正因为如此，作为客家移民的第一站，也是重要基地的赣州，在客家人所认定的核心区“客家四州”中，客家的自我认同感反而是最低的，内部的土、客划分也相对模糊。这倒也是一件好事，本来就是一个民族，一定要按先来后到的次序，搞得那么清楚其实也没有什么必要的。

所以我们在这部分的地图上所圈出的“客家核心分布区”，只是说这些地区是客家文化分布的核心区，而并不是说籍贯是那里的人就一定是客家人，或者说自认为是客家人的比例就一定占优了。至于说哪个人究竟算不算客家人，就我个人的看法，还是由他自己说了算。毕竟我一向认为，所谓“族”的划分，无论什么层次的，还是以文化认同感为准的。相信在“客家”身份没有成为一个拥有特殊权利的群体（比如高考加个分什么的），并被以某种书面形式确认之前（比如印在身份证上），认同自己是客家的人，绝大多数都是真实意思的表达（不会有因利益而什么冒充客家之类的）

第十章 客家先民在福建的迁移方向

第一节 客家先民经石壁盆地迁入福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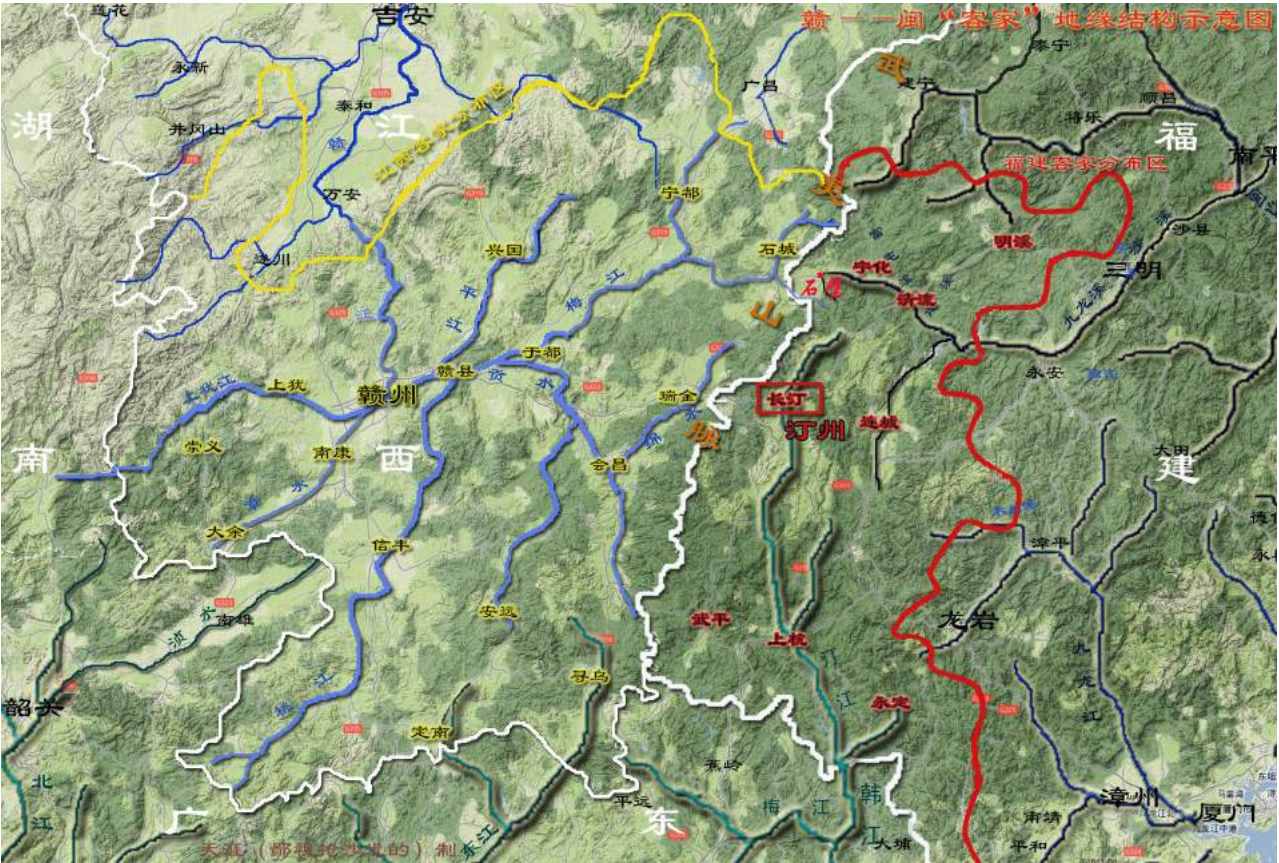
既然说客家文化成为一个有明显识别度的文化，是因为由赣南地区向外所进行的二次迁徙而造就的。那么我们就有必要来研究一下这些先民的迁徙路线了。理论上一个族群在一个地区稳定后，是可以向任意一个方向自然渗透的，只是在这些渗透过程中，相对空间较大的方向会成为主要的突破方向罢了。像赣南的客家文化也是如此，在西北、东北两个方向的赣江上游支流与中游支流分水岭的北部（吉安、抚州两地的南部边缘）；以及罗霄山脉的西侧（湖南的东南边缘），也都有客家文化区的存在。不过这些自然渗透在湘、赣两个强势本土文化的压力之下都没有形成规模，无法为客家文化的发展作出关键性的贡献。

如果按照正常的思路，从赣南再次迁徙的客家先民们最有可能选择的迁徙路线，应该是跨越大庾岭，然后沿北江向南，直至珠三角地区。而实际上，这种情况也的确发生了，以至于北江上游的韶关地区，仍然是客家文化的重要分布区，也被我们划到了“客家核心分布区”内。问题是这条最容易选择的路线，也一定会被早期移民所看中。特别是在早期移民占据了北江下游的珠三角地区，并形成强势文化区后，粤北的这些后来者即使能够在与土著族群的博弈中，在北江上游的河谷、丘陵中得到栖身之地，也不大可能发展成为与珠三角的广府文化、潮汕地区的潮汕文化并立的“客家”文化。更有可能的是依据一般的地缘规律，成为下游地区的子文化区。

既然客家人和客家文化在赣南初步形成后，向北、西、南三个方向进一步渗透时会遇到强大的湘、赣、粤文化阻击，那么他们唯一有可能的突破口就应该是在东面的福建境内了。不过从地理结构来看，这个方向应该是最没有发展前途的。在分析闽越时，我们已经十分清楚了福建的地形。可以说，这个是中国沿海地区中山地密度最大的省份，以至于我们在扫视地形图时，无法在它的腹地找到一个稍具规模的平原区。有限的几个稍成规模的平原，也是沿海岸线分布的沿海冲积平原。

更何况在福建和江西之间，还隔着高大的武夷山脉。即使客家先民有本事翻越武夷山脉，并且沿着那些发源于武夷山脉东麓的河流（如闽江）穿越这些大纵深的山地，并最终到达这些沿海平原，他们也会发现，在此生存了数千年的闽越族人也不会给他们机会来保持自己的文化特色。更何况在这几千年的历史进程中，当年沿海路迁徙至福建沿海的这些“越”人，早就沿着这些河流溯江而上，将自己的文化传播到了福建腹地。即使后来闽越族人同样已经华夏化了，基于地理结构而保持的地缘结构却并不会发生多少变化。就像波斯人后来成为穆斯林，但伊朗高原地缘结构的完整性，却并没有因为意识形态而改变一样。

尽管客家文化向福建境内渗透有着非常大的困难，但福建在历史上却的确成为客家文化的重要发源地。其境内的两个地缘标签：有客家祖地之称的“石壁村”；以及位列“客家四州”之列的“汀州”，都在客家文化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甚至可以说，如果客家先民没有向福建境内迁移的话，今天的客家文化就不会有这样广泛的影响力和知名度。而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先要来看看，当年居住在赣南的客家人是遵循什么样的路线，迁移到福建境内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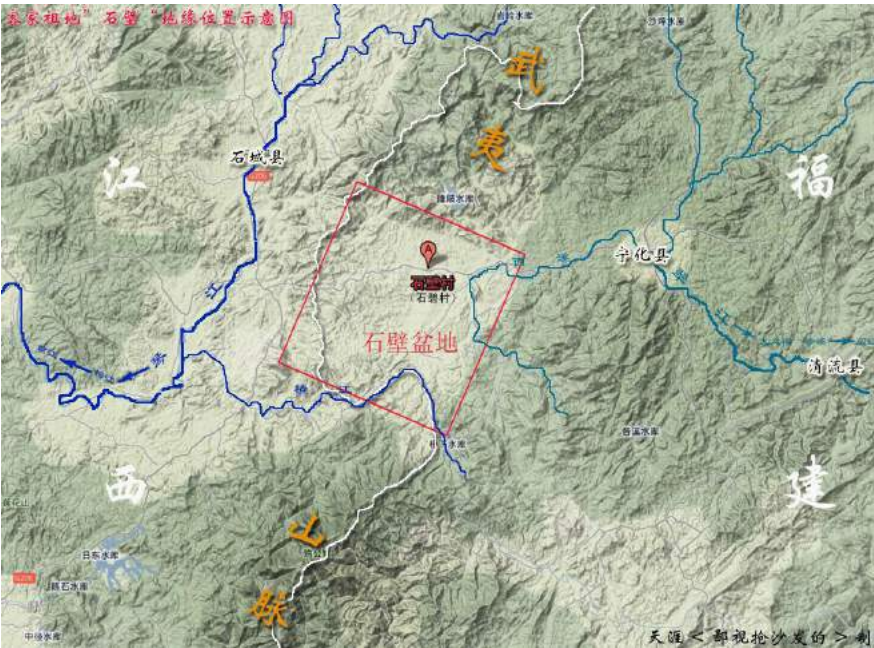


赣——闽客家地缘结构示意图

从所附的《赣——闽“客家”地缘结构示意图》上我们可以看出，虽然江西和福建的分界线是按照武夷山脉的分水岭来划分的，但这却并不意味着两个地缘板块之间就没有联系紧密的区域了。当武夷山脉向南即将走到尽头之时，它也像所有的山脉那样，无论是高度还是密度都有所下降，这就为赣、闽两地之间的族群迁徙提供了便利。更为重要的是，尽管武夷山东麓整体都是高密度的山地，但在西南部，也就是武夷山余脉相对应的区域，却有着一小片相对下陷的区域。尽管这些相间于山地之间的小型河谷盆地是那么的不起眼，但对于本来就是在夹缝中求生存的客家先民来说，能够有这种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的相对平坦区域来继续他们的农耕事业，已经是难能可贵了。

事实上，当我们从空中俯视赣、闽、粤三省交界之处时，就会发现由于分割三

省的大庾岭、武夷山余脉等山体与周边山体之间相比并没有高度上的优势，因此三省在这一地区的地理分割并不明显。而相对宽松的地理条件和广布的河流，也生成了许多小型的河谷盆地。这些地理特点，都为农业属性明显却又无法在大平原地带拓展生存空间的客家先民们，提供了生存、发展的可能。这种地形，加上三省交界的边缘地位，都为客家文化保持自己的特点提供了地缘上的基础。



客家祖地“石壁”地缘位置示意图

尽管依照山脉的走向，赣、闽、粤三省交界之处的切割算不上明显，但如果我们把视线转移到河流上面，就很容易发现其中的地理规律了。当赣南的客家先民们沿着赣江上游的支流逐步迁徙至分水岭西侧，并最终跨越分水岭向闽西南进行自然渗透时，他们需要在武夷山脉中找到一个突破口，以为持续的移民行为提供战略通道，这个突破口

口的战略作用类似于湘桂走廊。有这样相对平坦的平原带成为枢纽来过渡，也让两个水系、两个地缘板块之间的联系就能够变得更加紧密。

相比秦人利用湘桂走廊这条狭长的平原带强势向岭南渗透，在武夷山脉之中寻找连接赣、闽两地水系的突破口，要更有难度。毕竟作为一条山脉来说，武夷山脉的发育完整程度要远高于由诸多丘陵组成的“南岭”。不过这个突破口最终还是被找到了，它就是“石壁盆地”。而客家人的祖地“石壁村”，正是位于这个面积只有 200 平方公里，镶嵌在武夷山脉之中的小盆地之中。石壁盆地这个地理名词，也正是得自于石壁村这个客家文化中的著名地标。

像石壁盆地这类镶嵌在山脉之中，地势相对较为平缓的小型盆地，在那些争夺激烈的地缘板块眼中，往往具有重要的军事价值。比如太行山中扼守飞狐陉的涿源盆地；中条山中的“虞原”（“假途伐虢”故事中，那个悲剧的“虞国”所在地）。如果赣、闽两省是中央之国内部争夺的焦点所在，石壁盆地也应该会具有同样的战略作用，不过历史并没有给这两个省份成为重要战场的机会。而“石壁”这个地理单元在交通上的跳板作用，却通过客家先民的迁徙而得以流传于世。从本身的地理结构来说，石壁盆地的轮廓大致呈现为一个“口”字形，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个“家

徒四壁”的房间，石壁之名也正是来源于这种直观感受。也正是这种地理结构和地理位置，才让客家先民有机会躲避已经涉及赣南地区的战乱，在此蓄势准备二次迁徙。

第二节 蒙古征服华夏促客家民系形成

关于客家民系最初形成的时间，一直以来都有不同的观点。因为中国历史上的北方马上民族入主中原，以及随之而来的汉民族大规模衣冠南渡的情况发生多次。秦汉时代，开启了岭南华夏化进程，并带去了最初的华夏移民，是没有异议的。而之后到底是哪一次移民直接促成了客家民系的形成，尚无法确定。比较一致的观点是，唐宋之间的“五代”时期，是一个划分标志。在此之前的移民已经占据并充实了较好的地理单元（特别是珠三角地区），并转而形成了土著的华夏文化，也就是现在以珠三角为核心区域的粤语文化，或称广府文化。

这种断代不无道理，在我们曾经解读过的大庾岭以南具有门户作用的地理单元“浈江谷地”（南雄盆地）中，有一个在广府文化中与客家文化的“石壁村”具有同等地位的祖地：珠玑巷（南雄市区东北10公里处）。而这个华夏移民南迁岭南的中继站，所能够直接追溯到的年代就是唐代（现在我们所能看到的梅关古驿道，就是唐代重新整修并拓宽过的，随之而来的就是一个移民高峰期）。当然，珠玑巷也好，石壁村也罢，所代表的并不只是一个点，而是一个地理单元，或者说地缘板块。从地缘板块的角度来看，整个浈江谷地和石壁盆地，都有理由接受广府和客家后裔祭拜的香火。

在一个民系的形成过程中，总是需要有一个能够直接追溯到的时代的。否则都按五百年前是一家的标准往上再追溯的话，广府和客家文化都是由共同的华夏先祖传承下来的。只是如果大家都这样想的话，地球上倒也真正和平了。往上数到人类走出非洲的时代，地球上所有的人（如果没有外星人冒充地球人杂在其中的话）都一定可以找到共同的祖先。不过非常明确一点的是，我们在这里解读广府和客家的源流，并不是一定要将这两个民系区别并对立起来，而是从整个华夏文明扩张的角度来探究其间的地缘背景。相信在岭南土、客关系最为紧张的时期，也没有人会否认自己的华夏身份。

与汉族内部的其他民系有所不同的是，客家民系往往非常强调自己的华夏属性；而包括广府在内的其他民系，也因为自己的移民时间早，而认为自己保存有更多的华夏原始文化基因，因此也经常出现关于谁才是正宗的汉族后裔之类的争论。其实经过之前的分析，大家应该已经清楚了，土客的区别，无非是移民时间的问题，最初的来源其实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既然大家都认可自己的华夏身份，究竟谁更正宗的争论其实是没有必要的。即使从技术角度看，也没有优劣之分。不过客家如此强烈的华夏认同，却也的确是有地缘背景的，而这与客家意识的形成更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汉族内部的诸多民系（如东北民系、华北民系、中原民系、广府民系等）中，客家民系可以说是最为特别的一支。之所以特别，是因为其他的民系都可以很容易找到对应的地域以及占据优势的省级行政区，而客家民系的核心分布区，无论从地理上，还是行政上，都被分割得支离破碎。即使它的内部地理相连，但却从来没有过一个以客家为名的行政区出现。也就是说，如果按照正常的地缘规律，像客家这种分布在各大地缘板块边缘的族群，只可能各自成为所在区域主体文化的附属文化，或者是以所谓少数民族的面目出现。而客家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独立的民系，并享有很高的知名度，和中央之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游牧民族扩张——蒙古帝国的建立有着直接的关系。

在蒙古人崛起之前，中央之国虽然已经多次经历过游牧、渔猎民族入主中原的情况，但以汉族为核心的政权，却始终能够保有长江甚至淮河以南的半壁江山。如果这种情况能够一直维持下去的话，那么那些不同时代南迁的氏族应该还是会按照正常的规律，逐次沿南迁路线沉淀下来；或融入当地土著文化，或为土著文化注入新鲜血液后，形成新的文化和族群；并不会在边缘山地上去刻意保持自己的文化特点，以独立的姿态去面对所在地的土著文化。而蒙古人的那次全面入侵，却直接影响了长江以南已经稳定的地缘结构，并直接激发了独立的客家民系的形成。

在蒙古人入主中原，并攻取了南宋一线的地缘板块：四川盆地、江汉平原、江东地区之后，农耕文明的南宋王朝并没有就此完全灭亡。如果当时的蒙古人对农耕属性的华夏文明表达出合适的敬意，并做出愿意融入华夏民族的姿态的话，那么他们在征服了中央之国南部那几个一线的地缘板块后，应该就能够比较顺利的成为中央之国的主人了。

不过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如日中天的蒙古帝国并没有此类想法，他们甚至将华北平原大片的农田变身为牧场。出于对改变生产、生活方式的恐惧，即使是只关心身边事的普通农民，也必须站出来反抗这种改变了。相比之下，后来的满洲人就做得更柔性些，虽然初期有过跑马圈地使生产关系倒退的方式。但后来的及时纠正，并主动融于华夏文化，使得这个“异族”王朝得以存继了将近 300 年，以达到中国历史上一个正常王朝的寿命值。

蒙古帝国这种不尊重被征服地“地缘属性”的做法，固然让他们的统治不能长久，但就最初的军事征服来说，他们却是做得极为成功的。而那些不愿意就此改变的南宋民众在失守了一线地缘板块的保护之后，依旧在二线地缘板块中继续他们的抵抗事业。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之前很少被推到前台的江西、福建、广东三省成为双方博弈的主战场。即使是这片最后的战场失守于蒙古铁蹄之下，残存的抵抗力量依然在海上完成了最后的抗争。文天祥、零丁洋、崖山等颇具民族气节的符号也成为这段历史的标记，并留存在我们的记忆当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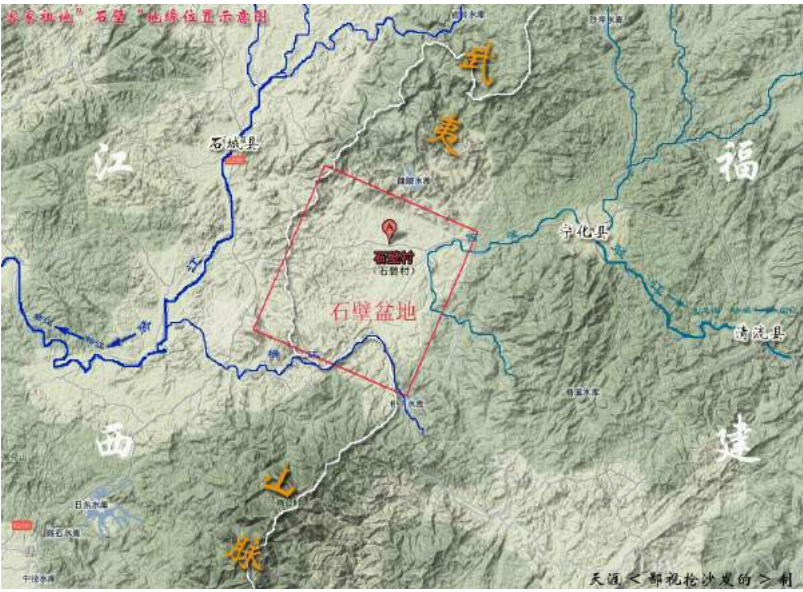
但如果从最本质的层面来看，之所以会有这么全面的反抗，还是基于对改变生产、

生活方式的恐惧。正是在这一波游牧民族的全面入侵中，之前已经沉淀在赣南地区的汉族移民被迫进行了二次迁移。这种有别于和平时期的自然渗透，造就了两个后果：一是迁移的氏族因为迁移的原因是不甘臣服于游牧民族的统治，而变得非常强调自己的华夏属性；二是迁移的目的地并不是所谓“人往高处走”，向条件更好的大平原地区迁移（那里是政治征服的重点），而是被迫向更为边缘的地区转移。

理论上，当时迫于蒙古人的压力而从赣南各河谷平原迁出的移民，可以向周边各方向的山地转移，但最终导致客家民系产生的那支却是迁移到福建的那支。而赣闽交界处的“石壁村”，就是客家民系形成、扩张的地缘始点。

第三节 客家先民渗透至闽江流域

就石壁盆地的地理位置而言，处在武夷山脉这条闽、赣分割线之中，是其成为躲避战乱的客家先民的避难地的重要原因。南征至此的蒙古人，即使是要征服闽越地区，也不能以这个方向为重点（以闽越的地理结构而言，沿海路南下是最好的选择）。而这个盆地本身的双重属性，又成为客家先民的下一步迁徙的地理基础。



客家祖地石壁地缘位置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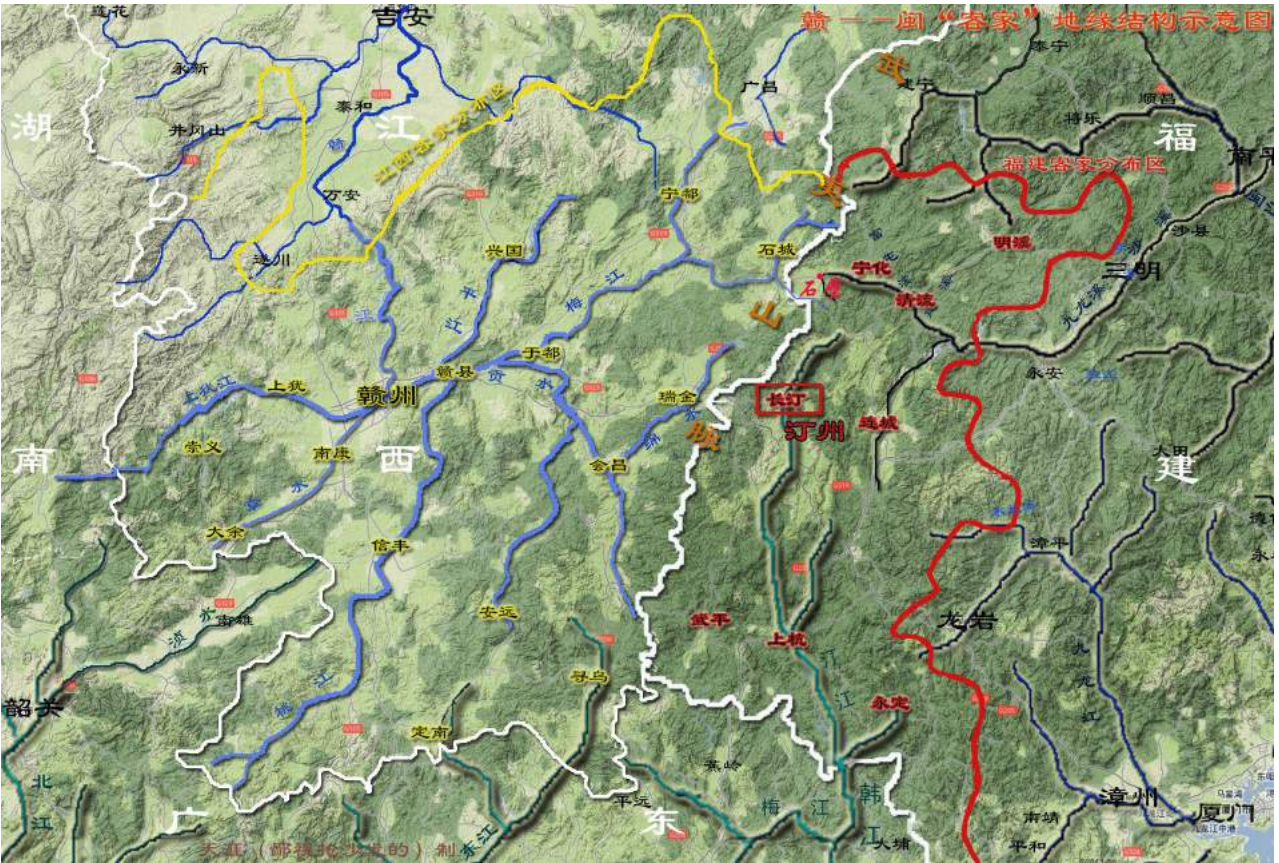
之所以说石壁盆地有双重属性，是因为它的边缘山地同时发源了两条河流，而这两条河流又分别隶属于赣、闽两大水系。向西流淌的那条河流叫做“横江”，在横江水逐次汇入江西境内的“琴江”、“梅江”、“贡江”之后，最终在赣州合流入了赣江；而向东蜿蜒的那条则叫做“西溪”，其流入福建境内的宁化县城后，转而合流入了“九龙溪”、“沙溪”，直至最后汇入“闽江”。

也就是说，从连通水系的角度来看，石壁盆地本身就天然具有地缘枢纽的作用。

如果说当年的秦、汉帝国不能借助海路征服闽越，而是要像开挖灵渠那样，寻找一个点来打通陆地水上交通线的话，石壁盆地应该会是候选地之一。当然，这种情况一直也没有发生过，毕竟征服闽越的话，海路是性价比最高的选择。事实上福建境内的水资源虽然十分丰富（一条闽江，水量就比流域面积比它大11倍的黄河还要大），但由于自身体系的原因，其内河的航运价值，一直没有机会在中央之国的

地缘舞台上展现出来。也许从连通腹地，拓展空间的角度看，能找机会打通一下与长江、珠江水系的联系，对福建摆脱封闭的地缘状况会有所帮助。

虽然石壁盆地有连通赣、闽的地理特点，并且与江西方面有隔而不断的感觉（相比而言，盆地的西边缘山地高度、密度都较低，有多条天然山谷相连），但盆地的腹地还是与西溪的关系比较密切，因此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石壁盆地，绝大部分是被划入了福建境内，并成为宁化县的一部分。如果当年迁移至此的客家先民仅仅是在此躲避战乱的话，那肯定是没有办法成为一个庞大民系的祖地的（客家民系的人口目前已经上亿了）。如果有幸被哪位著名文学家发现的话，最多也就是得到个类似“世外桃源”的定位而以。



赣——闽客家地缘结构示意图

从自然渗透的角度看，既然石壁盆地内的“西溪”是属于闽江水系，那么客家先民们很自然的选择，就是先向闽江下游渗透了。而从现在福建境内的客家文化分布状况来看，他们也的确这样做了。在闽西南以客家文化为主的八个县中，北部的“明溪”、“宁化”、“清流”、“连城”四县都是属于闽江上游水系。问题是，当客家先民们试图向闽江流域持续渗透时，他们会遇到很大的问题。首先是地理结构的问题，以闽越腹地的地理条件而言，河谷平原的发育本来就是有限的。对于农耕属性明显的客家先民来说，闽江上游的地理条件远比不上他们在赣江上游的“老家”。

其次，在客家人决心继续向闽江流域扩张时，闽越族人（包括后来华夏化的闽越族）经营闽江流域已经有千年以上了。你越往下游地区渗透，所遇到的土著文化抵触也会越强烈。对于视土地为根本的华夏民族来说，都天然会有排斥外来“入侵”者的本能。因此客家在闽江上游地区的扩张也就止步于上述地区，并没有大规模渗透入闽江流域的腹地。如果福建境内的客家先民就此止步的话，那么它们的在客家民系中的地位 and 所扩张的区域，并不会比跨越罗霄山脉向湖南境内渗透；以及向赣江中游地区渗透的客家人更高、更多。甚至可以说，这些被封闭在各省边缘山地中的客家人，最终的命运一定是被土著文化所同化，就像现在赣南的客家文化已经很大程度成为赣文化的一部分一样（包括身份认同感）。

第四节 客家先民渗透至汀江流域

如果说客家人由赣南迁移至石壁，拉开了客家向福建移民序幕的话，那么接下来向闽江下游地区渗透，则可以说是一种尝试。而真正让客家人在闽越地区占据一席之地的，是另一条与闽江上游水系相邻，却又特立独行的河流“汀江”。正是由于客家先民由闽江流域向汀江流域的转进，才实质性地拉开了客家文化扩张的高潮。

很多对客家有所了解的朋友可能会感到奇怪，既然石壁在客家形成的历史中具有如此重要的承上启下的作用，那为什么最后的行政地位却如此之低（村、镇级）。即使在“客家四州”中，覆盖福建地区的“汀州”，其地缘中心也不是在石壁，以及它所属的宁化县，而是在现在的长汀县。其实这也很简单，因为源头和中心的地缘属性毕竟还是有区别的。就好像长江、黄河的源头地区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区域，长江、黄河流域的地缘重心却是在中下游地区一样。

就石壁盆地而言，以其本身所属的水系和地理条件来说，是没有太大扩张空间的。我们前面也说过，在山体密度如此之大，土著文化存续时间如此之长的闽江流域，能够扩张到覆盖四县的程度，已是很不容易了。这很大程度得益于赣南这个人口储备库在客家文化形成之初，能够通过石壁盆地这个武夷山脉的缺口，源源不断地为之补充新鲜血液。

既然往闽江流域渗透没有太大发展，那么客家先民在人口饱和后，势必还要寻找下一个渗透方向。好在他们只要把视线稍微向南移一点，就会发现另一条体量不小，并且脱离闽江控制，独流入海的河流“汀江”。在闽西南这块山体密度较低，下陷盆地地形体量稍大的区域里，隶属汀江流域和闽江流域的区域，基本上是各占一半。而这些比较适合聚居和农业生产的区域，都已经被农业属性强烈，却又无法得到大块平原区的客家文化所覆盖了。

其实观察赣、闽、粤交界处的核心区，我们会发现，这些区域都是些比上不足（与大体量平原区相比），比下有余（高密度山地区）的丘陵区。从整体上看，会给人

以盆地相间的感觉。虽然这些下陷地区的腹地还是没有形成体量很大的平原地区，但对于已经有技术在低缓丘陵上开发农业用地的华夏先民来说(如梯田技术的使用)，已经有条件让他们在此依靠农业生产来繁衍生息了。只不过从单纯的生产力角度而言，这类地形的地理条件，一般也就是能达到自给自足的程度罢了。而大片的平原地区才有余力储备去发展更多样性的文化，以及直接成为地缘政治的主要博弈区。



福建省政区图

福建的行政地位，也正是由于它有更好的辐射力。我们在闽越部分也分析过了，福建的河流绝大多数都是自产自销，即发源于武夷山以东，然后在福建境内独流入海。其中只有闽西南的汀江是一个特例，这条同样发源于武夷山东麓的河流，最终并不是由某个福建沿海平原入海的，而是去滋润了潮汕平原，由潮汕地区入海的。只不过在它流入广东境内，并与发源于广东的另一条河流“梅江”汇合之后，以“韩江”这个名字出现在了潮汕文化之中。

既然汀江和闽江流域相比，在闽西南这块山地密度相对较低的区域，所占有的份额并没有优势，那么就需要有其他因素来决定其地缘地位了，而这个因素就是区位。在决定一个地点是否成为地缘中心时，所在地的平原面积并不是被第一考虑的要素。在区位上有没有优势，能不能因此而辐射更多的地区才是最被考虑的因素。也正因为如此，在平原空间上与川西平原中的城市相比，没有任何优势的重庆，才能够凭借多河交汇的地理优势，成为四川盆地中的又一个地缘中心。

汀江流域在闽西南

汀江这种游离于闽越板块之外的辐射力，在古典时期为其赢得了“州”一级的行政地位。其上游处的“长汀”，也由于在闽西南地区据有承上启下，连接闽、汀流域的地缘作用，而成为整个闽西南的地缘中心，并成为狭义的“汀州”府。不过对于封闭（对内）而自自成体系的福建地区而言，闽西南这块文化上以有别于闽越文化之外的客家文化所覆盖，地理上又据有天然的向外辐射力的板块，始终是一个异类。

对于异类的处理办法，在行政上永远只有两个方向。一个是允许其自成体系，依照已经形成的地缘结构成立行政区；另一个就是分而治之，将之分块划入相邻的更高一级的行政区中。在古典时期，帝国的统治者们还是基本按照前一种方式在做，也因此而产生了管理闽西南八县的“汀州”这个地缘标签。而现在，闽西南这片客家文化区，则没有再保有一个地区级的行政区了。它北部隶属闽江流域的明溪、宁化（石壁所在县）、清流三县，被划入了以闽江上游水系为联系纽带的三明市；南部的整个汀江流域，加上其东面的连城县（连城所在盆地属于闽江流域），一起被划入了龙岩市。就龙岩市的地缘属性而言，则是属于九龙江水系的上游。而九龙江的下游，则是闽南这个地缘板块的核心城市漳州、厦门。

将汀江流域交由闽南属性的城市管理，这其中的地缘思维，其实是希望这个板块能够成为闽南地区的腹地。或者说还是希望把汀江这条天然有可能被广东地区辐射的河流，内部消化掉。至于这种划分是否合理，又是否在地缘文化上达到了和谐，还有待时间去证明。在我们目前所讨论的内容中，其后果就是“汀州”这个地缘标签，成为客家四州中唯一一个过去式。而除去赣州之外的，与客家文化、汀州关系密切的梅、惠两州，在地缘矛盾更为尖锐的广东地区却得以保留了下来。

第十一章 客家先民在广东的迁移方向

第一节 客家先民由汀江转入广东梅江

客家这个民系之所以能够成为一个具有独特认知的民系，并非是因为它在赣南以及闽西南的沉淀。如果没有在广东地区的三分天下有其一，仅凭在赣、闽两地的存在，客家文化是有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民系的。在成功扩张至汀江流域后，客家先民实际上拥有了两条入粤的战略通道：一条就是仍在赣南的客家先民，在翻越大庾岭后，沿湓、北江向南迁徙；另一条则是由已经在闽西南定居的客家先民使用，即沿汀江而下，进入下游的韩江流域。

前者作为主要的迁移通道，其实千年以来一直在使用，技术上与闽、粤通道的打通与否并没有关系；而后者虽然看似难度更大，但沿这条路线迁徙的客家先民，却是客家意识的直接塑造者。也正因为如此，粤北韶关一带虽然也是客家文化的主要覆盖区，但却没有被客家文化的研究者列入“客家四州”这个客家核心区的范畴中。事实上在“客家四州”这个概念之外，还有一个更狭小的客家核心区范围，即包括梅州、汀州、赣州三地区在内的“客家三州”（排除了惠州）。

梅州的地理范围是在韩江上游的梅江流域（广东境内）。汀、梅、韩三江的关系，简单点说，就是由闽西南发源的汀江，与粤东发源的梅江，在粤闽交界处（广东境内）合流而成了韩江，并最终由潮汕平原入海。当年客家先民由石壁、汀江一线南迁时，理论上是可以进入潮汕平原的。但经过之前的分析，我们也已经清楚了，作为广东境内仅次于珠三角的地缘板块，以客定位的客家先民，是很难在这样体量的地缘板块中压倒土著文化的。

事实上潮汕平原也并非没有受到外来文化的影响，否则也不会形成独立的“潮汕”民系了。不过潮汕文化形成的外力因素，却并非来自于陆地，而是海洋。在潮汕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受北面闽越文化影响是非常大的，而与之地理相邻的闽南地区，更是直接作用者。因此潮汕话也被认定为是闽南话的一种次方言。

基于陆地文明的属性，我们在探究华夏文明扩张的时候，往往会把注意力集中在陆地线路上。而实际上，海洋也是华夏文明扩张的一条重要路线。而在海路扩张中，闽南这个地缘板块，其实是有着和赣南一样的地缘作用的。在所属省份中相同的地缘地位（位于核心地缘板块南面的次一级单元），都使之有可能成为沉淀南迁北方移民的重要基地。

而随后的二次迁移，也是依据双方的地理位置而进行了。就闽南的二次移民而言，东南沿海土著文化薄弱的区域，都是他们有可能落脚的地方。由于海洋在交通上的开放性，闽南移民并不一定要遵循陆地规律逐次南迁。除掉地缘关系紧密的潮汕地

区以外，雷州半岛、台湾岛都早期华夏文明覆盖的薄弱地区，都可以成为闽南化的华夏文化渗透区。已经带有明显山地族群特征的客家先民，显然在竞争潮汕平原这块海洋属性明显的板块上不占优势。因此由闽入粤的客家先民主力并没有沿江而下，跨越莲花山脉进入潮汕平原，而是在行至汀、梅、韩三江交汇处后，向西溯梅江而上，将梅江流域变身为客家文化区了。



粤东客家地缘结构图

第二节 蒙古征服华夏对客家入粤的影响

可能会有人觉得奇怪，我们一直都在说迁移，似乎总是由北向南的单方面迁移。那么有没有反方向迁移的情况呢？这种情况也的确是有的，就客家先民而言，在迁入闽、粤之后，亦有回迁至赣南的。不过主流还是南迁，甚至向海外扩张。毕竟越往北部，开发的时间越早，空间越小。实际上在宋元交际之时，客家先民通过石壁向闽西南迁移，并随后再沿汀江入粤之前，岭南地区经过上千年的开发，本来也已经没有大规模迁入的空间了。

但我们也说过，蒙古人是第一个统一中央之国全境的北方民族。而纵观整个古典时期，同样能做到这点的，也只有后来渔猎民族出身的满洲人了。这两个民族算是代表游牧、渔猎两大文化，完成了对于农耕文明的政治征服。只不过这种军事和

政治上的征服并不代表文明的征服，华夏农耕文明在东亚大陆的优势，一次次地将这种政治上的被征服转变为了文明上的反融合。而在统治上更为成功的满洲人，反过来更为彻底的接受了华夏化洗礼。

蒙古人的这次全面征服，使得广东地区第一次成为对抗北方来敌的主战场。当然，这也可以算得上是最后的战场了（直接领导这最后的反抗的，就是来自于赣江流域的文天祥）。抗争的政治结果，自然是已经十分清楚了，岭南地区也成为元朝的国土。而这最后的博弈也消耗了广东地区，尤其是粤东地区大量的人口。这就为避乱迁入闽西南山地的客家先民大规模南迁入粤腾出了空间。尽管在珠三角、潮汕平原这样的一线地缘板块，由于原有的人口基数较大，没有机会介入（政治因素也促使客家先民无法进入），但在边缘山地上，客家先民还是很有机会填补空间的。

其实这种由于大规模战乱而导致外来人口大批迁移、填充，并改变某些文化属性的情况，在那些地缘博弈的焦点地区并不鲜见，最为典型的就是四川地区。比如有人会问，为什么四川盆地是官话区，而云、贵两省通行的也是四川味的普通话（川普）。这其中的背景，也正是因为四川盆地屡次成为主要的地缘博弈区，而导致的人口大换血。这个过程也正是历史上著名的“湖广填四川”（最初的主体是来自湖北地区，而湖北由于与中原的地缘关系，也已经成为官话区（可以说是西南官话的源头））。

至于说云贵高原为什么没有像岭南那样，形成带有鲜明地域特点的方言区（像粤语区那样），而是也成为官话区。个中的原因，其实我们在国际部分解读中南半岛时就已经给出了答案。简单点说，就是岭南地区的独立政权“南越国”，早在西汉时期就已经灭亡了，两千多年的移民史，加上岭南相对独立的地理结构，有足够的时间形成自己的独立方言。而西南地区，在短命的蒙古帝国征服之前，还是由土著的非华夏民族（当时的认定标准）所建立的大理国来进行统治的。而汉族移民大规模移入的时间和四川盆地大规模填充外来移民的时间，基本算是同一时代，所以并没有时间和机会形成自己的汉族族系。

现在我们回到客家的话题上来，正是因为蒙古人的这次征服彻底打乱了中央之国原有的地缘结构，所以不仅四川盆地、云贵高原的地缘文化受到了影响。广东地区的地缘结构也由于客家民系的大规模填补空间，而呈现出了三分天下的局面。所以尽管北方汉族南迁的历史持续了两千多年，但在客家民系形成的断代史上，宋元之交的时期，应该算是客家民系形成的断代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尽管入粤的移民一直没有断过，但沿赣东南——闽西南——粤东一线南迁的移民，成为客家文化形成的强化者。

也正因为如此，在客家文化通过向岭南直至海外传播，成为不可忽视的民系时，梅江流域的梅州可以因其发展形成了有独立意识的客家文化，而打出“世界客都”的文化牌；而作为二次移民的重要跳板，“石壁”这个武夷山中的小盆地，也成为

客家民系可以直接追溯的源头，并以“客家祖地”的身份出现在客家文化中。至于赣州，无论你是否是由赣、闽路线南迁入粤的，都无法绕过这个最初沉淀客家先民的地缘板块。因此在客家意识得以强化，并涉及经济利益的今天（毕竟有大批的海外客家移民存在），本来已经成为赣文化圈重要组成部分的赣南地区，也开始通过打“客家摇篮”这张文化牌来试图建立自己的海外关系了。

当客家成为一个独立的民系时，你的家族是否经由石壁这个跳板进行过迁徙反而变得不重要了。在认定或者说扩大一个民系时，更为直观和重要的标准是共同的文化背景（特别是语言特点）。就像大家现在认定自己的华夏身份时，并不一定要把自己的祖先的来源直接追溯到黄河流域，而只需要在姓氏、语言、文字等文化表现形式上，表现出自己的华夏属性就可以了。在这种认定方式的主导下，那些未曾经石壁走出赣南，或者经由其他路线迁移的，具有与率先拥有客家意识的“石壁”客家共同文化属性的族群，也被认定为客家民系的一部分。

当然，并不是每一个被认定者就会认同自己的客家身份的。而目前客家也没有可能成为身份证上享有特权的一个“民族”，来直接划定自己的人口范围。但从纯粹的学术角度，确认这个民系的存在及覆盖范围还是可以做的。最起码我们还可以通过这段内容了解一下赣、闽、粤三省交界处的地缘结构。毕竟解读这一地区的最佳历史载体——红色政权的“苏维埃”时期，离我们所叙述的年代还有两千多年的时间差。真等到那个时候的话，相信会有很大一部分人会感到失望的。当客家民系的认定标准已经转而成为文化属性上的认定时，粤东的另一个地缘板块——东江流域的“客家”属性，也得到了认定，而它的行政标签则被打上了“惠州”的标记。

第三节 客家先民进入东江流域和迁移海外

在客家先民的迁移史中，沿汀江、梅江一线迁移的客家人其实算是比较晚的。但就传承的历史而言，却是最清晰的，也正因为如此，梅州和石壁才在客家民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比较有趣的是，在赣南的东部也有一条梅江，而在这条梅江之畔有一个著名的红色故都“瑞金”，与瑞金隔分水岭相望的就是汀江之侧的“汀州”府（长汀）了。并不确定这两条梅江的得名是否有内在联系，不过这倒与客家先民的迁徙路线挺符合的。

说到梅江，它和另一条韩江的上游河流“汀江”，在走向上倒是大相径庭。汀江由北至南与下游的韩江呈直线连贯状态；而梅江则是由南至北的反方向流动，在汇入韩江之后，再向南奔向大海。这种走向所造成的后果就是，客家先民虽然在历史的进程中不断的溯梅江而上，向梅江流域的腹地渗透，并由此而与海岸线越来越接近。但梅江流域（或说梅江客家）的地缘中心，却依据下游更容易辐射影响上游的地缘原则，形成在下游接近韩江的地方，也就是现在的梅州市。

东江流域、梅江流域，加上莲花山脉以南的大潮汕地区，共同构成了“粤东”这个地理板块。仔细观察客家文化在粤东的覆盖区域，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在东江流域，还是韩江流域（包括梅江在内），客家所占据的区域虽然大，但都是在东上游的山地丘陵之中。下游的珠江三角洲平原，以及潮汕平原就是属于广府和潮汕这两个更具土著特色的民系所覆盖。而客家先民在和土著居民的博弈中，也体现出了顽强的生命力和对于山地的适应性。尽管不能大规模渗透入珠三角、潮汕这两大块沿海平原之中，但那些充当板块分割线的分水岭，却也都被客家先民见缝插针的占据了。像梅江客家文化所覆盖的区域，也并非只是在梅江流域，莲花山脉及其以北的韩江干流，以及其他支流（比如大埔县所在的与梅江方向相对的梅潭江），也都被由闽入粤的客家先民所覆盖。



粤东客家地缘结构图

与梅江相比，西北方向与之平行的东江，其流向就“正常”得多了。发源于赣粤边境的东江，最终成为珠江三角洲的缔造者之一。而东江流域的地缘中心，则依正常规律形成在靠近下游珠江三角洲的惠州。在分析珠江三角洲时，我们曾经将珠三角边缘的惠州市定位为珠三角的外围城市。

这当然是基于它的地理位置而作出的定位。作为由北至南渗透至珠三角边缘的客家文化前沿，反过来也意味着惠州有很大机会被更强势的广府文化所同化。

现在的情况也的确如此，尽管惠州作为东江客家的地缘核心，被列入了“客家四州”这个地缘概念中。但就惠州这个城市的居民而言，很多人却更认同自己是属于广府文化圈的一员。而就目前的情况来看，相比于珠三角的全国性经济重心的地位，以及政治优势，客家文化在东江下游地区并没有机会反制成为主体文化。惠州这个地缘分割点融入珠三角文化圈的趋势很难逆转了。如果是那样的话，客家文化的倡导者们再想为东江客家找到一个地缘中心的话，就必须再溯江而上，突出东江中游

的河源市的客家属性了。

就现在的行政结构来看，相比古典时期代表福建客家的“汀州”被分拆并入其他地区的结果而言，东江中上游流域析出的“河源”这个地级市，倒是一个完整的客家文化区。要是有一天，河源在客家民系中的地位得以提升，并成为东江客家地缘核心的话，行政上的便利倒是更容易凸显自己的客家特色（如果行政管理者想打这张文化牌的话）。

客家文化的原始地缘属性，我想大家应该已经十分清楚了。概括地讲，这是一个以农业为基本生产方式，以相对密度较低的丘陵地带为聚落区的族系。除掉我们所说的赣、闽、粤三省交界的这片区域外，分布在中国其他省份的客家人聚落区也大都有着这种特点。不过客家民系现在之所以能够具有全球性的影响，却和客家人曾经大批向海外迁徙分不开的。这些散布于世界各地的客家人，反过来又促进了客家原始聚居区内客家文化的繁荣。毕竟认祖归宗也好，衣锦还乡也罢，无论是客家还是其他民系，乡土观念都是支撑文化的纽带。

客家人和客家文化向海外迁徙的大背景，和鸦片战争之后广东成为中国开放的前沿省份有着密切关系。事实上，东南沿海的人口输出并不仅限于客家人，更占据地缘优势的广府、潮汕，以及闽南等族系，同样或主动（下南洋）或被动（比如被“卖猪仔”）的漂洋过海。在这些离开东亚大陆的客家人中，基本都是分布在闽、粤两地的客家人，而基于居住地并没有直通海洋的河流，留在或回迁赣南的客家人并没有参与到这次全球性的扩张当中去。

只不过当这些漂流在外的客家人最终希望回来寻找自己的根时，无一例外的会沿着当年祖先迁移的足迹，上溯到赣南地区。赣南这个纯粹的内陆板块也因此得以通过客家文化，有机会间接的与海洋文化对接。不过我们也分析过了，客家人在如东江、韩江这样能直流入海的河流流域，占据优势只是在丘陵特征明显的中、上游地区。在那些下游沿海平原上，客家人在与土著文化的竞争中并没有取得优势。当然，这并不代表客家人就没有向更靠近海洋的地区努力渗透过。实际上所谓“客”这个概念的出现，就是随着客家进一步向沿海地区迁徙而造就的。

第四节 清末客家人和土著居民的土地之争

客家能够在赣南、闽西南、粤东这些河流中上游的丘陵地带，规模性的形成独特的文化区，是有着独特的历史机遇的。在我们解读客家文化形成中脉络最清晰的“石壁”客家时，所提到的促使客家先民从赣南规模性的迁出的“宋元之交”这个时间点，就是其中的一个历史机遇。首次面对北方民族入侵而消耗掉大量土著人口的粤东、闽西南地区，客观上为客家先民留出了足够的空间；另一个历史背景就是，在清朝以前，中国的人口一直都没有过亿，总人口数与土地之间的矛盾其实并不突出。

之所以在每个王朝的末期总会出现因土地而起的尖锐矛盾，是因为随着时间的推移，王朝初期被相对平均分配的土地会不可避免地集中到地主手中，从而引发了土地的结构矛盾。而最终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周期性的将原有的结构摧毁，重新建立相对公平的土地结构。也正是因为看到了这点，现在的中国对于土地自由流转和私有化问题看得非常敏感。如果直接依附于土地的农业人口不降到发达国家水平，相信是没有政治家敢冒险放任土地集中化的。

如果客家的覆盖地区只是在那些山地丘陵之中，那么客家文化的独立性应该不会有现在这样明显。只不过在 19 世纪的中国，中国的人口数量出现了一次质的变化，即由明朝以前一直保持的千万级人口，迅速跨入以亿计数的级别。到鸦片战争之前，官方统计的人口数量已经达到 4 亿之巨。这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像地理大发现，使得原产于南美的富含淀粉的高产农作物（如土豆、玉米等）的引进；以及清前期取消人头税（摊丁入亩）的努力，减少了隐匿人口（所以有观点认为，明朝人口其实已经过亿了，但不管怎么样，清朝人口大爆炸是事实）。

成倍增长的人口与在量上没有质变的农业用地，所带来的后果就是为了寻找更多的生存空间而带来的人口迁移。在中国的其他地方，如北方地区向边缘板块属性的内蒙、东北地区迁移的走西口、闯关东，都是这种人口爆炸背景下所进行的人口迁移。而在此之前的古典时期，守土观念深厚的华夏民族多是因为政治、军事的原因，才会进行大规模迁移。在拓展新生存空间的尝试中，有海洋之利的东南沿海地区，很自然地选择了以海洋为通道的向海外地区的渗透。在意识的转变上，这其实也要“感谢”国门被西方洞开所带来的世界观的转变。

与那些靠近边缘地区的族系相比，身处内陆的客家人其实并没有扩张空间。但人口与土地之间的矛盾，已经迫使他们必须寻找新的土地了。在这种情况下，那些土著居民力量相对薄弱的沿海地区，便成为客家人渗透的方向。这其中，我们之前分析过的紧临珠三角的潭江流域，也就是“四邑”地区，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区域。问题是，人口出现大幅增长的，并不只有山地丘陵之中的客家人，沿海平原的人口同样在大幅增长，因此也需要去向之前没有填满的空间渗透。以四邑地区为例，珠三角的广府族系向此渗透会更有地缘优势。由此，客家人和土著居民因为土地而爆发的大规模冲突就不可避免了。

在这场冲突中，土著居民在的心理优势在于，会认为自己才是这些土地真正的主人。并由此而认定，那些由东、梅等江中上游地区下来的居民为客属身份。正是伴随着这种地缘博弈，客家人的族系概念才得以强化，并成为广东三大民系之一。关于清中期以后（即人口大爆炸之后）的土客矛盾，或者说由此引发的土客械斗，有很多相关的资料可以查询。可以说，这段历史是非常血腥的。唯一能够从根本上解决这种矛盾的方案，就是为双方寻找新的生存空间。通过海洋向海外渗透，就是缓解人口压力的一种方式。

而从政权的属性来说，作为最后一个古典王朝的清朝，当然不会去鼓励这种方式，毕竟对于保守的农耕文明来说，这种方式等于在放弃华夏的身份。有资料表明，19世纪末的巴西政府需要大量劳动力时，曾经希望通过外交途径从中国迁移人口，但很自然地被拒绝了。而东亚另一个饱受人口压力，并且海洋属性明显的国家——日本，却欣然接受了这个机会，并由政府组织迁移了30万人口。因此至今日本后裔在巴西，乃至整个南美的影响力，都要高于华裔（甚至还在秘鲁诞生了日本裔的总统）。

尽管东南沿海的居民在向海外移民时，基本是属于自发性质，但并不代表当时的政府在缓解土客矛盾方面就无所作为了。只不过被定义为“客”属的客家人成为牺牲的对象，他们当中与土著居民矛盾最为激烈的那部分，被有组织地从所渗透进的土地上强制性的迁往湖广、广西等地，客观上也造成了客家文化的进一步发散。

第五节 客家民系获得的海洋突破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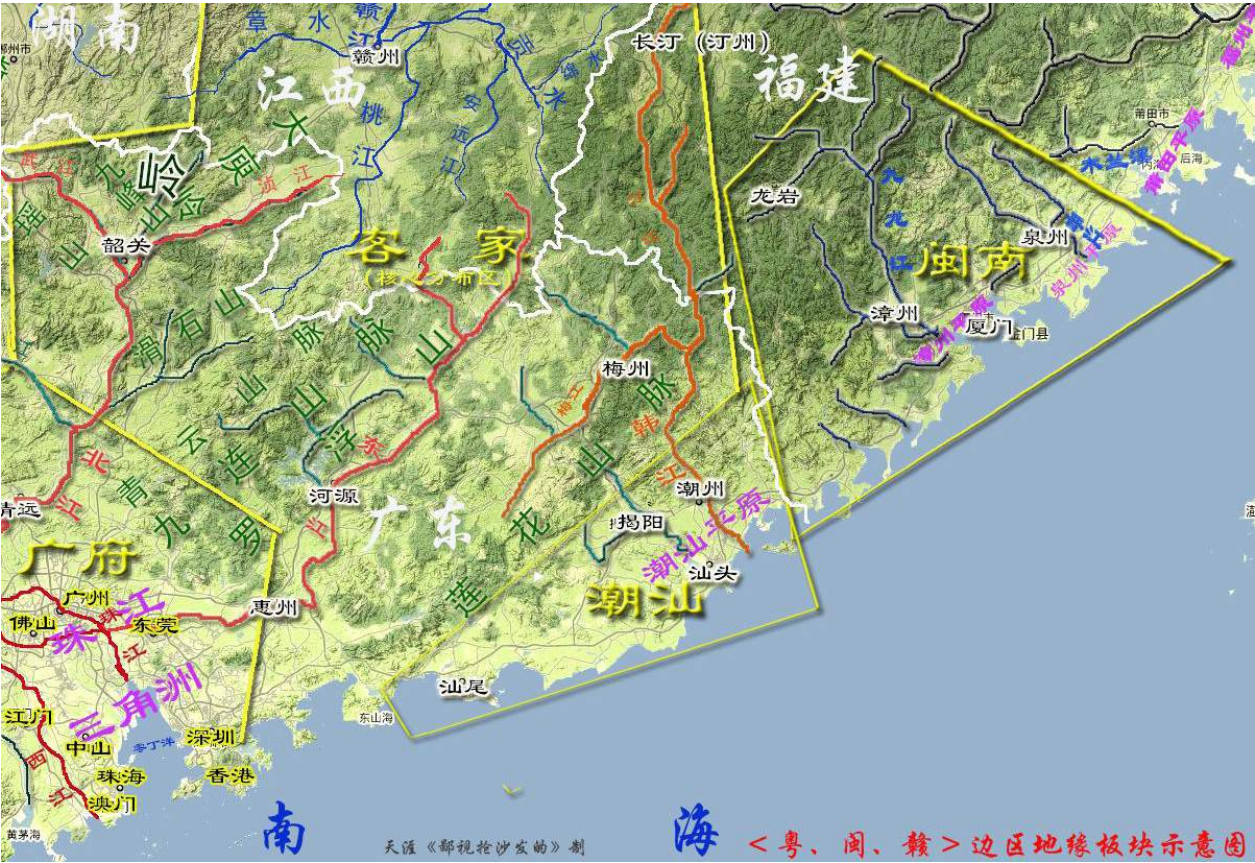
虽然客家人在向沿海地区渗透的过程中并不占据优势，但也并不代表客家文化区就无法真正获得一个属于自己的出海口了。四邑所处的潭江流域虽然在客家先民进行开拓时，广府文化也并不占优，但其与客家核心区分割的状态，以及与珠三角紧密相连的地理位置，使得客家文化很难成为这场土地博弈的胜利者。如果有一块区域能够与梅、东两江的客家核心文化区相接，又能够绕过珠三角、潮汕平原这样的土著文化优势区，那么客家文化还是有可能直接打通海洋通道的。

如果客家核心文化区想寻找一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的话，那么珠三角平原与潮汕平原之间的结合部，就是唯一可能的突破口，毕竟这两个地缘板块并非是由江河进行分割的。其间有一片起到缓冲作用的沿海丘陵区，就是客家文化扩张的机会区。这个区域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够无缝对接东、梅两江的客家核心区，避免像在四邑博弈那样，因远离大本营而最终在竞争中落败。

从现有的行政划分来看，客家核心区所扩张成功的这片沿海地带，基本就是现在深圳市东部的龙岗区、惠州市下属的惠阳区、惠东县。从地理结构上来看，这块缓冲区正好位于珠三角平原与潮汕地区分割线的莲花山脉之间。无论是广府，还是潮汕文化，在此的影响力都是相对较低的。反过来，客家移民在此站稳脚跟之后，也会反过来影响周边地区。像潮汕板块西端的“海陆丰”地区，就是因为地理位置的关系，同时受到包括客家文化在内的多种文化的影响，而变得与潮汕核心区的文化有些不同。

从水系的角度来看，客家文化的这个海洋突破口隶属于东江流域。但这并不代表这里所接纳的客家移民，就都是来源于东江流域。实际上当跨越闽粤边境，向梅江流域迁徙的这支客家先民，在上溯到梅江源头后，也会进一步跨越分水岭，渗透入这片沿海地区。正是在东、梅两江（或说惠、梅两州）客家人的共同作用下，客

家文化最终在广府和潮汕两大土著文化之间，艰难地打通了一条属于自己的海洋通道，这也为客家文化最终规模性的向海外渗透，奠定了地缘基础。而如果客家核心区是一个完全被封闭在内陆山地的族系，那么基于整个广东、福建的沿海属性，当客家人在海外移民成为一种谋生手段时，也同样会和广府、潮汕族系的土著居民一样，向海外扩张。只是在自己的核心区中没有直接融入海洋因素的话，客家文化的海外扩张之路会变成艰难许多，也不会有现在这样规模的海外影响力。



粤闽赣边区地缘板块示意图

需要说明的是，从地缘格局来看，东江客家与梅（韩）江客家的源流并不相同。应该说，如果从入粤的时间来看，东江客家的主体应该会更早。特别是东江的源头就在目前的江西境内，从地形上看，可以拥有自己独立的迁移通道。只是晚有晚的好处，正因为由赣（石城方向）入闽（宁化一带），再入粤的这支客家移民，迁移的时代较晚，历史记忆深刻，因此反而成为客家文化的主力代言人。迁移路线上的赣州、汀州、梅州三州，也分别以自己的历史定位，为自己贴上了客家文化的“摇篮”、“祖地”、“驿站”、“客都”等标签。

当东江客家也希望在客家文化的历史演变过程中占据一席之地时，就需要另辟蹊径寻找自己的优势了。从东江的开发历史来看，可以说是属于南粤第一批被开发的区域。后来封关自立为“南越王”的赵佗，在他还是秦朝官吏时，所任的职位就

是“龙川令”。而这个龙川，就是现在东江上游的赣、粤边境的龙川县（广东境内）。从江西境内发源的两条东江源头：寻乌水（寻乌县境）、九曲河（定南县境），到了龙川这里，汇集成为东江干流。从地理位置以及历史记载来看，赵佗在龙川担任县令的历史，的确可以佐证东江这条赣、粤通道，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被开发使用了。只不过，相比于北江通道能够直接对接珠三角和赣南的核心区，东江通道后来所发挥的历史作用要小得多罢了。



赣粤边界地形图

如果从字面上理解的话，所谓主、客，其实是相对存在的。相比于居住在岭南的百越之族，秦帝国及以后迁入的华夏移民，都可以算是“客”属了。也正是抓住了这点，试图以自己为中心，树立东江客家品牌的河源市，在寻找自己在客家文化中的定位时，干脆直接上溯到了秦朝，将赵佗直接奉为“客家始祖”，并寻找一些古迹作为“客家古邑”（特别是龙川这个有史可查的地点），以期扩大自己的文化影响力。只是这种定位，其实是非常牵强了。因为包括赵佗在内的，由秦帝国而起的华夏移民，可以说是整个岭南地区华夏化的先行者。如果说是始祖的话，也应该被奉为所有岭南汉族移民的始祖。一定要说跟哪个族系关系更近

的话，先期形成的广府文化应该更有资格争夺这个“祖宗”。除非，你认为广府文化不是属于华夏文化，而是纯粹的、没有华夏化的百越文化。特别说到这点，除了说明东江客家的迁移特点其实是有别于梅江客家的（即并不会以石壁为祖地）以外，也是有感于现在基于经济目的的文化争夺战中出现的各种乱象。对于一直以祖先崇拜为文化核心的华夏民族来说，祖先们一定想不到，现在他们的身后名已经成为生产力和 GDP 的一部分了。

客家文化内部的支系关系，大致就是这种情况了。其实所谓民系、民族，主要是以文化为纽带了。只要大家认同相同的文化，有共同的记忆，就可以认定彼此的亲缘关系了。至于自己那支是否能占据更重要的地位，并不重要。相比于赣、汀、梅、惠四州，珠江三江的另一支“北江”，其实大部分区域也被客家文化所覆盖。只不过北江通道，在历史上历来是中原王朝与岭南之间沟通的最重要的通道。因此即使从地理结构上看，已经覆盖了赣南、粤东的客家文化，会通过自然渗透的方式补上粤北这个缺口，但强势的广府文化，以及来自官话区、赣语区的移民文化，也会汇集在此，并让客家文化无法在交通干线上占据优势。有鉴于此，像浈江、北江沿线的南雄、韶关这样的战略要点，核心区都没有成为客家文化的优势区。因此即使在粤北也广泛分布有客家族系的移民，但核心区的缺失，使得整个粤北无法以“韶州”（韶关的古称）之名在客家文化中占据一席之地了。

从现在珠三角的强势地位，以及北江流域与珠三角的地缘关系来看，粤北最终应当还是会和粤西一样，成为珠三角的腹地。至于说东、梅两江的客家核心区有没有机会以客家文化为纽带，成为一个单独的地缘板块，就很难说了。即使单从经济和文化角度来看，可以被定位为珠三角外围城市的惠州市，也日趋广府化。至于说被定位为特区的深圳，则成为外来人口和文化向岭南迁移的最新案例。无论是广府属性还是客家属性的土著文化，最终应当都会让位于综合性的中华文化了（语言上则以现在的官话，即普通话为主了）。

客家族系的前世今生，就写到这了。希望对大家了解这个特别的族系，以及赣、闽、粤三省交界之地的地缘结构有所帮助。至于说客家族系在国内其他省份的存在，其实都可以在上述区域寻找到最初的来源的。鉴于篇幅所限，就不一一列举了。就我们所搭建的主体结构而言，客家文化的解读，其实算是超越了既定的时代背景了。下一步我们需要回到历史的轨道上去，去看看成功征服南越之地的秦帝国，即将遇到什么样的麻烦了。

第十二章 粤西南地区的地缘特征

第一节 粤西南板块的内部结构

在即将开始“楚汉相争”部分之前，岭南还有一个板块要补充一下。就是广东的另一个沿海版块——粤西南（湛江、茂名、阳江）。在三十多年前，当红色中国准备打开国门，从而真正成为这个世界的一分子时，沿海地区，特别是东南沿海，由于天然的海洋优势，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事实上在 19 世纪，英国人用炮舰打开中国国门时，东部沿海地区的地缘优势便已经开始体现出来了。只不过由于众所周知的政治因素，这个变化出现了 30 年的空白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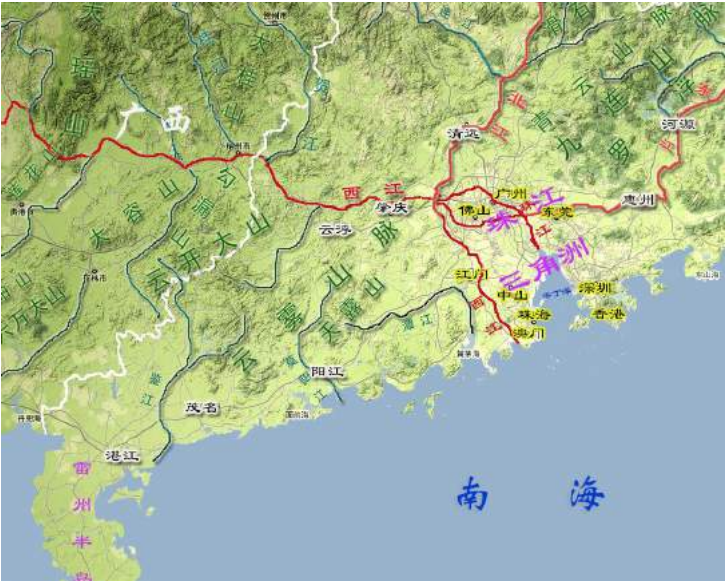
有趣的是，当年欧洲人对这个东方老大帝国所做的一切，本质是出于“重商主义”思维指导下的门户开放要求。即对于因工业革命后生产力已经发生质的飞跃的欧洲人来说，他们迫切需要中国这个大市场。而上世纪 70 年代末的那次改革开放，所造成的后果却是现在的西方国家高呼“中国制造”这只狼，侵占了它们的市场。这种攻防转换的形成，不是一两句话，或者说地缘能够解释清楚的。不过这两种结果倒是有着共同的地缘文化背景，即“孤独”的（相对于地中海文明）矗立于东方的中央之国，已经习惯了凡事自成体系。无论是被动的成为消费者，还是主动的成为产品提供者，都不能动摇他自下而上，自给自足的原始想法。这种根深蒂固的文化理念，使得中国人理解的自己在全球化趋势下的定位，绝不仅仅是以合作分工的形式，串联在全球经济体上的一个板块。

也就是说，中国人不会在任何一个领域放弃以我为主打造完整体系的想法（比如体现在所谓的“以市场换技术”行为上，就是一定要坚持“引进——消化——吸收”的渐进过程）。这种思维所导致的战略后果，一如英国人在向中国输入鸦片之前所面临的困境一样。即你可以必须依赖中央之国所制造的种种必需品，但中央之国却不能回报你以同样的市场。理解了这一点，也就不难理解在面对中国崛起时，西方国家总是会感受到巨大的压力的原因（虽然他们并不一定十分清楚本质原因）。

之所以会写上这段话，是因为大家可能注意到了，一旦脱离古典时期这个范畴，涉及现代社会，能够有海岸线的板块，似乎总是着墨比较多。这可能会让一些处在河流上游，山地之中的朋友感到不快。但如果这些地形复杂的山地涉及一个重要的地缘概念、历史时期的话，那么自然也是会详细解读的。就好像我们花了不少篇幅来解读“客家”这个地缘概念一样。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河流上游地区的命运总是和下游地区有着紧密关联的。在海洋所起的地缘作用占优的今天，那些又有下游优势，又能对接海洋的板块，作为内联外通的枢纽，很自然地需要多费些笔墨了。

在岭南的海岸线中，有一处无论是在解读广西还是广东时，都没有单独分析过。

鉴于无论是在古典时期，还是在近现代史当中，这个板块都没有特别的表现，所以在结束岭南部分，转回到楚汉相争时代之前，还是有必要单独拿出来解读一下。而这个板块的名称就叫做“粤西南”。从行政区划的角度看，“粤西南”板块包括有湛江、茂名、阳江三个地区。在通常的概念中，这三个地区是和北边的“云浮市”共称为“粤西”的。



广东地缘结构图



广东行政区划图

这种情况，是因为这个板块内部还可以分为三个相对独立的板块，即：阳江所在的，以阳江流域为主的东部地区；茂名所辖的，以鉴江流域为核心的中部地区；以及以九州江下游地区——雷州半岛，这两部分组成的西部湛江地区。

像这种由相邻的几条江共同构成统一文化地缘板块的情况，在东南地区其实也

但这种单纯依据方位来划分地缘板块的做法，往往并不符合地缘现状。就好像我们可以笼统的把新疆、西藏都归入“西部”这个概念中，但这两个板块之间所存在的巨大差异，让他们的地缘关系本身并没有太多交集，“粤西”这个概念也是这样的。沿着河流水系这个重要地缘联系纽带带来观察的话，肇庆以西，包括云浮在内的西江流域，更应该归为一个板块。而各自拥有独立水系的湛江、茂名、阳江所在的沿海地区，亦可以自成一个板块。为了和单纯方位意义上的粤西区别，我们可以用更为精准的方位感，来为这个板块命名为“粤西南”。

曾经想为粤西南这个板块找到一个更能体现其地缘文化的名称，比如珠三角、四邑、潮汕，这些广东境内的沿海板块都有这样的名称。但最终发现，这个内部关系并不十分紧密，且在广东的整体结构中有些边缘化的地区，很难找到一个能体现文化共性的名称来作地缘标签。之所以会有

很常见。像瓯越、闽南、潮汕都有这种情况。只不过上述三个板块，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登上了地缘政治舞台；晚的在近现代的海外渗透中，也发挥过重要作用。而粤西南板块的边缘地位，却让它没有机会成就自己独具特色的强势文化，反过来却成为其他强势地缘板块的渗入地。也许在将来，这种情况会逐渐改变，但最起码在现在，我们需要知道到底是什么地缘背景，阻碍了拥有海岸线的粤西南成为一个一线板块。

第二节 粤西南的区划和族群文化

粤西南的基本地理结构，我们在分析“象郡”时已经初步解读过了。它们和北部湾以北，现在被划入广西的那块沿海地区（桂东南）一样，都是由一些北——南向，独流入海的河流所覆盖。河流的这种纵向并列关系，使得当年的秦人无法像打通“湘江——珠江”水道（灵渠）那样，通过一项战略性的工程，就为控制整个西江流域打下坚实的基础。无论秦人从哪个方向进入这块沿海地区，并试图消化它时，都要花费更多的时间。

正因为如此，秦人当初才将之笼统的划入了待整合的边缘行政区“象郡”之中。即使是到了汉朝，新生的帝国在彻底征服土著化的“南越国”之后，也只是将之从象郡中剥离出来，分立为“合浦郡”。只是这些行政上的改变，并不能改变这片现在地跨两广的沿海地区没有核心地区的状况。因此钦州、北海等雷州半岛以西，北部湾以北的这部分划给广西之时，也并没有造成太突出的地缘割裂感。

对于雷州半岛北部这片游离于珠江流域之外的沿海地区来说，之所以没有整合成一个强势板块，是因为没有一条东西横穿整个地区的河流将大家串联起来。以至于每一条由北向南，独流入海的河流，其流域都有可能独立发展起来。这其中最东面的潭江流域（四邑地区），由于紧贴珠三角地区，所以可以被明确地归入珠三角的辐射圈。而阳江、茂名、湛江三地，无论是在历史还是现在，其地缘文化都呈现多样性。

分析粤西南的族群文化，我们会发现，除掉在广东地区占优势地位的广府文化（粤语区）以外，客家、闽南（潮汕）文化的影响力也是明显存在的。这三者在这个边缘地区的竞争，一如他们在各自核心区的地缘关系一样。广府文化占据了大部分区域，并借政治优势而取得了覆盖了所有政治中心（市、县所在地）；客家移民的大部分，仍然是被挤压在高地之中。

至于那些从闽南（包括莆田）、潮汕等于闽南语区迁来的移民，则依旧把自己的落脚点，放在了离海洋最近的地方，并成功地让雷州半岛这个两面临海的突出部，成为闽南文化的延伸区。在目前珠三角地区的发展已经遇到瓶颈之时，同样拥有漫长海岸线的粤西南地区也迎来了发展机会。最起码当你承受不了珠三角的成本压力

而进行产业转移时。作为珠三角直接腹地的西、北两江流域，并不会比粤西南更有海洋优势。

这种沿海优势，甚至早就已经在行政上得到了重视，以至于粤西南的大部分县都已经升格为“县级市”了。至于说粤西南能不能以一个统一板块的形象打造出广东地区的另一个经济重心，地缘上的最大问题，仍然是无法确定谁才是地缘中心。如果单纯地以地理来论，茂名应该算是三市的中心；而如果论与珠三角的地理距离，阳江又是受其地缘辐射最多的区域；至于湛江，其依托雷州半岛所取得的岸线优势，又使之希望自己才是粤西南的中轴。



粤西南地缘结构图

如何在粤西南三市内部进行分工合作，是那些公务员应该头疼的事（谁让他们的待遇比我们好）。我这里所做的，只能是依靠其原始地缘属性，来分析出结构性问题在哪里。就地缘中心这件事来说，原始的地理结构也并不是唯一的影响因素。比如我们观察现在居中的鉴江流域，就会发现它的地缘中心“茂名市”，并不是依一般规律位于鉴江干流边上。追根溯源的话，我们会发现现在的“茂名市”并非是历史上的“茂名”。在 1958 年，这一区域因为石油资源而成立“茂名工矿区”这个行政机构时，“茂名”二字还是作为一个县名，作为现在鉴江边上的“高州市”的行政名称。只不过现在这座以资源立城的新城，不仅夺走了“茂名”这个名字（原茂名县就改名高州了），还成为这一区域的地缘中心。

像这种因为地缘重点的变迁而转移地缘中心的情况，茂名并不是孤例。比如现在雷州半岛的地缘中心“湛江”，就是因为它的海港优势，在中央之国国门洞开时，

被法国人看中而崛起的（当时湛江港所面对的港湾叫“广州湾”）。在此之前，湛江和雷州半岛在以农耕为主要生产方式的华夏文化看来，并不是个有潜力的地方。相比之下，雷州半岛与大陆交接的东北点，位于鉴江下游的“吴川”市，因为更具向大陆纵深辐射的潜力，而成为这一带对外经济的重心（现在则反过来被湛江管辖了）。雷州半岛在古典时期的行政级别不高，根本原因还是在于缺乏农业潜力。这一方面是因为它的地理形态（两面临海，缺乏高地保护）很难规避恶劣的海洋气候；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它狭窄的纵深、相对平缓的土地，使得内部的河流分散、短浅，无法打造出完备的灌溉网。要想解决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引水打通一条可以覆盖大部分区域的河流，以稳定的利用农业用水。

这个问题，在古典时期并没有得到解决，毕竟以雷州半岛的位置来说，中央之国的政治家们并没有兴趣将之经营为鱼米之乡，真正使之在地理结构上有所变化的时间是在 1958 年。在那个相信“人定胜天”的年代，雷州半岛北部区域由干劲十足的青年农民，挖通了以“雷州青年运河”为名的灌溉网。而这条运河的水源并非来自于雷州半岛，一条与鉴江、莫阳江平行的河流——九洲江，成为运河的上源。也正因为如此，管辖九洲江下游与“雷州青年运河”河口的廉江市，在广西获得北部湾沿海地区时，并没有随着与之文化相通的合浦等区域划归广西。

在分析广西部分时，我们曾经说到，广西因为得到了北部湾的海岸线，由一个内陆省份变身为了一个沿海省份。只不过两千多年以广西盆地为基础的地缘布局，使得它的这个转身还需要花费不少的时间才能够完成。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桂东南的北部湾沿海地区潜力还是很大的。至于留在广东的粤西南部分，虽然没有机会成为广东的地缘中心，但作为一个沿海板块，还是有着很大发展空间的。特别是基于广东整体的经济实力，在带动自己内部板块时，会比经济上处于弱势的广西更有优势。

有人说客家的情况比较陌生，的确也是这样的。其实就整个中央之国的地缘结构来说，古典时期的岭南一直都不是重点地区。只是现在海洋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经济带，如果要等到两千年之后才去具体解读，实在有点说不过去，所以借着始皇帝南征“南越”的机会，延伸一下罢了。

第十三章 陈胜发动起义拉开反秦的序幕

第一节 陈胜发动大泽乡起义的背景

就秦帝国的历史来说，应该算得上是中国历史上最短命的统一王朝了。不过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完成北却匈奴，南征南越的地缘扩张，已是非常难得了。这些连续不断的战争和那些浩大的工程之所以能够实施，所依靠的其实是诸侯国们数百年来所积累的资源。以胜利者姿态成为中央之国之主的秦人，当然有权利这样做。只是相比于六国各自都有数百年的历史来说，新生的帝国毕竟太过于年轻了。对于一个新生的国家来说，真正的安全期是在大部分的人民和精英阶层主体都出生在这个国家以后。换句话说，只有当那些前朝的遗老遗少们被自然淘汰掉，换代的民众都有了新的国家认同感后，王朝的稳定期才会真正到来，这和所谓的“三代培养贵族”的道理其实是一样的。从这个角度看，秦人在学习统治中央之国的政治技巧上，反倒没有周人做得好。

经历过那么多年残酷战争才得到天下的秦人，当然也是会想办法防止那些前朝遗民危害新生的帝国。他们所做的一项重大决定，就是把六国的贵族都集中迁到咸阳居住，以便于监督管理。问题是，真正感受到压力的并不只是这些贵族，那些底层的百姓同样无法适应秦人那种以法家理论武装起来的，准军事化的生活方式。对于中国这个农业社会来说，一个新生的王朝通常只要整合好了上层建筑，就不会遇到问题；但如果你试图大幅度地改变农民的生活方式，那么你的麻烦就来了。秦人过于集中的管理方式，就让他们帝国很快陷入了崩溃的边缘。

最先给帝国制造麻烦的，是两个对我们这些接受过基本教育的人来说，都是非常熟悉的人了。我想只要是学习过小学历史的人，都应该对“陈胜”、“吴广”之名熟得不能再熟了。如果你来自海外，碰巧又对历史不感兴趣，也不要紧。只要在国内观泡上一段时间，也会经常听到一句话：“现在的中国就差两个人了”。不管你之前清不清楚这两个人，现在心里肯定都想到他们是谁了，那么恭喜你，答对了。这两个人就是陈胜、吴广（肯定不是陈水扁和吴淑珍啦）。

陈胜、吴广的那次“起义”，之所以在我们的教材中定位这么高，是因为它被定义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在此之前，也并非没有类似的举动，只不过既然我们的历史把秦朝作为“封建”时代的开始，那么之前“起义”的主体当然就只能是奴隶了。这种硬生生的用西方人的方法来套用中国历史的情况，自然是非常不严谨的。只是我们这里所关注的不是这些学术问题，所以也就不展开了。

抛开套在陈、吴二人身上的阶级论不说，以当时的情况来看，陈胜、吴广的“大泽乡起义”倒也算得上是开启了“起义”的先河。毕竟秦人当时的高压统治，已经

无法让他们成为“义”的代言人了；而诞生出“揭竿而起”这句成语的“大泽乡起义”，在当时也的确是第一个在秦国外强中干的身体上，撕开了一道口子。正是有了这道口子，才有了那些六国故地纷纷而起的“义军”，也才最终葬送了始皇帝期望传国千秋万代的梦想。

虽然在我们学习的历史当中，陈胜、吴广的名字总是联系在一起的。但在真实的历史当中，陈胜才是真正的主导者。在那次看似偶发的起义事件中，所隐含的是陈胜超出常人的政治头脑，以及对地缘政治形势的判断。我们知道，在正史的解释中，所谓的“大泽乡起义”，是由于陈胜、吴广以及 900 余人被征发至燕山南麓的“渔阳郡”戍边，在行至“大泽乡”这个地方时，由于暴雨冲毁道路，延误了行程，而引起的民变。无论是史记，还是后来的阶级论，都认定事件的直接原因是按照秦朝法令“失期，当斩”。

不可否认，就当时被鼓动的 900 余人来说，应该是相信这个判断的。因此才会在陈胜“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的鼓动下，揭竿而起的。问题是秦朝的法令虽然严格，但对于雨水阻隔这种不可抗力造成的延误，是可以免除处罚的。这一方面既对应古人顺应天时的基本态度，也符合立法的原则。作为带队的屯长，陈胜是没有理由不知道这点的。

实际上从后来陈胜的种种举动来看，他的这次行动是经过详细策划的。甚至可以说，即使没有大雨冲毁道路的事情，亦或干脆没有征发他去戍边，陈胜都应该会找机会组织他的“义军”的。从这个角度看，陈胜能够留名于历史，并非出于偶然。虽然我个人经常说，我们现在所叙述的历史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人本历史，或者说精英历史，但这并不代表不会去分析那些重要历史人物的思维和行动。只不过在我看来，他们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在于能够冷静的分析情况，顺势而为，而不是通常所认为的，历史是由精英人物所创造的。

第二节 陈胜为起事所做的准备工作

陈胜的成功起义，首先在于他选择起义的地方在“楚”地。尽管史书中没有记载陈胜和这 900 多农民是从哪里起程的，但从行进的路线来看，他们都是楚地之人无疑。在秦灭六国部分，我们已经清楚了，虽然楚国并不是最后一个在政治上亡国的诸侯国，但秦灭楚之战，却是秦人所打的最后一场大仗。在这个过程中，秦人也吃了他们最后一次败仗。在攻灭了楚国之后，偏安于山东半岛的齐国，与躲到边缘地区的燕、代（赵）两国基本就在无抵抗的状态下亡国了。也就是说，在楚人乃至六国遗民的记忆中，最新鲜的抗秦案例就是由楚人所创造的。而楚国本身就特点鲜明的地缘文化特点（与北方文化的差异，以及更加自由的生活态度），更让他们成为最不适应秦人高压统治的六国遗民。

如果按照最终的目的地渔阳来看，即使是秦国的法令规定暴雨冲毁道路这种情况也要受罚，在后面漫长的旅程中，陈胜和他的九百农民也是有很大的机会把时间抢回来的。从时间的角度看，陈胜、吴广这么早发难，似乎有点早（还没到逼到绝路的境地）。当然，如果你早就想好要起事，只是在寻找一个机会的话，那么从大泽乡（现安徽宿州南）再往前走，就可能会丧失这个机会了。简单看一下地图，我们就会发现，如果陈胜他们再往北走的话，很快就会进入中原腹地了。也就是说，他们已经走到了楚地的边缘。对于这些出身于楚地的农民来说，如果走出了乡土之地，再想一呼百应的话，就很困难了。虽然六国遗民们对于秦人的高压统治也都有不满，但你并没有把握他们会愿意听一个“外国人”的话。



秦末楚地主要义军示意图

另一个被历史所忽视的细节告诉我们，大泽乡这个起义的地点，很有可能是精心策划过的。当我们将大泽乡在地图上定位时，会发现现在已经没有了“大泽乡”这个地名了，取而代之的是隶属于宿州市的“埇桥区”。也许有一天，希望以旅游拉动当地 GDP 的领导们，会试着重拾“大泽乡”这个高知名度的地缘标签。谁知道呢，反正现在大家都这么干。在现在的埇桥区境内的偏东南方面，有一个地名叫做“蕲

县镇”，大泽乡起义的故址正是在它的东面¹。在秦帝国的行政规划中，“蕲县镇”的后面是没有这个镇的。

说到“蕲县”的这个“蕲”字，如果前面的内容看得仔细的话，应该会感到眼熟（估计没几个人记得）。因为在秦灭楚之战中，秦将王翦正是在“蕲”这个地方大破楚军。为楚国和六国赢得过最后一场胜利的楚国统帅“项燕”，也因此兵败被杀（楚人相信他是自杀的）。也就是说，陈胜选择起事的地方，正是十四年前项燕以身殉国的地方。在这样一个极具纪念意义的地方，假借楚人心目中最为崇敬的英雄——项燕的名义，号召楚国遗民来复兴楚国，是再合适不过的了。

选择了合适的地点（蕲地）、合适的方法、合适的精神领袖（项燕），陈胜、吴广和他的九百余人队伍迅速得以壮大，并成为整个楚地抗秦力量的领袖。不过如果陈胜的政治才能仅限于此的话，那么他并不可能取得后来的历史地位，并引发一场席卷整个帝国的战争。那么陈胜在政治上又有哪些举动呢？

陈胜为了这次起事，是做了很多准备工作的。让人记忆深刻，并在后来的历史中无数次被模仿的是两件事：一是他让吴广把书写了“陈胜王”字的帛书放在鱼腹中，然后故意让戍卒发现；二是吴广躲到营地外面，学狐狸的声音呼唤“大楚兴，陈胜王”六字。不可否认的是，以古人的认知来看，这种心理暗示是能够起到一定作用的。只是单凭这些装神弄鬼的方法，就想成大事，却是不可能的，否则那些江湖术士早就登堂入室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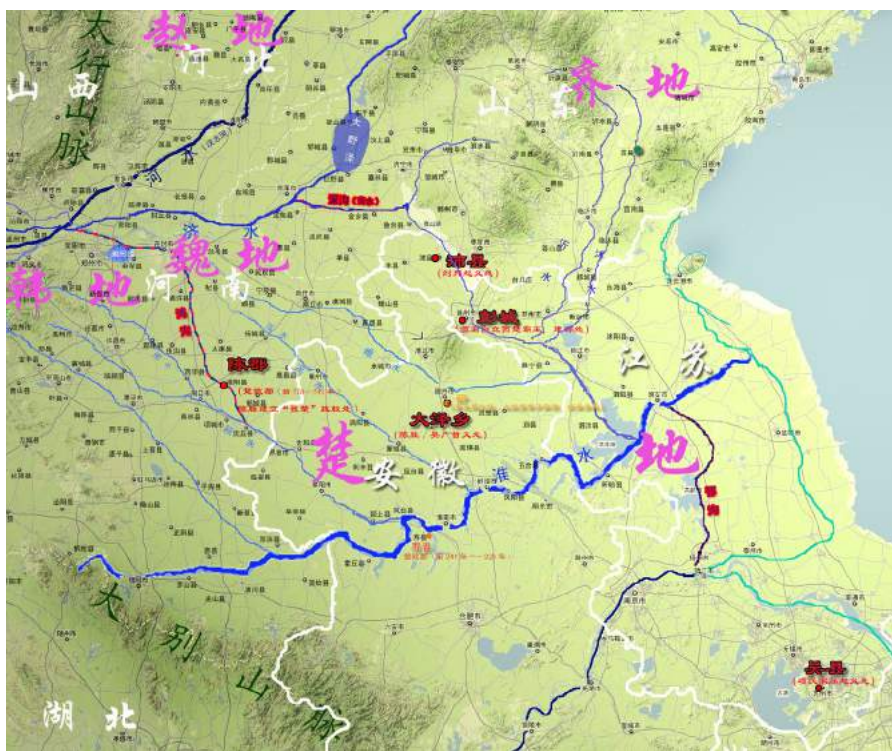
真正让陈胜成为抗秦义军领袖的，是他在政治上所拉的两杆大旗。其中一杆，就是楚人的英雄——项燕；另一杆，则是秦始皇的大儿子——扶苏。至于扶苏这个人，相信只要是对秦朝历史略知一二的人都应当知晓。在赵高的策划下，这个本来应该接位的长子被放逐到了北地，与蒙恬屯兵以御匈奴（随后便被迫自杀），而秦二世也就成为受赵高控制的“胡亥”。将秦始皇的长子与楚国末期最知名的大将放在一起，并假称二人未死，是这场起义的领导者，看起来是非常可笑的。毕竟他们二人即使真的还在世，也没有可能走到一起。陈胜之所以要这么做，就是为了能够最大限度的激发帝国内部的反抗意识。

如果仅仅是假托项燕之名起事的话，那么陈胜所能鼓动和影响的地区，最大限度也就是在楚国灭亡前后被秦吞并的国家。这些基本上处在太行山——大别山以东的区域，其青壮年阶层基本上还存有对故国的记忆（直接或被父辈间接影响），并因为有比较，而更容易对秦国的高压统治更反感。至于那些被秦人占据了超过50年的区域，其居民的国家认同感已经趋向于秦了。这其中就包括了楚人当年的根本之地——两湖之地和南阳盆地。在公元前278年，白起攻破郢都之后，楚地的概念就开始东移，淮河也成为楚地最为重要的中轴线。

1 2014年宿州市已将埇桥区的西寺坡镇更名为大泽乡镇。并以境内的涉故台为纪念陈胜吴广起义之地，即陈胜筑坛盟誓，诛伐暴秦之处。

对于那些已经被秦国成功消化掉的六国故地，以及秦人的根本之地来说，项燕这张牌可以说是毫无意义的。不过将扶苏这个“太子”拉出来，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毕竟“废长立幼”这种事，在中国古代是有违祖制的。在这个政权交接期，以这样一个方法来干扰秦人的内部凝聚力，在政治上是一步好棋（秦始皇亡于公元前 210 年，大泽乡起义随即在公元前 209 年爆发）。

相信陈胜在拉“扶苏”这杆大旗来做虎皮时，并没有寄希望于秦地（帝国已经基本消化的地区）也会响应他的号召，共举抗秦大旗。究其根本，这只是用来扰乱对手的战术。陈胜真正能够依托的，还是楚地这个抗秦意识最强的根本之地；认为能够引发连锁反应的，也正是太行山以东那些入秦不久的诸侯之地。正是基于这个战略需求，陈胜并没有选择回撤到楚地腹地去建立他的“张楚”政权。而是以攻击者的姿态向西北方向前进，将楚国曾经的都城“陈”郡（公元前 278 年——公元前 241 年为楚都，位于今河南省淮阳县，楚人退出江汉平原后即建都于此）作为了根基之地。



秦末楚地主要义军示意图

事实上从防御的角度来看，“陈”郡并不是一个好的选择。一是就这块土地的原始属性来说，并不是属于楚人的势力范围。在他们和周人对抗的时期，隶属于周王朝的“陈国”，就已经将之华夏化了。也正因为如此，这块曾经被楚文化覆盖过的土地，后来还是成为中原的一部分。当然，在陈胜所处的年代，陈郡的原始属性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

这块土地始终处于楚地的边缘区域。在公元前 241 年，迫于秦国的压力，楚人不得不将国都再次迁至淮河以南的寿春之时（安徽寿县），秦人就已经将控制区扩张至此了。

将这样一个脱离楚国控制长达三十余年，又处在楚地边缘的城邑作为都城，对于刚刚起步的“张楚”政权来说，是存在很大风险的。只能说陈胜对于今后的发展

是持乐观态度的。这从他取“张大楚国”之意，将政权之名定为“张楚”便可以看出。如果只是想割据一方和秦人打持久战的话，淮南的“寿春”，以及江东的“吴”郡都会是更好的选择。

其实陈胜这种以攻代守的战略并不能说是错误的，以秦人的力量来说，即使在他们以诸侯的身份进行攻击时，楚国仍然处于劣势。现在的秦人已经成为中央之国的主人，拥有更为强大的资源，在这种情况下，寄希望于与秦人划淮河或者长江而治，是非常不现实的。唯一的机会，就是尽快把水搅混，在楚地和整个山东（太行山以东）之地引发抗秦的连锁反应。基于这个战略需求，将自己的基地放在楚地的北部边缘，既能以攻击者的姿态给其他诸侯之地的遗民们以信心，也能第一时间对秦人的军事行动作出反应。

第三节 张楚的建立与诸侯国的复立

从名义上看，陈胜为自己的政权取名“张楚”，自然是想复兴楚国。但实际上，这只是一个名义罢了，陈胜真正想建立的，还是完全属于自己的政权。秦朝以后的历史，一直被我们的教科书定义为“封建社会”，如果单从字面和它所对应的欧洲历史的时间特点来看，周人所建立的社会结构，才算得上是“封建”。不过这并不表示中国这两千多年的时代，不能当成一个单独的时代来看。我们可以为这个时代找到很多特点，比如那独具东方特色的、强大的中央集权意识。而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这个时代的阶级通道已经完全从意识上被打通了。

我们可以看到，在先秦，一脉相承的贵族体系是非常稳固的。即使出现了像周代商这样的朝代变更，其前朝的王族血脉也会得到尊重（宋国的建立）。换句话说，在那个时代，如果你没有显赫的贵族出身（哪怕是附会的），就基本没有可能出现在历史的视野中。当然，这并不代表你就没有机会立国，甚至改朝换代。但前提是，你必须先在体制内谋得一个贵族身份的认定，循序渐进的完成这一切。这就好像是西方贵族身份的姬氏，可以建立周王朝；而平民身份的“跖”，却只能成为“盗跖”一样。

而陈胜以庶民的出身，喊出“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口号，却彻底打破了贵族体系神圣不可侵犯的惯例。这句口号也在后来的历史中，无数次激励着他的模仿者去彻底打破旧有的体系，以塑造一个新世界。从这个角度上看，中国近代史上这场大革命的文化根源，并非来自于德国或者俄国（这种意识在我们所处的时代，远比那些仅仅是在表面政治体系完成所谓民主化进程的国度，要来得重要）。

在技术层面上，陈胜的出现还是要感谢伟大的始皇帝所建立的中央集权体系。秦人的创造力在于以帝国的形式取代王朝的封建结构，来控制中央之国这个庞大的地缘板块。为了完成这个目标，所有能够被秦人找到的诸侯宗室，都被强迁到了咸

阳，以集中管理。这在政治上就为那些试图重新洗牌的六国遗民们，留出了政治空间。尽管在秦人的巨网之下，并非没有诸侯王族漏网，但看到机会的“准政治家”们，更愿意看到陈胜这个完全没有贵族背景的人成为精神领袖（如果陈胜都可以，那些出身更好的人不是更有机会了）。正是在这种普遍的心态下，由陈胜所派遣出联络魏、赵、燕等地抗秦力量的人，都纷纷以同样的形式，借尸还魂的复活了这些诸侯国。

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不会对旧有体系表达敬意的，毕竟这个体系才刚刚瓦解，还远没有彻底的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否则也没有必要借这个躯壳了。陈胜授意可以做魏王的代表（周市），就充分表达了这种敬意。他将所找到的一个魏国王裔，立为新的魏王。不管别人怎么想的，反正旧有的体系对于陈胜来说，只是一个工具罢了。他甚至把一个会错了意思，将一个漏网王孙立为“楚王”的下属杀掉，以避免楚国的反抗力量从自己手中分流。

其实陈胜最初只是想借着楚地庞大的地缘基础来独立对抗秦人的，他并不希望那些诸侯故地也出现“王”一级的势力来和他平分秋色。不过在这一切都不可避免地发生之后，陈胜也就接受了这个现实。并寄希望于自己成为王中之王，以联盟的形式来共同对抗秦人的反攻倒算。至于颠覆秦帝国以后再怎么样办，陈胜本人倒是没有机会实践了，只不过同为楚人的刘邦和项羽还是领衔主演了这场火并大戏。

如果说楚、魏、赵、燕四地“复国”，都是系出陈胜的“大泽系”的话，那么齐、韩两地的情况就稍显特殊了。齐地的地缘位置使得他们的表现和战国后期一样，总是希望游离于合纵体系之外。在“大泽系”的义军希望到齐地发展时，齐人的选择不合作（并打跑了陈胜的部下）。当然，这次他们绝不会再傻到去和秦人同乘一条船了，只不过齐人选择了由自己来拥立新的“齐王”（能沾上贵族血脉的“田儋”）。

不管是否出自正统，以及与之之间的关系如何，六国当中的五国都算复国成功了。在这种情况下，同为战国七雄的韩国，也没有理由不找出个代表来参与这场“王的盛宴”。只不过从陈胜从起事到失败被杀，前后不过半年时间，实力最弱的韩地还没有来得及想好以什么样的方式来参与这场聚会。之所以会有这种犹豫，还是因为韩地那尴尬的地缘位置。无论是大泽系里那些有野心的将领，还是残留的韩国宗室都十分清楚，一旦秦人反扑，新成立的韩国都会不可避免地成为双方博弈的焦点。相比于齐地那种超脱的位置，任何想以韩地为根本称王的人，都会心生顾虑。当然，顾虑归顾虑，在六国纷纷复国的大背景下，韩国人心目中的复国热情也不可避免地被点燃了。只不过这个想法是在项羽取代陈胜成为义军领袖后，才得以实现，而促成此事的倒是一个名人——张良。

回头看看秦末这场洗牌，倒是和 20 世纪上半叶的情况有几分相似。当一个旧体系被推翻之后，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尝试，并在其中蕴含着各种层面的力量角逐。从这个角度看，秦人所建立的帝国也只是一个过客，能够为这个阶段画上句号的，就是刘邦所建立的汉帝国了。有兴趣的人，可以为这隔两千多年的历史阶段寻找一下

对应点。就我个人而言，对旧有贵族体系留有余地的项羽，和试图建立全新体系的刘邦之间的“楚汉相争”，倒是和国共之争有很高的可比性。只是不知道，在那个全民皆政的年代，有没有人以刘、项二人的阶级出身作为切入点，试着解读那段历史。

楚汉相争固然是这段历史的重点，不过在陈胜的“张楚”政权失败前，项羽也好，刘邦也罢，都只是遍布楚地的义军中的一员。而现在陈胜的政治定位其实是和春秋的霸主，或者战国合纵联盟的领导者类似。不管更像哪种定位，陈胜都是只出头鸟。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看陈胜和秦人之间是如何博弈的。

第四节 起义军攻入关中后被秦人击败

对于率先起事的陈胜来说，不管他的梦想是建立像秦帝国那样的“帝国”，还是满足于做一个春秋霸主，他都必须在和秦人的对抗中证明自己的实力。好在他所能拥有的地缘基础是六国故地中最好的。北向联络那些六国故地，将这把火扇旺，只是在战略上必须走的一步棋罢了。但如果把抗秦的希望建立在这个松散联盟的形成上，就是大错特错了。当年六国合纵抗秦，让秦人施展外交才能各个击败的教训，相信已经够深刻了。

既然并不能指望再恢复之前的战国格局来和秦人进行长期对抗，那么陈胜的“张楚政权”如果要取得胜机的话，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发制人了。即在秦人还没来得及作出反应时，就先发制人地攻击秦人的根本之地“关中”，以期迅速解决问题。如果关中得手的话，那么秦帝国的崩溃也就指日可待了。说到这里，可能大家会有一个疑惑，既然秦帝国已经建立，那么在山东遍地狼烟的情况下，秦人所引以为傲的行政体制就没有作出反应吗？

不得不说，秦人厚积薄发，一气呵成地完成剪灭六国的战争，是得益于他们高度程序化的“耕战”政策。而那种将军功视作生产力的管理方式，也的确让秦人治下的百姓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军功可以换取爵位）。只是这种战时管理体系随着秦人的统一战争结束，也走到了它的尽头。如果秦人能够及时找到一套“坐天下”的管理方法，帝国应该有机会渡过最初的危险期。问题是，秦人并没有看到这种调整的必要性。或者说，他们相信只要把为自己赢得胜利的制度套用在这些土地上，就能够让国家步入新的轨道。

正是在这种思维主导下，秦人并没有在华北平原，乃至江淮地区，以军管的形式配置强大的军事力量，以应对有可能暴发的反抗。另一方面，秦人快速建立的，以为中央政权服务的行政体系，却已经开始高效运转。这些六国故地在还没有休养生息的情况下，就被迫向关中、北地、岭南地区，正在进行的大规模战争和宏大工程输血。也正是在这二者的共同作用下，秦人在六国故地（特别是楚地）所建立起来的行政机构，以及零星军事力量被迅速颠覆了。对手的失误，也就是自己的机会。

显然，陈胜是个很善于把握机会的人。在外联诸侯故地的同时，他的攻秦（关中）大军也在行进中迅速壮大。

从攻秦的路线来看，陈胜和当年的合纵联盟一样，并没有更多的选择。函谷关（崤函通道）和武关（丹江通道），是攻入关中的两条路线。当然，你也可以走轹关道西进，不过那样的话，陈胜的大军势必会在河东之地就与秦军陷入胶着状态（占据河东日久的秦人已经把河东经营为熟地了），并让帝国的中心有足够的时间调配自己的资源进行反击。在兵力不足的情况下，通常你必须在两条路线中选择一条作为自己的攻击线。而对于一呼百应的陈胜来说，他更愿意两路出击，并在西进的过程中，将南阳盆地、洛阳盆地中不满秦人统治的民众吸收到自己的阵营中。事实证明，秦人所建立的帝国结构并不稳固。在洛阳盆地和南阳盆地都相继陷于反抗者之后，攻击函谷关的大军甚至已经率先攻入了关中平原。

曾经多次为秦国抵御住六国合纵大军的函谷关之所以这么快陷落，主要还是基于秦人的战略重点发生了转移。而成功地吞并六国之后，那些基于诸侯对抗而修建的军事防御体系就不再受到重视，甚至主动拆除了。在这种情况下，函谷关这个曾经被秦军重兵把守的战略要地，在军事上的警觉程度也被大大降低了。事实上，不仅是函谷关，甚至是关中腹地，秦人也没有准备足够的军事力量以应对有可能发生的反抗。帝国的主要军事力量，正如我们之前分析过的那样，正分为二大部分：一部分在北线沿长城一带抵御匈奴，另一部分则进入岭南，以完成帝国南达“南海”的渴望。

理论上，将北地的边防军调回防守关中，是最为现实的选择。尽管蒙恬在修建直道时，战略意图是将关中的资源调往北地；但如果情况发生了逆转的话，这条高速公路自然也不会是单行道。只是就算把北地的边防军调回来，蒙恬本人也没有机会展现他的军事才能了。在那场决定帝国接班人的宫廷斗争中，他已经和公子扶苏一样，被逼自杀了（谁让他们最后的时刻是同事呢）。不过动用北地的边防军始终是一步险棋，因为你无法保证那些机动力量极强的游牧民族，会不会乘虚而入。当年的赵国也是在实在没有机动力量的情况下，才不得以做出了这样的选择。而在这张牌被消耗掉之后，赵国也就随之亡国了。现在的秦帝国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这步险棋还没有实施的必要。终秦一世，秦直道也没有发挥过它应有的军事作用。当然，也并不能说一点作用没发挥过。最起码驾崩于巡游路上的秦始皇，就是通过秦直道送回咸阳的。

说帝国还没有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并不是说他可以指望另一支南下的征“越”大军。从地理距离的角度看，即使这支大军能够回防，最多也只能在张楚政权的后方实施军事行动。于救援关中本身，是远水解不了近渴。更何况我们都知道，在秦帝国风雨飘摇的情况下，那些南征的将领们更愿意脱离中央之国体系，建立“南越国”。作出这种决定，并不让人感到意外。即使是在帝国未能面临解体风险的情况下，

这种自成体系，封关便能自守的地缘板块，也都很容易引发独立意识。在我们熟悉的三国历史中，为灭蜀二大功臣之一的钟会就没有经住这种诱惑。只不过他的蜀王梦很快就破灭了，而赵佗的南越国却成就了百年国运。

对于现在的秦帝国来说，在面临攻入关中的陈胜大军时，并没有一支现成的强大军队来与之对抗，不过他们却拥有组织一支大军所需要的所有条件。对于作为帝国的核心区的关中来说，军械和物资的储备都不是问题，而秦人也从来不缺少天才的军事将领（这次横空出世的将领，是少府“章邯”），唯一需要考虑的是有没有足够的兵员。以关中的农业条件和政治优势来说，如果进行正常的军事动员，也应该能够组织出一支数量不低的军队。当然，将分散于关中各地的士兵、农民组织起来，是需要一定时间的。与之相比，秦人有更好的选择，那就是把之前集中在关中修建陵墓和阿房宫的七十万劳动力组织起来，以抵御张楚大军（滚雪球般发展的张楚大军，攻入关中时已有数十万之巨了）。

在形势危急的时刻，将受管制的劳动力转换为士兵，并不是秦人的创举。最起码当年商纣在面临周人的进攻时，就同样把朝歌的奴隶组织起来过。只不过那支被临时组织起来的奴隶大军，并没有成为商朝的保卫者，而是在战场上倒戈一击，成为对手的一部分。相比之下，秦人的组织能力则要强得多。秦人这么多年来建立的“法制”观念，也让那些完成身份转换的刑徒、奴隶们，相信他们只要在战场上为帝国建功，就能够为自己的命运带来转机。也许这样被快速组织起来的秦军，战斗力暂时无法和之前经过战争磨砺的秦国大军相媲美，但他们的对手也同样是刚刚组织起来的“乌合之众”。从这个角度看，优势是在拥有更强资源和更高组织能力的秦人一边。

秦汉相交的这段历史，可以分为两个阶段：一是秦楚博弈阶段。这一阶段的特点是，以“张楚”（陈胜）、“西楚”（项羽）两股呈继承关系的楚地力量，与秦帝国的对抗为主线；而第二阶段，则是秦帝国灭亡之后，随之转入的“楚汉相争”阶段了。有了春秋战国所打下的基础，解读这段历史并不需要像先秦那样，在一些基础的地缘概念上花大量时间。也让我们可以更好的从战略层面上来回顾那段历史。

章邯组织的这场帝国反击战，是在骊山以北一条叫做戏水的河流边上进行的，史称“戏之战”。戏之战的胜利，使秦帝国很快占据了军事上的主动权。接下来所要做的，就是挥师东进，以平定关东的叛乱了。没有证据表明骊山那临时组织起来的70万人都参与了随后的“平叛”。因为在这些人当中，有很大程度是从那些六国故地征调来的。你无法保证他们出关之后还能够维持对帝国“忠诚”。从这个层面上说，章邯所组织的这支大军，主要是在战略上为帝国争取了进行战争动员的时间。在后来长达两年的东出平叛过程中，秦军的成分也逐渐被置换为真正意义上的“秦人”了。

第五节 陈胜兵败撤退被其车夫所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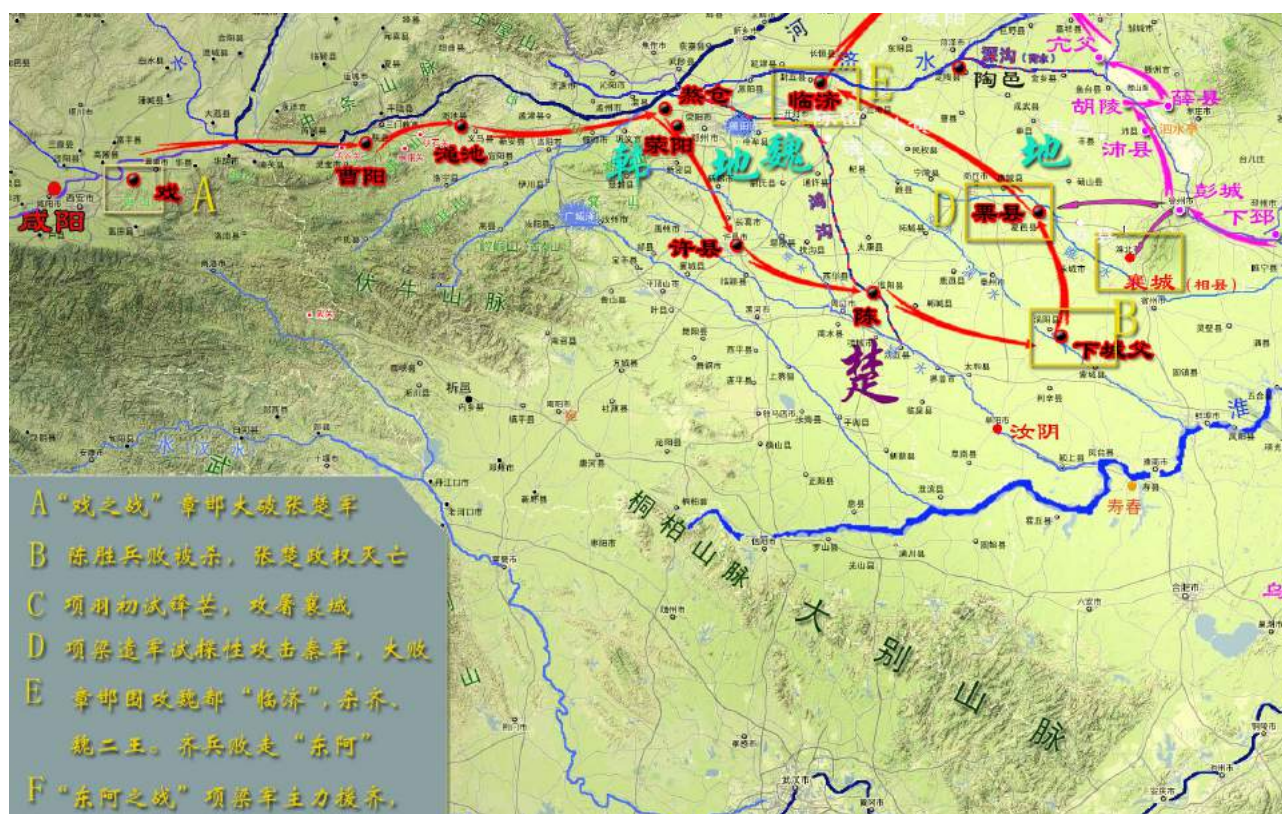
在击溃“张楚政权”的攻秦主力后，章邯和他的秦军在后面的军事行动进行得极为顺利。我们在史书中，可以看到秦军沿崤函通道，直至中原取得了一系列的胜利。而张楚军在曹阳（对应“陕”地）、滎池、敖仓（对应虎牢）、滎阳所组织的逐级抵抗也宣告失败。当秦军东出洛阳盆地，攻占滎阳之后，他们所面对的是已经遍地烽火的六国故地。在这些反抗秦人统治的暴动中，秦人原来设立的各级军政机构和那些“义军”正处在胶着状态。一方面，很多城邑和地区已经被借尸还魂的楚、魏、齐、赵、燕等国所占据（还有部分暂时没有找到政治归属的义军）；另一方面仍然有部分地区的帝国官吏在拼死抵抗。基于擒贼擒王的基本逻辑，陈胜所建立的张楚政权，自然成为章邯的主要打击目标。

基于这个战术目标，进入中原腹地的秦军主力并没有沿黄河继续东进，而是南下先行攻占了被义军所占的“许县”（许昌），然后再向东南方向攻击前进，直逼张楚政权刚刚建立的都城“陈”。当陈胜选择“陈”这个楚地边缘的城邑作为自己的都城时，他想的更多的应该是以此为基地能够更好地外联诸侯，对抗秦人。不过秦人的反扑比预想的来得要更快，也更猛烈，缺乏缓冲的“陈”邑很快就被秦军攻克。如果陈胜这时对他的抗秦事业已经感到悲观的话，他应该会沿着颍水快速南下，渡过淮河。在那里，楚国最后的都城“寿春”，能够为张楚政权赢得更多的喘息时间。

其实陈胜也并非没有过退守淮南的想法，在他从“陈”邑中撤出后，最初的转移方向也的确是沿颍水南下，退守至“汝阴”（网络上永远的热点，安徽省“阜阳市”）。只是在再往南便可渡过淮河之时，陈胜改变了主意，转而退入了东北方向的“下城父”。对于野心极大，身为农民时便叹道“燕雀安知鸿鹄之志”的陈胜来说，不甘心就此退入淮南，将刚刚在反秦义军中建立起来的威信与影响力拱手让人。在现实世界中，付出与收获总是成正比的，如果你不能有担当，处在博弈的焦点，那你也不可能指望那些已经自立为王的新晋诸侯们，会再视你为精神领袖，尊你为“陈胜王”，特别是你的草根出身本来就让更多人对你心存疑虑时。

从战略上来看，陈胜如果就此退入淮南，以避秦军锋芒，不失为一个正确的选择。因为对于淮南、江东这些边缘板块，秦人并不认为会有很重要的战略价值。在他们看来，中原、河济、河内这些传统的博弈中心，才是决定帝国命运的枢纽地区。只要能够迅速平定河、济两岸，那些边缘地区的反抗就成不了气候。也就是说，如果陈胜能够退入淮南的话，秦军主力就会选择北上，去平定刚刚在魏地、赵地建立的魏、赵政权。只是基于我们刚才分析的原因，陈胜在犹豫之后，还是选择了留在淮北。如果陈胜能够在下城父坚守的话，那么魏、齐两地，以及楚地的其他义军，应该会逐渐向他靠拢，并最终与章邯军展开一场决战。毕竟以叛乱者身份出现的他们，并没有战国诸侯们那样的外交空间。

在秦人没有想到用政治手段来瓦解愈演愈烈的暴乱之前（军事手段不给力时，才会想到），叛乱者们最好的生存办法就是抱成团。问题是，就个人的命运来说，历史总是存在偶然性的，无论你曾经的经历有多么辉煌。在红色革命面临重大挫折时，总是有人会考虑“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的问题。而对于退入“下城父”固守待援的陈胜王来说，也并不是每一个跟随他的人都对打败秦人保持信心。



秦末军事博弈图（一）

当然，一般情况下，你可以选择逃避，以脱离这个组织。不过陈胜的车夫“庄贾”参加“革命”，显然对自己的前途充满着憧憬。从这个记载下来的名字来看，也许这位车夫之前从事的是商人职业。经过计算之后，陈胜头被送往了秦军大营，以换取他所希望的富贵。在充满偶然性的历史面前，个人的命运总是不可测的。不过从大历史的背景来看，秦帝国所面临的麻烦还远没有结束。或者说陈胜的生死与否，并不能逆转这个历史潮流。而就“张楚”这杆抗秦大旗来说，随着陈胜的被杀，也成为过去式。虽然陈胜的旧部后来组织起来重新夺回了陈邑，杀掉了叛徒庄贾。但改变秦帝国命运的使命，已经被移交给另一个更合适的人选——项梁了。

终秦一代，那种以战国诸侯为地缘背景划分人口属性的情况都是显著存在的。这种身份认定，也在左右着战局的变化。所以我们会看到，在整个秦末战争中，依然充斥着那些已经成为历史的诸侯国的名字。而对于试图在这个乱世中建功立业的枭雄们来说，这也决非没有意义之举。

第十四章 项梁率江东子弟北上抗秦

第一节 项梁沿泗水而上攻略城池

在凝聚楚地抗秦力量这件事上，相比假托“项燕”之命的陈胜来说，项梁这个项氏家族的正宗成员（项燕之子），优势要明显得多。特别是对于那些不屑于陈胜出身的贵族成员们（包括对贵族体系仍保有敬意的人）来说，项梁更是一个完美的选择。当陈胜在大泽乡起事的消息传到江东时，作为楚地抗秦精神领袖的项氏家族，也闻风而动地举起了“义旗”。其实被长江阻隔的江东板块，的确是一个自成体系的好地方。即使是秦人任命的会稽郡守，也没有经受住这个诱惑，背叛了帝国。只不过项氏家族显然不想受制于人，而那位试图顺应民心的郡守，也悲剧性的成为帝国的殉葬品。

作为一个被楚人寄予厚望的家族，项氏家族当然不能仅仅满足于盘踞江东了。而项梁、项羽和他们的八千江东子弟兵渡河的地方，我们在吴楚相争阶段记得就曾经分析过。那个叫做“乌江亭”的地方，也是终结项羽生命的地方。由于信息传递需要有一个周期，西渡长江之后的项梁，并不知道陈胜及其张楚政权和秦人的战争，已经进行到何种地步了。而陈胜在称王之后，已经派出了很多使者向各地（特别是楚地）联络，并试图以首义之威扩张势力范围。问题是，尽管大家都对秦人的统治非常不满，但并不代表所有人都愿意接受陈胜这个草根的领导。

为张楚政权联络江东的使者，在到达广陵（扬州）之后，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相比之下，项氏家族在楚地的影响力，就要大得多了。于是在没有得到正式授权的情况下，这位使者便借“陈胜王”的名义，封项梁为张楚政权的军事统帅（上柱国）了。应该说，这是一个很正确的政治策略，即使是让陈胜来做决定的话，也不会有相左的意见。毕竟如果能够得到项氏家族支持的话，张楚政权在楚地的正统地位，就算被确立起来了。从项梁的角度来考虑，接受这个头衔并没有什么坏处。

一方面陈胜的张楚政权借首义之名已经有了很大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在形势未明的情况下，大家更紧张的还是秦人的反攻倒算。在这种情况下，张楚政权需要借项氏家族来扩大在楚地的影响力，项梁也可以依托张楚政权这杆已经树起来的大旗来扩张自己的势力。至于说以后大家正式合兵之后，权力要怎么分配，那就要看各自的实力了。实际上以项氏家族的出身和威望来说，让他们真心接受陈胜的领导是很难的。因此渡过长江之后的项梁，并没有选择西进向陈胜靠拢，而是选择了沿江东政权北上争霸的传统路线——“泗水”一线北上，以控制整个东楚地区。

虽然在战国后期，楚国丢失了大别山——桐柏山以西的根本之地，但他们在东线却取得了很大的发展。之前被越人占据的江东、江淮平原，以及泗水沿线那些残

存的小国，都逐渐成为楚地。甚至连泗水上游的鲁国，最后都为楚国所灭。这些泗水——邗沟一线，包括江东吴越故地的地区，被统称为“东楚”。其实楚国扩张至东楚的时间并不算长，但“蛮夷”出身的楚人，对于控制这些被北方诸侯视为化外之地的区域，却颇有心得。相对宽松的管理手段与秦人的标准化进程相比，更容易让那些新征服地区接受你的统治与文化。这种“无为而治”，不过分干涉基层生产生活方式的管理思维，也直接影响了后来的汉帝国。



秦末军事博弈图（一）

楚国当年在东部的成功扩张，也为项梁做大自己的势力打下了坚实的地缘基础；另一方面，张楚政权在西面与秦军主力的缠斗，也使得项梁的北上之路变得异常顺利。就泗水沿线而言，在之前我们就分析过了，有两个点的战略位置非常重要，一个就是沂、沭、泗三水相交处的“下邳”（现为邳州市所辖），如果你想向沂沭河谷，乃至整个齐地渗透的话，下邳就是必争之地；另一个战略要点，则是泗水中游的彭城（徐州）。这个处在几大板块相交处的兵家必争之地，即使是在现在，也是江苏、

安徽、河南、山东四省的地缘枢纽。从这个角度看，如果不能以徐州为中心，在泗水中下游地区划出个单独等级区的话（省级），那么徐州这个江苏省的西北角，也有同等的机会被划入另外三省。或者说，成为中原、山东文化的一部分。

其实在现在江苏的地图上，徐州的位置还不是西北方向的边缘，在它的西北部，还有两个县的位置更为突兀，那就是“丰县”和“沛县”。而如果要追根溯源的话，造成现在这种行政区域结果的源头，就是在于楚汉相争这段历史。而项氏家族中最为著名的成员“项羽”，与他的天敌“刘邦”就是这段历史的造就者。至于项梁是

如何沿泗水北上渗透，项羽和刘邦又是如何在这个舞台上脱颖而出的，我们后面会有分析。

当项梁和他的“江东军”渡过淮河之时，他的队伍已经壮大了不少（黥布就是在渡河之前来投奔的）。而“下邳”这个战略要点，也成为他和他的军队休整之处。现在，摆在项梁面前的有三个战略方向，或向东进入“沂沭河谷”以图齐地；或继续向北占领整个泗水流域；当然，既然举的是抗秦大旗，最应该做的还是向西进入中原腹地与秦军主力接战。影响项梁决定走出下一步的，是彭城方向出现的变故。在那里，有另一支义军拥立了新的楚王，以期在楚地获得正统的地位。和项梁一样，这支义军之前也在名义上接受了张楚政权的号令。只不过陈胜在西线战事不利的消息，让大家有了抢占政治制高点的想法。

事实上，和彭城义军一样，项梁在名义上接受张楚政权的号令，也只是一个权宜之计。但在陈胜面临失败，楚地新的领袖有可能诞生的情况下，作为楚地号召力最强的项氏家族来说，自然不会愿意把这个机会轻易让人的。于是以为张楚征讨叛逆之名，项梁攻下了彭城这块兵家必争之地。在中国历代的所谓“农民起义”中，这种火并现象是再正常不过的了。只不过为了师出有名，有政治头脑的人都会去寻找一个“道德”的政治理由罢了。而在项梁火并彭城义军的过程中，张楚这杆大旗起的就是这个作用。

攻下彭城后，此时就军事上的打算来说，项梁仍然是面临西、北、东三个方向的选择。事实上，这三个方向的军事行动，项梁都在试探性地进行当中，以按照所遇到的困难程度来制定出下一步的扩张方向。在这些试探性的攻击中，后来的“西楚霸王”项羽（项梁的侄子）第一次显露出了他的军事性格（嗜杀，缺乏政治手段）。为了彭城的侧翼安全，地理位置上位于彭城西南，并与之依附于同一丘陵带的“相县”（今安徽淮北市相山区），被项羽率军攻占。

从军事战略上来看，这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但这场项羽的首战，最为引人注目的，却是战役之后的作为。在这场战役之后，“相县”由于激烈的抵抗而被项羽屠城。抛开人道的层面，单从技术角度来看，以屠城这种军事恐怖主义的手段作为战术，也是一些军事家获得成功的手段。在一千多年以后，建立历史上最大帝国的铁木真就曾经非常娴熟地运用这一手段。从战术所取得的效果来看，这其实应该算是一种政治上的辅助手段。为的就是让你的对手在权衡利弊得失后放弃抵抗，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威慑效果。

只是从后来项羽的作为来看，他其实并不具备一个政治家的潜质。“屠城”这个在古典时期曾被广泛运用的政治手段，对他而言，很多时候只是在单纯宣泄一种情绪；另一方面，在自己的根本之地（相县亦为楚地）做出屠城这种举动，也是非常不明智的。这种政治能力的缺失，也为项羽日后的失败埋下了隐患。需要说明的是，在历史的记录当中（始于史记），项羽首战的这个地点，一直被记录为“襄城”。

而“襄城”的位置，则被认定为中原西侧、伏牛山东麓的“襄城”县（许昌市与平顶山市之间）。

事实上单纯的看平面地图，也足以让我们得出判断，正在泗水一线的东楚军绝无可能穿过秦军主力，跨越整个中原腹地去攻击在战略上暂时没有任何意义（对东楚军来说）的襄城。所以说，襄城的朋友在回顾自己家乡的历史时，如果读到这段历史，大可不必感到气愤。当然，这并非是希望淮北的朋友去从这段历史中感受痛苦。只不过，这也是研究地缘的一层积极意义，最起码我们不会被那些“专家”级的人物（包括司马迁）的笔误所误。对相县的攻击，并不是东楚军所组织的唯一军事行动。既然已经前进到这个中原的边缘，而另一方面章邯所率领的秦军主力已经在西线取得了大胜利，并向东逼近，那么秦军和东楚军之间的军事接触也就在所难免了。



秦末军事博弈图（一）

项梁的东楚军攻克了彭城，并不代表就已经全部收编了彭城义军。在他们到来之前，彭城义军凭借自己的地缘优势，已经在泗水中上游地区扩张了自己的势力。

虽然包括在彭城北边的“沛县”起兵的刘邦，也表示愿意归附。但这些名义上的归附，也只是一种机会的选择罢了。在这个乱世，机会主义者们无时无刻不再寻找更好的机会。

如果从地理结构上看，这场楚地义军之间的火并，可以看作是一场沿泗水而展开的南北对决，胜利者就是更有政治资本和更强大后方的东楚军。占据了彭城之后的东楚军，随后便沿泗水挥师北上，进而攻克了彭城义军的最后一个据点“胡陵”（具体位置在沛县最北部，苏鲁交界处）。现在的项梁，应该说已经在楚地东线占据了绝对优势，包括刘邦在内的那些北部（泗水流域）义军，也纷纷归附。

第二节 项梁退入薛邑并拥立楚怀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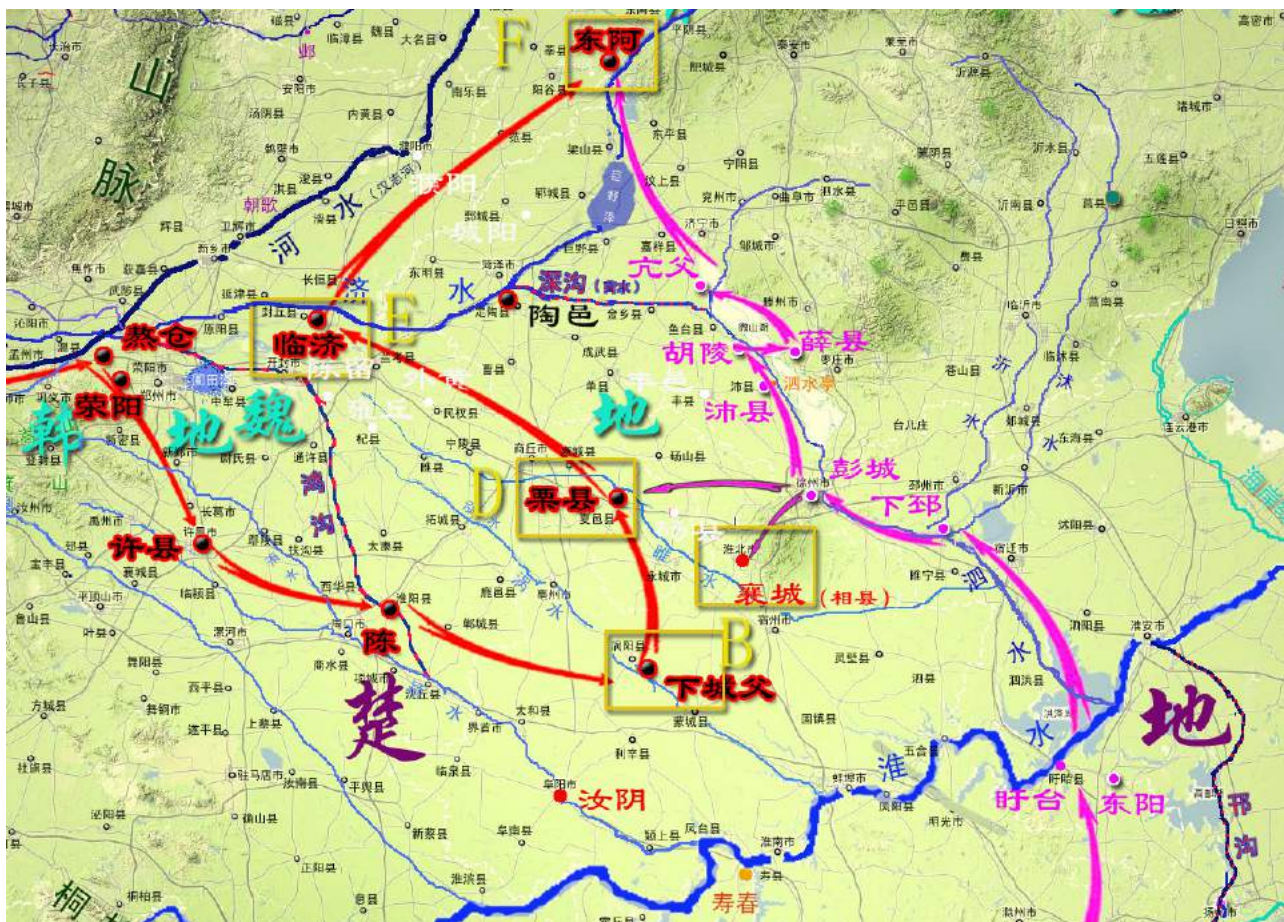
就在东楚军攻克胡陵之时，秦军主力也已经从“下城父”北上，进驻到了睢水旁边的“栗县”（豫鲁交界的河南夏邑县）。从地理位置来看，我们有理由相信，秦军主力的下一个目标有可能就是彭城。不过对于秦人来说，泗、淮两水其实都不是重点。以“得中原者得天下”的思维来看，解决掉中原腹地的新“魏国”，比纠缠于泗上这些东夷故地要更有价值得多。

不能说秦人的想法是错误的，为了解决张楚政权，他们已经沿着中原的边缘向南前突了太多。即使是单纯的从后勤保障来说，也应该把“大梁”一带的魏地收复。问题是战争的主动权并不仅仅掌握在秦人一边，对于已经声势日隆的项梁来说，如果还不能与秦军主力接战的话，会直接影响到他在各路义军中的声望的，特别是双方的距离已经如此之近的情况下（想想长征时期的红色政权，为什么一定要北上并寻机与日军接触）。因此占据胡陵之后的项梁派出了一支军队，对栗县的秦军主力进行了试探性攻击。这次攻击当然不能算是决战，只能说是在“投石问路”，因此东楚军并没有派出自己的主力，被收编的彭城义军成为那块“石头”。

试探性攻击的结果，证明了秦军才是真正的“石头”，而那支偏师只是一个鸡蛋罢了。不过刚才我们也说了，秦军并没有准备继续东进，所以也没有乘胜追击。而是按照既定计划北进去攻击魏国的都城“临济”（河南封丘县东）。从“济”这个名字我们也可以看出，这是一座位于济水边上的城池。失去了河东之地的魏国，后来的国土范围基本也就是在河北平原南部（漳水以南）、西“河济平原”，以及中原腹地的大部（包括后来从宋国接收的泗水以东部分，泗水沿线则被楚国所控制）。我们现在所说的“魏地”，指的也就是这部分。从位置上来看，济水可以算得上是魏地的一条中轴线。将都城定在它的边上，可以上下兼顾。让人疑惑的是，这个新“魏国”为什么没有据旧都“大梁”为都，而是在它的北边另择一地。

其实也不是魏人不想光复旧都了，实在是当年秦军在围攻大梁城时，引鸿沟水淹大梁，把魏人苦心经营的大梁城毁坏殆尽了。如果大梁还有战略价值的话，秦人

应该会重新构筑它的防御体系。只不过一统江河的秦人，已经把目光投向更远的边缘之地，自然也没有必要把核心区内的城池重新修复了。有鉴于此，匆忙立国的魏人才在济水南岸选择了“临济”作为暂时性的基地，为的也就是能够更好的辐射整个魏地。



秦末军事博弈图（一）

当秦军在栗县阻击楚军得手的消息传到胡陵后，项梁和他的东楚义军所做出的第一反应，便是渡过泗水，东进到泗水东侧的“薛”县（现枣庄市所辖）。说起这个“薛”邑，其实和东楚军最早占据的“下邳”颇有渊源。在战国中期，盘踞于下邳的泗上诸侯“邳国”，由于不断受到楚国攻击而被迫迁移至此。就薛县的位置来说，东靠尼山，西临泗水，是控制泗水一线进入泰沂山脉腹地的门户之地（鲁国故地）。当年齐国迁回控制邳国后，就曾经让孔子大为不满。

薛邑作为一个地标，最为风光的时候并不是叫这个名字，而是“徐州”（现在的徐州是当时的彭城）。魏、齐二国的“徐州相王”就是在此，正是那次会盟，真正让战国进入了一个“王”的时代。基于薛地的重要地理位置，秦初在设立郡县时，也以其为核心设立了“薛郡”。在战国后期，齐国因为灭宋而被群攻，以至于衰弱后，楚国逐渐控制了泗水两岸，并最终将文化底蕴深厚的鲁国攻灭。也就是说，楚人曾

经控制了整个泗水流域。以楚人的文化而言，要想彻底将自视为周礼根基所在的鲁地同化是很难的。不过这并不妨碍项梁从战略的角度看中泰沂山脉腹地这片山地，并试图以此为依托和秦人周旋到底。

退入薛邑之后的项梁，已经得到了陈胜确切的死讯（其实可能在下邳就知道了，只不过为了师出有名，陈胜必须活着），下一步他需要在政治和军事上马上作出决定。政治上顺理成章的决定，是接过替代陈胜的位置，依旧以张楚之名号令楚地各地的义军。以出身和家族的影响力而言，项梁来做这件事的优势比陈胜要大得多。不过虽然项梁也是贵族出身，但终究不是楚国王室的成员。这样做最大的风险在于，如果有另一支希望号令楚地的义军找到了王室成员，并拥立为楚王，那么项梁方面的号召力势必会受到很大影响。因此项梁和他的谋士们商量后，最终还是决定找一位王室成员来做政治“领袖”。

最终的人选落在了一位放羊的孩子身上。据信，这个孩子就是当年被秦人所囚禁的“楚怀王”的孙子。从战略上来看，在秦、楚丹阳、蓝田二战之后，楚国在战略上对于秦国来说，就已经转为了守势（楚怀王时期）。而从楚人的直观感受来说，楚怀王被秦人所困，客死异乡的结局，更应该是导致楚国衰败的直接原因。在此之后仅仅用了十几年时间，秦人就把楚国挤压到了“桐柏山——大别山”以东。以这样一个悲剧性的英雄人物的后代作为领袖人物，并重新启用“楚怀王”这个尊号（所以楚怀王有前后之分），和当日陈胜拉出项燕这杆大旗的道理是一样的。至于说这位放羊娃是否真的是王室成员就不那么重要了。反正在权力斗争当中，这类角色注定都是一个傀儡，一个符号。一旦失去了利用价值，很快就会被从人间蒸发的。

在拥立了新的楚王——“楚怀王”之后，楚地的抗秦事业也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这支在属性上明显以“东楚”为地缘基础的政治力量，不妨被概括为“东楚”政权。也就是说，在我们的断代中，秦末乱世正式由“张楚”世代，转入了“东楚”世代。既然已经正式立国，那么首先要做的就是为这个新的“楚国”确立一个政治中心。从位置和“风水”上来看，依山傍水的彭城是个不错的选择。只不过在张楚政权覆灭，秦军全面转入战略反攻的阶段，将这样一个前突位置的点作为政治中心，并不是一个稳妥的方案，当日信心满满的陈胜建都于“陈”就是一个教训。从安全的角度来看，以江东的“吴”县（苏州）为都，应该是最保险的方案。只是那样的话，就很难辐射整个楚地了，也无法向各路诸侯证明自己的野心。有鉴于此，淮南的“盱台”被确立为新的“楚都”。

说句题外话，这个“盱台”在今后的历史当中，再也没有机会作为国都之选。而它后来唯一一次又和“王气”沾边，是因为一个外来物种“小龙虾”。只不过它现在的名称已经变成“盱眙”了。盱眙东面的“东阳”，也是项梁收编第一支重要抗楚义军的地方，这义军的领导者“陈婴”，也被封建在当地，以拱卫楚都（只不过在后来的楚汉相争阶段，陈婴、黥布这些系出“东楚”的将领，却都纷纷投奔了

刘邦)。处在“东楚”的南北地理中心，又有淮河为依托，以及稳定的民众基础，建都盱台倒也不失为一个稳妥的方案。如果前线的战事不顺，东楚军便可顺泗水而下，据守淮河一线以抵御秦军。即使你日后希望以江东为核心，建立割据政权，基于“守江必守淮”的规律，淮河一线也必须有战略支撑。只是真到了那一步，新“楚国”的国都就肯定得迁到江东了。

第三节 秦军攻下临济后进攻东阿

由于秦人的目标是魏都“临济”，主力退入“薛”县的项梁并没有如期迎来他的对手。对于一支正在成长中的队伍来说，这其实是一件好事。当魏人在临济城下苦苦支撑时，项梁和他的东楚军有时间和空间来进行修整，并继续吸收楚地的抗秦力量加入。从这个层面上看，暂时远离战火的薛县成为了东楚军蓄势的基地。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一直在沛县、丰邑（现丰县）一带周旋，希望打出一片天地的刘邦，也应召来到了薛邑会盟。只不过当时的项羽应该没有想到，这个小小的泗水亭长竟然会是他事业和生命的终结者。

回头再看临济城下的状况，一切都在朝着有利于秦人的方向发展。在“临济之战”结束之时，失败身死的并不仅仅是刚刚自立的魏王（魏咎）。同样自立没多久的齐王“田儋”，在救援临济的战役中，也为秦军所杀，身死阵前。当然，在历史博弈当中，永远不缺乏领袖人物。能够在一场战役中攻杀两位诸侯王，也不代表秦人就此解决了魏、齐两地的动乱。比如齐国，田儋的二位堂弟田荣、田横就曾经先后被拥立为“齐王”，而他们也并不是唯一有愿望和机会成为齐王的齐人，像楚国的情况一样，在大局未定的情况下，各种力量的博弈在所难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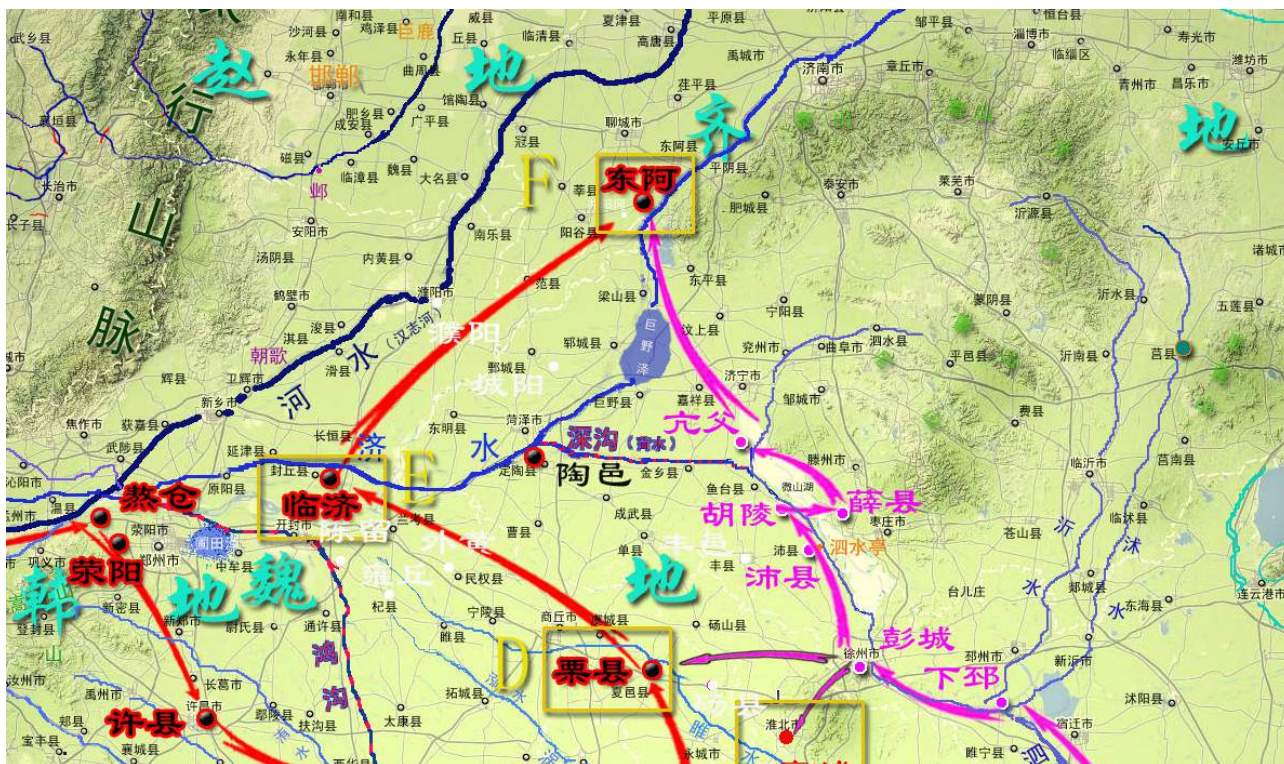
对于秦军来说，他们也清楚，攻杀一两个“王”并没有代表着平乱之役的终结。最重要的还是实实在在的把那些叛乱之地重新纳入帝国的管辖范围。临济战役的结束意味着济水以南的中原腹地，已经基本在秦人掌控之中了。摆在章邯面前的依旧是两个选择，要么挥师东进，与盘踞在泗水一线的东楚军决战，并逐次向南收复泗水两岸的楚地；要么向北渡过济水，去控制西河济平原的魏地。

出于河、济两水在中央之国的核心地位，章邯并没有选择东进。渡过泗水之后，就有可能与东楚军在山地接战的顾虑，应该也是一个因素。毕竟在那一区域，鲁国和那些泗上小国曾经在大国的挤压中存活了几百年。相比于更利于大兵团作战的“河济平原”来说，将自己的主力纠缠于泰沂山区这种复杂的地理结构中，是正规军所不愿意面对的。更何况在河、济以北，燕、赵故地也已经燃起战火，并复国成功。齐地的反抗力量也可以从东河济平原而起，随时攻入西河济平原，并与燕、赵军队一起攻入中原。在这种地缘格局之下，泗水一线的得失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秦军在西河济平原并没有遇到什么抵抗。毕竟魏国义军的主力已经在临济为秦

军所破，短时间内无法再集结出一支有战斗力的“义军”了。相比之下，齐国的情况就要好得多了。作为战国诸侯当中最后一个被秦人所灭的国家，齐人对于秦人统治的反感程度并不会比楚人低。而孤立主义盛行的齐地虽然终于明白了唇亡齿寒的道理，驰援魏国，并甚至因此而失去了他们的“王”，但齐地本身却没有受到损伤。

在秦人看来，战国时代所累积的经验告诉他们，对于齐、楚，包括燕这三个边缘国家来说，最好的办法还是先让他们置身事外，然后先集中火力灭掉三晋。也正因为如此，把张楚这个出头鸟打掉后，秦人并没有把谨慎的沿泗水一线北上的“东楚”军作为打击重点。至于齐地，想用政治手段让他们置身事外，是再也不可能的了。像范厨师那样，连着被忽悠两次的情况毕竟是少数。更何况现在的齐地还没有整合成一个整体，你并无法通过外交途径影响整个齐地的动向。所以尽管秦人的首要战略目标是三晋故地（现在基本上只剩下赵地了），但在此之前，齐人必须得到足够的教训，以让他们重拾观望的态度。



秦末军事博弈图（一）

被秦人选定的目标，是东、西河济平原相接处的“东阿”邑（现在东阿县的西南方向，现为阳谷县辖）。如果我们希望去参观武松打虎的“景阳冈”，就会发现这两个地标几乎都在同一位置。不管历史上是不是真的有武松，反正章邯是分出了一部分兵力去攻击“东阿”这个济水边上的城邑，以向齐地施加压力。正如战国时期的格局一样，如果要攻取齐人所据的山东半岛，最好的办法还是由东“河济平原”入手，跨越济水的难度要远低于穿越泰沂山脉。

对于齐人来说，他们并无法判断秦军下一步是否真的要拿齐国开刀。基于他们的“王”刚刚支援了魏国，齐人有理由相信秦人准备大举挥师东进了。不管齐人的判断，亦或秦军的战略意图如何，秦军对于东阿这个战略要点的围攻，却是实实在在的。与这些匆忙集合起来的义军相比，有些严密组织的秦军要有优势得多。更何况刚刚击溃了张楚、魏两大政权的秦军，正处在高峰期。因此齐军如果要想保住东阿，除了拼死抵抗以外，还需要得到外部支援。

比较幸运的是，这些乘势而起的枭雄们，虽然在战术上不可避免的有自己的小算盘，但在战略大方向上，还是明白相互依靠的重要性的。即使是孤立主义盛行的齐国，也由“齐王”亲率援军支援了魏国。现在，齐国遇到了麻烦，而可以给予他们支援的，就是蓄势已久的东楚军了。应该说项梁自起兵以来，就在避免和秦军主力接战。作为一个优秀军事世家的继承人，如果没有把兵力集合到一定程度，是不会轻易出击的。当然，这样做的代价就是，张楚和魏两个政权被秦军所破。有了张楚、魏国冲锋在前，为项梁争取的时间，加上项燕、楚怀王这两块军、政上的金字招牌，在薛邑招兵买马的东楚军，得以迅速壮大，并在质量上向正规军靠拢（有几个月的时间整军）。

当秦军向东攻击东阿时，楚军也已经开始向北移动了。最先被东楚军拿来试刀的，是深沟——泗水交汇点北的“亢父”。占据这个点，你可以认为项梁的下一步打算，是沿深沟（菏水）向西，准备取“定陶”（陶邑），进而进入战争的中心区；也可以认为，项梁是为了经营沂蒙山腹地，而占据战略要地。不过形势总是瞬息万变的，在占据亢父这个可攻可守的城邑之后，大败魏、齐军队的秦军，已经攻击至东阿。如果说秦军在中原腹地的攻击，还能让项梁从容的在泗水两岸积蓄力量的话，那么秦军作出全面攻击齐地的姿态，就不能让项梁再坐视不管了。如果秦军顺势拿下隶属齐地的“东河济平原”，再顺势向南攻取山东半岛的话，那么东楚军势必在战略上陷入秦军的包围当中。

而这个时候，如果东楚军受到秦军主力攻击的话，他们甚至会找不到像样的援军以为外援。在群雄并起的年代，你可以利用那些出头鸟来为你赢得必要的时间和空间，但却不能总是躲在后面，否则就会像齐国（战国）那样，最终聪明反被聪明误。对于项梁来说，他需要的只是一个合适的时机罢了。就现在的形势来说，除掉张楚政权残余的一小部分力量以外（这部分义军甚至乘秦军主力北上，夺回了“陈”，以图复兴张楚，问题是他们已经不是楚地的旗帜了），楚地的大部分抗秦力量已经集中到了项梁身边。而从位置来看，攻取亢父的东楚军，也可以很快渡过济水，驰援东阿。

攻击东阿的军事行动，可以说是东楚主力和秦军主力的第一次接战。就秦军这方面来说，基于我们分析过的战略方向（先控三晋之地，再图边缘），他们并没有倾全力，而是只分出部分兵力攻击东阿。更为重要的是，秦军低估了项梁在泗上地

区所积蓄的力量。这也情有可原，当你已经把势头最盛的陈胜灭掉，有理由相信楚地的抗秦力量暂时已经不再成为威胁了。一方是志不在此，另一方是蓄势已久。“东阿之战”也使得秦军是出征以来首次遭遇的失败，并且是大败。接下来的秦军，必须重新调整他们的战略目标了。

第四节 项梁在定陶之战兵败身亡

在东阿取得大胜的项梁，并没有马上开始全力追击向西撤退的秦军。就之前所表现的战术风格来说，步步为营似乎更符合这位楚军统帅的性格，经历了这么一场大战之后，主力的休整在所难免。当然，这并不代表在大胜面前，楚军就不会乘势扩大战果。为楚国（现在他们可以名正言顺的作为“楚国”的代言人了）执行这项军事任务的，就是秦末这出大戏真正的主角——项羽、刘邦。就他们二人后面的表现而言，你甚至无法确定谁才是第一男主演（第一女主角倒可以确定，应该是吕雉，也就是后来的吕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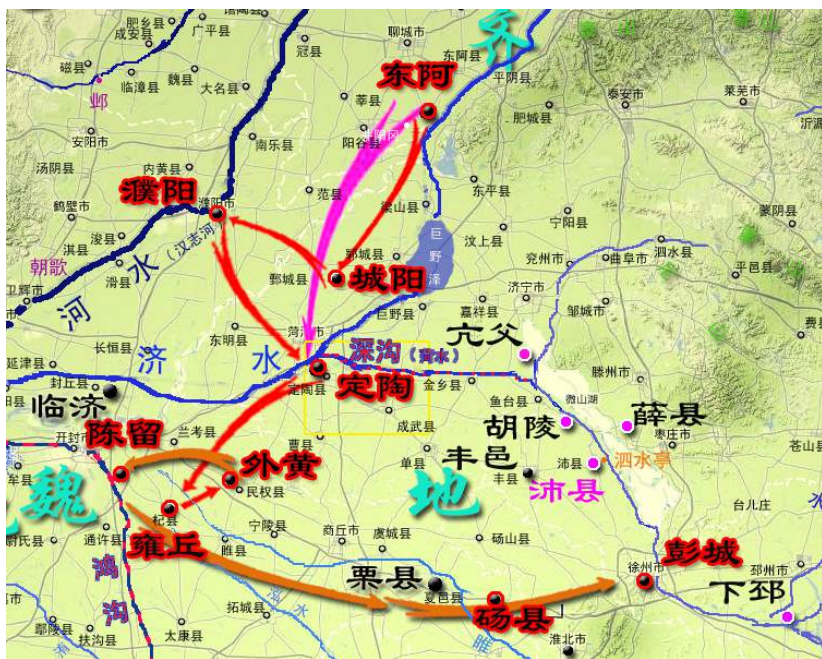
不过在项梁战死之前，他们二人还是以比较重要的配角身份出现在这场军事博弈之中。如果按照评书中的说法，项羽的定位，应当是“前部正印先锋官”，任务就是“查探敌情，挫敌锐气，逢山开道，遇水搭桥”，而刘邦自然就是“副先锋”了。从项羽后来的表现来看，他获得这个角色，绝不仅仅是因为裙带关系。不过再分析得仔细点，项羽也似乎更适应这个定位。不得不说，项羽在军事方面是有天赋的，只不过如果他想真正成为统帅的话，还需要有个有战略眼光的“参谋长”来辅佐。在他后来走向巅峰的过程中，的确也有这样的人物辅佐。熟悉楚汉相争这段历史的人，也应该猜到是谁了，他就是范增。事实上力劝项梁不要自己称王，而是扶植更具号召力和正统性的“楚怀王”的，也正是这个睿智的老人。

作为先锋的项羽，应该还是很称职的。在追击秦军的过程中，西河济平原的城阳（山东鄄城）、濮阳都先后成为楚军的攻击目标。只不过黄河南岸作为当年卫都的“濮阳”城，城池比较坚固（并引黄河水护城），项羽在外围取胜后，并没有能够攻入城中。相比之下，据守城阳的秦军和百姓，结果就要悲壮得多，又一次成为项羽屠城的对象。从后来的攻击路线来看，项羽和刘邦的这支先锋部队，并没有很明确的战略任务（略地），更像是一支锐气十足的奇兵，用来流动打击各个据点的秦军。在濮阳城外，未能破城的项、刘二人，接下来又向南渡过济水，攻击那个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定陶”（陶邑）。

不过作为秦人最早在东部的据点，陶邑的防御级别也不比濮阳城低，项羽的这次攻击同样未能得手。事实上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项羽这支先头部队并没有很明确的战略目标，只是在寻机和秦军接战，以为后面的主力部队试探秦军的虚实。因此攻击定陶未能得手后的项羽、刘邦，接下来又向西渗透到中原腹地，去攻击秦军

占据的“雍丘”了（河南杞县）。总的来说，项羽的攻击范围都是当年的魏地。并不能说楚军就是活雷锋，在帮着短命的魏国复国。作为已经成为抗秦中坚的楚军来说，他们自江东一直向北，控制整个泗上地区后，也需要扩张自己的东西纵深了。

作为配角的项羽、刘邦，固然可以比较随性的选择自己的攻击目标。但作为亲率主力的项梁，就必须从战略的角度来制定自己的攻击方案了。从地理位置上看，菏、济两水相交之处的“定陶”，是以泗上地区为后方的楚军向西扩张的桥头堡。在此之前，楚军已经占据了菏水的另一头（与泗水交点附近的“亢父”），稳定了自己的防线。所以从东阿出发的楚军主力，并没有把占领整个西河济平原作为目标，去攻击秦军在此的重镇“濮阳”，而是向南把陶邑作为了主攻目标。



秦末军事博弈图（二）

陈胜身死之后留出权力真空一样，齐王在临济城下的身死，也让齐地陷入了一场“王”的争夺战。在形势未明的情况下，项梁并不想过早的对齐人内部政治斗争结果作出判断。既然楚国在齐国的王位之争中，暂时保持模棱两可的中立态度，那么本着“攘外必先安内”的原则，时下的齐人也对继续和秦军 PK 兴趣不大了，虽然目前的形势看起来是那么有利。

其实无论是政治博弈，还是战争，盟友的数量与质量并不是决定结果的主要因素。最终的结果，还是要取决于联盟中的主力是否有独立对抗对手的力量。这就好像德国人从来就没指望过意大利人能够帮他们独当一面；而加起来的总实力并不弱于秦国的关东六国，最终却被秦国各个击破一样（两个二流国家的联合体，是对抗不过一个一流国家的）。就项梁所聚集的楚地义军来说，现在已经有了足够的资源与信心独力对抗东征的秦军。因此在没有得到齐军支援的情况下，项梁还是率领楚军主力发起了“定陶之战”。正如我们刚才分析的那样，这是一个步步为营的选择，在

经过项羽和刘邦的试探性攻击，以及在东阿所取得的战果。项梁有理由相信，现在的楚军已经可以转入战略进攻阶段了。如果为了自己的这次攻击更加保险，楚军应该联合背后的齐军来共同完成这次攻击的。事实上，楚军方面也的确通知了齐军。以楚军刚刚援助的齐军的情况来看，齐军似乎没有理由不与之同仇敌忾。问题是，和

战略上并不算冒进。

最初的战局是朝着有利于楚军的方向发展的。秦军在外围被楚军击败后，龟缩进了城防坚固的定陶城中。连续的胜利，让楚军对于拿下定陶城充满了信心。项梁甚至没有召回正在西面作战的项羽、刘邦。从战术安排上来看，也并不是要把所有部队都用来主攻，分配一部分力量去警戒外围，防止对方增援也是正确的做法。问题是，项羽在中原腹地的攻击行为，更像是一次完全独立的自由发挥，并没有与定陶城下的楚军主力行动相互协调。不过在战术结果上，项羽倒是取得了不小的战果，在攻击雍丘的战役中大败守军的他，甚至斩获了这支秦军的主将“李由”（丞相李斯的儿子）。



秦末军事博弈图（二）

受到这一系列胜利鼓舞的项羽，对自己独立作战的能力也更加有信心了。雍丘东面的“陈黄”（河南民权县），而不是楚军主力正在攻击的“定陶”，成为项羽的下一个目标。相信在主力由“薛”县出发，攻击前进之时，项梁肯定就对自己所积蓄的资源，与章邯所率领的秦军主力之间做出过比较。在感觉到有足够的本钱时，才发起的东阿、定陶之战。问题是，秦军方面的情况也是在动态变化的。当前线遭遇到楚军强力反攻之时，如果要想挽回战局，就必须得到有利的支援。尽管帝国的

内部现在正处在权力交接的不稳定期，但东线战场失利对帝国来说意味着什么，相信谁都清楚。

因此在定陶守军苦苦支撑的同时，秦人也在自己的控制区（特别是关中）进行紧急动员。加上一年前章邯东征所征调补充的秦军，秦人的这两次动员可以说是拿出了自己的全部家底。而最终的战役结果也的确如秦人所愿，发生了逆转。在章邯（并不在定陶，而在濮阳待援）的率领之下，帝国的援军对定陶城下的楚军发起了总攻。项梁和他的楚军主力显然低估了秦军的潜力，并且自己和项羽所取得的一系列胜利，也不可避免的让自己滋生了轻敌的思想。在战场之上，决策失误往往是要以生命的付出为代价的。而这一次以生命为代价的，就是项梁本人。

回头再说说项羽，对于他来说，超人的勇气应该是他成功的一大秘诀。在得知项梁兵败身死之后，他甚至没有马上想到后撤，以避秦军锋芒，而是转而由外黄出发，向西北方向挺进，去攻击更加深入对手腹地的“陈留”（开封东南，鸿沟东岸）。不得不说，这是一个非常规的举动。也许作为一名冲锋陷阵的军人，需要这样的勇往直前的勇气，但从战略战术的角度看，这实在不是什么好主意。

现在该我们的另一位领衔主演沛公“刘邦”来发挥作用了。相信在之前的军事行动中，项羽的攻击力才是胜利的保障。但在面临战略抉择时，刘邦显然就要成熟得多。二人开会的结果，还是理智战胜了冲动，楚军这支建制完整，并且在攻击中不断壮大的军事力量，开始沿睢水向东南方向退却，并最终在睢水东岸的“砀县”（刘邦驻军）、泗水边上的“彭城”（项羽驻军）布下了防线。假使秦军下一步以楚地为攻击目标的话，那么彭城、砀县一线就会变成东楚军逐级抵抗的第一线，就像当年宋、楚两国在此胶着那样。如果失败的话，那么以楚都“盱台”为核心的淮河防线，就该发挥作用了。

按照一般规律，当一个政治集团的领袖遭遇不幸时，这个集团内部势必会有混乱的现象产生（只不过规模大小不同罢了）。而这种时候，往往就是你的敌人所等待的战术机会。从整个秦末的形势来看，秦始皇驾崩之时，就为陈胜的起事创造了机会；而援助魏国的齐王阵亡，也让齐人的注意力转移到了最高权力之争，以至于没有参与“东阿之战”。至于说这次项梁的阵亡，对于刚刚夺得楚地“正统”地位的东楚军来说，也同样面临内部结构调整的问题。而这个时候，最让人担心的问题就是秦军会乘势追击。如果是那样的话，楚军很有可能需要退回到江淮了。

幸运的是，定陶之战的胜利让秦军产生了误判，即认为楚地义军暂时已经不足为患了。从客观的角度来看，产生这种影响也属正常。毕竟在秦军的连续攻击下，陈胜和项梁都已被攻杀，而中原腹地也已经在秦人的控制之下了。帝国的战略家们有理由相信，在经历过如此重大打击之后，楚地及齐地的那些机会主义者不会再主动对秦人发动大规模进攻了。

第十五章 项羽率楚军与秦军展开巨鹿之战

第一节 王离和章邯进攻赵国并围攻巨鹿

如果说战国诸侯当中有哪个诸侯国给秦人的影响最为深刻，那一定是赵国了。这个战国后期的抗秦中坚，曾经让秦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至于楚国，尽管他们在最后的抵抗中，也曾经在一次战役中打退了秦军的第一次进攻，但在秦人看来，赵人的韧性和战斗力才是最值得警惕的。换句话说，秦人绝对不希望在自已纠缠于楚、齐两国的纵深之时，让赵人抄了自己的后路。因此在灭掉了魏国，击溃了齐、楚两国主力后，秦人决定把重心放到河北平原，去解决掉赵国的问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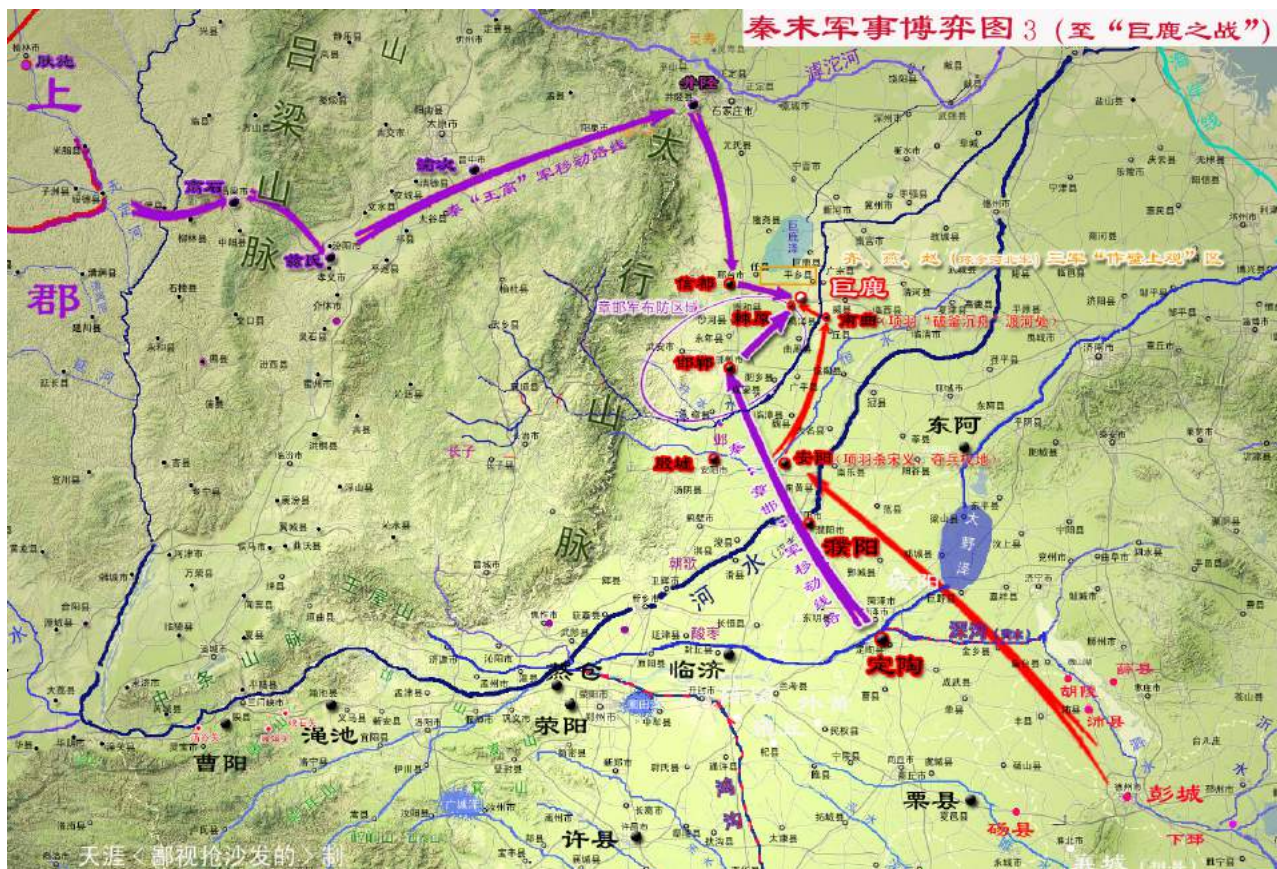
秦人对于赵地的重视，从他们的兵力调配上也可以看出。在章邯所带领的秦军主力与楚军纠缠于河、济之南时，帝国就已经着手抽调他们最后一支机动力量向东移动，以伺机攻入河北平原了。在战争刚刚开始时，我们就已经分析了，没有预料到内部会出问题的帝国，把他的主要军事力量分成了南北两路，一路越过五岭，去实现始皇陛下南到大海的帝国梦；另一路则集结于上郡、云中、九原，以对抗北面的匈奴人。

用来征服南越的这支大军，是肯定不能指望的了。其实也不能怪赵佗他们不“爱国”，就这支南征大军的成分来说，本来就是以那些六国故地之民为主（赵佗本人是赵国人）。在帝国还拥有强大的控制力之时，他们当然会愿意凭借战功来获得体制内的政治地位。但在帝国本身遇到大麻烦，并面临崩溃时，这种依靠强制力建立起来的“忠诚”，就不那么可靠了。相比之下，秦人用来防御北部威胁的军队，成分要“纯洁”得多。在观察到匈奴方面并没有与关东诸侯结成战略同盟时（在以后的历史中，这种情况很常见），秦人决定把他们在上郡的预备队投入到东部战场上去。这支由王翦之子“王离”所统率的总数达十万人的军队，也是帝国所能抽调的最后一支成规模的军事力量了。

从上郡出发的“王离”军并不需要向南移动进入关中，再由崤函通道或“轹关陁”出关。在战国阶段，我们就分析过了，上郡所在的陕北高原和山西高原中的“太原盆地”之间，存在一条穿越吕梁山脉的通道（离石一线）。当年建立中山国的“白狄”就是通过这样一条路线，渡过黄河，最终穿越整个山西高原，进入华北平原的。鉴于“王离”军的攻击目标是赵国，他选择了由“井陉”这条线路来穿越太行山脉。

对于“井陉”我们并不陌生，沿着这条路线走出太行山脉之后，就可以到达滹沱河的南岸，赵国核心区的北部。在秦、赵最后的战争中，秦军曾经数次出井陉攻击赵国。这条路线的好处在于，可以切断赵国南北的交通线，并从北部直接面对赵国的核心区；而它的弱点则在于，如果要想取得战术胜利，就必须在南路亦有一路

秦军配合进攻（或由上党出“滏口径”攻击邯郸，或由漳水南侧渡河攻击）。如果没有的话，孤军深入的秦军就很容易陷入赵军的包围当中。当日蒙氏家族的第一代名将“蒙骜”（蒙恬的祖父），就是由于南路秦军（公子成蛟）因政治原因在上党的观望，而兵败身死的。



秦末军事博弈图（三）

正是清楚了这点，由上郡出发，横穿整个山西高原的“王离”军，在即将进入华北平原，到达“井陉盆地”之时，停住了脚步。之所以会这样，就是因为这支北地调来的生力军，需要得到章邯所率领的秦军主力北上的消息。从地理位置上看，像井陉盆地（秦人在此设立了“井陉”县，建制一直延续至今）这种太行山脉边缘的小盆地，是非常适合用来驻军观望的地点。如果南线秦军主力进展顺利，那么他们只需向前跨出一步，就可以迅速南切到邯郸——信都（邢台）一线；而如果章邯失败了，那么井陉的秦军也可以马上发挥他的防御作用，为帝国守住第二阶梯的国土作出贡献。假如不是在东阿遇到了项梁所率领的楚军主力，并失利的话，秦国南北两军合围赵地的计划，在时间上应该会贴合得很好的。不过随后在定陶之战翻盘成功的章邯，也并没有让远道而来的王离失望，而在井陉等待消息的王离军也终于得到了进攻的命令（多等了几个月）。一场决定帝国命运的战役“巨鹿之战”也由此拉开了序幕。

东出井陘的王离军，并没有把战略目标放在沿滹沱河切断赵国南北交通上。就这支十万人的军队来说，沿河布防并没有太大的意义，特别是你的对手并不仅仅会来自于北线时。对于目前处在战略进攻角色的秦军来说，最好的战术还是握紧拳头直取对方的核心区，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将对手刚刚集结的主力歼灭。之前在南线，先后攻杀了张楚、魏、齐三王，以及项梁的章邯军，就很好的贯彻了这一战略思想。否则，面对遍地烽火，将兵力分散去各处充当消防员，只会将自己拖垮。

和战国时期一样，漳水以北至“巨鹿泽”（之前的“大陆泽”因黄河改道，水量已大为减少）一带是赵地的核心区，也是新生的“赵国”政权的根据地。和先秦的情况有所不同，除掉信都（邢台）、邯郸这一北一南两个重要城邑之外，秦人又在巨鹿泽的南面设置了“巨鹿”这个郡治（巨鹿郡行政中心），并将巨鹿泽周边及以东的大片土地划入了新设立的“巨鹿郡”。事实上就巨鹿郡的辖区来说，在春秋战国时代并没有特别重要的战略要点，更多的是以缓冲区的面目出现在地缘博弈的舞台之上。秦人之所以要将这块缺乏地缘核心的土地独立出来，为的就是不让赵国的核心区置于同一建制之下（邯郸郡）。当你征服的土地上有潜在的不稳定因素时，分而治之是很容易想到的选择。

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赵地的核心区内，实际上由信都——巨鹿——邯郸构成了一个三角形支撑。如果秦军能够攻克这三个战略要点的话，意味着河北平原的南部（滹沱河以南）都回到了帝国的控制之中。而那个曾经让秦人无比头疼的赵国，也像他另外两个三晋兄弟那样，很快又成为历史了。并没有在路上做过多纠缠的王离军，重点攻击的战略要点就是三点当中最北部的“信都”，而在王离军开始行动后不久，打扫完定陶战场，并稍做修整的章邯军，也从南线渡过济、河、漳三水，攻击至邯郸城下。

有人可能感到奇怪，为什么在战国后期赵国是抗秦主力，而到了秦末群雄并起的年代，曾经韧性无比的赵国却成为龙套角色，以至于在秦军的两路夹击下，只有招架之功。其实以赵国的纵深和地缘条件来看，在战国七雄当中，只能算是中等。在和秦国的那些战争中，更消耗掉了国家的元气。当秦人在感叹他们的帝国这么快就遇到麻烦时，赵人也同样没有足够的时间来恢复元气，并在各地诸侯的内部竞争中竞争领袖地位。正是因为这些客观因素的存在，赵人很快就失去了信都和邯郸这两个战略要点，并不得不把主力退入东面的巨鹿城。

当章邯所率领的南线秦军与王离所率领的北线秦军，分别攻下了邯郸、信都之后，赵王和赵军主力所据守的巨鹿城，自然也就成为两支秦军的下一个目标了。就这次攻击任务而言，秦军内部也进行了分工。简单点说，就是由王离军负责围攻巨鹿城，而章邯军则沿漳水一线布防，并在巨鹿城南的“棘原”设立补给点，以为承担主攻任务的王离提供补给。这种安排看似有些奇怪，因为自从反攻开始的“戏之战”后，章邯所率领的秦军一直都是以主力的身份，在六国故地攻城拔寨，而这次却把主攻

任务交给了王离所带领的北地边防军，自己则担当起了后勤保障工作。

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即使是主力也不一定总是要一直冲锋在前的。已经东征在外两年，并刚刚经历过东阿、定陶两场恶战，又攻下邯郸城的章邯军，有足够的理由需要休整。而作为生力军的王离军，无论是从战斗力还是之前的消耗来看，都足以担当攻城的重任。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战争进入相持阶段，胜利的天平往往就要向更有补给优势的一方倾斜了。从章邯的防区来看，他既可以充分收集邯郸一带的物资，以战养战式的就地补给，也可以通过滏口径从西面的上党高地接收给养。如果没有援军的话，无论是谁担当主攻巨鹿城的任务，巨鹿城的赵军都不可能坚持太久。那么坚守的赵军能不能期待来外援呢？答案是肯定的。

第二节 诸侯国派军增援巨鹿城

深知赵国灭亡之后，自己会成为下一个目标的齐、燕两国，都向巨鹿城派来了援军。而赵人自己，也将北部没有受到王离攻击的赵军收拢在一起，以向南驰援巨鹿（时称“河北军”，由赵将陈余率领）。从河北平原的地形，以及援军来自的方向上看，秦军即使有足够的兵力，也很难设立关卡，以阻止各路援军驰援巨鹿。事实上秦军也没有这种想法，在他们的眼里，这些隶属于不同“国家”的军队，并不会对自己造成太大的威胁。而齐、燕、赵三国援军也的确没有让章邯失望，尽管大家都知道战略上救援巨鹿城的意义，但具体到战术层面，却没有谁有足够的胆量承担起与秦军决战的主力任务。于是在巨鹿一带出现了一出奇特的景象，一面是王离军在加紧进攻巨鹿城；另一面则是燕、齐、赵（河北军）驻扎在巨鹿城北，巨鹿泽南，既前进，也不后退，而是就地筑营以自保，静观其变。

在真实的战争中，双方比拼的重点往往并不是纯粹的数据，或者说不能简单地认定 1+1 就会等于 2。特别当你的对手是一个松散联盟时，你会比面对同样数量、质量的统一指挥的军队，有更多的机会。运用政治手段离间，是一种有效的方法；纯粹的军事威慑，也是一种方式。就双方数量的对比来说，燕、赵、齐三国聚集在巨鹿城北的军队和秦军并没有质的差距。问题在于谁也不愿意做这个出头鸟，去承担主攻任务。这点其实和战国后期的情况一样，加起来实力超过秦国的山东诸侯们，却总是被秦人施展连横之策，各个击破。

就救援赵国这个任务来说，其他“国家”的军队不愿做出头鸟也是说得过去的。特别是之前出头的陈胜、项梁、田儋（齐王），都已经被秦国攻灭的前提下。但隶属赵地的“河北军”，不付出点实际行动，却是怎么也说不过去了。可惜的是，赵军派出去试探进攻的五千人，很快就在秦军中消失得无影无踪了。面对数十万秦军（主攻部队就有十万），让这点人去送死，只能算是做个姿态了。如果不出意外的话，在联军的观望之下，巨鹿城很快就会被秦军攻克了。这当然并不代表赵地就完全被

秦人控制了，但滹沱河以北的那些燕赵之地，在秦人眼里已经不足为患了。可惜的是，这个世界总是充满着意外。因为在我们所列举的诸侯中，还有一个重要的诸侯——楚国，没有现身。而楚人的动向，才是决定战争结果的终极因素。

在秦军的计划里，楚地实际上已经不构成威胁了。在他们的想法中，攻灭了陈胜、项梁这两个领袖级人物，楚地再想凝聚力量也得等上一阵子（政治上也得乱一阵子）。在此之前，帝国应该起码能够收复赵人所占据的河内之地了。不过秦人显然低估了楚人的潜力，尽管在和秦军的作战中，楚人先期聚集起来的军事力量遭受了重大打击，但就楚地本身，特别是东楚之地而言，却并没有被秦人所收复。在这个全民皆反的年代，楚人凭借纵深优势所呈现出来的战略优势，支撑了他们成为这场战争的主角。这一点倒是和二战时期的苏联，颇为相似。

另一个重要因素缩短了楚国的政治混乱期。虽然项梁作为楚军的最高军事统帅，拥有无可置疑的影响力。但不要忘了，凝聚楚地力量的最大的那杆大旗，其实是王室嫡出的“楚怀王”。这个王的存在，使得项梁身死之后的楚地，并没有像陈胜、齐王被杀之后出现权力真空。当然，在这个群雄并起的年代，机会主义者并不会放弃任何一个机会上位。如果楚怀王只是龟缩在淮南的“盱台”的话，那么基于这个国都的位置，它并没有可能辐射到所有楚地。更为重要的是，这种防御的姿态，会让淮河以北的楚地之民认为他们的“王”已经准备放弃他们，偏安江东了。在这种情况下，出现一个新的“王”来领导那些第一线的楚地，是非常有可能的。

如果秦军在定陶之战后选择沿泗水一线南攻的话，那么楚怀王其实也只能先求自保了。不过秦军先解决三晋的战略，让他有了更多的选择。并不是每一个被历史推到前台的人都想当然的是“政治家”；也并不是每个人都会在这种不利局面下选择前进的。不过这个年龄不详的牧羊人，显然还是从他的王室血统中继承了一些政治潜力。为了能够维护自己在楚地的正统地位，新上位的楚怀王决定乘秦军主力北上的机会，将自己和楚国的国都前突至“彭城”。而那些在淮南（包括江东）所积累的后备力量，也随之北上了。

要是项梁不死的话，楚怀王也许到死都只是作为一杆大旗，存在于历史舞台上。不过现在历史既然给予了他机会，楚地的领导权也自然地“回归”到了“王”的手中。虽然权力斗争讲究的是实力，如果执政后的楚怀王，手中依然没有足够的牌，最终还是免不了成为过客，但最起码在这一刻，他是凝聚楚地力量的纽带。从实际情况来看，楚怀王其实算是楚地的第三代领导人了（陈胜、项梁为一、二代）。在经历过张楚、东楚两个世代之后，现在的楚国终于在政治上回归了正统。就这个新领导人而言，冒险迁都至彭城，当然不是为了防御。

现在摆在楚人面前的有两条路：一是北上赵地，去参与诸侯联盟的“救赵”行动；二是乘秦军主力纠缠于河北平原之时，向西收复楚地，真正复兴楚国。从战略上来看，这两个方案各有利弊。乘着河北打得热火朝天之计，赶紧把自己的实力做大，当然

是不错的。但如果秦军又打败了联军，灭掉了赵国，那么秦军主力迟早还是要回过头来收拾楚国的。到了那时，就不知道还有没有能援助楚国的义军了。如果不乘机扩张的话，又似乎是在错失机会，特别是楚人作为义军中坚，已经和秦军进行过二轮对抗了，把自己的基础做实也不为过。既然两个方案这么难取舍，那么索性也不要选择，而是两套方案一起执行，在战略上也多给自己一个机会。

最终被选择执行这两套方案的是项羽和刘邦。即刘邦率领他在砀县的军队向西扩张，而项羽的部队和其他义军作为主力向北驰援赵国。单从军事角度来看，让项羽去啃秦军主力这块硬骨头，也是无可厚非的。毕竟在之前的战役中，项羽在军事方面的才能已经显露无疑。只是做出这项人事安排，军事因素只是一方面，更为重要的还是基于政治方面的考虑。对于根正苗红的楚怀王来说，并不十分担心有其他王室成员来争夺楚地的领导权，尤其是项梁之前为之打下的基础已经足够坚固了（清除了潜在对手）。真正有可能对楚地领导权发起挑战的，其实就是实力派的项氏家族了。基于这个家族的影响力，以及在楚地义军中的控制力，项羽的能力越强，就越不能让楚王放心。

当然，现在就去清除这个隐患，是自毁长城的做法。在处于战略防御阶段的时候，内部矛盾的尖锐性总是要低于外部的。既要利用项羽的军事能力，又不能让他坐大，这种考虑直接影响了北伐主力的人事安排。一个曾经在项梁兵败之前，就预料到这个结果的将领——宋义，成为楚军主力的统帅。而最具军事才能和威望的项羽，则成了他的副手。这种明显带有制衡意味的人事安排，显然不能让项羽满意。他需要一个机会重新夺回他的军事领导权，很快这个机会就来到了。

第三节 项羽在巨鹿之战歼灭王离军队

在楚王所任命的统帅（宋义）带领下，楚军主力开始向北移动。鉴于秦军主力已经北上，那些驻守在城邑当中的秦军并没有出城为他们制造太多麻烦。在这种遍地烽火的时候，如果不是对方惹到自己，最好的办法还是各走各的路。不过北上的楚军最终还是停了下来，停下来的位置叫做“安阳”。这个安阳，和现在挖出甲骨文和曹操墓的安阳，并不在一个位置，而是在它的东部（内黄县西北）。

从位置上来看，楚军驻军的地方位于漳水拐向东北方向的拐角处。如果楚军决定马上渡河的话，那么他们可以攻击沿漳水一线驻防的章邯军，以减轻巨鹿城的压力；而如果继续沿漳水北上的话，也可以在到达巨鹿城东侧时再渡河，以直接救援巨鹿城。从战术上看，两套方案都有它的可取之处，也都可以为巨鹿城内的赵军增加生存的机会。可惜的是，楚军的统帅并没有在这两条攻击路线中作出选择，而是选择了另一套方案——“隔岸观火”。

其实这也很好理解，既然燕、齐两军，甚至赵国自己的河北军，都在巨鹿城北观望，

远道而来的楚军没有理由去做这只出头鸟。这种局面也是秦军愿意看到的，对于一个成熟的军事家来说，断其一指的围歼战，一定比伤其十指的击溃战要更有价值得多，也更有威慑力。诸侯援军也并非不知道这层意义，只是事到临头时，基于人性的弱点都会犹豫的。就像我们这些普通百姓在遇到恶徒行凶时，绝大多数人并不是因为没有正义感而置身事外。如果有人肯挑头出来，并占据上风的话，那么愿意一拥而上，一起痛打落水狗的人，会是大多数。



秦末军事博弈图（三）

楚军的这种观望态度虽然属于正常反应，但就项羽来说，却是不能忍受的。一方面项羽对于楚王任命宋义来压制他，深感不满；另一方面基于他的性格来说，也绝不屑于这种权衡再三的“战略”性的思维方式。其实就性格而言，也没有绝对的好坏之分，只要用对地方就行了。项羽这种有些不计后果，在一般情况下是很危险的。不过在面对双方绝对实力没有

差异（无论是战国，还是现在，如果关东诸地能够同心协力的话，在实力上都是占优的），需要有人挺身而出时，却可以对凝聚诸侯内部力量起到积极的作用。

换句话说，从大势上来看，秦帝国的崩溃是在所难免的。即使不在巨鹿之战落败，也会在后来的战争中逐渐把战争潜力消耗掉。但项羽这个异类的出现，无疑加快了这个进程，并使得这场持久战很快以“突然死亡”的方式结束了（秦亡以后的历史就属于另一个故事了）。不愿意看到楚军也成为观望者的项羽，很快杀掉了他的上级并取而代之。基于项氏家族的军事影响力和控制力（班底都是项家带出来的），以及积极救赵的道德制高点，这场“下克上”的谋杀并没有引发军事混乱。

而彭城的楚怀王也只能接受这个现实，并无奈地任命项羽为楚军统帅。取得军权的项羽并没有马上渡河去攻击章邯军的防线，而是迅速向北移动，到达了巨鹿城东南方向与之隔漳水相望的“南曲”，并准备实施他的攻击计划。率先为楚军做试探性攻击的，是黥布所率领的两万楚军。这是一个军事性格和项羽有诸多相似点的猛将。在硬碰硬的战场上，这种作战风格的确能够成倍地激发战斗力。项羽的军事

才能当然不仅仅体现在一个“猛”字上了，就战术安排来看，楚军的先锋部队并没有选择直接攻击包围巨鹿城的王离军，而是把攻击点放在了王离军与章邯军的结合部。

为了给巨鹿城下的王离军提供补给，章邯在巨鹿城南的棘原与巨鹿城之间，构筑了一条长约数里，两面有墙体护卫的“甬道”，以保护粮草的运输。而楚军的攻击重点也正是这条运输线。一个优秀的将领，一定会把很大的注意力放在自己的后勤之上的（如果不能，那就只能做冲锋陷阵之事了），当然也包括对手的。项羽的这种攻击战术，也的确打乱了秦军的攻城计划，使得他们不能像以前那样没有后顾之忧的进攻。

当然，仅仅靠一支勇猛的先头部队是无法取得战役胜利的。所以在先头部队的试探性攻击取得一些小胜后。项羽率领他的楚军主力全数渡过了漳水，开始进入战场。如果这时的燕、齐、赵三军能够和楚军一起行动，并统一指挥权的话，那么与秦军相比，联军实力并不处于弱势。只是在还没有看清风向的情况下，自保的心态仍然占据了上风。事实上项羽也并没有指望这些“作壁上观”的盟友（这句成语，就是出自这场战役）。他用自己的方式成倍地提高了楚军的战斗力，这个方法两千多年来也一直为军事家们所津津乐道，它就是“破釜沉舟”。

从战术的角度看，项羽的破釜沉舟和孙子兵法的“陷之死地然后生”是一个道理。没有退路和补给的楚军，所显示出来的战斗力，比用军功爵制和严刑酷法组织起来的秦军要更加强大。而从秦军的方面来看，他们则有一种措手不及的感觉。一方面是对楚军决战式的攻击预料不足，毕竟之前的诸侯联军虽然也有小规模试探性攻击，但根本不对秦军构成威胁。对于楚军这个已经在定陶之战中败过的对手，秦军同样也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对楚军渡河即战的效率（一般要扎下营来再择机出击，只带三天干粮的楚军没有做这个缓冲），以及背水一战所激发的战斗力估计不足。

在楚军这种不要命的打法面前，攻击巨鹿城的王离军很快便陷入了被动局面，以至于九战九败。王离本人也被楚军俘虏（其他主要将领或阵亡，或自杀）。如果单纯比较王离军和楚军数量（楚军约五万），楚军是处于弱势的。尽管背水一战所激发出来的士气，可以让楚军在正面 PK 时取得胜利，但如果要想全歼围城的秦军是非常有难度的。这也是这场战争让后人觉得不可思议的地方。

事实上，直接参与巨鹿之战的并不只有楚军，作为楚军救援的对象，无论是巨鹿城内的赵军，还是在城北踌躇不前的赵国河北军，都没有理由在楚军发起总攻时不参与战斗（所以司马迁也只是说“诸侯军救巨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坐壁上观”）。也就是说，楚、赵两军加起来，在绝对数量上已经不会低于，甚至超过了围城的王离军。正是在数量上不处于劣势，战斗力超出对手的情况下，楚军才有可能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歼灭围城的秦军。

第四节 章邯没有支援王离的原因

单纯比较楚、赵两军的数量和战斗力，的确可以为巨鹿之战的胜利找到符合逻辑的客观条件。问题是，一直以来作为秦军平叛主力的章邯呢？如果加上他那不少于二十万的秦军，项羽又怎么能够取得巨鹿之战的胜利呢？事实上，在王离军与楚（赵）军硬碰硬时，章邯的军队其实也在“作壁上观”，并没有全力参加战斗。想知道章邯为什么要这样做，我们要先来解读一下章邯军与王离军之间的关系。在整个战国，乃至秦帝国时期，秦人给我们的印象都是铁板一块，或者说是以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对抗一个松散联盟。秦人在巧妙地利用军事威慑、政治离间来将他们的对手各个击破时，的确也将内耗降到了最低。不过，这并不代表秦人就不会因为内部原因而失败。当年与秦始皇的弟弟成蛟两路出击攻击赵国的蒙骜，就是因为前者的政治企图而成为牺牲品的。

就章邯与王离所带领的两支军队来说，其间的关系也是很微妙的。尽管章邯军自骊山起兵以来，就一直是秦军用来平叛的主力，但就战斗力来说，驻守北地的边防军才是秦军的精锐。这点也并没有什么奇怪的。毕竟对于关中的帝都来说，北地的匈奴人无论从战力，还是地缘关系来说，都是帝国最大的威胁。相比之下，章邯所率领的秦军，大部分都是在陈胜首义之后才临时组建的。军事素养是比不上北地那些职业军人的。正因为如此，章邯与王离两支成分不同的军队之间虽然在协同作战，但相互之间却并没有隶属关系。而承担主攻巨鹿任务的，也当仁不让的由王离所带领的“正规军”来完成了。

不能统一指挥权，并不影响章邯在战事开启之初对诸侯军队的破竹之势。毕竟凭借秦人高超的组织能力，以及强大的物资储备，章邯在面对那些刚刚组织起来的“乌合之众”时，是占有相当优势的。这也是他在战争初期能迅速灭掉张楚政权的原因。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反叛者的军事能力也在逐渐加强，并开始正规化了。而在面对这种遍地烽火的情况，秦军自身的消耗也是非常大的（以十万计）。因此，越往后面章邯军所面临的困难也就越大，特别是后期的补充越来越艰难时。

这种自己越来越力不从心，而对手却越打越多，越打越强的情况，在东阿之战终于让秦军遭受了重大挫折。虽然凭借帝国竭尽全力的支援，在定陶之战扳回了一局。但章邯自己心里已经十分清楚，那些战术上的胜利并不能带来战略上的逆转。即使秦军能够凭借军力取得一次又一次的胜利，攻克一个又一个的叛乱城邑。但只要秦军主力移向别的地方，这些被“光复”的地区很快又会重新落入叛乱者的手中。比如秦军攻克的张楚都城“陈”，在他们东进之后不久，就被忠于陈胜的残余部下夺了回去，并试图复兴张楚政权。而章邯军在北上攻击邯郸时，定陶以及河济平原一带又马上陷入了混乱中。

可以说，已经领导平叛工作将近两年的章邯，对于大势已经十分清楚了。这种

战略上的悲观态度，也直接影响了他的战术方向。如果新的秦军主力——王离军，能够支撑起平叛大旗的话，那么章邯当然还是会和帝国一条心来干掉这些叛乱者的。但如果帝国这支最后的精英部队都被消耗掉的话，那么章邯就不得不为自己的后路着想了。反映在巨鹿之战上，就是在王离军与楚军死磕时，据守邯郸——漳水一线的章邯军在保存实力。

很多时候对于政治家来说，他们宁愿军人没有政治性格，只以尽忠职守为己任。就像明知被陷害，还愿意就死的蒙恬一样。很显然，章邯考虑的要更多一些。从项羽的角度来看，选择王离军来作为攻击目标，也是一种战术。如果把秦军主力打垮的话，那么无论是对于秦人方面，还是那些举棋不定的诸侯军来说，都是极大的震慑。

当然，这样做的风险也是很大的，除非你有必胜的决心和把握。也正因为一般人是很难做到这点，项羽才在中国历史中成为战神一级的人物。从结果上来看，项羽迎难而上，擒贼擒王的战术获得了完美的成功。打垮了王离军之后，那些现场观战的诸侯军都彻底被项羽所慑服了，并愿意完全服从项羽的指挥。可以说，自战国以来，关东诸侯们数百年未能统一的军事指挥权，在项羽这里成为现实。当 1+1 终于有机会等于 2 时，秦人苦心建立的帝国，也就走到了尽头。

第五节 章邯率秦军向项羽投降

当王离军被击溃之后，章邯军又一次被推到了前台，成为秦军主力（也是最后一支了），而这时战争的主动权已经交到了项羽手中。不过巨鹿之战胜利后，项羽并没有就势率领诸侯联军挥师南下攻击章邯军，而是又一次渡过漳水，沿着楚军当日北上的路线穿过“安阳”，运动至了漳水之南，也就是章邯防区的南面。

其实也不能说项羽就没有和章邯进行过遭遇战，毕竟王离与章邯两军是连成一片的。只不过，从战术的角度看，项羽在攻击围攻巨鹿城的王离军时，可以与城内的赵军里应外合，形成夹击之势，增加了获胜的机会；而在应对以邯郸为中心，整体呈防御态势的章邯军时（兵力也更多），就很有可能陷入拉锯的状态了。而这一点，并不是项羽愿意看到的。毕竟对于楚军来说，现在是在远离本土的客地作战，后面还是一帮善于辨别风向的“盟友”。一旦自己和章邯军消耗下去，难保形势不会有变。

从战略的角度看，章邯之前所平叛的中原、河济平原、包括漳水以南的河内地区，虽然在主力北上之后，有些据点重新被各种义军攻克，但很多关键据点还在秦人手上（如荥阳、开封等）。如果章邯的主力承受不了联军的压力的话，那么最有可能的移动方向就是向南打回到中原的魏、韩故地，甚至向东攻击项羽在泗水流域的根基之地。正是因为这种地缘上的不安全感，让项羽在和章邯军进行接触战并取得胜的情况下（章邯军并没有出击死战，而是退守防线），决定放弃由北向南正面攻击章邯军的想法，而是绕到漳水之南封堵住章邯军的后路，这样的话，即使不能消灭秦军，

也可以着手经营中原的魏韩之地，让他们成为楚国控制区的一部分。

至于说那些已经愿意受项羽号令的诸侯联军，则留在巨鹿一带，对章邯军呈夹击之势。尽管与楚军相比，这些联军的战斗力堪忧，但如果章邯军真的选择这个薄弱环节作为突破口的话，对于楚人步步为营的扩张控制区，也并没有影响。现在章邯所面临的形势，很容易让人想到长平之战中的赵军。不过位于这个战略包围圈中的秦军，形势并没有当年赵军那样危急。即使漳水以东也已经完全被对手所控制，秦军所面对的包围圈也只是个“C”型包围（当然，这是个反“C”）。也就是说，就算章邯军没有办法在河北平原有所作为，还是可以由滏口径从容地退入上党高地，以在太行山一带建立新的防线。只不过那样做的话，也就意味着曾经强大无比的秦帝国，现在不得不进入战略防御阶段了。

在战略主动权已经转移到以楚军为首的诸侯联军手中后，章邯军再想在东线有所作为都是很难的了。无论向哪个方向攻击，都有可能让自己陷入真正的战略包围圈中。老老实实地在原地，最起码可以控制住滏口径这条退入第二阶梯的后路。问题是，无论你是想继续在东线战斗下去，还是退回到太行山以西依地形建立战略防线，都需要得到帝国中央的支持。否则的话，这条战线迟早也会被攻破的。

可以想见的是，章邯当时是非常纠结的。因为他很清楚，在反攻项梁的定陶之战中，帝国已经把最后的家底交给他了。如果消耗掉帝国最后的生力军仍没有解决问题的情况下，个人的命运会怎么样，是可想而知的。这也是章邯在王离军与楚军全力拼杀时，选择了保存实力的主要原因。你也可以理解这是在为自己留筹码。至于说这个筹码将来是继续为帝国服务，还是卖给对手，就要看形势的变化了。乱世之中，没有比手上有兵权更让你感到安全的了。

以章邯本人的身份来说，如果在帝国还有机会的话，当然还是愿意和其他秦人一起战斗的。为了试探帝国中央的态度，章邯派人回到了咸阳，以请求新的支援。对于这次没有成功的求援，史家们一般按照传统的“忠”、“奸”二分法，把账记到了那个亡国奸臣赵高身上，认为他出于政治目的无视了章邯的请求，甚至决定诛杀章邯，以让其承担失败的后果。

从主观上来看，让最近连续失败，并消耗掉帝国数以十万计军队的章邯来承担后果是很正常的，特别是在军法严明的秦帝国。但从客观的角度来看，帝国的确也没有能力再对前线的秦军进行补充了。如果章邯肯像之前的蒙恬那样，以履行一名纯粹军人的义务而面对来自上层命令的话，那么换帅之后的秦军还是会战略后退，回缩到山西高原，甚至关中以图后事。那样的话，秦末这场战乱应该还会持续得更长些。

当一个国家面临危难时，很多人希望看到的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并慷慨就义的军人。可惜的是，并非纯粹军人出身的章邯（原先任职少府，管内务的）在政治上的考虑显然更多些。手中还保存了二十万秦军的他，可以选择退入关中，从

赵高手手中夺取帝国的控制权，然后再图与关东诸侯对抗。作为一手打造出这支秦军的统帅来说，章邯并不用担心部下会不服从他的命令。至于理由嘛，只要你想做，总是会有有的。连身为楚人的陈胜都能借公子扶苏的名义来造一把反，更何况根正苗红的章邯了。

不过，即使章邯能够回到关中，以“清君侧”的名义夺取帝国的控制权，也依然无法解决掉东线的压力。更何况，那样做的话，项羽和他的诸侯联军一定会尾随其后，进逼关中。除非你在战略上，有把握以关中之力翻盘整个战局。否则章邯最后的结局，依然不会有什么变化。既然继续获得帝国的信任与支持，以及夺取帝国的控制权，都不可行，那么章邯如果想生存下去的话，就只剩下向对手投降这一条路了。基于双方不共戴天的矛盾，要想作出这个决定，是非常艰难的。当然，熟悉这段历史的人，应该都知道章邯最后还是投降了项羽。

向项羽投降，并不是最好的出路，但也并不是没有机会，前提就是你要有价值。而章邯手上的二十万秦军，就是最大的筹码。虽然说，重振秦帝国的希望并不能寄托在这二十万秦军身上，但他们的倒向，却能够决定帝国崩溃的速度。从项羽的角度来看，如果有机会完胜对手的话，他并不愿意用政治手段来弥补军事方面的不足。因此在章邯提出和谈的请求时，项羽并没有在第一时间接受。相反，项羽希望利用这个机会迅速出击，攻破对方的防线，以彻底解决掉章邯这二十万秦军。

当章邯还在等待项羽的答复时，楚军的先锋部队已经乘机渡过漳水，向章邯的防线发起了攻击。这时候的秦军已经别无选择了，即使他们仍然认为与对手和谈是唯一的出路，也必须向对手证明自己有玉石俱焚的能力。在历史上，“以打促和”一直是政治家们常用的方式。即使是你马上要进行战略撤退，也必须用一场战术上的胜利来为自己争取时间和空间。所以不管章邯愿不愿意，他都必须尽全力抵挡住楚军的进攻。

在楚军已经掌握战略主动权的时候，寄希望于秦军战胜楚军是不现实的。不过以防御的姿态出现，楚军要想攻破秦军的防线，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换句话说，章邯虽然没有能力扭转战局，但和楚军进行一段时间的持久战，还是能够做到的。回头再看项羽这边，在先头部队渡过漳水，并在北岸初步攻击得手和建立进攻基地后，项羽所率领的楚军主力部队也随之渡过漳水进入了战场，只不过这次的楚军已经不需要用“背水一战”这样的狠招来提振士气了。

秦楚两军决战的地方，是在一条叫做“纡水”的漳水支流旁边（河北省磁县西南入漳水）。就战役的结果来说，楚军不出意料地取得了胜利。问题是，这种正面战场的胜利只能算是击溃战，并不能达到全歼秦军主力的目的。已经把自保作为主要目标的秦军，很快退入了他们构筑的二线防线后面。想想当年秦人是花了多大代价才突破邯郸的外围防线，攻克邯郸的，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漳水防线的突破，并不代表战争的终结。比较戏剧化的是，当年的进攻者——秦军，现在反过来成为

防御者了。

当秦军稳住防线之后，章邯又一次向项羽提出了议和的请求。而对楚军方面来说，如果不能速战的话，远离大后方的他们，补给很快也要出现问题了。在这种情况下，章邯和项羽这两个集国仇家恨于一身的冤家终于走到了一起。从政治的角度看，这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个正确的选择。章邯可以在新的系统里谋得一席之地。尽管有风险，但在回归秦国已是完全没有出路的情况下，这个风险也是必须承受的；对于项羽方面来说，不仅低成本地解决了秦军主力，更可以借助这股力量入主关中，成为天下之主（想想吴三桂是怎么做的）。

至于那些打酱油的诸侯们，早在巨鹿之战时就已经被彻底收服了。这些人并不会会有争夺天下共主的想法，能够在东楚体系主导下谋得一个正式诸侯的名分，对于这些两年前还是草根的枭雄们来说，已经是求之不得的了。看来事态正在向有利于项羽的方向发展，似乎已经没有什么能够阻止他成为天下最有权势的人了。不过下一步，秦末英雄传的另一个主角，也是在下一部分戏份最重的角色——刘邦，即将粉墨登场了。这并不是说，刘邦在这个时候才登上历史舞台，只是他之前的戏份还不能算是主角。正在河北平原打得天昏地暗的项羽，很快就会发现，他的这些努力很有可能为刘邦作了嫁衣裳。

第十六章 刘邦领兵西征并攻入咸阳城

第一节 刘邦向北进攻秦军据守的城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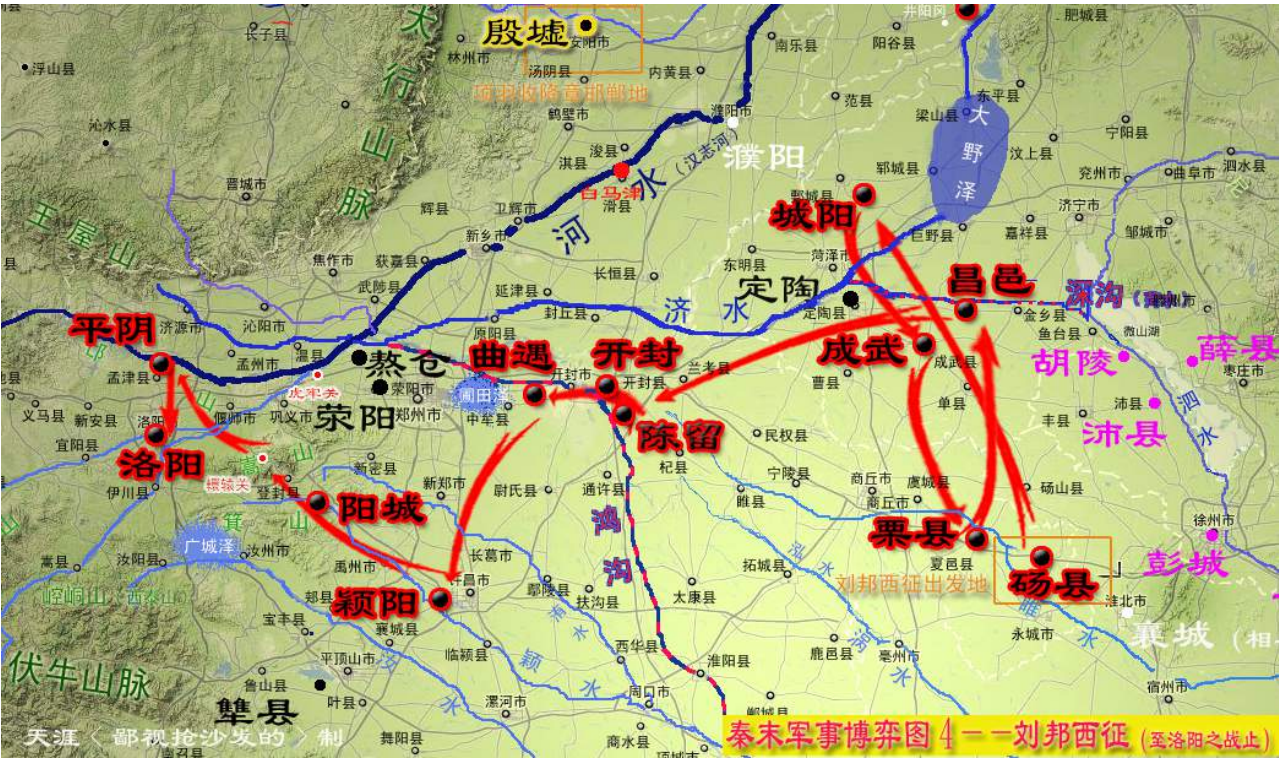
当年楚怀王被囚秦国，客死他乡之时，曾经留下过一句非常著名的遗言“楚虽三户，亡秦必楚”。这和日后唐朝预言武则天当政的“唐中弱，有女武代王”；以及清朝预言慈禧“亡清”的“叶赫那拉氏的诅咒”一起，算得上是古典时期三大最著名的谶语了。类似这种预言，古典时期其实有很多的。真真假假的，多是有政治目的。相比后面两条，我更相信楚怀王那句悲愤之言在历史中真实地出现过。其表面意思也不难理解，就像民间之人结仇，也常有人会说出自家就算剩下最后一人，也要报仇之类的话。只是后来的人们更愿意相信这是一句谶语，于是乎便寻找各种线索去附会这条“预言”。

其中有一种说法，便是应在了项羽与章邯的这场博弈中。项羽率领的楚军主力借章邯求和之机北渡漳水，向秦军发起总攻的这个渡口，就叫做“三户津”。如果一定要认为这个世界上有预言存在，我倒宁愿相信所谓“三户”之说，是落在了陈胜、项羽、刘邦三人身上。当然，如果楚怀王当时说的是四户、五户……的话，我们还可以在这个名单中加入吴广、项梁等人。反正就像当初写推背图的人一样，留下的信息越简单，给后来这些大神们发挥的空间就越大。预言这事，只是扯个题外话，也是向一些感兴趣的人表明对于风水、推背图一类概念的态度。真要说“三户”当中是谁直接终结了秦帝国，那功劳还是要记在刘邦身上的。我们在楚军主力北上之时说过，刘邦这个对王权没有直接威胁的将领，被安排的战略方向是向西，即向秦国控制区的纵深渗透。

基于楚军主力都已经随项羽北上救赵了，刘邦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利用王命在身的政治优势，收拢被秦军打散的张楚（陈胜）、东楚（项梁）义军，以壮大自己的力量。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刘邦并没有贸然西进，而是向北进发，在当初自己和项羽反复攻击过的区域中收拢散兵。当刘邦和他逐渐壮大的队伍北进至河济平原时，他已经有了足够的力量向秦军发起攻击了。而最先成为攻击目标的，就是那个曾经被项、刘二人攻破的“城阳”了。战役的结果很让刘邦满意，城阳和紧挨着它的“杠里”两地的秦军，都被刘邦所攻破。在这场遍及东部的暴乱之中，像城阳这种被双方反复拉锯的现象，是很普遍的。

对于大多数揭竿而起的义军来说，他们只是出于地缘关系而很自然的选择离自己最近的城邑，作为攻击对象。就像在沛县起兵的刘邦，最初也把旁边的“丰邑”（今丰县）作为自己扬名立腕的第一站，而反复攻击一样。鉴于沛、丰两地是系出楚系的刘邦龙兴之地，这块在地缘上属于几大板块交接的区域，两千年来在定位自己地

缘文化归属时，都更愿意强调自己的“南方”血统。这种潜意识里的文化归属感，也直接影响了二地的行政归属。以至于最后的明王朝，在以帝都南京为服务对象选择直属区时（所谓“直隶”），把直隶省（清朝的江南省，后分割为安徽、江苏两省）的北境划到了丰、沛两县。以至于在表面印象是江南文化代言人的江苏省，仍然让很多人不解的拥有沛、丰——徐州一带的“北方”地区。



秦末军事博弈图（四）——刘邦西征

如果把视线投向两千多年前去看看刘、项二人的崛起史，这种行政区划方案也就不能说是没有地缘依据了。尽管刘邦系出楚地，受的是楚怀王的王命，但鉴于楚地势力的领导地位，刘邦并没有把扩张势力范围的区域限定在楚地。在河济平原初试牛刀之后，刘邦和他的军队又南渡济水，在定陶之南的“成武”（今山东成武县）击败了秦军。实际上，现在整个关东的局势都处在胶着状态。在秦军主力北上之后，据守在那些中心城邑的秦军一般并不会主动去招惹那些“义军”。只不过，对急于做大的刘邦而言，仅仅待在一个安全的地方，举起招抚义军的大旗是没有用的。攻击这些“熟悉”的秦军（当项梁还在时，刘邦和项羽就已经在这一带扬名立腕了），一方面可以让刘邦得到急需的战略物资，另一方面也可以树立其义军主力的地位。

这不仅有利于将楚系义军收为己用，也可以影响到系出魏、齐两地的义军，让他们愿意和自己协同作战。在攻击成武得手之后，深沟边上的昌邑，以及睢水边上的栗县也都相继成为刘邦的攻击目标。从战术结果来看，刘邦所发动的这些攻击行动也并不总是能够得手，像昌邑之战就没有成功（有一次和二次攻击之说）。不过

这并不重要，因为对于刘邦来说，这些军事行动只是他扩充实力的手段，他真正的目的并不是在东线打出一块属于自己的根据地。因为楚怀王给他的战略方向是向西攻击前进，扩大楚国的势力（目前的移动轨迹是南北向拉锯）。这项战略任务最大的诱惑之处并不在于能为楚国得到多少土地，而在于一个“花红”，即楚怀王在分派项羽、刘邦出征之前，所许下的“先入关中者为王”的承诺。

这个承诺，当然不是说楚怀王要把自己的王位让出去，而是说将秦人的老家封建给直接灭亡秦帝国的人。这种有机会成为一方诸侯的诱惑是非常大的，特别是关中之地在秦人数百年的经营下，已经成为中央之国最富庶的地缘板块的背景下。为了得到关中称王的机会，无论是在河北鏖战的项羽，还是在东线扩张实力的刘邦，最终都会主动选择西进，无惧和秦人正面 PK 的。而没有明确战术任务的刘邦，很快就率先开始了他的西征。

第二节 刘邦西征中攻下陈留邑

刘邦向西攻击的第一站，仍然是一个他曾经战斗过的地方——陈留。这个位于大梁城东南方向，鸿沟东侧的城邑，当初也是刘、项二人为楚军先锋时所共同攻击过的最后一个城邑。如果不是因为项梁在定陶之战的失败，也许两个人当初已经攻击得手了。现在，需要刘邦自己来完成这个任务了。和当初由项羽主导的那种天马行空般的军事行动有所不同的是，刘邦这次回来，战略的方向性要明显得多。陈留再次受到刘邦的青睐，不仅是因为它处在西征的路线上，更重要的是位于鸿沟这条南北交通线上的重要位置，使得陈留储备了大量的物资。夺取这些物资，对于刘邦日后的军事行动来说，有很大的帮助。要知道，在乱世之中，你永远不缺愿意跟随你打天下的机会主义者，只要你有足够的资源。

单从军事能力来比较，刘邦和项羽显然不在一个层级上。后者的作战能力，在整个古典时期也是首屈一指的。不过战争永远不是只看军事层面的东西，卓越的政治能力则能够弥补军事上的不足。这也就是设立了“政委”这个重要职务，并特别擅长运用政治工作的红色政权，能够仅仅用了三年时间便得到天下的根本原因。所谓政治能力，很大程度是体现在对“人”和“势”的判断上。作为一名优秀的政治家，你并不需要什么都会，但你必须能够判断得出，哪些人和哪些建议能够为你带来所需要的结果。反过来，那些优秀的人才也会因为你有这样的判断力，而愿意为你所用。概括地说就是，如果你想成为一个参谋、幕僚的话，“善谋”是你应有的素质；而如果你的志向是做一名领袖级人物的话，那么“善断”的性格就是必需的了。

就刘邦和项羽二人的性格而言，刘邦在政治上要成熟得多。这也在军事行动上帮助了他，弥补了他本身军事能力的不足。比如攻击陈留的计划，就是由熟悉陈留情况的本地人“酈食其”制定的。这个以“高阳酒徒”之名留名于中国文化史的老头，

在后来楚汉相争的历史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相比于项羽快意恩仇式的“屠城”之举，刘邦这种善于收拢土著之心的能力，让他的攻击阻力要小得多。希望从历史中得到商业经验的研究者们，会认为刘邦的胜利在于团队的胜利；而项羽更多的是在孤军奋战。只是造成这种差别的原因，其实还是在于他们个人的性格差异。要知道，从团队和基础的角度看，项羽现在比刘邦的优势可不是强得一点半点。

攻击陈留得手只是刘邦西征的第一步，接下来，陈留西北部的“开封”（今开封县），鸿沟西侧的“曲遇”（中牟县东北），相继成为刘邦的攻击目标。根据历史记载，刘邦的这次连续攻击行动中，还攻击了一个叫做“白马”的地方。不过这个在历史上曾经多次爆发重要战争的渡口，当时位置是在黄河的南岸（今河南滑县北）。已经得知项羽获得巨鹿之战胜利，并击败章邯军的刘邦，并没有理由再次北进河济平原，甚至攻击北渡黄河的渡口。除非他想跑去和项羽会合，去继续当他老二的身份。事实上这个时候的刘邦，已经完全把自己置于项羽竞争者的位置上了。能够入主关中为王的诱惑，并不是每一个草根都有机会得到的。

其实刘邦还是很应该感谢项羽的，如果不是项羽在河北大破秦军主力，刘邦这段时间的手风也不会那么顺。对于那些据守城邑的秦人来说，在获知自己主力尽失的情况下，还能有多少战斗力就可想而知了。相信这个时候留在关东的秦人，想得更多的是如何退回到自己的根基之地去。至于那些系出本地的官吏，大多数在第一时间就已经站队到反叛者一边去了。

第三节 刘邦帮助韩国复国和进入洛阳盆地

鸿沟作为切割中原的地缘分割线，在先秦乃至楚汉相争的历史中，都发挥着重要的地缘作用。能够跨越它，并在曲遇大胜秦军，也意味着刘邦的西征取得了重大进展。如果按照正常的路线选择，下一步刘邦和他的军队应该沿鸿沟向西北方向攻击前进，并通过荥阳、成皋（虎牢）进入洛阳盆地，继而沿崤函通道攻入关中。这条路线，也是当年诸侯们合纵攻秦的主要通道。当日张楚军攻入关中，也是走的这条路线。

问题是，当日张楚军能够很快攻入关中，是因为事出突然，秦帝国根本来不及反应（注意力都在对外扩张和那些大工程上了）。以至于洛阳盆地、函谷关很快失于敌手，直至叛军攻到了骊山以北，才组织好反击力量。而现在，刘邦要想再次走同样的路线入关，就要困难得多了。从秦人的角度看，如果他们已经清楚无法扭转在东部的战局，洛阳盆地很自然的就会成为帝国抵御重生诸侯们的前沿阵地。因此在曲遇之战战败的秦军主将杨熊退守到荥阳之后，很快就被军法处置，以稳定住秦军的军心和防线。而已经把自己定位为防御方的秦军，在可以依托山势的情况下，将会给意图西进的刘邦（也包括其他义军）制造更大的麻烦。

换言之就是，要是刘邦还想走常规路线攻击洛阳盆地的话，将有可能遇到前所未有的麻烦。更为重要的是，如果这个时候的项羽能够彻底打败章邯的话（当时章邯还未降），那么项羽和他的楚军主力很快就可以挥师南下，然后由当年周武王渡河攻商的“孟津”反向渡过黄河，攻入洛阳盆地，并直指关中。而这个时候的刘邦，可能还在荥阳、成皋一线和秦军苦战呢。

现在对于刘邦来说，重点已经不在于能够攻下多少城邑，也不在于能够收编多少军队了。楚军在巨鹿之战的胜利，让他和其他义军看到了战略反攻的机会已经到来了。刘邦需要的是和时间赛跑，以率先攻入关中，去成就他关中王的梦想。既然沿黄河南岸西进的难度有点大，那么刘邦就需要有新的军事计划，以帮助他继续西进了。而这次帮助刘邦作出决定的，是一个“韩国”人，他就是张良。张良在汉帝国建立中的作用，以及在古代谋臣中的地位，相信不用我多说了。尽管他的成就是在两个“楚人”的博弈中获得的，但他本身却并不是楚人，而是韩国人。不过在这个动乱的年代，绝大部分的机会主义者，一开始还是以自己的属地来划定自己所隶属的集团的。张良也不例外，身为韩人的他，之所以去投奔楚人，是希望借助“楚”这个带头大哥复兴韩国。

在陈胜做带头大哥的时候，韩国是唯一没有复国的战国诸侯。这显然跟韩国弱小的地位，以及逼仄的地缘位置有关。无论是韩国的遗老遗少们，还是那些希望借尸还魂的枭雄们，都对在这个注定要成为博弈焦点的板块称王有所顾虑。当然，任何一个国家都会有狂热的爱国主义者，张良无疑就是这样一个人。在他的极力劝说下，韩国终于在楚国的认可下，名义上得到了复立。作出这项决定的是当时主政楚军的项梁。从项梁的角度来看，他当时的战略方向是在东线打出一片天地。如果韩国人愿意在西线牵制秦军，并不是一件坏事。更何况之前的张楚政权已经系出了魏、赵、燕三个诸侯，天然的成为王中之王，如果东楚系想接过这杆大旗的话，有自己扶植的盟友也是很有必要的。

不过楚人所能够给予韩国的，也只能是个名分了。真正想复国的话，还是要靠韩国人自己努力。问题又回到了最初的顾虑之上，以韩国的体量和位置，想复国实在是有些难度。在秦人还想收复东部之时，他们是绝不会容许韩国人从中切断自己战线的。相比之下，楚、齐这些边缘之地就要占便宜得多了，即使是在秦军攻势最猛的时候，他们的大部分国土都能因为不是战略重点，而保持独立状态。正是因为这些原因，张良和他的“王”在韩地的复国运动进展得并不顺利。即使偶尔能够攻下几座城邑，也很快会被秦人夺回去。

正当张良在韩地打不开局面时，西征的刘邦为他带来了新的希望。从刘邦的角度来看，能够得到张良这个土著的帮助，对他在韩地的作战也是十分有利的。在张良的帮助下，刘邦转而南下，攻陷了颍川郡的重镇“颍阳”。能够得到这个颍水边上的城邑，对复兴韩国也许有些很大帮助，但对于刘邦入主关中的战略目标来说，

却并不十分重要。所以与其说是张良在帮刘邦，不如说是刘邦在帮韩国人复国。当然，刘邦也不是一无所获，为了应对共同的敌人——秦人，这种合作是十分必要的，也是互利的。而刘邦所得到的，就是一条攻入洛阳的新路线。

在评书当中，每当攻击方的攻势无法突破对方依地形而设立的防线时，总是会有熟悉当地情况的向导，引导攻方走一条小路出奇制胜。而在真实的历史中，这种情况也的确经常发生。毕竟在古典时期的技术条件下，维护道路的成本很高。如果一条道路长时间不使用的话，很容易被水患之类的自然灾害所破坏，特别是穿行在山谷之中的道路还会被树木所覆盖。另外从行政管理者的角度来看，他们也并不愿意开放过多的道路，以增加管理成本。



秦末军事博弈图（四）——刘邦西征

连接洛阳盆地与中原的道路，几千年来都是以黄河南侧的通道为主。虎牢关、汜水关、成皋、荥阳这些在历史中经常出现的地缘标签，都是为了据守这条官道而设立的。不过这并不代表就没有其他道路可以进入洛阳盆地了。如果刘邦和他的韩国盟友们顺着颍水向上游地区进发，他们很快就可以到达嵩山的脚下。而在这片以少林寺闻名天下的山地当中，有一条叫做“轘辕古道”的小路能够穿越嵩山，进入洛阳盆地腹地。“轘辕古道”的得名，是因为它的关城设立在一个叫做“轘辕山”的山头之上。说起这座山，估计没几个人知道。不过它旁边的少室山和太室山两座山峰可就出名得多了，如果谁想在“僧人派”（少林派在广电总局审核下的别称）和“嵩山派”之外，也在嵩山开宗立派的话，倒是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山头。

从古道的历史来看，其实已经很久了，相传是大禹开辟的。结合我们之前所分析的龙门与大禹治水一节，这种可能性倒是存在的。在秦帝国时期，轘辕古道并没有被纳入“驰道”（秦朝的官道）的规划中，也没有在道路上设立关城（设关始于东汉）。这也很好理解，如果有更好的道址选择，是没有必要翻山越岭的。对于远道而来的刘邦来说，他即使是听说过这条古道的存在，也一定不知道怎么走。而对于张良他们这些韩国人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如果你只是一个路人，想走这种位于深山之中久未维护的道路，是十分艰难和危险的。但对于一支上万人的军队来说，简单修复道路，使之达到通行条件，就不是什么难事了。有了韩国人的帮助，刘邦很快溯颍水而上，通过轘辕古道进入洛阳盆地。

第四节 刘邦阻止司马卬进入洛阳盆地

按照正常的情况，刘邦必须攻下洛阳盆地的核心——洛阳（当年的周都“洛邑”），才能够打通进入崤函通道的缺口。对于当年视洛阳盆地为自己国土（王室算是受保护的国中之国）的韩国人来说，能够借助刘邦的帮助而得到洛阳城，也是一件让人兴奋的事。不过时局总是瞬息万变的，当刘邦和张良准备联手攻取洛阳的时候，却得到了另一个消息。那就是有另一支军队也准备进入洛阳，并抢夺率先入主关中的荣誉。这个叫司马卬的将领在历史当中并不出名，但他的后世子孙中却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以至于我们今天分析历史时还不得不借助他当年留下的文字。这个人就是“司马迁”。

司马迁的这个高祖父“司马卬”并不是楚人，而是赵人。司马迁在记录这段历史时，只是说他的高祖也想从河内南渡黄河，入主关中。这似乎给人一种印象，即身为赵将的司马卬是和刘邦平级的竞争者。但实际上，司马卬所执行的是项羽交给的任务。因为当时的项羽已经通过巨鹿之战的胜利，取得了诸侯联盟的军事指挥权。如果不是因为还要对付章邯，在得知刘邦已经向西渗透到洛阳盆地时，他一定会亲率主力南下，以避免被刘邦抢了灭秦的功劳的。

司马卬对于项羽的忠诚，在后来也得到了回报。在项羽自封西楚霸王，并分封天下诸侯时，司马卬也因为平定河内有功，而裂河内之土立国，受封为“殷王”（以朝歌为都）。其实如果从法理上来说，楚怀王所许诺的“先入关中者为王”，目前应该只在楚人当中有法律效力。因此身为赵将的司马卬，也不会自说自话的去充当灭秦的急先锋。对于大部分义军来说，能够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谋得个裂土封侯的地位，就已是最高理想了。不过这个承诺对于刘邦来说，意义就不一样了。

一方面，楚军主力在河北的胜利，使得楚国成为天下之主的形势已经很明显了。所不清楚的，是楚系天下到底是以霸业还是王业的形式出现而已。就目前的情况看，那些六国诸侯很有可能还是会以独立的形式存在的。而作为草根出身的刘邦如果想

在这些六国故地称王，是没有地缘优势的。相比之下，那些有王室血统的遗老遗少们，机会要大得多。在这种情况下，在秦人的土地上谋得一个诸侯的地位，所遇到的政治阻力反倒是最小的了。特别是在楚怀王很有机会成为天下共主的情况下。

不管司马卬究竟是自己想入主关中，还是在替项羽作先锋，刘邦都不愿意看到有其他人来和他争夺这个机会。因此进入洛阳盆地的刘邦并没有急于攻击洛阳，而是先绕过洛阳，移动到了黄河的南岸，攻取了控制黄河渡口的“平阴”（今河南孟津县东北）。攻取平阴，只是刘邦西征其中的一个插曲。在通过控制渡口阻止了司马卬南下的路线之后，刘邦终于重新把他的攻击目标对准了洛阳。

只是要想攻破洛阳这个形胜天下的战略要点，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尤其是秦人已经决心固守崤函通道，转入战略防御阶段之时。依照战国时期的经验，在围攻像洛阳这样的一级城邑时，拉锯个两三年也是很正常的事。而对于在和时间赛跑的刘邦来说，他并没有耐心和实力在洛阳耗下去。因此在攻取洛阳的战役没有结果的情况下，刘邦选择了按原路退出洛阳盆地，以重新制定他的作战计划。

在韩地的军事行动，实际上是由刘邦和张良所组织的韩地义军所共同完成的。不过当刘邦准备南下时，韩国人就不能够继续和他联合作战了。这次因为有了刘邦的帮助，双方也攻取了不少城邑，算得上是有了复国的基础了。从刘邦的角度来看，韩国人和他们的“王”留在韩地牵制秦军，也不是件坏事。对于他来说，只要能够把张良这个人才带走就可以了。

这个时候的张良，仍然是以复兴韩国作为自己的理想。但深谋远虑的他也十分清楚，以韩国的地缘位置是很难有机会生存的。即使勉强立国，也很有可能在秦人与关东诸侯的拉锯中，陷入与战国时期一样的尴尬境地。而要想打破这种夹心饼干的局面，唯一的机会就在于帮助楚人攻取关中，以在和平的环境中为他的祖国谋得一席之地。当然，这种最为理想的结局是在秦亡之后，天下就能够进入和平状态。如果那些新贵们不满足于现状，决心再火并一场的话，韩国这个可有可无的国家，很有可能又成为牺牲品了（后来的事实也的确如此，项羽根本就不认为韩国有存在的必要）。

第五节 刘邦攻取南阳盆地城邑

刘邦南取“南阳”的信心，还在于当初张楚新立时，也曾经分兵攻取过南阳。而当地的军民也很快响应了反秦的号召。如果不是因为由函谷关攻入关中的张楚主力很快被章邯所败，这一路义军也很有可能能够攻克武关，与前者会师关中（得知章邯反击得手的消息，归顺张楚的南阳郡就复归秦人了）。现在借助项羽在河北大败秦军主力之势，南阳那些“识时务”的官民们，还是很有可能又一次改变风向的。

离开韩地之后的刘邦，首先在方城夏道之北的“犍”县东侧（平顶山市西南）

遇到了秦军的阻击，阻击他的是驻守南阳的秦军。其实如果不是帝国的南阳郡守守土有责，必须出战的话，急于攻入关中的刘邦并不想在路上攻城拔寨，耽误时间的。要知道，现在的项羽已经随时可能解决掉章邯了。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心态，在犍东击败了秦军，并迫使秦军退入南阳的政治中心“宛”县（今南阳市）之后，刘邦并没有步步为营地去攻击宛县，而是绕过了这个中心城邑，试图快速逼近武关。



秦末军事博弈图（五）

如果可以绕过洛阳而进入崤函通道的话，也许刘邦早就这样做了。特别是在洛阳战事不利的情况下，刘邦更加认为把时间和精力放在攻城之上，并不符合自己的战略意图。问题是，这种绕过战略据点而快速前进的方式，战术上其实是非常危险的。如果不是小股奇兵去实施斩首、烧粮一类的战略任务，是不会采用的。而大部队运动是很难隐藏自己行踪的，特别是在武关道上还有众多的秦军据点呈线性排列的情况下。你并无法在绕过宛城之后，就畅通无阻的到达咸都城下。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就是你在前方受阻的时候，又被后方放过的敌军抄了后路，尤其是像宛城这样被秦人多年苦心经营的中心城邑（物资和人力都比较充足）。因此在刘邦已经绕过了宛城，

准备直取武关道时，张良劝停了刘邦的这个冒进的军事方案，而是转回头来围攻宛城。

事实上现在驻守宛城的秦军也非常纠结。秦军主力在河北战事不利的消息，已经让他们开始思考自己的退路了。以宛城的储备来说，固然可以和刘邦相持很长一段时间，但就算能够打败刘邦，又能怎么样呢。以目前的形势，帝国在东线已经不可能再有所作为了。如果帝国决心退守到高地之上和关东诸侯进行长期对抗的话，那么并不属于帝国核心区的南阳盆地很有可能被放弃的。即使不被第一时间放弃，也会遭受到一波又一波的攻击。

正是在这种对前途已经失去信心的背景下，驻守南阳郡的秦军向刘邦投降了。也可以说是主动加入到“抗秦事业”当中，这其中当然少不了善于分析“时务”的中间人为双方穿针引线。宛城的“和平解放”，让刘邦更加相信，在博弈当中政治手段往往比单纯的军事手段要有用得多。基于宛城在南阳郡的中心地位，这座城的投降对于南阳境内其他守军的影响可想而知了。因此在接下来平定南阳的过程中，南阳境内的各个城邑，如南面的胡阳、丹水、郦邑（内乡县）、析邑（西峡县），大多随着刘邦兵锋所至，而开城投降了。即使偶尔有抵抗的现象存在，也被滚动发展壮大的刘邦军所快速解决了。

当收取了南阳郡最西端的城邑“析邑”后，也意味着刘邦和他的军队马上要进入穿越秦岭的“武关道”了。而这个时候刘邦的军队已经壮大了不少。基于下一步的战事需要，也因为不想有后顾之忧。刘邦在平定南阳之时，基本都是让已经“起义”的帝国官吏留守原地，而把驻军带走。这点和后来项羽的做法截然相反，后者对于自己控制民心的信心，显然要远低于控制几个关键人物。

刘邦这种安抚民心，以为己用的方法，历史上凡是成熟的政治家都会用的。最基本的方式就是要让被征服的民众，能够感受到生活压力会变小（最起码不能变坏）。有秦人强大的国家机器压迫在前，要想做到这点其实是很容易的。可惜的是，在这点上，拥有更多资源的且贵族出身的项羽没有草根出身的刘邦理解得透。出身肯定不是影响性格的唯一因素，但也不能说毫无影响。

第六节 刘邦沿武关道攻入咸阳城

为了确保关中的东南安全，秦人一共在武关道上设立了两个重要关隘，一个是东侧的“武关”，另一个则是西端的“虢关”（商洛市西北）。当刘邦准备他的下一步军事计划时，整个中央之国的政治格局已经开始发生质的变化了。一方面，章邯终于以打促谈地和项羽达成了和解，并在“殷墟”（河南安阳）会盟；另一方面，在获得章邯投降的消息后，咸阳城里的政治家们也已经感到大势已去了。在这种时候，那些王室以外的成员总是会认为自己有更多的选择余地，毕竟他们也只是打工者。这也就是三国故事中，鲁肃劝孙权抗曹时说“众人皆可降曹操，惟将军不可降曹操”

的原因所在。

刚刚更换老板的章邯，只是一例罢了。下一个有这种投机想法的，就是帝国的实际控制者赵高了。如果让赵高来选择的话，他宁愿自己的谈判对象是更“人性”化的刘邦。为了手上有更多的筹码，他甚至谋杀了他亲手扶植的秦二世，另立了一个他认为更加容易控制的王子“子婴”（秦三世）上位。其实换不换已经意义不大了，这些傀儡性质的帝王们，在没有利用价值后都免不了被牺牲的下场。

相比于收服南阳的民心，刘邦目前对于秦人是否能够真心归顺，还是心存疑虑的。毕竟前者的地缘基础，有浓厚的楚文化沉淀。刘邦很容易和南阳的军民找到共同的国家认同，以使得双方归于同一体系。至于武关以西（包括武关）的秦地，刘邦就没有这么大的自信了。因此在赵高派密使前来谈判，并希望共同瓜分秦地时，刘邦并没有相信。另一方面，对于武关的守将愿意献关投降的诚意，也同样没有接受。按张良的说法就是“此独其将欲叛，恐其士卒不从”。同样的想法，之前项羽也曾经有过，这也让他在章邯第一次请降时没有接受。

从战术上看，刘邦和项羽都用了同样的方式来对付有投降意愿的敌人。那就是在对手斗志松懈，等待回音的时候发起突然袭击。所不同的是，项羽虽然取得了初胜，但却无法完全吃掉章邯的秦军主力；而刘邦则顺利地攻下了武关、虢关。攻下了武、虢二关，打通了武关道，和攻下函谷关，打通崤函通道的意义是一样的。无险可守的帝国核心区，只能凭借最后的力量来和反叛者决战了。这并不是关中之地第一次被对手攻入，但在战国那些诸侯合纵攻秦的战役中，秦人在关中总是有足够的人力、物资储备，来击溃那些合作并不紧密的对手们。即使是在三年前，张楚军攻入关中时，帝国也能够快速武装起数十万劳力将对手赶出关中。只是现在，帝国再也没有预备队来组织像样的抵抗了。

最后的决战，是在关中盆地的西南门户“蓝田”南面进行的。对于这个地点大家并不陌生，当年楚怀王在丹阳之战落败后，倾全国之力曾经攻击至此，但却没有能够再继续前进。从此之后，楚国也就全面转入战略防御阶段，并由此而衰弱。现在，刘邦和他的楚军有机会为他们的王和国家一雪前耻了。在蓝田之战失利后，咸阳并没有出现最后抵抗的情况，中央之国的第三位皇帝“子婴”（在位46天，初称皇帝，后改称秦王）便出城投降了。

这和后世的情况倒有所不同，一般情况下，在关中失守后，后来的帝国中央往往会南迁到四川盆地，依托地形获得喘息机会，以蓄势反攻（比如安史之乱时的唐帝国）。如果从心理上分析的话，就是这么辛苦建立起来的庞大帝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崩溃，让秦人失去了再战下去的勇气（不可能再做得比以前好了）。另一方面，失去了关中这块根本之地，秦人对于巴蜀这类边缘之地也没太大信心。更何况在遍地烽火的情况下，地缘条件更有利于独立的巴蜀之地，还能不能听从帝国的号令还是个未知数。

从蓝田到咸阳的这块地势略高的区域，历史上被称作“灞上”。之所以会有这个称呼，是因为一条叫做“灞水”的河流（渭水支流）。作为关中东南方向最后一道关卡的“虢关”，就是在古灞水的上游。而刘邦与秦军最后展开决战的地方，则是在灞水西侧的“蓝田”（现在的蓝田县城，在灞水东侧）。所谓灞上，指的就是灞水西侧的这片高地。攻入灞上，并最初受降咸阳的刘邦，实际上也成为帝国的终结者。在历史上，前一个朝代的直接终结者往往未必能够成为新王朝的建立者，就像为满洲做嫁衣裳的李自成一样。不过刘邦显然是个幸运者，历史选择他建立了汉帝国。

进入咸阳之后的刘邦，现在要面临两个重要问题：一是如何统治秦地；二是如何面对项羽。尽管刘邦在攻击武关时，就表现出对秦人的不信任。但现在已经成为关中之主的他，是无论如何也绕不开收取秦人民心的问题的。除非他想的不是做“秦王”，而是抢一把就回老家（项羽就是这样干的）。刘邦的具体做法在后世无数次被模仿，就是定了三条新规矩：一是杀人偿命，伤人、抢劫者依法治罪；二是除此之外的其余秦朝的法律全部废除；所有官吏、百姓的工作、生活状态不改变，这也就是所谓的“约法三章”。

在秦人严酷的管理面前，秦人和其他被征服者同样在承受着巨大压力。现在，有了刘邦这种无为而治的管理，关中的民心很快就倒向这位新的“秦王”了。毕竟，上层的政治争斗和底层百姓并没有直接关系。绝大部分人只是关心自己的生活，有没有因为政治变化而改变。如果能够变得更好，那么他们对于政权更迭呈肯定态度；反之，则会无限怀念旧国，并试图干扰新政权的建立。

约法三章的实施只是为刘邦解决了关中内部的矛盾，能否在关中称王，最大的变数还是在项羽身上。尽管当日的王命是“先入关中者为王”，但谁都知道，楚国的话语权是掌握在紧握枪杆的项羽手上的。如果项羽不同意，刘邦的位置也是坐不稳的。为了防止项羽跑到关中来“摘桃子”，刘邦首先想到的是派军固守函谷关，就像他当日守和平阴不让司马卬过河一样。问题是，你真的守得住吗？

第十七章 项羽入关中并分封十八诸侯

第一节 项羽坑杀秦军降卒与放过刘邦

正当刘邦攻入关中之时，项羽也已经收服了章邯，并挥师南下了。应该说，项羽对于刘邦抢先一步入主关中，是非常有意见的。因为大家都很清楚，如果没有项羽在河北打败了秦军主力，刘邦的西征之路是肯定没有这么顺利的。即使项羽对于入主关中称王没有什么兴趣，但也不愿意将灭秦的功劳让与他人。

单从实力来看，项羽这时可以说是达到了顶峰。不光楚军主力、诸侯联军统归自己所辖，章邯所率的二十万秦军主力，也同样成了项羽的部下。如果项羽想进入关中的话，总兵力不过数万的刘邦，是无论如何也挡不住的。所以说，刘邦寄希望于函谷关挡住项羽，其实是不可取的。即使凭借崤函之险能够挡住项羽，项羽也可先占河东，再渡河攻入关中。不过在项羽做这些事之前，他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解决，那就是如何处理章邯那二十万降军。

秦军和关东诸侯的军队成为同一战壕的战友，这不得不说是一件很奇怪的事。特别是在那些被秦人压迫已久的诸侯军看来，秦人和大家的关系是很难调和的。如果有机会，这些降军很可能出现反复。就项羽本人来看，其实也是这种想法。否则他也不会章邯第一次请降之后，反而加紧了进攻。对于这位战场之上的天才来说，从肉体上消灭敌人，远比花费政治手段来收拢人心要容易得多。诸侯们的担心也并非没有道理，作为客地作战的秦军，即使在主帅的军令之下投降了盟军，但建制并没有打乱，一旦回到自己所熟悉的地缘环境中，谁也不敢保证会发生什么。

对于如何解决成建制降军的问题，历史上有很多种解决方案。比如红色政权就很擅长做基层工作，以此来解决这个问题。不过这些东西对于项羽来说太复杂了，他选择了一个最“彻底”的解决方案，就是把这二十万秦军尽数坑杀。这的确是个非常彻底的解决方案，就像当初白起在长平所做的那样。只是两个人虽然都选择了坑杀降卒，但从战略战术的角度来看，却有不同的效果。从战术上看，白起坑杀赵卒，是为了从心理上给赵人以最大的震慑（所以才会放几百名童军回去报信），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效果。只不过后来，咸阳的政治家们觉得为了这场战争，秦国也已经快到油尽灯枯的地步，还是没有选择马上乘胜追击的方案；从战略上看，白起这次消灭了赵国四十万劳动力，也使赵国彻底伤了元气，不再有实力和秦国对抗了，这也为日后灭亡赵国打下了基础。

现在的问题是，白起这样做，有他的战略、战术意义，却并不代表项羽做同样的事情，也有同样的效果。因为在项羽坑杀秦卒之时，秦人所建立的帝国其实已经灭亡了。或者说，无论是秦国的政治家，还是底层百姓，都不会认为秦国还有机会

恢复到之前顶峰了。这种时候，作为天下最有权势的人，项羽今后无论是自己称王称帝，还是挟天子以令诸侯，要考虑的都是“坐天下”的事情了。一味的凭意气杀戮，只会让这个乱世持续得更长一些。

项羽的坑杀降卒和刘邦的“约法三章”，谁的作为更能让百姓接受，是不言而喻的。所以说项羽的败，并非败在军事上，而是政治上。不过就现在的情况来看，军力鼎盛的项羽还是有机会凭借实力扫平一切对手的。项羽坑杀秦卒的地方，位于洛阳盆地西北侧的“新安”（现在还是这个名字）。过了新安之后，就是当年蔺相如扬名的渑池了。再往前走，项羽和他的数十万大军必须经过北嵕道和函谷关，方能进入关中。我们之前也说了，已经视关中为自己封地的刘邦已派军在函谷关等着项羽了。

正如项羽的政治头脑和刘邦不在一个层级之上一样，刘邦的军事能力和项羽差的也不止一个身位。在项羽的攻击之下，函谷关很快便由“天堑变通途”了。在上一次张楚军从同样的路线攻入关中后，他们屯兵在骊山北、戏水东的地区，准备与秦军决战。这一次项羽的驻军也不例外地驻扎在这个区域，等待与咸阳城中的刘邦“会面”。作为统帅的项羽，所驻扎的地点，具体的地名叫做“鸿门”，因此他用以和刘邦“谈判”的那场宴会，也就被称之为“鸿门宴”了。鸿门宴的过程和结果，相信大家都已经很熟悉了。比较让人感兴趣的有两个问题，一是项羽为什么没有杀刘邦；二是如果刘邦死于鸿门宴，那么项羽会不会顺理成章地建立属于自己的“王朝”。

我们先来看看第一个问题。其实如果项羽的性格足够果断的话，即使刘邦在宴会中途逃回了自己的驻地，也一样可以凭借优势兵力将刘邦击溃。至于能不能杀掉刘邦，倒是不能确定。毕竟在战争当中，将帅逃走的机会还是比较大的，特别是你一开始就明白自己不可能取胜，而预先留好后路的情况下。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如果项羽愿意，刘邦是不可能在关中立足，并带领军队全身而退的。之所以没把事情做到位，还是在于项羽本人的性格。虽然我们前面说了，项羽对于治理国家、收拢民心，其实是没有什么想法的。但鉴于其个人能力超强，他对于能够慑服那些首领级人物，还是很有自信的。这从他把二十万秦卒尽数坑杀，却留下了章邯等秦军高级将领就可以看出。在项羽的军事思维里，只要你手上没有足够和我抗衡的军队，你个人并无法对我造成真正的威胁。

让我们再来看看第二个问题，刘邦如果死于鸿门宴，项羽是不是马上就能建立属于自己的王朝，并让天下进入到和平阶段呢？答案是否定的。我们从鸿门宴后项羽对于中央之国地缘格局的划分，就能够看出，无论有没有刘邦，天下都将再度陷入混乱之中。而项羽本人是没有机会笑到最后的。

其实项羽不杀刘邦，除了性格上不够果断以外，还因为没有足够的理由。政治家们常说的一句话，叫做“师出有名”。其所顾虑的，也就是任意打破规则（法律和道德上的）会有损自己的威信，这将会直接影响到自己的管理。刘邦攻入关中，于楚国和整个诸侯联盟来说是有功的，并且是接受了王命来做的。在项羽还没有想

好是否要自立为天下之主之时，项羽的犹豫是可以理解的。

当然，这个理解只是说在没有下定决心情况下，项羽有不杀刘邦的顾虑。但作为一个政治家来说，项羽在攻入关中之前，其实就应该想好未来的规划了。如果决心要成为天下之主的话，那么他所需要思考的就不是该不该杀刘邦，而是怎么找一个说得过去的罪名来安给刘邦了。至于这个理由是什么并不重要，总会有人想到的。实在不行，“莫须有”的罪名也不是不可以接受的。对于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来说，这都不是问题。

既然项羽下不了决心攻灭刘邦，那么他接下要面对的，就是如何安排这个曾经的“兄弟”了。其实问题远不止如何处置刘邦那么简单，不管项羽的政治才能如何，他都必须着手安排中央之国的政治格局了。当然，如果他愿意的话，这个伤脑筋的问题可以让楚怀王去想。只不过认定天下是自己打下来的项羽，是不可能让一个傀儡来对自己发号施令的。

第二节 项羽实行封建制并分割秦地

就国体来说，摆在项羽面前的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学习秦人的管理方式，延续郡县制，用中央集权的手段建立“帝国”；另一种则是按照周人的方式，把整个中央之国封建成一个个封国。如果说得再简单点，那就是到底是选择“帝国”还是“封建”？帝国还是封建，这的确是一个问题。秦人高度集权的帝国那么快的崩盘，似乎已经证明了这个体制是不成功的。也许对于中央之国来说，这个制度是大势所趋，正如我们在后来两千年的历史中所看到的那样。但在具体实施时，显然还是要做出诸多调整的。

只不过这些政治改革上的事情，对于我们的军事天才来说，实在是太过伤神了。对于项羽来说，他宁愿选择像周王朝那样，将国家分割成一个个自成体系的板块，以间接管理的方式来管理这个新的“王朝”。做到这点的前提，就是项羽自己所管理的那块区域必须是最大，最有地缘潜力的区域。事实上以当时的情况来看，“封建制”的实施也是政治上阻力最小的，甚至可以说没有阻力。毕竟如果自己有机会成为一方诸侯的话，没有谁会愿意去做一个随时可能被更换掉的帝国官吏。

即使项羽有雄心建立自己的“帝国”，并贸然实施的话，也一定会遇到强烈的反弹，并让中央之国马上陷入一场新的混乱之中。最好的办法，还是先稳住这些共同打天下的枭雄们，然后再运用政治、军事手段在体系内把他们慢慢消化掉，就像后来刘邦所建立的汉帝国那样。既然无论项羽是否有政治远见，现阶段的“裂土封侯”都是不可避免的了。那么怎么分割，就是一个技术活了。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恢复战国末期的格局，让那些诸侯故地的遗老遗少们，以心理认同为基础重组自己的国家。至于说秦人的土地，则可以由项羽自己来管理。

恢复战国后期的格局虽然比较简单，也符合当时的地缘背景（大家都还有这种国家认同感）。但最大的问题就是，这会不会让中央之国又陷入一场新的混乱之中呢？毕竟这些经过几百年优胜劣汰而胜出的诸侯国，各自的体量都已经很大了。如果你想做他们的“王”的话，被管理者的实力太强，并不是件好事。正因为有这种顾虑，项羽在封建诸侯时并没有完全恢复战国格局，而是把每一个战国诸侯的故土分割成了两个以上的封国（包括自己的封国在内，一共为十八国），以这种分而治之的手段来降低自己的管理难度。

首先被分割的是秦人在关中的核心区。如果项羽决定据秦地，以成王、霸之业的话，那么秦地就没有分割的必要了。占据了这块风水宝地，项羽对其他诸侯的威慑力就可以达到最大。问题是，项羽本人并不愿意留在关中，而是希望能够“衣锦还乡”。这句成语的出处，正是在有人建议项羽留驻关中时，项羽所说的那句名言：“富贵不还乡，如锦衣夜行”。不得不说，当这句话说出后，项羽悲剧的命运就已经注定了。如果项羽能够格局再大点，看清各板块的地缘特点的话，那么即使在后来他所分封的诸侯们，又开始火并甚至想取他而代之时，他也可以占据最有利的地形来保持战略优势。这一点，秦人已经用自己的历史证明过了。

说到“衣锦还乡”的心理，相信每个人都会有的。问题不在于你是否应该衣锦还乡，而在于你以什么样的形式回去。后来楚汉相争的胜利者刘邦，也同样有这样的心理诉求，因此才会有“大风起兮去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的名句留传于世。只是刘邦的这种心理需要，并不会影响到他对帝国地缘格局的设计，更不会固执的把自己的政治中心放在自己所熟悉的地缘板块中。既然项羽本人对秦地没有兴趣，那么他就没有理由来保证秦地的完整了。

因此按照分而治之的原则，秦地被分割成了三部分：咸阳以西的部分，被封建给了章邯（雍王），以奖励他为“和平”作出的贡献；而咸阳以东的部分，则被分封给了另一个归顺的秦人“司马欣”（塞王）。至于关中盆地以北的高地，则建立了“翟王”董翳的封国。如果你对这两个新出现的人物感兴趣，可以去查阅他们的资料，并弄清他们对项羽的贡献在哪。只是在我们的分析中，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项羽需要分割秦地，以让秦人互相牵制，不再成为威胁。在项羽决定回到楚地的前提下，这也是最好的方案了。唯一让人感到些许疑惑的是，项羽并没有以楚系或其他地区的人来管理秦地，而是完全信任了三个归降的秦人。

做出这种安排，只能说项羽从军事角度已经认定秦地不再有一枝独秀的潜力了。经过这几年的战争和最后一次性坑杀的二十万秦卒，秦地的有生力量被严重的削弱了。而进入咸阳的项羽，不仅把包括末代秦帝“子婴”在内的秦国王室斩尽杀绝，更对咸阳城进行了三光式的掠夺。其力度之大，足以让项羽自己相信，秦地和秦人已经不足为患了。在这种情况下，让三个已经对自己俯首帖耳的秦人来管理秦国故地，并没有多少风险。

更何况他们现在的地位是他们在秦国所不可能获得的，如果想维持这种地位的话，即使没有项羽的指令，他们也会对秦地那些有复兴帝国想法的人加以镇压。其实，要是经过长时间的博弈和休养生息的话，分割后的秦地应该还是会重新组合成一个整体，并恢复旧有的实力。其过程，很可能是当年秦国兴起的翻版。但就项羽的政治思维来看，并无法想到这么远。单纯通过分割来达到平衡，是最容易想到和做到的了。

“三秦”的分割，只是项羽重组中央之国计划中的一部分。那些秦地以外的土地，包括楚地，也同样按照分治的原则进行了分割。尽管在秦末和楚汉相争的阶段中，那些“诸侯”们都更像是打酱油的，但我们还是有必要花点时间来交待一下，项羽这位导演是如何来安排这些配角的。

第三节 项羽在六国故地分封诸侯王

除掉秦地被一分为三以外，其他诸侯国故地也在尊重地缘属性的情况下，进行了切割（像欧洲人那样，横平竖直的用数学方式划界，在中国是不会发生的）。比如巨鹿之战的被援助方——赵国，就被一分为二，北部为封建在高地之上的“代王”赵歇；南部为主控河北平原的“常山王”张耳。而赵国的北邻燕国，也按照同样的原则进行了分割。“辽东王”韩广，得到了燕山及辽东的土地；而燕王臧荼，则分得了燕国在河北平原的核心区。

在灭秦战争中就已经内斗不止的齐地，也和秦地一样被分成了三部分。只不过和其他诸侯之地略有不同的是，这三个齐地之王都和当年的齐国公室有血缘关系，相对算得上根正苗红吧。其中，齐国的核心区，以临淄为中心的区域被封建给了齐王田都；胶东半岛这块齐地的后花园，成为胶东王田市的领地；至于泰沂山脉腹地，以及东河济平原的齐地，则是济北王田安的国土。

从上述分封我们可以看出，出身并不是项羽在分配战利品时所要考虑的问题。对于这位军事家来说，在之前的战争中有多少功劳，才是决定你命运的根本因素。当然，这其中也不会没有一点政治考虑。在张楚时代自立的那些诸侯王，都没有想当然的能继承故国的国名，并得到所属地的核心区。像被挤压到边缘山地之中的原“赵王”赵歇（现在的代王）、原“燕王”韩广（现在的辽东王），都是这种情况。为了更好的控制这些新贵，项羽更愿意让那些业务精英得到更好的土地。这种政治上的设计，从表面来看也的确能达到平衡的效果。最起码那些被项羽所提拔，得以和原来的“王”们平起平坐的将领们，应该会更愿意效忠于项羽。

同样的原则，也发生在了魏地之上。被章邯所攻杀（战败自杀）的魏王“咎”的弟弟“豹”，虽然在魏国被灭之后，向楚军借兵，重新夺回了部分魏地，并自立为新的魏王。但在这次重新洗牌当中，也没能受封魏地在中原的核心区，而是更名

为“西魏王”，被分封到了魏国当年的根基之地“河东”。至于魏地的核心区归属了谁，我们后面就会说到。在魏地内部的几大板块中，河北平原南部的“河内”之地，是一个承上启下的枢纽板块，只不过这块重要的区域并没有被分配给魏人。为了表彰司马迁的那位高祖“司马卬”在平定河内战争中所表现出来的忠诚，这位赵人得到了原先由魏国主控的“河内”之地。也就是说，虽然各人的地缘属性在封建当中会被考虑，但作为一个管理者来说的项羽，最优先考虑的是忠诚度和能力。



项羽分封十八诸侯示意图

最后再说说韩地的情况。尽管韩国在当年的战国七雄中，属于战略纵深最小，实力最弱的一员。但依照分而治之的原则，也同样需要被分割。那位因张良极力游说而成韩王的“成”，在项羽大封天下之时，勉强还是保住了“韩王”称号。不过他的领地也就仅限于中原西侧那片韩地核心区了。当年由韩国主控的洛阳盆地，被项羽封赏给了率军攻破洛阳的申阳。而这个因军功而受封的“河南王”，来自于河济平原的中部，也并不是韩地之人。

项羽对诸侯故地的重新洗牌，从战术上来看，是为了让他们互相牵制，以形成王朝内部的平衡。不过从战略上来看，这种裂土封“王”的做法，却为日后的分裂埋下了隐患。只要回头看看春秋战国的历史，就不难想见，即使目前这些灭秦功臣们能够和平共处，但当他们各自整合好自己的内部体系后，战争还是会不可避免的降临。而如果这种国体是合乎时宜的，那么中央之国两千年来，所周而复始的就不会是周期性的重建大一统帝国，而是不断的重现战国时代了。可以肯定的是，项羽不是历史学家，也不大愿意以史为鉴，想得那么长远。比较明确的是，就目前所打造的体系而言，如果要想保持稳定，作为控制者的项羽来说，就必须拥有最大的地缘纵深，以确保最强的实力。

理论上讲，在将其他诸侯故地分裂之后，项羽只要能够直接控制住楚地，就能够掌握主动权了。当然，如果那些被打乱的诸侯体系重新整合成为几个强势板块（特别是以秦地为核心的第二阶梯的那些地理单元）的话，楚地的战略优势就会不复存在了。问题是，项羽真的想不到那么远。或者说，最起码不认为这一天会这么快到来。他甚至不认为，西至武陵山区，东到大海的这片土地，需要被一个“王”所管辖。在项羽的概念里，江东和泗水流域所属的东楚地区，才是他的根基之地。既然他和他的家族能够以东楚为基地征服天下诸侯，那么同样也可以在衣锦还乡之后掌控天下局势。

正因为项羽对于东楚这块福地的迷恋，楚地中最为核心的大别山以西部分，被分封给了两个战功卓越的楚人：“临江王”共敖、“衡山王”吴芮。而江淮地区西部，以及赣江流域所属的南楚地区，当年被秦人划定为九江郡，现在则成为了九江王英布（黥布）的封地。一下子出现了这么多陌生的名字，估计很多人的脑袋已经晕了。其实如果你不是希望从中为自己血统寻找些高贵成分的话，倒也不必去搞清他们。结合那张所附的《项羽分封十八诸侯示意图》，搞清了项羽所做的规划是何道理，又有可能造成什么样的战略后果就行了。

第四节 项羽与刘邦控制的地缘板块

把秦地、齐地分成了三块，赵地、燕地、魏地、韩地各切割为了两块，最后还在楚地封建了三个王。项羽貌似已经完成了他的分治计划，接下来，我们需要来看看，项羽又为自己留下了哪些风水宝地。首先，作为泗水——邗沟——江东一线的东楚地区，作为项羽的根基之地，无疑是会留给自己的。只不过，项羽即使再顾家也清楚一个道理，如果只是偏居东南，是不可能成功管理整个中央之国的。这个道理，早在二百多年前，同样由江东起家的吴、越两国就已经清楚了。无论你想用什么样的形式成为中央之主，中原之地都是你必须掌握的地缘板块。

单从地理结构上来看，这一点也很好理解。只要能够占据天下之中的这块土地，

你就能够最大程度的接近其他诸侯的地理距离。这对于你即将面临的管理工作是非常重要的。这也就是“得中原者得天下”这句话的地缘背景。当然，如果你仅仅占据中原是远远不够的，这很容易让你陷入四面包围的境地。只有在此基础上再加上一块边缘地区，才有可能化被动为主动。至于边缘地区是哪块，技术上倒是有多种选择。只是项羽所选择的东楚+中原的模式，是历史上最不成功的模式罢了。在他之后，中央之国的博弈者之中也几乎没有以这种怪异的方式搭建成型的了。

正是因为春秋争霸，以及战国的火并，让大家都清楚了控制中原的重要性，项羽才没有仅仅满足于衣锦还乡。而这也是可怜的魏王只能在自己的封号前面加上一个“西”字，并回到他那并不熟悉的河东故土的原因所在。有一句话叫做“做对的事情，而不要把事情做对”。意思就是说，在最初进行方向性的选择时，就要做出正确的判断，而不是在错误的道路上去努力修正。当然，如果你一开始就选择了一条曲折的道路，并且无法回头的话，那么还是需要在既有的条件下把事情做好的。

从战略上看，项羽目前所选择的战略布局，就是一种错误的选择。假如他当初听了那个劝他留在关中的儒生的话（项羽甚至在劝谏者看出他不足以成大事，讽他“沐猴而冠”后，把对方给活煮了），然后再把这块强势的边缘之地和中原连成一片，纳为自己的直辖区，那么即使项羽选择的是一种倒退的国体，中央之国也能够迎来一段相对稳定的时期。这并非是项羽在地缘规划上所犯的唯一一个错误，而项羽日后所犯的一系列战略错误，也让他和他的项家天下如此之快的改姓刘了。

另一个显而易见的错误，就是在明知中原之地在中央之国的枢纽地位之时，仍然固执的把自己的都城设立在了泗上之地的彭城。如果项羽只是在管理东楚之地时，建都彭城应该是个正确的选择，最起码比回到江东要更有进取心。但现在项羽需要重点管理的是中原之地，甚至要借此管理整个中央之国时，把自己的政治中心放在这样一个偏东的板块，就显得短视了。也许在今后的日子中，项羽会逐渐修正掉他所犯的些错误。只是一件事情的成败，并非只取决于自己，更多的还要看你的对手在做什么。

很不幸的是，作为项羽最大的竞争对手——刘邦，他的决断能力要远胜于项羽。作为项羽曾经的兄弟，当下的对手，项羽并非没有对刘邦加以防备。事实上，项羽在分封天下诸侯时，就已经处心积虑的对抑制刘邦做出了布局。回头看看项羽和其他十六个诸侯，似乎已经把那些诸侯故地给瓜分完了。也就是说，那些先秦诸侯们苦心经营数百年的土地，都已经没有空间留给刘邦了。这显然是一种刻意的安排，如果说那些比项羽更早称王的诸侯们，由于他们的潜在威胁而被迫让出了国土中最为丰美的平原地区的话，那么像刘邦这样已经明确成为项羽最大威胁的对手，项羽就更是会让他有多远甩多远了。

让一些人困惑不解的是，刘邦在这次分配中，所获得的是秦岭以南的汉中盆地和四川盆地（都“南郑”，也就是现在的汉中市）。而在后来的历史中，这个拥有

天府之国——成都平原的板块，曾经无数次保存了中原政权的元气。秦人也正是因为得到了蜀地的农业补给，才最终得到天下的。问题是，以项羽所处的时间点看，还不能有足够的历史经验来告诉他蜀地的重要性。就像地处西北的秦人，不认为江东乃至整个东楚地区是什么重要的板块一样。在项羽的概念中，巴蜀这块基本没有和关东诸侯发生过直接交集的板块，还是一块游离于中央之国之外的化外之地。

这种局限性其实是一种时代的局限性，包括刘邦在内的其他诸侯也同样有这种观念。他们甚至不会认为，已经被秦人占据将近百年的汉中、四川两大盆地，应该归于“秦地”的概念中。因此把刘邦分封自此，绝对有放逐的性质。后来所发生的事情，让大家知道了项羽犯了一个多么大的错误。其实如果一定要把刘邦放逐到半生不熟的地区去，除掉巴蜀之地以外，河套、瓠越一类的板块，也是一种选择。前一个方案，其实是在借刀杀人，让刘邦在与匈奴人的PK中自生自灭；后者则可以让项羽自己来监督这个对头，并切断刘邦与其他诸侯的联系。这两个选择最大的好处，都是没有多少农业基础来补充刘邦的实力。

不过说这些，都是事后诸葛亮了。在项羽看来，有秦岭这道天险阻隔，刘邦是没有机会翻身的。更何况，如果把这个危险的对手封建到其他板块的话，难保他在转移过程中节外生枝，占据哪块核心板块以自立（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现在有项羽和他的数十万大军目送并监视，刘邦绝没有实力和空间玩出其他花样来。这其实也是项羽不杀刘邦的重要原因。假如没有为刘邦找到这样一个放逐的好去处，也许项羽反而能下定决心攻灭刘邦了。目送刘邦去了汉中，项羽终于可以衣锦还乡了。只是现在的项羽，还面临一个很大的政治问题，那就是如何处置楚怀王。

第五节 项羽尊楚怀王为义帝并放置郴地

如果说分封诸侯，设计刘邦，是为了削弱自己的对手，让中央之国的地缘格局重新呈现出一种平衡状态的话，那么对于楚怀王的处置，就关乎最高权力归属的法律问题了。虽然说项羽作为天下的实际控制者，已经没有任何人质疑了。但毕竟项羽和他的楚军是以匡复楚国的名义而起兵的，并且还有楚怀王这个名义上的国君存在。如果就这么轻易的把他放在一边，政治上的风险是很大的，你甚至无法肯定楚地之民会有何种反应。

这种困惑，在历朝历代试图上位的权臣那里都会有，处理的方式也不尽相同。眼光长远者如曹操，用整整一代人的时间来淡化掉前朝的记忆；性急者如王莽，在时机尚未成熟时便偷天换日，以至功败垂成。从项羽为中央之国所搭建的架构来看，他显然是以春秋时期的格局为范本。只不过在具体的诸侯封号上，既然已经通过战国进步到了“王”的地步，就没有理由再回头按“公侯伯子男”这样的层级来打发这些新贵了（虚名这种东西，上去容易下来难）。依照春秋的政治格局，这个世界

的实际控制者，是掌握在轮流坐庄的“霸主”手中的。至于谁做这个“霸主”，就要看谁的实力更强了。

项羽认可这种结构，并不代表他愿意霸主的位置有一天会旁落。因此项羽为自己取了个特别的封号——“西楚霸王”。这个封号中的“西楚”二字，曾经让很多人感到不解。因为项羽所留给自己的封地，明显是以东楚为核心（项羽的祖籍在“下相”，今天江苏宿迁，就在彭城东南）。而大别山以西的西楚核心区，则交给了他信得过的两个亲信去管理。之所以会有这种“名不符实”的结果出现，只能说项羽其实也很清楚，楚地是他霸主的基础。即使他不愿意远离家乡去控制西楚之地，那么也需要在名义上表明，自己才是这片土地的直接代言人。

“西楚”二字，表明了项羽以楚地为依托，控制中央之国政局的战略。而在封号中直接加入“霸”字，则是将霸主的名分彻底固定下来了。现在我们一提到“霸”字，总是会和霸气、武力等字眼联系在一起，特别是英勇无比的项羽曾经用过这个字。但实际上，在最初的时候，“霸”是“伯”的意思，也就是最大的。所谓“霸王”二字，通俗点说，也就是王中之王了。有了这样一个比其他诸侯高半级的封号，项羽号令诸侯也就显得名正言顺了。

其实，历史进化到战国后期，中央集权的政权组织方式就已经是历史的必然了。那种层层封建，裂土封侯的方式，不仅不利于自身结构的稳定，更不能让自己集中资源在和对手的PK中获胜。从这个意义看，在秦人已经建立大一统的“帝制”之后，项羽再回到春秋模式，用“霸”的形式邦联诸侯，应该是一种历史的倒退。问题在于，秦人之前过于集权的统治，刚刚被证明是失败的。除非你对历史的潮流把握得非常精准，否则这种倒退现象的出现也有一种必然性。就像在帝制已经明显不符合社会需求的20世纪初，一些对共和制信心不足而试图恢复帝制的那些人一样。而项羽，正是属于这种信心不足的人。

现在让我们回到之前的问题。既然项羽通过自立“霸王”，从法律上确立了自己对中央之国的实际管理权，那么作为他原来上司“楚怀王”怎么办？如果你觉得取而代之的时机还未成熟的话，就必须给他找个合适的位置放着。在周人所建立的体系中，中央之国的最高君主是周王，但现在大家都是“王”了，再让楚怀王也做“王”，显然就不合适了（我实在也想不出，比“霸王”更高的王了）。秦始皇把“三皇五帝”的称号始无前的地合二为一，为自己设立的“皇帝”称号，倒是一个现成的选择。不过这个称号，一定会让人不自觉的想到秦帝国所建立的恐怖管理体系，这和项羽目前所搭建的架构是不相符的。因此最终楚怀王得到了个“义帝”的称号。

“义帝”这个尊号，其实倒是挺符合楚怀王的定位（“义”其实是“假”的意思，如“义父”）。反正自始至终，项羽就没打算让这个名义君主拥有一点权力。不过既然有这个傀儡在，就不排除他的政治价值被其他人利用。当你希望在诸侯混战中抢得先机时，有机会挟天子以令诸侯的一方，总是能够拥有更多的政治资本。这种

政治资本绝非只是道义上的，而是实际的地缘影响力。就这位“义帝”来说，如果他与项羽决裂，那么楚地民心将会有很大一部分背离项羽。消除这位义帝的潜在威胁，最好的办法还是把他留在身边，并表面上给予应有的尊重，以完成民心转换的过渡期，就像后来曹操做的那样。不过以项羽的性格，并不愿意有这样一个名义上高过自己的领导留在身边，这会让他非常的不舒服。

因此和刘邦一样，义帝也被有多远甩多远地丢到了半生不熟的边缘之地。唯一有区别的是，刘邦是被分封到了整个中央之国的外围，而义帝则被放置到了楚地的边缘。这块留给天下共主的自留地，可没有当初周王室所苟延残喘的洛邑那么好的位置。在当时，它被称之为“郴”，而现在则叫做“郴州”。如果我们在地图上去寻找郴州的位置，会发现这个湖南城市位于湘江的上游，它的南面就是南岭了。也就是说，即使是在位置已经有些边缘的楚地，这也是最边缘的地方。我们无法具体描述当时的“郴”地有多么的荒凉，但可以知道的是，即使是在 1200 多年后，唐代大文人柳宗元在《捕蛇者说》中描述郴州的邻居“永州”时，这一地区依然是蛇虫遍地的半开发地区。

将义帝安排到这样一个荒凉之地，最重要的理由是，项羽并不放心让这位对自己威胁最大的领导有机会与其他诸侯接触。在自己不愿意亲自监控的情况下，让他置于自己亲信之侧，也许是最安全的（能在楚地封王的，都是项羽最信得过的）。只是无论如何，这并不是一个保险的方案。因为往往越是亲信之人，将来越有可能成为你最可怕的手。就像项羽目前最大的对手刘邦，也曾经是项羽最亲密的战友一样。如果项羽所安排监视义帝的位于西楚核心的临江、衡山二王，将来有了反意，那么义帝对他们的价值要远胜于其他诸侯（可以顺理成章的号召楚地民众）。

并没有花很长的时间（义帝四月去郴，八月被杀），项羽便想清了这个道理，而他所想到的解决办法，就是让当下还对自己忠心耿耿的几个楚地之王前去诛杀义帝。这样做，似乎将问题彻底解决了，但实际上却更削弱了项羽控制中央之国的合法性。要知道，一个名义上的君主并不一定在活着的时候才有利用价值。让那几位楚地的诸侯王去执行这个弑主的任务，固然可以让他们和自己捆绑在一起，并失去利用这个政治筹码反对自己的机会。但如果是其他的楚人，特别是刘邦借着这件事来质疑西楚的合法性，那么项羽又该如何面对呢？

第六节 项羽所分封的诸侯出现内乱

在前面我们一直在说，项羽的这种政治布局大体上是在学习周人的封建方法。只不过周人封建当中有个最基本的原则，就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这样方能保障政治结构的稳定。在今人看来，这应该是在任人唯亲，是一种不合理的管理方式。但在以血缘为识别标志的古典时期，这却是最基本的安全保障。从这点来看，项羽显

然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最起码在中央之国这样一个“家天下”的地域，他这种重军功而轻血缘的做法，会让天下很快陷入新的混乱之中。

谋杀“义帝”并不是混乱的开始。事实上在项羽分封完十八诸侯的同时，一场新的博弈和混乱就已经开始了。而被项羽安排到秦岭以南的刘邦，也并不是最早的麻烦制造者。最先打破这种平衡的，其实就是项羽本人。在他所分封的十八诸侯中，绝大部分都是随之在河北与秦军主力苦战过了。可以说，最起码在项羽心目中，这些人在他破釜沉舟，击败王离所率领的秦军主力时，就已经完全归服于他了（诸侯们甚至惊恐到用膝盖来行走，匍匐到他的面前）。在这些分封的诸侯中，刘邦肯定是个异类了。作为与项羽同出一门，又同时领受王命征讨秦人的兄弟，项羽有充分的理由置其于死地。而除掉刘邦之外，另外还有一个诸侯也并非出自项羽的“门下”，或者说无法取得项羽的信任，这个诸侯王就是韩王“成”。

韩王成的背景，我们在前面已经交待过了。从项羽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位唯一没有在自己指挥下和秦人战斗过的诸侯。相反，在韩地的复国运动中，他的死对头刘邦却起了不小的作用。也就是说，如果一定要划分阵营的话，韩国是唯一可以被归类为刘邦阵营的诸侯国。既然韩国人的忠诚无法保证，那么韩王成的下场也就可想而知了。事实上，这个在关东勉强得到封地的“韩王”，并没有机会真的回到自己的封地上去，而是被项羽软禁在身边。像韩国这样重要的位置，项羽是绝不会放心把它交给一个自己不信任的人的。从地缘格局来看，项羽也可以因此而控制整个中原之地。

如果参照春秋战国的博弈过程来看，把中央之国切割成十八块，显然还不能达到平衡的效果。从管理的角度来看，一个人所要直接控制的成员最好不要超过八个；而就诸侯博弈的情况来看，战国七雄的格局，让中央之国的地缘博弈进入到一个相对稳定期。这样看来，当日投错山门的韩王成被牺牲是在所难免的了。而韩国也并非是唯一一个，在一开始就退出政治博弈的诸侯国。我们前面分析过了，为了降低那些比自己更早自立为王者的影响力，项羽在分封时，将这些并非真正出于自己“门下”的诸侯，都赶到了各自板块的边缘。而那些受到超级提拔的将领，则得到了更靠近中原的土地。

不能说项羽的这种布局没有道理，毕竟让对自己忠诚度更高的人，得到更好的待遇是正常的管理方式。但对于那些被排挤的诸侯来说，就没有那么容易接受了。辽东王韩广（原来的燕王）就是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对于这位系出張楚的老“燕王”来说，让自己放弃燕地的核心区，去经营燕山以北的辽东是无法接受的。而在项羽的布局当中，越级提拔为新“燕王”的臧荼（曾经的燕将），就是为了防止这种“背叛”的。事情的结果是，有项羽作后盾，又占据了燕地核心区的新“燕王”，很快攻灭了故主。加上韩国，十八诸侯在一开始就已经少了两个。

燕地并不是唯一出乱子的板块。在大家唯陈胜马首是瞻的时候，除掉燕国，魏、

赵、齐三国也都已经复国了。也就是说，燕地并不是唯一存在政治风险的板块。在燕地开始内部洗牌的同时，赵地也同样发生了火并。主导这场叛乱的，就是之前在巨鹿之战中屯军于巨鹿城北的赵将陈余。在项羽所构筑的新体系中，陈余并没有如愿被封为王，这也成为赵地之乱的导火索。最终与燕地的结果正好相反，被项羽刻意扶植，占据赵地核心区的“常山王”张耳（之前赵国的丞相），被赶出了封地。而被项羽赶到代地的“代王”赵歇，则南下重新成为赵王。至于帮助旧主复国的陈余，终于如愿以偿得到了赵国在高地上的土地，成为了新“代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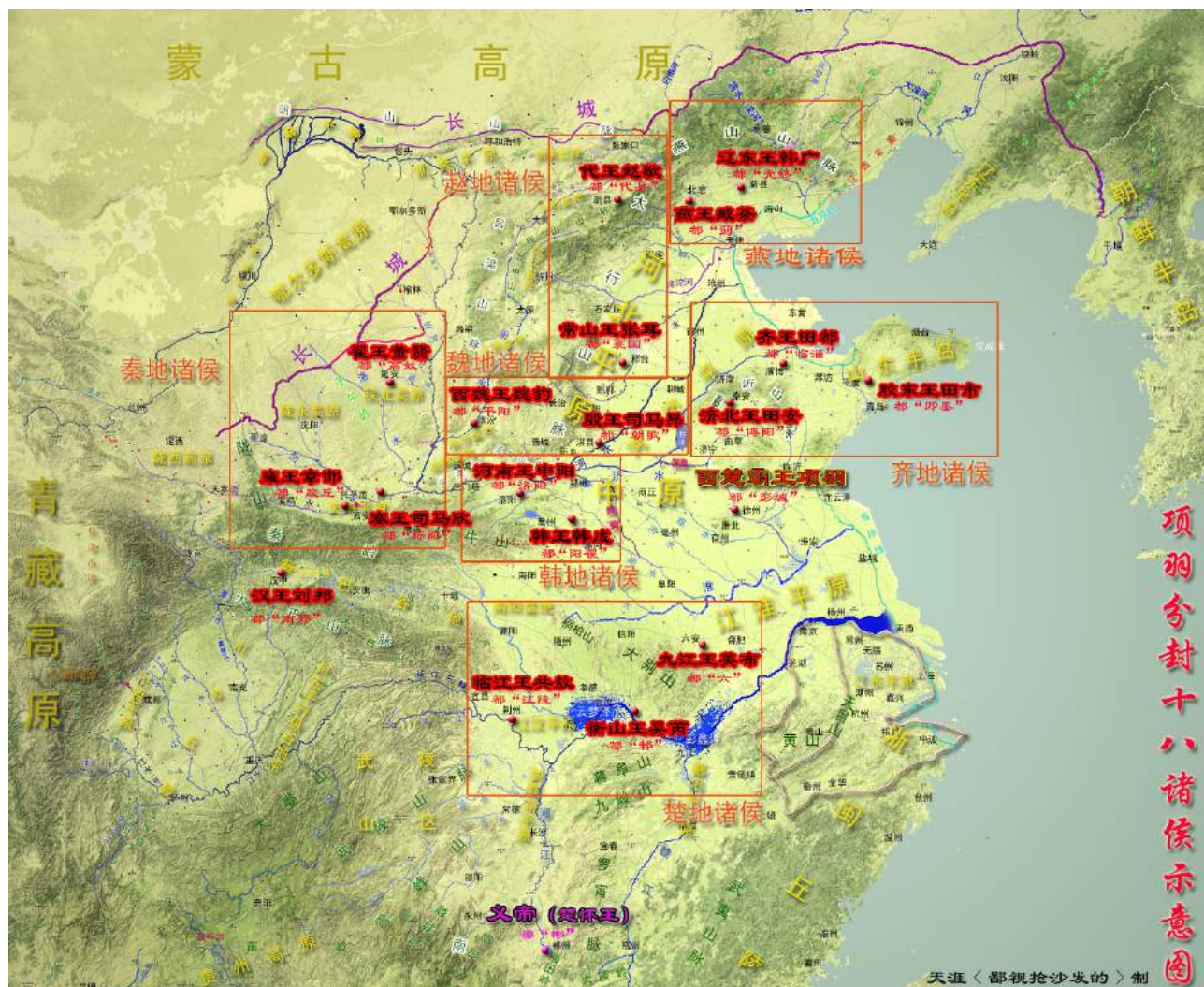
现在我们再来看下齐地。为了平衡这个板块，项羽在齐地封建了三个诸侯国。只不过在这次分封中，却并没有为张楚时代的“齐王”家族留下一席之地。我们知道，在章邯攻取魏地的时候，率先在齐地举义旗的齐王“田儋”已经在救魏的行动中战败身死。问题是，这个新的王族一共有三兄弟，田儋死后，他的弟弟田荣又接过了王旗。和齐国在战国时总是奉行孤立主义一样，田家这三兄弟所复建的“齐国”，也更愿意自力更生，不受制于人。三人当中在历史上最为知名的，当属老三田横了。这位最后的齐王，直到刘邦一统天下之后，仍然不愿归降，而是率领五百属下出海居于海岛（今田横岛），最终全部自杀殉国。

和其他张楚时期的诸侯在项羽分封天下时，都还能得到一块封地（虽然不太好）维持王的地位不同，田荣既没有得到临淄一带的核心区，也没有被封建到齐地的其他板块。也就是说，在齐地分封的齐、胶东、济北三王当中，最有资格得到一块封地的田荣，没有得到应有的地位。究其原因，还是因为项羽无法信任田荣。当日项梁在定陶之役兵败身死，有部分原因就是田荣没有出兵共击秦军（因项梁在齐地的内部火并中不愿意公开表明立场，支持田荣家族的正统地位）。这个理由，很容易让人想到私仇，但从项羽的角度来看，更多的是从管理难度来考虑的（章邯这个直接的仇人都能放过）。如果说刘邦之外，谁最有可能对项羽的霸权作出挑战，那就是田家兄弟了。

参考燕、赵二地的情况，即便是把田荣分封为济北、胶东王，相信齐地也一定会陷入混乱之中，更何况田荣还没有获得任何封地。为了确立自己在齐地的政治地位，田荣首先干掉了项羽所封的齐王田都，自立为新的齐王了（他甚至还支援了赵地的叛乱）。至此，除掉项羽根基所在的楚地以外，关东的燕、赵、齐、韩四地的政治格局，都已经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唯一例外的似乎只有魏地。这并非是说那位被迫在封号前面加了个“西”字的“西魏王”对这种分配没有意见。只是因为魏国在东部的核心区成了项羽的直属地，即便他有不服之心，也没有反对之力（魏国放弃河东之后，因都“大梁”，又被称之为梁国。所以归于项羽的魏地，也被称之为梁地）。当然，现在不发声，并不代表日后形势发生变化时没有异动。很快，我们的西魏王“魏豹”就有机会表达他的不满了。

花费这些篇幅在刘邦起兵之前交待这些打酱油的配角做了些什么，又是如何改

变政治结构的，是想告诉大家，即使没有刘邦，项羽先天不足的霸业也同样会马上陷入混乱之中。而刘邦的崛起，只是加速了项羽的灭亡。从表面上看，项羽已经成为天下的霸主，并对中央之国的政治版图作出了划分。但实际上，除掉坑杀掉秦地的二十万主力以外，其他诸侯、将领的军事实力并没有被重新分配过。也就是说，这个天下还是属于军阀混战的格局。大家今后能够取得什么样的地位，并不取决于项羽封给自己一个什么样的爵位，而在于自己在博弈过程中所积蓄的包括军事和政治在内的资本。



项羽分封十八诸侯示意图

第十八章 刘邦出汉中收服诸侯后东征

第一节 刘邦率军从陈仓道攻入关中

现在终于该我们的主角刘邦出场了。不管关东是否已经闹得像一锅粥，刘邦这边都必须马上定下自己的战略了。是偏安西南，把汉中、蜀、巴三郡经营成自己的王道乐土；还是寻机打回去，和项羽争个长短。如果选择前者的话，那么汉中就不是最适合建都的地方了。相比之下，成都平原会更适合成为政治中心。如果选择的是后者，那么刘邦就必须马上制定下一步的作战方案了。这一方面是因为，刘邦和他的部下绝大部分都是关东之人。在乡土观念极重的中央之国，被放置到这样一个远离家乡的边缘之地，无异于被流放。因此在刘邦翻越秦岭的过程中，他的军队里就已经出现了逃亡的现象。而反过来，如果刘邦准备反攻的话，这种强烈的思乡之情就可以转化为战斗力了。

另一方面，如果刘邦不能迅速返回博弈中心，而是希望把封地经营好了，再在未来有可能出现的新“战国”格局中胜出，是很困难的。对这一点感触最深的，当属后世的诸葛亮了。这位天才的战略家之所以在有生之年不断地北伐，就是因为知道，如果不能在他们这代人完成入主中原的梦想（最起码要占住关中）的话，那么随着时间的推移，蜀地本土的人才逐渐替换掉那些外来人才后，就很难再有足够的动力去参与中央之国的博弈了。这种情况，并非是在天府之国的蜀地才会有。在另一个适合偏安的板块——江东，这一幕也在历史上不断地上演着。

从战略的角度看，北伐关中是刘邦取胜的唯一途径。理论上他也可以由汉中，沿汉水一线的“秦巴谷地”，向东攻击南阳盆地。或者说南下蜀地，然后再由蜀地顺江而下攻击江汉平原，从东线回到关东。问题是这样做的话，刘邦所遇到的抵抗将会是最激烈的。正如我们之前所分析的那样，能够被项羽安排到江汉一线的诸侯王，都是他最值得信任的将领。另外，既然大家都是系出楚地，那么从民心向背上来看，刘邦也没有信心在这方面占优。特别是在项羽还没有因为谋杀义帝，让自己在政治上陷于不利地步时。

相比于东征的这些不确定因素，杀个回马枪，打回关中去，却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从战略上来看，关中之地在中央之国内部博弈中的重要地位，已经由周人和秦人充分验证过了。如果刘邦能够占据这块四塞之地的话，那么就有很大的机会复制秦人扫灭六国的过程了。其实单就蜀地（包括汉中）的地缘优势而言，主要是在防守上。只有在和关中之地置于同一政权管辖之下时，蜀地在进攻中所发挥的战略补给作用，才能够发挥出来。从这个意义上看，已经拜项羽所“赐”，得到汉中、巴蜀的刘邦，和当年准备南征巴蜀的秦人，所面临的战略机会是同等的。只不过二者的方向正好

相反罢了。

虽然将秦岭南北连成一片是一个正确的选择，但真的要做到的话，还是非常困难的。这其中的困难，主要就在于秦岭这条地缘分割线的地理分割作用太大了。当年若不是“苴国”引狼入室的充当带路党，秦人也很难有机会把难于上青天的蜀道变为入主蜀地的通途。现在的刘邦，想等机会再找到个带路党帮助其穿越秦岭，无异于守株待兔（理论上，三秦如果内乱的话，是有可能有这种机会的）。对急于乘势回到关中的刘邦来说，他需要有更快的途径回到关中。

当我们把目光放在战术层面上时，就会发现项羽有足够的理由相信刘邦会老死蜀地。因为秦岭这座厚实的山脉中间甚至没有像样的河谷通道沟通南北，要想穿越秦岭，往来于汉中、关中两地，就必须借助那些悬挂于河谷两侧的“栈道”。不得不说，当初发明栈道的人，以实践验证了“人定胜天”这句口号。只是这种以脆弱结构支撑起来的道路，因其先天不足，存在着两大致命弱点：一是数量不足；二是很容易被毁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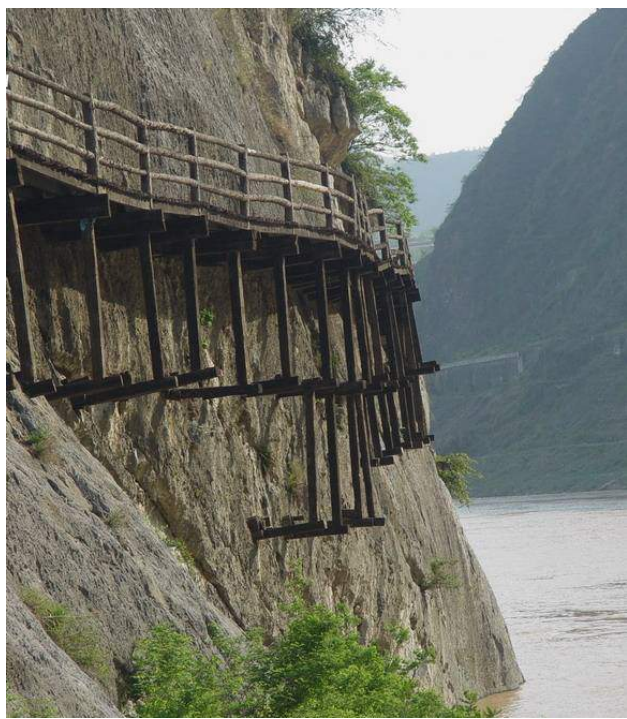
秦岭古道地缘示意图

就秦岭中的道路来看，历史上一共存在着五条主要路线，自西向东分别是陈仓道、褒斜道、傥骆道、子午道、峪谷道。如果再加上由关中通往南阳盆地的“武关道”，一共就是六条跨越秦岭的道路。除掉地理条件相对较好的“武关道”外，其他五条穿越秦岭腹地的道路，都不得不借助“栈道”这种形式穿越某些路段。基于在秦岭中构筑栈道的工程量太大，维护起来也颇有难度，这些古道并不会同时使用的。也就是说，作为二者地缘关系主导者的关中盆地的政权来说，一般只会按照自己的需要来开辟维护其中的某些道路。

我们知道，秦岭以南，大巴山以北，可以被统称为“秦巴谷地”。在这片谷地中分割出了一系列盆地，而与关中盆地相对应的，主要是秦巴谷地中最大的两个地

理单元：汉中盆地和安康盆地。在穿越秦岭的五条栈道中，褒斜道和傥骆道所对应的是汉中盆地。而如果你从关中走出，向南走子午道和峪谷道，那么你首先到达的会是安康盆地的两端。至于说那条最早被使用的道路“故道”（陈仓道），则是一条由汉中盆地之西，沿故道水——嘉陵江穿越秦岭、大巴山脉紧密结合部，直达四川盆地的道路。

当然，如果你的目的地不是四川盆地，你也可以在穿越完秦岭之后转而向东，沿汉水上游的河谷进入汉中盆地。只不过这种走法会比较绕远罢了。故道是最早被开发使用的秦岭通道。构筑于它北段的关隘“大散关”也被划入了“关中四塞”之列，正因为如此，它也被称为散关道。不过在我们所叙述的这段历史中，它更应该被称之为“陈仓道”。之所以会有这个新标签，就是因为那个“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典故。而这个典故所描述的，正是刘邦如何运用战术手段攻入关中的。



栈道

说到“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件事，有人提出异议了，认为这件功劳应该挂在韩信的名下。怎么说呢，如果单纯分析军事的话，这种归类是正确的。但现在既然在讲政治，那么军事家们所服务的政治家，才会是真正的主角。从这个角度看，在韩信有条件成为一方诸侯之前，都不会以博弈者的面目出现在政治舞台上的。我们已经简单分析了穿越秦岭的五条道路，其中最早被使用的应该是陈仓道；如果你的目的地是汉中的地缘中心“南郑”的话（现汉中市），那么穿越褒斜道之后，你很快就能看到它了。最起码在汉朝以前，沟通秦岭南北主要靠的就是这两条道路。

在“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这个典故中，一共出现了两条道路。而这当中的“栈道”，所指向的就是褒斜道了。这并不是说褒斜道是唯一使用“栈道”这种技术形式的道路，而是说在刘邦反攻关中的时候，这条通道上的栈道需要修理。为了向项羽表明自己已经决心偏安西南，不再介入核心区的博弈。刘邦和他的部下在通过褒斜道之后，就放火烧掉了栈道。这种自决后路的做法，显然起到了效果。不再视刘邦为威胁的项羽，终于离开关中，衣锦还乡去了。

当项羽回到关东之后，关东诸侯马上陷入的混乱让其自顾不暇了。此后负责监视刘邦的任务，就已经移交给那三位就封的秦王了。从地缘关系来看，控制关中

盆地西部的章邯，会是刘邦最直接对手。如果刘邦想打回关中去，那么他最先要做的就是修复褒斜道上的栈道。事实上他也的确这样做了，只不过这样做的目的，只是为了让章邯相信他的对手会从原路返回。至于刘邦的战术意图，相信大家都已经很清楚了。他的攻击路线并不是褒斜道，而是陈仓道。

从路线的长度来看，由褒斜道入关中，要比陈仓道便捷得多，更何况刘邦本来就是走这条路上任的。因此在刘邦故布疑阵之后，章邯就把自己的主力放在了褒斜道一线，以防御刘邦的进攻。其实如果章邯有足够兵力的话，他应该在各条可通行的道路上都部署重兵，以阻止刘邦可能的北伐。但要做到这一点，前提是你有足够的人力物力支撑。而在项羽西征的过程中，不仅二十万秦军被坑杀，秦国数百年来所积累的财富也被项羽一扫而空。如果伟大的始皇帝没有花费那么多的人力物力为他经营身后事的话，那么他所带走的那些财富应该也都会姓了项。

在人力、物力都陷入低点的时候，秦地还被一分为三，成为“三秦”，章邯所能控制的兵力有多少，就可想而知了。正因为如此，他才需要判断出刘邦的主攻方向来部署自己的主力。可惜的是，这一次他错了，刘邦和他的军队出其不意的由陈仓道攻入了关中。在信息交流手段还很简单的时候，刘邦所率领的军队（已经可以称之为“汉军”了）在南线的移动，是很容易做到保密的。只是由汉中向西切入秦岭与大巴山脉，再向北进入陈仓道，终究是在绕远。这从成本上来说，是很不划算的。但也正是这一点，章邯才会判断失误。

第二节 项羽和刘邦政治远见的差距

现在我们可以比较全面的为秦汉交接的这段历史，做个阶段划分了。划分的标准是依据谁才是这个地缘舞台上的主角，以及他所属的地缘背景。最先出场的，当然是我们的“陈胜王”了。而他和其建立的“张楚”政权，也率先拉开了这段乱世的序幕。一直到陈胜兵败被杀的这段时间，我们可以称之为第一阶段，即“张楚”阶段；第二阶段的标签，我们在之前也已经贴过了。兴于东楚之地的项梁和他的扶植的楚怀王接过了张楚的大旗，成为楚地唯一的“合法政府”，也很自然的成为关东义军的新带头大哥。基于这个新政权的地缘基础，我们可以把这一阶段称之为“东楚”阶段。

第三个阶段是属于项羽的。与前一阶段的分割点可以被定在巨鹿之战结束，诸侯愿意归于项羽统一指挥之时。在此之前的项羽还是以军事将领的身份，在为“东楚”服务。而在此之后，项羽已经变身为一个“政治家”（虽然并不合格），并成为中央之国的实际控制者。而这一阶段，可以用项羽给自己的封号来标注，称之为“西楚”阶段。最后一个阶段的历史，是由项羽和刘邦所共享的。从刘邦经由陈仓道攻入关中的那一刻起，中央之国的政治博弈就已经变成楚、汉两个政治体系之间的争

斗了。在历史当中，最让人印象深刻的也是“楚汉相争”的这个阶段。

四个阶段的划分，看起来好像是个很漫长的过程，但仔细看看时间，从陈胜揭竿而起，到刘邦一统江湖，也不过就是7年的光景（公示前209年——公示前202年）。这种转瞬之间便决出胜负的过程，比之春秋战国那种经过数百年积累而缓慢形成的博弈格局，要更吸引人们关注的目光。这也是英雄，或者试图成为英雄的人，都会更喜欢这种军事色彩深厚的乱世的原因所在。毕竟从个人的角度看，一念之差虽然不能改变时代的变迁，但却可能改变自己 and 家族的命运。有鉴于此，在我们的分析当中，也不可避免的出现对那些英雄人物的具体分析了（虽然先秦的这段历史，更能体现诸历史视角下诸地缘板块的各项指标）。

其实如果不是项羽这位军事天才政治敏感度太低，做出的政治布局不够稳定，天下再经历过一次战国时期也未可知（时间当然不会像先秦那样长了，但经历个两三代时间，再重归一统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虽然历史的结果已经告诉我们这段历史不是“战国”，而更像是两个骑士的决斗（如果刘邦也算骑士的话）。但单从二者对决的地缘形势来看，却仿佛又是一次秦国和关东六国的PK。只不过高地的政治属性已经不再是属“秦”，而是“汉”了；而关东诸侯的形势，看起来倒是比战国时期要强了，最起码他们当中已经产生了权力的集中者——项羽。这比结构复杂的战国时期，要更有利于资源的统一调配。当然，这并不代表刘邦就没有离间关东诸侯的空间了，只是他所面对的对手要强大得多，而连横的空间则要比当日的秦国小。其实如果刘邦希望通过外交手段让那些臣服于项羽的诸侯转变风向，已经不能算是“连横”，而是“策反”了。

从地缘关系的角度来看，项羽放弃关中而退归东楚在战略上是一个巨大错误。因为即使没有刘邦，当天下进入稳定期，经过休养生息后，恢复元气的关中之地也一定会博弈出一个能够完全控制关中之地的“王”来。到那个时候，项氏家族和他的霸业再想覆盖到这片四塞之地就难了。问题在于，当我们把视角转入到微观层面，去审视项、刘二人的性格和做法时，就会发现项羽即使留在关中，他也需要对自己的方法做出调整。否则像他那种“三光”的做法，是很难收服秦地民心的。

相比之下，刘邦所做的就有远见多了。他在先入关中后实行的“约法三章”，就已经足以让恐惧被报复的秦人感受到安全感了（这点很重要）。再对比一下后面项羽的“三光”政策，秦人在面临选择时到底会倾向于项羽阵营，还是倒向刘邦，已经不言而喻了。这也是刘邦在攻入关中之后，仅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便彻底平定了三秦的根本原因。有了政治基础，军事上的胜利总是会来得更快。这一点，即使身处其中的人也未必能这么乐观的想到。就像1946年的红色政权最初也没有想到，自己仅仅用了三年时间便能夺取天下一样。

所以在与项羽的PK过程中，与其说刘邦是赢到军事上，不如说是赢在政治上。所谓军事家与政治家的最大的区别，就是后者考虑问题一定会更加全面和更有远见

些。每当我的视线转到楚汉相争这段历史时，我的脑海中总是会不由自主地浮现一句“名言”：别拿村长不当干部。如果说中国历史中有哪位帝王的出身算是草根，那么除掉那个出身已经见底的明太祖以外，就是这位汉高祖了。不能说每一个人的出身都会对性格的形成造成致命影响，但显然，草根出身的刘邦对于民心向背的敏感度要更高（这是政治家的评分当中，一项很重要的指标）。而项羽这位没落贵族，更关心的是精英阶层的想法。

第三节 刘邦派出的先锋军被楚军所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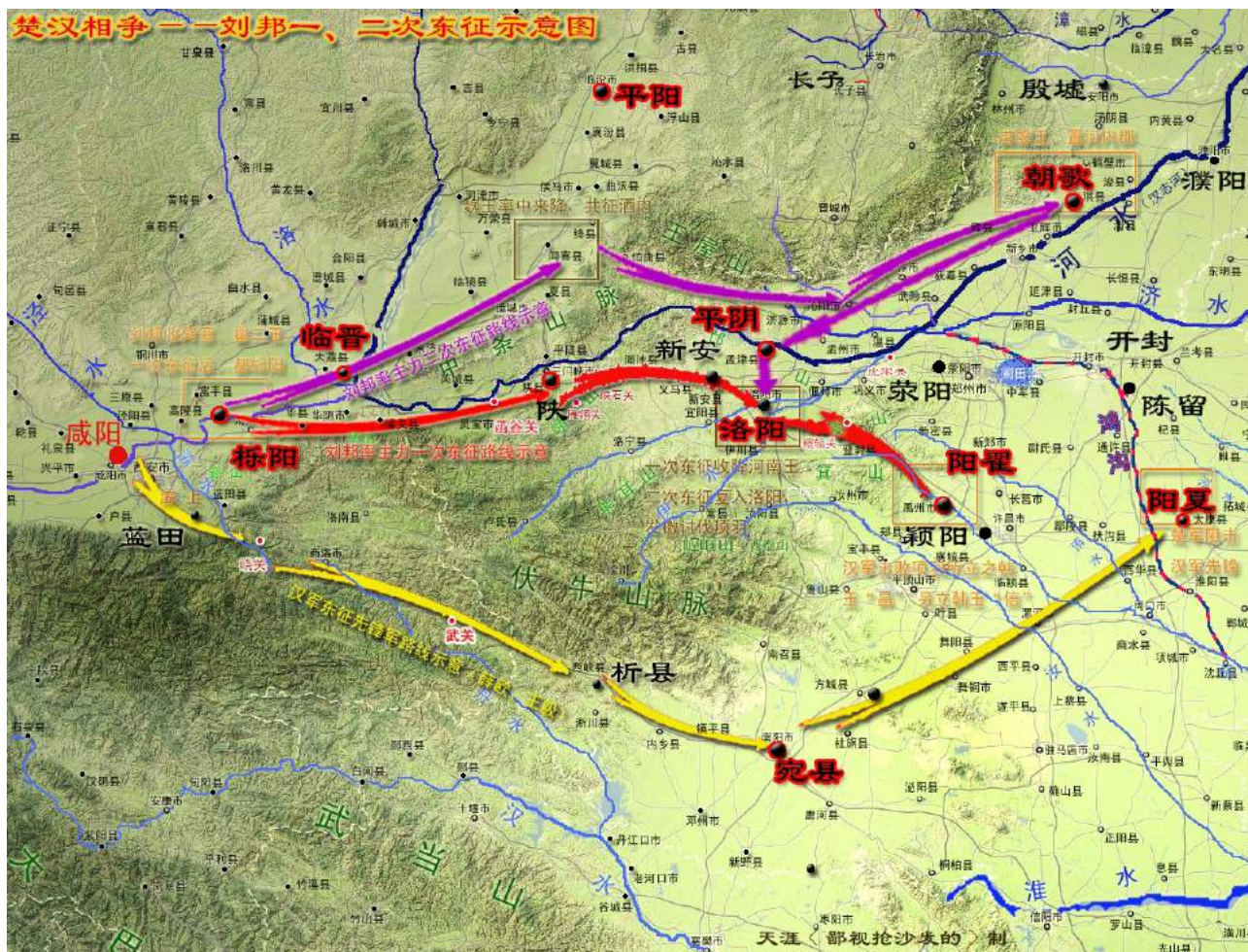
攻取关中，对于刘邦的事业来说只是一个开始。事实上，在汉军刚刚攻灭章邯时，刘邦便已经开始谋划并抢占关外的桥头堡了。而最先被刘邦所看中的战略要点，对于他来说也同样是一块经营过的熟地，它就是“南阳盆地”。反攻秦地所迅速获得的胜果，让刘邦有理由相信，自己同样留下好声望的南阳之地也有可能顺风倒向自己。因此在攻击到咸阳之后，刘邦除了遣军向西、北方向去接收陇西、陇东两个板块，并由此攻击陕北高原的上郡，以对关中盆地残余的抵抗力量形成合围之势以外；一支先遣军就已经顺由武关道，将汉军的触角延伸到关外了。

有人感叹，刘邦入汉中时不过几万人，这么快就可以分兵出击了。真要说起来，除了刘邦擅收民心以外，更要感谢项羽的帮助。在秦人看来，项羽所立的那三个关中之王，不仅断送了秦人的江山，更白白牺牲了二十万关中子弟的性命。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对秦帝国还留有眷恋的贵族官吏，还是普通百姓，都无法认同这几个“卖国求荣”的乡党。正是在这种“宁赠外邦，不与家奴”的心态支配下，刘邦这个示恩于前的外来和尚很快便成为关中之主，并如滚雪球般的壮大了自己的力量。在关中之地站稳了脚跟的刘邦，也因此有了和项羽PK的资本。更为重要的是，看到这种希望的，并非是刘邦一个人。那些还在政治归属上有所疑虑的精英们，也同样看到了刘邦的潜力。因此刘邦在遣军出武关，“收复”南阳时，并没有遇到阻力。很快，随着刘邦的兵锋所至，这个不久之前刚刚归附过刘邦的板块，又倒向了刘邦。

如果从战略上来看，刘邦出武关的这支先锋军（将领薛欧、王吸）在占据南阳之后，需要思考下一步的行进方向了。继续向东，穿越方城夏道攻入中原是一条路；向南沿大洪山两侧攻入江汉平原也是一种选择。从战略选择来看，前一个方案并不是最好的选择。因为在南面的长江一线，有项羽所分封的两个亲信：衡山王、临江王。也就是说，如果汉军继续东征的话，那么很有可能会被还击的楚军切断后路。

不过这支汉军最终还是选择了继续东征，原因就是刘邦的家属还在沛县。刘邦希望这支快速部队能够在项羽做出反应之前，抢先将自己的父亲和妻子（吕后）接出来。这也是为什么刘邦刚刚攻占了咸阳，就迫不及待的派军出武关的重要原因。这看起来好像是个存有私心的理由，但在家、国一体的华夏文化中，这种家事其实

也是公事了。如果你的家人落在对手手中的话，很难说不对自己下一步的走向造成影响。除非你是个什么都放得下的人（最起码要让你的对手这样认为）。有这种性格的人，根据所处的环境不同，有时会被别人看作英雄，有时则被认为是流氓。根据刘邦后来的表现来看，很显然，他就是这种人。



楚汉相争之刘邦一 / 二次东征示意图

除非形势所逼，一般是没有人愿意做这种英雄，或者要这种流氓的。因此在尚存一线机会的时候，刘邦还是让自己的这支先锋军尽快向沛县方向前进。问题是作为一支军队来说，你的行进速度是很难超过传递消息的信使的。所以在汉军突入中原，渡过鸿沟，进达鸿沟以东的“阳夏”（今河南太康县）时，项羽的阻击部队也已经到达了。这一点其实也在预料之中了，毕竟汉军现在已经进入到项羽的自留地——西楚的领地了。既然对手已经做好了准备，那么这支快速前进，后方不稳的部队，也就失去机会了。

很多人奇怪，在刘邦回师关中攻城略地的时候，项羽和他的主力在干嘛？其实我们前面已经说过了，项羽现在的注意力正集中在齐地之上。那个没有得到分封的“齐王”田荣，不仅自立为王，还一面帮助陈余在赵国重新洗牌；一面扶植那个在政治

上一直呈观望态度的名将彭越在中原腹地捣乱。相比于西线的动荡，项羽更关心自己领地是否安全。这并不算是一个错误的决定，毕竟如果项羽的根基之地都还没有稳定的话，也很难集中兵力西进反击刘邦。对自己的军事天才和实力非常自信的项羽，有理由相信，如果他能够把关东这些反叛的诸侯搞掂，那么那些首鼠两端，顺风倒向刘邦的诸侯们一定会又一次转变风向。

当然，这并不代表项羽就对刘邦在西线的扩张坐视不管了，派军在阳夏阻击汉军是项羽作出的第一反应，另一项决定就是恢复韩国。让这个注定要成为楚汉博弈焦点的板块，去迟滞刘邦的进攻。放那个与刘邦有深交的韩王成回去组织反击，自然是不可能的。真要去了，等于是为刘邦作嫁衣裳了（所以韩王成也没有活下去的理由了）。项羽所委任的新韩王叫做“昌”，在项氏家族起兵之时，这位新任韩王是江东吴县（苏州）的县令。就像刘邦所派遣的两位先锋，也是和自己一起起家的老乡一样。在华夏文化中，以乡土为纽带的关系，其稳定性应该仅次于血缘关系。

第四节 刘邦出洛阳攻取韩地和河东

前面我们分析了，刘邦派出武关的这支先锋部队，所执行的只是一项战术任务（接刘邦家属）。所以对于刘邦所领导的汉军来说，并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东征。这时的刘邦，主要注意力还在于清剿三秦残余的势力。基于我们前面分析过的原因，这个过程其实是非常快的。从刘邦出陈仓道返回关中，到完全占据关中之地，也不过半年的时间。也就是说，在项羽阻击汉军先遣部队，并另立韩王以为缓冲之时，刘邦也已经做好了主力东征的战术准备了。

现在的刘邦，已经和当日入秦时的实力不可同日而语了。那时的他还是以一个没有根基之地的反叛者面目，出现在政治舞台上。而现在，他已经拥有了秦人借以发家的关中、汉中、巴蜀之地。要知道，秦人完成这个整合足足花了数百年时间。而刘邦前后只用了不到一年时间。既然有了这样好的基础，刘邦并没有再尝试从武关道绕南阳入中原的路线。相比于崤函通道这条“正路”，那条路线更像是一条用来投机的偏门。已经在政治号召力上对自己颇有信心的刘邦，需要从正面出击一次，以验证自己的实力是否已经可以和项羽PK了。

和项羽在战争之后再以军功论功行赏不同，刘邦的做法要更为巧妙，涉及的层面也更广。具体的做法就是：“以万人若以一郡降者，封万户”。也就是说，如果你能带领一郡或一万人的军队归降汉军，那么你就可以在新的体系里受封“万户侯”。而如果那些位列项羽十八诸侯之列的“王”能够背楚归汉的话，也同样能够保有他们的爵位。这种既保护了既得利益者的权益，又切出蛋糕重新洗牌的做法，无疑是非常有诱惑力的。当然，如果刘邦只是个偏安汉中的诸侯，他的这种承诺自然只会被看作画饼。但现在，一方面是项羽在东线遇到了大麻烦；另一方面刘邦在西线又

声势日隆，势必会让这些骑墙派改变自己的政治选择。

刘邦在政治上的战术，收到了很明显的效果。在他率主力出函谷关过“陕”地，进行第一次东征之时，项羽分封在洛阳盆地的“河南王”很快倒向了汉军阵营。当然，也并不是所有人都会愿意接过刘邦所抛过来的橄榄枝。那位受项羽委托控制韩地的新韩王“昌”，就忠实的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在他看来，如果不是项羽的支持，自己是无论如何不会空降得到韩王这个位置的。基于刘邦与韩人的亲密关系（想想张良会不会认他），这位受命于危难之时的韩王是很难在新体系里保住自己王位的。唯一的机会，就是协助项羽抵御住汉军的进攻。

尽管必须以战争的方式来解决韩地的问题。但从战略战术上看，新韩王的赢面都很小。一方面刘邦在韩地的声望本来就很高，他很难得到韩地军民的支持；另一方面，已经如滚雪球般壮大的汉军，已经有压倒性的军事优势来应对韩国的阻击了。最终为刘邦解决掉韩国的，是汉军体系中最知名的军事天才“韩信”。而在处置这块“兵家必争”之地的方法上，刘邦和项羽做出了同样的选择。同样也扶植了一位新的韩王，以为汉军前驱。基于同样的理由，刘邦相信这位系出汉系的韩王应该会为了自己的王位，拼死与楚军对抗的。

需要注意的是，刘邦所新立的这位韩王，也叫“信”。也就是说，他和为汉军攻取韩地的大将“韩信”可以说是同名，这也算是一种奇妙的巧合吧（历史上为了区别，称之为“韩王信”）。如果按照项羽的分封原则，有军功的韩信很有可能就是新“韩王”了。而在刘邦的思维里，政治因素会更优先考虑。作为韩国王室的直系子孙，韩王信目前会更适合为刘邦整合韩地。当然，这并不代表刘邦会忽视军功，只是没有将之与战争的结果直接挂钩罢了。

现在的刘邦除了控制秦地以外，也完全控制了韩地。如果他再继续往前走的话，就马上会进入中原腹的“梁地”了（放弃河东之地后的魏国之地）。不过这也意味着失败的风险越来越大了。一方面，梁地目前是项羽的直属之地。进入梁地之后，刘邦的政治诱惑手段能起的作用就很有限了。而在军事上，刘邦还没有把握能够胜过项羽。要知道，楚军现在只是在东线被那些反叛的诸侯所缠住，并没有遭受失败。在这种情况下，刘邦踌躇不前是可以理解的。最好的选择是静观其变，看看项羽在东线的战况，再决定下一步的战略（是步步为营，还是乘胜追击）。

另一个方面则是战略上的问题，作为形胜甲天下的洛阳盆地来说，刘邦还是有把握能够守住的。但一旦进入中原之地，你就会发现很有可能陷入四面受敌的境地了。除掉要防御东、南方向来自楚地的军事压力以外，在黄河以北，被项羽分封在河内之地的“殷王”，更是一个直接的威胁。这位司马迁的祖先对项羽的忠诚度，早在刘邦试图通过洛阳攻入关中时就已经领教过了。事实上河内之地的战略威胁还不是最致命的，在关中的旁边，还有一块更为重要的板块能够直接威胁刘邦刚刚打下的根据地。这个板块，就是与关中一河之隔的山西高原。而受封控制这个板块的核心：

河东之地的，就是那位不得不在封号前加上一个“西”字的“西魏王”（魏豹）。秦晋之间微妙的地缘关系，使得刘邦只有在收服了西魏之后，才有可能真正去入主中原挑战项羽的霸主地位。这一点，当年的秦人在“崤之战”之后就已经清楚了。

在解决河东的问题之前，刘邦先要在政治上树起自己的大旗来。既然项羽将他封为“汉王”，那么“汉”这块招牌，刘邦也就欣然接受了。不过现在的“汉”，已经不是困在汉中的“汉”了。第一次东征回来之后的刘邦，已经充分相信自己成为秦地新的主人了。为了巩固这种成果，他甚至把之前的皇家园林都开放给了民众去耕种。而换来的结果，就是可以毫无阻力的将“秦地”变身为“汉地”（政治上的象征就是“易社稷”）。

对于刘邦的迅速崛起，项羽暂时还没有时间重点关注，因为东线现在的状况还是一团糟。可以说，除了楚地以外，燕、赵、梁、齐几地都出状况了（具体出了什么状况，前面已经分析过了）。就项羽来说，刘邦就算打过来也还得一段时间。但对于和关中一河之隔的河东来说，情况就不一样了。可以肯定的是，刘邦紧接着的目标就会是河东。而对于河东的西魏王（魏豹）来说，他可以选择像韩王昌那样，忠于项羽；也可以选择像河南王那样，顺势倒向刘邦。

在项羽的分封体系中，一部分是他一手扶植起来的亲信，如韩王昌、殷王卬，楚地那三个王；另一部分在张楚时代受封的“王”（包括他们的继承者），则是属于被边缘化的。而这部分人，也是最有可能背叛项羽的。很显然，魏豹就是属于后者。如果不是魏国在中原的领地被项羽直辖了，也许现在的他已经加入叛乱者的行列了。既然现在有机会站在刘邦的大旗下出这口恶气，那么西魏也就没有理由为项羽做炮灰了。因此在刘邦率军渡过黄河，进入河东之后，西魏很快便加入了汉军阵营。

第五节 刘邦攻取河内后从洛阳进军彭城

当你在政治上得势时，总是能够事半功倍的。西魏的归附，加快了刘邦的东进步伐。而按照顺序，汉军的下一个目标应该是河内的“殷王”了。从最初的部署来看，司马迁的这位祖先就是为了防备西魏的变数的。尽管我们说项羽的这些分封在战略上很有问题，不过以他对这些诸侯的了解，所做的这些平衡之策还是起到很大作用的。最起码，殷王在面对汉军的攻击时就没有顺风倒，而是忠实的履行了他的职责。

以汉军现在的实力而言，殷王是没有机会取胜的。唯一的作用，就是支撑住，等待楚军主力的支援。只是现在的项羽正在齐地收拾那个最不听话的齐王田荣，并没有时间来支援河内。在这种情况下，河内也很快成为刘邦的属地，而那位殷王在被俘之后也成为识时务的俊杰。在我们这些看客眼里，这些不时转变风向的“诸侯”，似乎很让人不齿。但身处在这样的乱世，大家本来也就是谋个富贵。既然没有称霸天下的能力，那么找个靠谱的靠山也属正常。特别是在旧有的国家认同体系已经消失，

而新的体系又未建立的时候。这种政治上的变化，并不会让人有太多负罪感。

和攻取韩地之后就开始后撤，以避免过于前突一样，在攻取河内之后，刘邦也没有继续向北攻击赵地。事实上他有足够的理由攻击赵地的，因为那位原本被分封在赵国核心区的常山王张耳，已经被赶出了赵地（前面已经分析过了），投奔了势头正盛的刘邦。有了这个带路党（并且带出了自己的军队），刘邦攻取赵地的把握还是很大的。不过现在赵地的情况比较微妙，因为赵地的变故同样也是在打破项羽的分封体系。也就是说，赵地现在所服从的并不是项羽的号令。敌人的敌人就算不是朋友，暂时也没有必要针对，否则项羽倒是很高兴看到大家拼得你死我活。

有鉴于此，在攻取河内之后，刘邦在黄河以北的军事目的暂时也就达到了。接下来的汉军，并没有必要再退回关中去，因为河内，包括太原盆地、上党高地，现在都已经是刘邦的控制区了。像当年从关中走出来的周人一样，两侧安全的刘邦，也可以把自己继续东征的基地设在洛阳盆地了。

当刘邦南渡黄河到达洛阳之后，他得到了一个天大的好消息。而这个消息，足以让他在楚汉相争的博弈中占据政治上的制高点，这个消息就是项羽谋杀了“义帝”。从项羽的角度来看，这个时候杀掉义帝，固然是怕这个名义上的“天下共主”落到刘邦手中。如果那样的话，项羽在政治上就成为反叛者了。虽然对于项羽来说，他从来就只相信实力，但考虑到义帝在楚地的影响力，这个风险还是不能冒。只是项羽没有想明白一点，那就是一个人的政治影响力，并不仅仅是在他活着的时候才能发挥，有时候死人可以比活人发挥更大的作用。最起码想利用他的人不怕他站出来反对，最近的案例，就是陈胜利用扶苏、项燕之名起兵。

在刘邦看来，项羽除掉义帝，比他把义帝接过来“奉天子以令诸侯”，要更为有利。这样的话，将来“平叛”之后，就不用考虑自己怎么上位的问题了。要知道，后来的曹操可是为这个问题头痛了半辈子。至于说义帝这块招牌，自然还是同样可以用的。在树起为义帝复仇平叛这杆大旗之后，刘邦和他的军队终于从洛阳出发，开始向西楚的纵深挺进。楚汉之间的直接对决也正式拉开了序幕。在洛阳誓师出征的刘邦，现在可以说是兵强马壮。算下来，三秦（雍、塞、翟）、西魏、河南、殷、韩、常山，这八个诸侯的军队都已经归附了汉军，加上刘邦自己，无论从控制的地区，还是实力来看，都算得上是得天下之半了。更何况剩下的那一半中，又有一半已经脱离了项羽的控制，特别是离心力最强的齐国正在和项羽PK当中。有了这么大的本钱，刘邦终于敢把楚地的政治中心——彭城，定为主攻目标了。有了为义帝复仇这杆大旗，刘邦有理由相信，楚地的民心已经不再是项羽的基础了。

估计连刘邦自己都没有想到，反楚联盟的军队会那么快地攻入彭城。造成这种结果的直接原因，就是因为项羽的主力此时还在齐地纠缠。其实本来项羽已经依靠他的军事才能解决了齐地的问题，在击败齐王田荣之后，齐地各处的叛乱者们慑于项羽的兵威，很快便又归附了西楚。就连田荣本人，也是在逃亡之后被齐人自己所杀，

献于项羽。

在田荣起兵反楚之后，项羽所封的三个王都已经或被杀或被逐。也就是说田荣已经重新成为齐地唯一的王，而干掉田荣之后的项羽，也便有了机会借机重新布局齐地。事实上，如果项羽有足够的政治头脑的话，田荣的造反等于是帮他的忙。因为要想建立一个统一的王朝，那些因功而封的异姓王是迟早要被消灭的。这一点，后来的刘邦和诸多王朝的开创者都作出了正确的选择。就算没有想到用郡县制来将这个重要的边缘板块，顺势划为自己的直辖地，在齐地封建几个与自己有血缘关系的新诸侯，也是一种过渡的方法。即使你认为，周人的分封制才是合理的方式。

很可惜，项羽并没有想那么多。重新收服齐地之后，项羽仍然依照“赏罚分明”的原则，用“三光政策”处罚了这片土地。如果说在战争状态下，这些无情的手段起到了威慑效果，以迫使那些还没有受到攻击的齐人投降楚军的话，那在叛乱已平的情况下，再这样做，就只能把齐人重新逼入反叛者的行列了。说实话，这已经不是项羽第一次这样做了。对于他来说，破坏一个旧世界比建设一个新世界，永远要更得心应手，也更能获得满足感。问题是，看穿项羽这种刚灭了火，又到处撒火种的做法，不足以成大事的，并不仅仅是我们这些后世的看客。那些身处当世的乱世英雄们也会有同样的感觉。这也造成了项羽一次又一次的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却一次又一次地面临政治上的背叛。

一般情况下，自己的大本营受到了攻击，大多数人会马上回师救援的，这也是“围魏救赵”战术得以实施的前提。不过项羽却不是这么想的，在刘邦和他的联军开始东征时，他并没有急于回防，而是集中兵力攻击田荣。能这样做的原因，在于项羽对自己军事实力的自信。在他看来，只要手中有了一支战无不胜的军队，即使是被刘邦攻陷了都城，也很快能够夺回来。事实也的确如此，在项羽从齐地回军救援之后，楚汉两军终于在彭城西南的睢水河畔展开了第一次决战。而战争的结果，以汉军大败而告终。

也许汉军和其他诸侯联军在数量上已经超过了楚军，但战争从来就不是单纯比拼数量。从军力来说，作为联军主力的汉军明显与楚军不在一个级别上。至于那些见风使舵的诸侯，你永远不能指望在你处于下风时，他们会冲锋在前。对于他们来说，已经在盘算接下去如何向项羽解释他们的背叛行为了。

第六节 刘邦败退彭城时说服黥布反楚

失败之后的刘邦，接下来只有向西退却这一条路了。在一望无际的华北平原上与项羽再战，无论是从战术，还是后勤保障来说，都不现实。但如果退到洛阳盆地及其以西的高地，情况就不一样了。在那里，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都占尽的刘邦，有信心抵御住楚军的进攻，并蓄势再战。因此在自己当年驻军的“碭县”收拢好残

军之后，汉军开始穿越中原，向西撤退。如果单纯的后撤，汉军还是有信心在楚军的追击之下，先跑回洛阳盆地或者关中的。问题在于，刘邦的这次东征可以说是集合了全部的力量，并没有在后方部署好防御力量来面对可能的失败。也就是说，要是让楚军这样尾随追击的话，乘胜追击的楚军很可能顺势就攻入关中了。现在的刘邦，需要想一个办法来拖住楚军。以让自己有足够的时间在后撤之后稳住阵脚，部署防线。

让楚军再一次被齐人绊住，是一个方案。前面我们也说了，项羽在齐地的那些惩罚性行动，又一次把齐人逼入了反叛者的行列。就在他打败齐军主力的“城阳”（现属青岛管辖），田氏三雄的最后一位幸存者田横又一次举起了王旗（只不过田横暂时没有称王，而是先立田荣之子为王），重新成为项羽的心腹大患。问题在于，你并不能保证项羽就一定会回过头去再征齐地。毕竟齐人的主力刚刚被歼，齐地本身又被楚军三光了一番。以项羽“擒贼先擒王”，要打就打出头鸟的军事性格来看，这次他很有可能置齐地的叛乱而不顾，先把刘邦这个“穷寇”斩尽杀绝。

既然齐人未必能拖住楚军主力，那么刘邦需要另找一个盟友来吸引项羽的注意力了。最终落入刘邦视线的人选，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个人就是九江王黥布。作为项羽的亲信部将，也是项羽放在自己封地旁边直接拱卫自己后方的楚地诸侯，在项羽军事上明显占优的情况下，说服他反戈一击，似乎是天方夜谭。但刘邦的确这样做了，并且成功了。以项羽对黥布的信任和重视程度来说，刘邦本来是不会有劝降他的想法的。之所以敢于派使者前去做说客，是因为黥布自己的表现让刘邦看到了希望。在田荣占据齐地自立为齐王时，北上平叛的项羽曾经征调黥布和他的军队一同前往，不过黥布称病并没有北上，而且仅仅派了四千人马前去支援。这当然会让视其为心腹的项羽感到不快。如果说，之前还可以有称病的理由的话，那么在汉军攻击彭城时，黥布仍然按兵不动，采取观望的态度，就无论如何也过不了项羽那关了。

事实上以当时天下又一次陷入动乱，而项羽又表现得只会打天下，不会治天下的行为，让诸侯们心存骑墙的态度是很正常的。在你无法判断对面来车的走向时，本能的反应就是站在原地不动。只不过在旁人看来，勇武的黥布似乎不应该有这种首鼠两端的想法。如果刘邦没有派说客去对黥布晓以利害，相信黥布还会这样观望下去。而刘邦现在要做的就是打破这种平衡，让黥布在关键时刻倒向自己。很多人认为，说客的口才是左右被说者决定的主要因素。其实说客们最主要做的是把战略形势分析好，让对方做出符合自己长远利益的判断，至于语言技巧倒在其次。

总结下来，刘邦的使者为黥布分析了如下的四条：一、项羽谋杀了义帝，已经失去了天下的民心（特别是楚地）。即使现在军事上再强大，也很难扭转负面形象；二、之前在楚齐、楚汉战争中，黥布坐山观虎斗的表现，已经足以让他失去项羽的信任了。如果项羽重新掌控了局势，那么对黥布的惩罚也是不可避免的（想想没有支援项梁的田荣的下场）；三、刘邦已经占据了西线最有防御力的地缘板块，虽然

这一次东征失败，退了回去，但完全可以依托洛阳盆地一线的地形优势，利用关中、巴蜀的人力、物资资源和项羽打持久战，并拖垮楚军。而楚军的根本在东楚之地，中间隔着人心尚未归附的梁地（魏地），相当于客地作战。更致命的是，赵、齐这些能够从侧后攻击楚军的国家，都已经反叛了项羽。如果战争真的变成持久战，显然对楚军是不利的。

最后一条，应该也是最能打动黥布的。即使项羽这次能够战胜刘邦，其他诸侯也不会就此归顺。对项羽的恐惧，会驱使他们继续和楚军作战。在这种“按下葫芦浮起瓢”的情况下，项羽的实力再强，又能消耗多久呢（刚刚复叛的齐地，就是最好的例子）？这些战略分析，与其说是为了说服黥布而作的，不如说是为楚汉相争的走势和项羽的结局作的。而这种客观的分析，也促使黥布作出了决定——叛楚归汉。不过对于黥布来说，他当然知道，如果现在举起反楚大旗的话，就是为刘邦当炮灰，也必将引来楚军主力的攻击，因此他希望归汉的规定是项秘约。这显然并不能让刘邦满意，他在这个时候派出使者去做黥布的工作，并不是为了将来自己在反攻时，有个见风使舵的“第五纵队”从旁接应，而是要让黥布现在就拖住楚军主力，以为自己布防留出充足的时间。

要想打消黥布最后的犹豫，就是让项羽知道黥布已经在政治上背叛了西楚。机会很快就来到了，因为这时的项羽也同样希望黥布能摆明态度，派出主力共同追击汉军。而刘邦的使者所要做的，就是在黥布还想两面落好时，让楚使知道自己已经与黥布达成了协议。这种做法，就像骆驼背上的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黥布心中最后一丝骑墙的幻想。为了不陷入被动，黥布别无选择地渡过了淮河，主动去攻击项羽。如果说齐地，包括赵地现在的叛离，尚不足以动摇楚军乘胜追击汉军的决心的话，那么黥布的反叛，绝对算得上是后院起火了。即使单从军事上来看，项羽也没有信心在南北两面都受到攻击的情况下，穿行八、九百里去攻击汉军。

既然形势出现了重大变化，项羽下一步的计划也随之改变了。一方面，他不得不分出主力去淮南平叛；另一方面，也需要拔除汉军留在砀县一带负责阻击楚军追击的后卫部队（刘邦也不会把所有希望寄托在黥布身上的）。而从刘邦的角度看，也达到了迟滞楚军进攻的目的。顺利退回关中的刘邦，很快便利用起了项羽“留”给他的地缘优势，为即将到来的楚汉第二战役作准备。作为西属政权的第一关口，洛阳盆地与中原相交的荥阳、虎牢一线，自然是汉军的第一道防线。在洛阳盆地没有失守前，函谷关一线应该还有足够的时间部署第二道防线。为了打赢这场关键战役，关中进行了全面战争动员，以增强荥阳防线的军力。

事实上在经过那么长时间的消耗后，关中的人力资源已经明显不足了。这次的动员，将之前不符合兵役要求的老弱人员全部征调了。至于蜀、汉中这两个项羽看不上眼的蛮荒之地，一如他们在秦国时的战略作用一样，为关中的后勤补给提供了有利的支撑。从刘邦的角度看，他的准备工作已经很充分了。只是这场战争虽然是

他和项羽唱主角，但那些打酱油的诸侯们也并非一点作用没有。就像黥布在关键时候的反戈一击，在战术上为汉军争取了时间一样。

第十九章 刘邦和项羽在荥阳的拉锯战

第一节 楚军和汉军相持于荥阳一线

在即将开始的第二次战役中，刘邦也必须审视一下那些盟友是否可靠。即使不指望他们帮忙，也不能像黥布之于项羽那样，背后捅一刀。骑墙派的特色就是“识时务”，在楚汉第一次战役（睢水之战）后，那些跟随汉军的诸侯们的立场也随之动摇了。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在平定关中的过程中，兵败降汉的塞王（司马欣）又重新回归到了项羽的军中。为了防止再一次出现类似的背叛，回到关中的刘邦，将留在关中的所有诸侯的子弟，都聚集在了都城栎阳（本来咸阳是最适合建都的，可惜被项羽烧了），以协助太子守城的名义监视了起来。这种留置质子的方式，并非是刘邦的创新。在诸侯林立的春秋战国时期，就已经是常用的手段了（我们伟大的始皇陛下，也曾经和他的父亲一起在赵国为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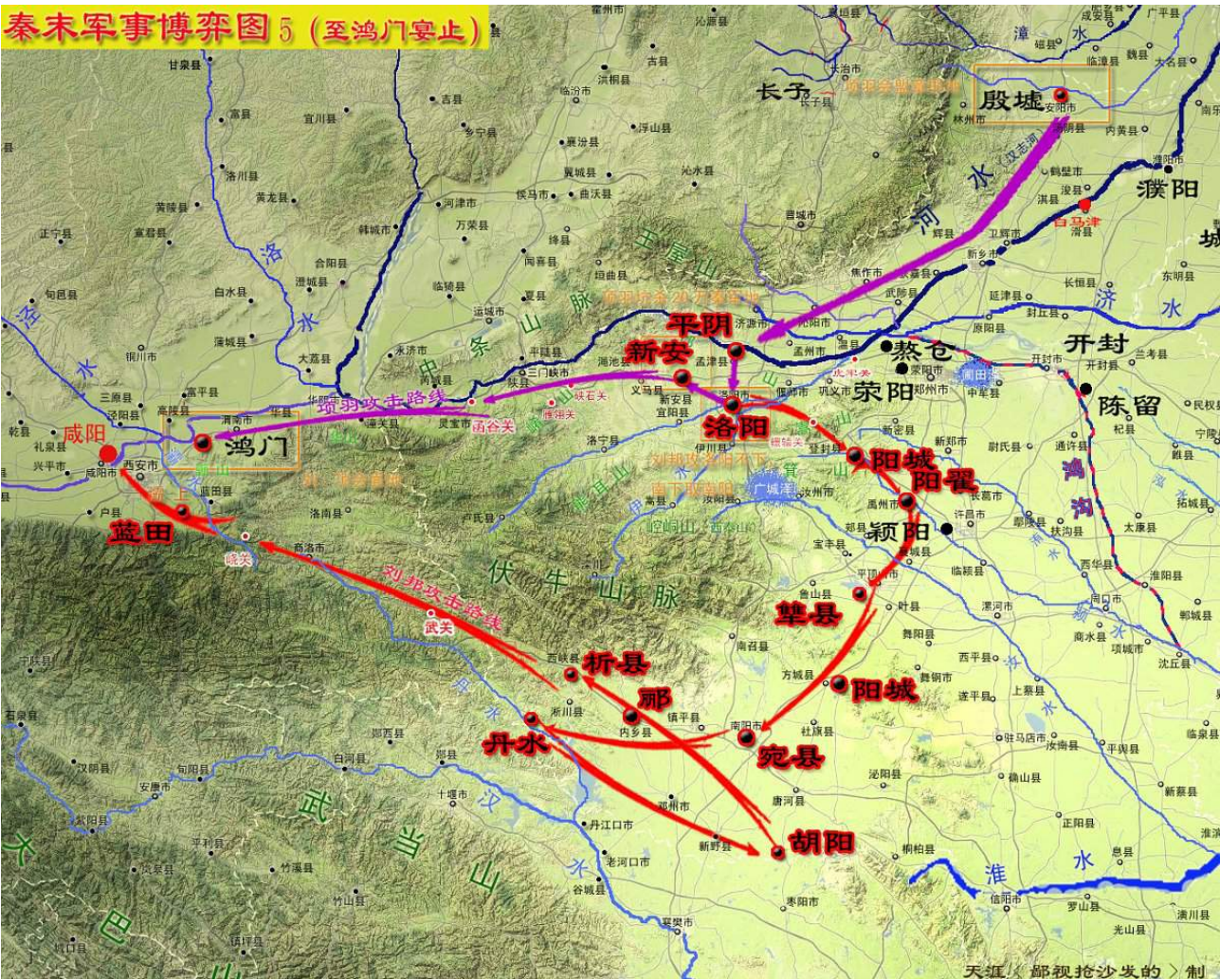
当然，完全指望这种方式来保证下属的忠诚是不可能的。就像项羽现在也派人到沛县把刘邦家人给扣压了下来，最终却被刘邦以一种流氓的方式给化解了一样（项羽在恐吓刘邦，要把其父煮成肉汤时，刘邦很淡然地回答，能不能分一杯给他）。在“家国天下”的文化背景下，当你所要管理的是一个个独立的诸侯国时，将对方的嫡亲后代留置在自己身边，应该说是规避风险的重要手段。即使你不能指望它发挥决定性的效果，也并不代表这样做是多余的。项羽如果在最初分封时也是这样做了的话，那么诸侯们（比如黥布）在有二心时，就不得不考虑更多的因素了。

就在刘邦着手做这些政治、军事上的准备时，东线的战场也已经决出了胜负。一方面项羽已经排除了汉军在东线阻击楚军的据点；另一方面，黥布的军队也被楚军主力所击溃，淮南的九江之地又重新回到了项羽的控制之下。而黥布本人则只身带着少量亲信，沿小路逃往了关中。不过对于刘邦来说，迟滞楚军主力进攻的目的已经达到了。有了黥布拖延的这几个月时间，汉军从军力、防线，以及后勤补给上，都做足了准备。这些准备也在和楚军先锋部队最初的接触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并取得了胜利。

不过刘邦也知道，楚汉之间的第二次战役要等到项羽亲率的主力到达之后才算真正开始。而在解决掉了黥布的军队之后，项羽的主力终于穿越中原，兵临荥阳城下了。如果单纯进行野战的话，刘邦十分清楚，自己决非项羽的对手。不过在有了充足的准备和城邑的依托后，作为防御方的汉军，还是很有机会和楚军相持下去的。作为西入洛阳盆地的必经之路，“荥阳”城是汉军的第一道防线。为了保证这个战略据点的补给，刘邦在荥阳与黄河南岸的后勤基地“敖仓”之间修筑了一条甬道。这样，由关中——洛阳盆地一线输送过来的粮食、军队，就可以通过这条陆上交通

线源源不断的输入到荥阳城中。

对手凭借“甬道”打通自己的补给线,对于项羽来说并不陌生。当日在巨鹿之战中,章邯正是用同样的方式来补给巨鹿城下的王离军的。按理说,当时项羽以劣势的兵力尚能歼灭王离,打败章邯。在实力不可同日而语的今天,打败汉军应该更不成问题了。不过单从军事角度来看,今日的汉军和当日的秦军在部署上还是有本质区别的。最显著的区别,就是现在的汉军是在荥阳城内据城以自守,而当日的王离是在巨鹿城下围城。相比于攻击后者可以与城内的赵军互为呼应,里应外合不同,这一次楚军所面临的是一场任务艰巨的攻坚战。黥布为汉军所争取的每一天,都在为荥阳城的防御力增加筹码。



秦末军事博弈图五

在先秦乃至后世的攻城战役中,一座准备充分的城池坚守一年甚至几年,都是很正常的。楚军现在所面临的也正是这样的问题,在齐、赵两地之乱还没有平定的情况下,项羽不得不在荥阳城下和刘邦进行一场旷日持久的战役,这显然不是项羽愿意看到的。为了打破这种僵局,汉军的补给线(甬道)成为楚军的重点打击对象,

就像在巨鹿之战所做的那样。从防御的角度来看，中原西北侧的荥阳并不是最好的选择（也就是今天的郑州古荥城，在现在荥阳市的东北）。这座韩地的重要城邑，位置并非是在进入洛阳盆地的水陆关口上。那个关口在历史上曾经以成皋、虎牢、武牢、汜水这些名字出现，并经常成为重要战役的发生地。刘邦之所以选择这个点建立防线，一方面是出于政治的需要。因为如果放弃了荥阳，也就等于放弃了整个中原，整体转入了战略防御阶段。这对于那些骑墙的诸侯们的心理影响是巨大的。如果要想稳住他们，最好的办法就是告诉大家，汉军仍然有实力和楚军在中原争雄；另一个原因，则是韩地毕竟是刘邦比较有信心的板块。就这样不作抵抗的把韩地的核心区拱手让给项羽，刘邦是很不甘心的。

最后一个原因，就是“敖仓”这个点了。作为鸿沟、济水、河水，三水交汇的枢纽之点，敖仓在秦帝国时期就是重要的物资转运中心和储备地（从名字就可以看出）。从敖仓的地理位置和功能来看，和中原东侧的“定陶”颇为类似。虽然你可以把这里储备的粮草、物资向西运走，但也意味着不能再从中获取战略利益了。正因为有了上述原因，刘邦才不愿意就此撤入高地，试图和项羽在中原再血拼一场。

从战术上来看，荥阳和敖仓应该也算是个黄金组合，前者为后者提供保护，后者为前者提供补给。汉军在二者之间所构筑的两面有墙体护卫的“甬道”，除了作交通线以外，本身也可以算是一道“长城”。只是这种长城的防御力，始终比不上天然的山地所提供的保护。在楚军的重点打击之下，汉军的甬道多次被中断，而荥阳城中的汉军也越来越难以为继了。汉军的这种不利局面，不可避免的对于那些依附的诸侯心理产生了影响，最先出现异动的就是西魏王魏豹了。这位假托父母有病，离开前线回去探视的诸侯，一回到河东之地便断绝了渡口，宣布反正归楚。

西魏的反叛，犹如在刘邦的背上插了一把尖刀。可以说，让刘邦在关中的根据地瞬间暴露在对对手的眼皮底下。这固然是一个坏消息，但并没有坏到让汉军马上崩盘的地步。因为和大多数的骑墙派一样，魏豹的这种反叛更多的只是政治上的表态。在项羽还没有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前，他更乐意以一个独立的、旁观者的态度来保存筹码。这种心态在黥布心中也有，即使是他为求自保主动向楚军宣战之后，也并不排除日后重新归楚的可能。

可惜的是，在楚军攻下淮南之后，“赏罚分明”的项羽又一次快意恩仇的举起了屠刀，将叛徒黥布的家人斩尽杀绝。在这种情况下，骑墙派也就不得不变成“反对派”了。相比之下，刘邦的方式就显得柔性得多了，清楚魏豹的反叛更多是一种观望的刘邦，最先试图用劝说的方式将西魏重新拉回到汉军阵营。而在胡萝卜政策无效的情况下，汉军中最为天才的军事家——韩信，很快使用大棒解决了问题。当然，能这么快的消除掉这个隐患，也并不全是军事上的胜利。刘邦在统一半个天下时，在各地所树立的政治威望，以及魏豹本人不够坚定的决心，都让汉军能够迅速的结束河东之战。

而在战场上失利的西魏并没有受到项羽式的报复，魏豹也又一次的回到了汉军阵营中。不过，西魏再也没有理由成为独立王国了。相比于项羽如此怀念战国时的格局，刘邦更愿意学习秦人的管理模式，以稳定自己的统治。因此，“西魏”所辖的河东、上党板块，相继成为直管体系的“郡”。

西魏的反复只是楚汉第二次战役中的一个插曲，由于处置得当，并没有对汉军造成负面的影响。相反，还让刘邦借机“削藩”，增强了自己的核心力量（那些同为诸侯王的盟军是靠不住的）。

第二节 刘邦与项羽和解失败

虽然刘邦平定了西魏的反叛，不过在荥阳一线的正面战场上，汉军仍然无法打破僵局。在楚军持续攻击补给线的情况下，汉军即使能够勉强支撑，也没有能力在正面战场翻盘。在这种情况下，已经感到力不从心的刘邦试图和项羽和谈，以荥阳为界，作为汉地的最东点，放弃与项羽争霸的想法。依项羽的想法来看，并非没有可能答应刘邦的条件。因为相比于西线这些被刘邦所控制的高地来说，他更关注对自己的根据地构成直接威胁的那些山东诸侯（特别是齐国）。否则当初也不会那么轻易的把关中“留给”刘邦了。也就是说，如果两军就此休战，刘邦亦愿意尊项羽为“霸王”的话，那么即使将来楚、汉之间仍然不可避免的会发生战争，楚军也很有可能会暂时休战，以腾出精力去解决齐地的问题。

毕竟战争的进程已经大大超出了项羽的预期，在西线拖的时间越久，项羽对于后方的忧虑感就越强。项羽的担心并非没有道理，尽管在睢水之战中（楚汉第一战役），项羽凭借胜利已经慑服了齐、赵两国，让他们在名义上又顺服了西楚的霸权。但谁都知道，这次顺服只是表面的，一旦楚军在前线战事不利，这些“异端”随时有可能抄了楚军的后路。对于这点，刘邦也是非常清楚的，所以当他在荥阳一线苦苦支撑时，也派出了使者游说这些观望的诸侯，希望他们能够像黥布那样站到汉军一边来。

在刘邦派出使者游说诸侯中，最先和刘邦达成战略同盟的，是那位和韩信、黥布并称为汉初三位名将的彭越。说起彭越这个人，其实很有意思。可能和他的出身地“巨野”一直是几方博弈的焦点地区有关，这位枭雄在起兵之后就一直不忙于站队。虽然和项羽、刘邦、田荣等诸侯都曾经合作过，但在政治上却一直没有明确的受过谁节制。从这点看，彭越更像是个“游击将军”。不过从他的活动区域来看，倒是对中原东部（梁地）至泗水一线非常感兴趣。问题是，这块区域是项羽的自留地，除非项羽倒台，否则彭越是不可能染指这一区域的。因此在刘邦率联军东征彭城时，彭越也加入了盟军，独立在梁地攻城略地。明眼人都看得出，这与其说是在为汉家打天下，不如说是在为自己圈地。

基于自己的诉求和项羽有不可调和的结构性矛盾，在汉军主力败退到了荥阳一

线后，彭越和他的军队仍然执着的在西楚的腹地游击楚军。毕竟如果汉军胜了，彭越还有机会实现自己梁地称王的梦想；而如果项羽胜了的话，是绝没有可能给他留下一块封地的。正是因为有了彭越的袭扰，项羽继续追击刘邦的决心动摇了。前面也分析过了，项羽对于自己那一亩三分地的重视程度，要远远高于西部那些高地。也正是这种缺乏战略眼光的想法，让两千多年后的毛写出了“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诗句来。

项羽在战略方向上的认识不清，并不代表所有人都会这样。最起码他最尊重的谋士亚父范增，就很清楚刘邦才是最大的威胁。即使真到了要和刘邦平分天下的地步，以荥阳为分割点，对于项羽来说也不是个好方案，最起码要把分割线放在函谷关一线，双方才有可能真正达成平衡。正是由于有了范增的力谏，项羽最终才没有放弃对荥阳的攻击，与刘邦达成和平协议。既然不能用政治手段解除掉荥阳之围，而彭越的游击行动又无法从根本上动摇楚军的决心，那么刘邦就只能另辟蹊径，想其他办法来打破僵局了。

正面不能突破，对手彭越在后方的游击又不能起到决定性作用。那么刘邦在战略上就必须把视线放在南、北两翼了。如果河北的赵国和两湖一带的衡山、临江两王能够和汉军形成同盟的话，那么楚军就有可能陷入三面包围的境地了。问题是现在楚军正处于战略进攻的阶段，且又有黥布这个不成功的例子在前面，再想让这些已经有了一亩三分地的诸侯们出头叛楚归汉就难了（彭越不一样，因为没有根基之地）。当然，这些诸侯们也不是看不出刘邦在战略上所占据的优势（民心、政治、地理），所以上述三个诸侯所秉持的态度和大多数人一样，就是既不帮楚，也不帮汉。或者说是名义上归项羽节制，实际上却只是观战。

既然这些喜欢打酱油的诸侯们都指望不上，刘邦就只能自己想办法依靠汉军本来的力量分兵从南北两翼出关，以形成对楚的战略包围。加上荥阳一线的正面战场，汉军如果要想完成这个完美的包抄计划，实际上是要把兵力分为三部分，即一路在荥阳一线继续阻击楚军；一路透过山西高原进入河北平原，从北面向楚军施压；另一路则可以从武关道出关，由南阳盆地出击，从南线牵制项羽的兵力。相比于南北两线的主动出击，荥阳一路的任务反而最轻松。因为即使荥阳有失，汉军也可在虎牢、洛阳、函谷一线逐级抵抗。

作为防御的一方，依托这些有利的地形，项羽即使在南北两翼没有受到攻击的情况下，想借此顺利攻入关中，也是需要付出相当代价的。有鉴于此，刘邦本人决定从荥阳突围出去，亲自执行南线出关计划。不考虑政治地位，单从军事的角度来看，刘邦也是很适合这项任务的。毕竟当初他就是顺着这条路线由武关道攻入关中的。在南阳盆地有着良好基础的他，能更顺利的完成这项战略任务。至于北线出击的人选，当仁不让的落在了已经平定了西魏的韩信身上。

第二十章 韩信北上攻灭西魏和赵国

第一节 韩信从夏阳渡过河攻灭西魏

所谓“花开两朵，各表一枝”，既然韩信动作在先，我们就先来看看他这一路的任务是如何完成的。单从战术路线上来看，韩信可以以河东为基地，出王屋、太行两山之间的轵关道进入河内，然后由河内向东南方向渗透，最终插入西楚腹地。问题是，这样做固然可以比较快的与楚军接触，从而策应正面和南线的汉军；但北面的赵地始终是一个威胁。毕竟赵地现在名义上已经重归楚军阵营，如果关键时候在背后上来一刀的话，那么韩信所带领的北路汉军就危险了。最为稳妥的方案，就是将赵国（包括和它在一根绳上的代国）拉入汉军阵营，一起执行这项任务。

可惜的是，赵、代二王虽然对项羽当日在赵地的安排不满，并赶走了常山王张耳，重新分割了赵地，但现在让他们公然反楚，并主动攻击楚军，也是断然不敢的。既然赵国不肯配合，那么韩信就只有用军事手段来解决掉赵国了。事实上在韩信攻取西魏之地后，赵国就已经在担心自己成为下一个目标了。我们知道，当日被赶出赵地的常山王张耳，目前正在汉军中。有了这张政治牌，刘邦并不担心在征服赵地之后，控制上会有什么问题。而在赵地这边，虽然依旧延续了项羽分赵地为二的地缘格局，即由赵王歇管辖来太行山以东的赵国故地，扶助他归位的陈余升格为“代王”，管辖山西高原上的大同、忻定、太原三个盆地。

但为了共同应对来自南面的压力（包括楚，也包括汉），代王陈余并没有回到他在蔚县盆地的都城去自成体系，而是留在了赵国都城，和赵王一起观察时事的变化。当韩信攻下河东之地，生擒魏豹，入主魏都“平阳”（现山西临汾）之后，最先感到紧张的是代王陈余。因为从地缘关系上来看，韩信很有可能顺势北进，向北攻取代国所辖的太原盆地。为了防止自己的根基之地有失，身在赵都的代王陈余，授命留守代都的丞相夏说率代军主力南下，布防在太原盆地的南大门“邬县”（今山西介休市东北），以防止汉军北上。

事实证明，陈余的担心并非多余，为了完成北线出击的战略任务，韩信果然向邬县的代军主力发起了进攻。如果单从实力上来看，已经攻取了西魏，得以收河东之兵的韩信，应该是占有绝对优势的。问题在于，荥阳一线的战事十分吃紧，而准备南线出击的刘邦也急需兵力补充。因此韩信在河东整合、征调的军队，连同重新归汉的魏豹，都被送往了荥阳前线。就训练军队这件事来说，没有比韩信更在行的了，所以才会有“韩信将兵，多多益善”之说。也正是有了韩信这个军事天才相助，刘邦才得以在军事上和项羽分庭抗礼。

其实自从韩信独立在北线发展以后，中央之国博弈的主角，其实已经不仅仅是

刘邦和项羽了。虽然韩信也在汉军序列中,但从后来的博弈格局来看,更像是一场“三国演义”。也就是说,自踏入河东的那一刻起,我们其实就可以把韩信看成是一股单独的政治力量,并作为刘邦的战略盟友,放置在地缘政治舞台上了。了解楚汉相争这段历史的人,大都对韩信这个人很感兴趣。的确,就军事层面来看,汉军的胜利很大程度可以算是韩信之功。如果拿他和项羽相比的话,应该说二者都是军事天才。只不过项羽的表现更像是一个可以决胜一场战役胜负的将才(所以才对性格相近的黥布另眼相看),而韩信则是一个更加全面的帅才。



黄河古渡示意图 (部分)

韩信的军事才能在刘邦被迫率军入汉中时,就已经显露出来了。在萧何冒着生命危险“月下追韩信”后,他对于汉军入主三秦的政治优势作出了精准的分析,并很快得到了验证。即使是在战术层面,韩信的策略运用也远比猛打猛冲的项羽来得丰富。“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策略的运用,成为声东击西战术的代名词,并被后世军事家奉为经典。其实就韩信本人来说,这项战术也很快又一次得到了运用。在攻取河东的时候,西魏将主力布置在临近黄河拐角的“蒲坂”(河对面是关中的“临晋”),以防备汉军渡河攻击。魏豹这样部署,不是说没有道理。毕竟临晋——蒲坂一线的“蒲津渡”,自古以来就是沟通西河两岸的主要路线。上次刘邦第二次东征也正是由此渡河,并最终收取河东、河内的。

在秦晋争霸部分,我们曾经分析过,分隔河东河西的这段南北向黄河,被单独称之为“西河”,而蒲津渡并非是渡过西河的唯一渡口,和蒲津渡齐名的还有关中盆地的东北角,韩城北部的“龙门渡”。只不过这个渡口的位置由于处在黄河刚从

晋陕大峡谷钻出，水流湍急，并不是一年四季都能渡河的。而韩信最终选择的渡河地点，是在龙门渡南面的“夏阳渡”（韩城市南芝川镇）。黄河的河道到了这里已经变宽，水流也变缓了。

其实韩信在哪里渡河并不重要，因为除了夏阳渡外，还有风陵渡、茅津渡等。这些在先秦时就已经发挥过重要作用的古渡，都可以帮助汉军到达河东。除非魏军有足够的兵力将所有的渡口封锁，否则汉军总是能寻找到机会渡河的（想想当年秦晋争霸时，也同样很难阻止对方的渡河攻击）。有了“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的先例在，魏豹并非没有想到过韩信会故技重施。而韩信这次战术运用的成功之处，就是让魏豹相信了他一定会从蒲津渡渡河，并把主力集中于此。做到这点的关键，就是把关中能征调到的所有船只都集中在临晋。既然关中所船只都集中于此，魏军也就没理由分散兵力到其他可能的渡口了。

至于说韩信最后的渡河方式倒是非常奇特，史称“木罌渡河”。说穿了，就是在瓦缸外面绑着木头作为运兵船。渡河之后的韩信并没有南下和魏军主力接战，而是迂回到魏军腹地，去攻击包括重镇“安邑”在内的城邑。这一方面可以最大限度的打乱魏军的部署，让他们在匆忙回军救援时自乱阵脚；另一方面，也可以封堵魏豹在战败之后经由轹关陁逃往楚地的后路。而有了韩信的这些战术的运用，加上刘邦已经建立起来的政治声望，魏豹的失败也就在所难免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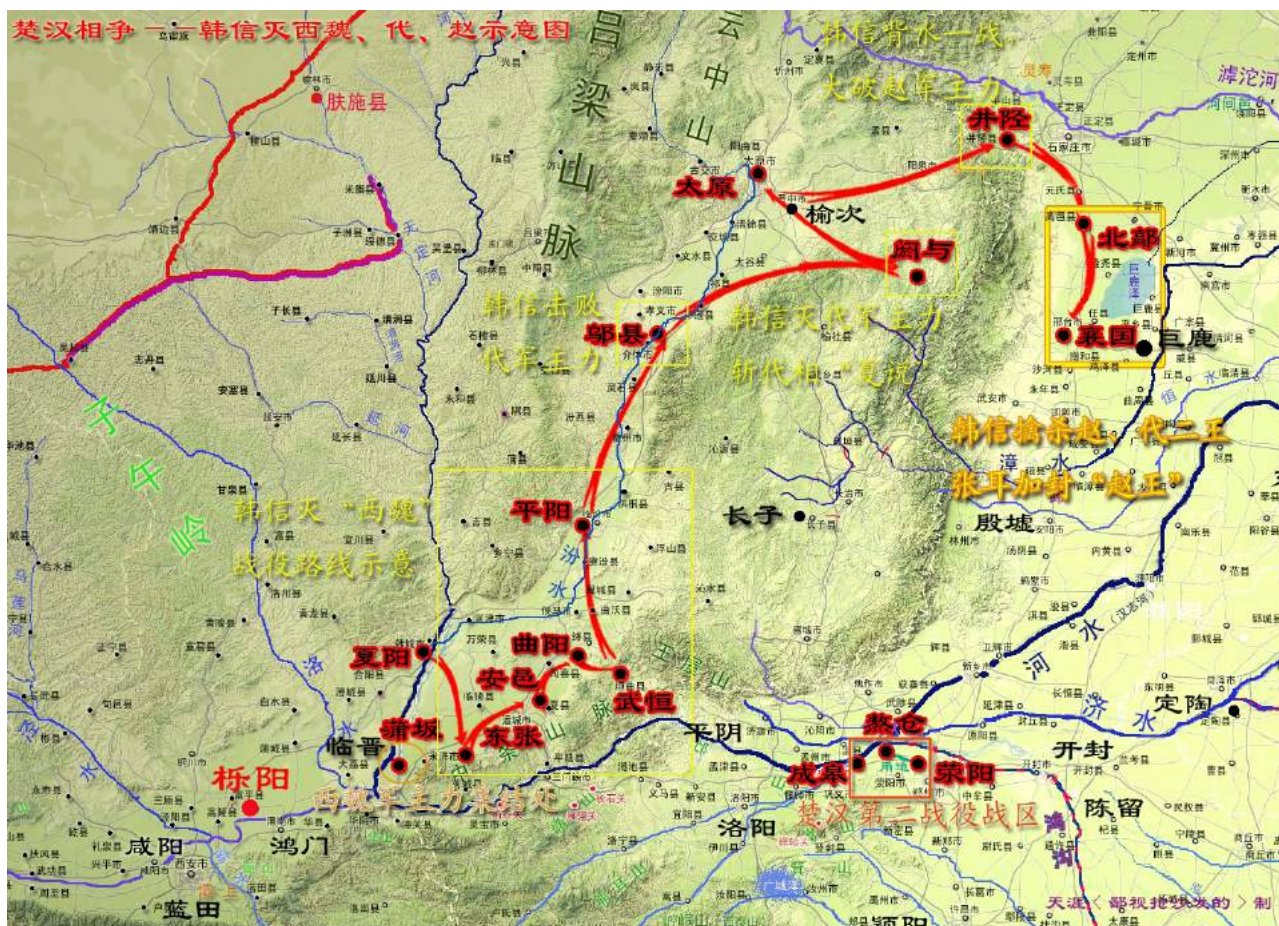
第二节 韩信在阬与歼灭代国军队

前面我们也说了，眼看韩信收复了河东，北面的代国是最为紧张的。虽然在项羽分封天下诸侯时，代国的都城被设立在了恒山以北的“蔚县盆地”。但实际上，在代国所控制的区域内，赵国旧都晋阳所在的太原盆地才是最为核心的地区。如果中央之国内部政局稳定的话，那么为了开拓（收复）北面那些已经被游牧民族渗透的边缘之地，代国倒也的确应该把政治中心放在北线。只是现在，代国必须保住自己领地内最为富庶的板块。

在刘邦抽调了韩信的兵力之后，韩信所剩余的兵力（约两万），相比于代军（约四万）是处于劣势的。不过韩信手上也并非没有王牌，张耳和他归汉时所带来的三万赵军就被他从刘邦处要了过来。这其中的意义，绝不仅仅是多了几万人那么简单。事实上作为进攻方的汉军，即使兵力比防御方多个一万人，也并不占优。所谓“十而围之，倍而攻之”，没有绝对优势的兵力，想啃下据城自守的代军，是很困难的。不过汉军中有了这几万赵人部队和一个昔日的“王”，防御方的心理不可能不受到影响。

其实作为楚汉相争的小配角，在诸侯当中实力也属较弱的代国，也十分清楚没有和汉军PK的本钱。因此在郇县与汉军接战之后，领军的代相（夏说）便率军突围，

弃城而去了（留在城中的守军，后来也被消灭了）。按照正常的思路，代军退却的方向应该是向北，即退入晋阳（太原）城、忻定盆地逐级抵抗，直至回撤到蔚县盆地的都城。问题是，这种后撤在战略上没有任何反败为胜的机会，只能在汉军的尾随攻击中把自己的实力消耗殆尽。最好的办法就是向东穿越太行山，进入赵国境内，和赵、代二王会合，抱团抵御汉军。



楚汉相争——韩信灭西魏、代、赵示意图

既然东进比北上更有机会保全自己，代军所要做的就是选择哪一条路线来穿越太行山了。我们曾经花了很大的篇幅来分析“太行八陉”。如果代军的直接目的地是以邯郸为中心的赵国核心区的话，那么滏口径应该是他们的选择。而从太原盆地接入滏口的话，并不一定要穿越上党高地腹地。在秦赵相搏的章节里，我们分析过一条沿着上党高地边缘接入清漳水河谷，最终由太行山腹地南下接入滏口径正道的路线。这条路线也是赵人在失去对长治盆地的控制时，用以连通晋阳——邯郸的生命线。而这条快速通道上的战略要点，就是曾经让秦军吃过大苦头的“阎与”（今山西和顺县所辖）。

相信精于计算的韩信已经预料到了代军主力会经由阎与退入赵地，与赵军会和。因此在代军突围之后，汉军的反应非常迅速，最终在阎与拦截住了代军的退路，斩

杀其主将。消灭了代军主力的韩信，接下来要做的就很轻松了。如果他愿意，继续向北接收全部的代地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因为这时待在河北平原的赵、代二王，决没有胆量和信心西征与韩信对战。他们现在所焦虑的，是如何将汉军阻击在太行山一线，以保全赵国。

第三节 韩信出井陘攻灭赵国

其实楚汉相争的这段历史，很像是浓缩了的战国史。如果不是项羽的个性太过悲剧，再次出现诸侯割据的“小战国”时代，也未可知。不过项羽个人的悲剧却也缩短了战乱时间，对于当时的百姓乃至中国历史进程来说，倒也是件好事。如果说项羽在政治能力的缺陷，使得他在与刘邦的博弈中已经失去了战略层面的机会的话，那么韩信的横空出世，更是在战术层面上大大加速了汉王朝的建立。也就是说，虽然从战略上来看，项羽那毫无政治家气质的表现，使得他根本没有机会创立一个“项氏王朝”，但如果刘邦没有韩信相助的话，战争的时间无疑会被大大拉长。

韩信对于刘邦来说，并不仅仅是一个军事将领那么简单。有了这个会“将兵”的助手，汉军实际上已经可以履行两线作战的战略任务了。即刘邦率领汉军主力在黄河以南的荥阳一线阻击楚军主力，而韩信则在黄河以北收三晋之地，从太行山一线击溃那些项羽所分封的诸侯。之所以说韩信所执行的是战略任务，是因为韩信在黄河以北的发展并没有得到刘邦的支援，反而他所训练、收降的军队时不时的要被尽数拿去，以补给荥阳前线的汉军。这种自给自足，独立发展的情况，让韩信已经完全具备成为称霸一方的诸侯的条件了。不过以当时的情况来看，中央之国的政治版图显然是以刘、项两家来划分阵营的。

经过灭秦战争，刘邦和项羽都已经积累了足够的政治影响力，以此来显示他们才是天下的争夺者。在这种时候贸然出头，自立门户，并不是一个好的想法。不过，不管韩信有没有过自立门户的想法，现在这种独立发展的情况，已经足以让他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了。因此，我们也可以认为，项羽现在所面对的并不是一支单纯的“汉军”，而是以刘邦为核心的“汉军”，以及以韩信为领导的“韩军”（为避免歧义，可称之为“韩信军”）。至于说刘、韩两股政治力量将来有没有可能分裂，倒不是项羽现在会考虑的。在他看来，只要能够攻破固守在荥阳的汉军主力，自己就是当然的“天下之王”了。既然项羽和刘邦作为政治博弈舞台的主角，已经顶死在洛阳盆地和中原腹地的交界之处了。那么中央之国其他板块的博弈就要由韩信和那些项羽阵营的诸侯们，自己去解决了。非常不幸的是，项羽方面的这些诸侯虽然表面站在楚军阵营，但实际上都还在看风向。尽管慑于项羽的军威，诸侯们这种首鼠两端的做法暂时不会给楚军的侧翼造成直接威胁，但他们之间也难以产生合力共同抵御韩信的东进。

在韩信凭借他的军事天才，以及诸侯们的犹豫之心，攻取了整个太行山以西的三晋故地后，开始准备东出井陉攻灭赵国了。关于穿越太行山的路径，我们在战国部分已经花了很多时间来解读了。应该说，根据韩信军的位置，以及“太行八陉”的分布，赵国并不难判断出韩信的行军路线。事实也的确如此，韩信准备通过井陉穿越太行山的消息，很快便被赵军获知了。对于处在防守一方的赵人来说，当年秦军的那些攻赵战争，让他们有足够的历史经验来对抗韩信军的入侵。从战略角度来看，赵军其实是非常有优势的。赵国在河北平原积蓄的力量，以及从太行山以西撤回来的代军，让他们从兵力上占据了很大优势（号称二十万）。而此时的韩信刚刚平定了太行山以西地区，主力又被刘邦所抽调走（只有三万新军），并没有本钱和赵军进行持久战。只要赵军以优势兵力扼守住井陉的出口，即使战力稍弱，也可阻敌于太行山之西。

其实，抛开韩信和赵军的实力对比不说，单凭一路进攻，就想攻入河北平原也是非常困难的。事实上，我们在战国末期的秦、赵战争中也可以看到，每一次秦国的入侵行动基本都是两路出击。即选择两条穿越太行山的通道，两路出击。正常情况下，韩信也应该花点时间经营一下那些刚刚归顺的土地。在兵力、物资都准备充分的情况下，再以两路出击方式攻赵，然而韩信最终还是选择了在兵力尚显不足的情况下攻赵。虽然在军事上取得了节节胜利的前提下，这种一鼓作气的做法在战术上也有些道理。但在双方兵力对比悬殊，对方又据有天险的情况下，这种做法无异于是在赌博。

之所以说韩信的这次攻赵之举是一场赌博，还在于韩信的战术运用。这是一次堪比项羽“破釜沉舟”的赌博战术，其结果也同样收获了奇迹，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背水一战”。与“破釜沉舟”大破秦军成为项羽的成名之作一样，韩信大败赵军的“背水一战”也成为他军事生涯中的经典之作。两者在战术上的共通之处，都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然而战场上的胜负，并不仅仅取决于自己有必胜的决心和巧妙的战术，也要取决于对手的表现。对于韩信来说，他的幸运在于赵军没有采取正确的战术来固守坚垒和他打消耗战。要知道，刚刚打下山西高原的韩信，相对地头蛇的赵军来说，是完完全全的客军。处在防御状态的赵军只需闭门不出，加上坚壁清野，就足以让韩信因缺乏补给就知难而退了。

只不过，道理虽是如此，但在自己兵力上拥有绝对优势时，却不是每一个统帅都能够把握的。在正面交锋中，克敌制胜所带来的成就感，让很多军事统帅放弃了看上去有些保守的稳妥战术。关于韩信“背水一战”的战术细节，相信大家都可以百度到。在这里，我们所关心的是战争的结果所导致的楚、汉两方博弈格局的变化。对韩信而言，井陉一战的意义，不仅在于尽灭赵军主力（连赵王都俘虏了），更在于从此之后，再也没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关口阻挡韩信的去路了。对于取得了一系列胜利的军事天才——韩信来说，河北平原一马平川的地形，意味着他有

更大的发挥空间。

如果说刘邦所率领的汉军主力，现在的战略任务是在荥阳一线拖住项羽的楚军的话，那么韩信的战略任务，就是通过迂回战术将那些西楚阵营中的诸侯各个击败了。基于这个目的，灭掉赵国并不是韩信东进的终点。要是此时不南下渡过黄河支援荥阳前线的话，河北平原北部的燕国，以及山东半岛的齐国，就会是韩信的下一个目标了。

第四节 燕齐两国面对韩信兵威的选择

面对即将到来的战争，燕、齐两国无非面临两个选择，或战，或降。到底要作出什么样的选择，并不在于他们是怎么想的，而是在于处在进攻方的韩信是怎么做的。所谓“三分军事，七分政治”，胜利并非只能从战场上收获。向这两个并非坚定支持项羽的诸侯展示出进攻的态势，并善待之前被收降的赵国军民，就能够起到很好的“胡萝卜加大棒”的效果了。

从地缘实力看，燕国要比齐国更容易受到韩信这种“不战而屈人之兵”战术的影响。在漫长的春秋战国时期，燕国所一直扮演的角色，就是偏安于燕山脚下，并无力于争霸于中原。历史上给予燕国板块最大的露脸机会，就是乐毅伐齐。对于这点，在楚汉战争中割据故燕之地的“新燕王”，当然也是心知肚明的。既然没有成为主角的实力，那么甘为配角，把宝压在更有机会获胜的一方，就是保全自己的最好方式了。如果没有现实的压力的话，燕国完全可以先关起门来经营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静待局势发生根本性的转变后再做决定。然而韩信如此神速的解决了赵国，将兵锋指向燕国，却让燕王必须很快的做出抉择了。要么归降韩信，成为汉军阵营中的一员；要么像当年的燕国一样，抵抗到底，甚至在失败之后撤入辽东作最后的挣扎。

应该说，燕国最终选择了归降韩信并不让人感到意外。毕竟以燕国的实力，只需要在两强当中作选择题就可以了。而且这一次的选择也不一定会是最终的结果，一旦有一天项羽重新回到河北平原，燕国同样也可以反戈一击，倒向西楚阵营，就好像魏国那样。然而同样的威慑，对于齐国却没有起到太大作用。究其原因，还是因为齐地的地缘条件使得占据这片土地的人，总是觉得自己应该有机会跻身于政治舞台的中心。也就是说，齐地边缘板块的位置，以及自成体系的地理结构，让齐国不甘心于如此之快的成为配角。最起码，齐国有本钱再看看形势是如何发展的。齐人此刻的态度一如他们在战国时期的表现一样——“坐山观虎斗”，既不入楚，也不入汉。基于齐国的位置，齐人的这种“中立”态度倒也是可以接受的。只是如果齐人回头看看历史，就应当清楚这种骑墙的态度，并不能够让自己笑到最后。

从战略上来看，解决齐国的任务应当是由已经控制了河北平原的韩信负责。不过一方面前期的灭赵收燕进行得太过顺利，韩信需要有时间来消化这些胜利果实，

积蓄力量；另一方面，齐国的山、河之利，也使得韩信必须进行更充分的战争准备，才有可能一战而胜。要知道，如果不能一战而胜的话，贸然发起的进攻很有可能就把齐国推入到了楚军阵营了。事实上，齐国目前这种人畜无害的表现，已经能够让汉军满意了。当然，对于汉军阵营来说，如果齐国能够在这个时候战略牵制楚军是再好不过了。只是刚才我们也说了，齐国要比燕国更有实力再观望一阵。因此刘邦所派出的使者（就是前面提到过的酈食其）除了被齐王热情款待，好酒好肉地招待以外，并没有机会说服齐王。

第二十一章 韩信率军南下攻灭齐国

第一节 汉军能够在荥阳坚持的原因

尽管韩信在山西高原以及河北平原对那些杂牌诸侯一气呵成的军事行动，极大的逆转了楚汉双方的对抗局面，但项羽仍然牢牢控制着中原腹地以及东楚之地。虽然从地缘结构上来看，我们并不认为项羽一味的眷恋东楚之地，以及控制了中原腹地，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但“得中原者得天下”却是一个现实。也就是说，不管韩信在河北取得多么大的成功，如果汉军不能够在中原击溃楚军的话，就不能说取得了战略优势。

单从军事能力来说，刘邦明显不是项羽的对手。之前的荥阳之战（楚汉第二战役），楚军本来已经占得了优势，并击破了汉军的补给通道，只是由于那个一直期望在“梁地”称王的彭越在楚军后方捣乱（史称“彭越扰楚”），使得项羽不得不回军以解后顾之忧。而在收复了被彭越攻取的城池之后，项羽很快又杀回了荥阳前线，再一次将兵锋指向了汉军主力。

其实没有固定地盘的彭越，本身并没有实力与项羽久战，这也是刘邦非常希望齐国能够加入自己阵营的主要原因。如果齐国能够和汉军联手的话，那能起到的作用就不仅仅是袭扰那么简单了。楚军必将面临真正的两线作战，而在齐、汉两王都拥有大后方的情况下，这种两线作战必将极大的消耗掉楚国的实力。不过彭越在项羽后方的游击战，还是对楚汉战争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他不仅为荥阳一线的汉军争取了喘息的时间，也让项羽无力去关注赵、燕等国在河北平原的命运。很快，韩信在河北平原打下的地盘，就将成为决定楚汉战争走向的关键因素了。

对于在荥阳胶着的楚、汉两军来说，战争已经陷入了痛苦的拉锯状态。总的来说，当项羽在的时候，汉军一方是处在守势，并经常被楚军攻破补给线，甚至破城；而当项羽回师收拾不断在后方袭扰的彭越时，汉军又能在局面上占据优势，并夺回一些失去的据点。这些因楚汉拉锯而被载入史书的城池、据点，包括荥阳、成皋、汜水、敖仓等。这些地名，我们在战国部分其实都已经解读过了。如果你一定希望了解这些点在哪里的话，可以回头翻阅那些曾经的内容和相关地图；如果不想那么麻烦，或者有一定印象的话，那么我们只需清楚，这些不光在楚汉战争中经常出现的地名，其实指向的都是一个战略通道，那就是洛阳盆地的东大门。

也就是说，楚、汉两军主力拉锯了三年的（公元前 205——公元前 203 年）“楚汉第二战役”，对于汉军来说，就是一场“洛阳盆地保卫战”。楚军之所以不能迅速打开洛阳盆地的东大门，除了汉军采取保守的据城以自守的防御战以外（除非项羽离开，否则不主动出击），也和彭越在楚军后方袭扰不无关系。不过即使没有这

些因素，楚军也不可能很快结束战争，反而一定会被拖入持久战的泥潭中。这个恶果其实在项羽自立“西楚霸王”、分封天下时，就已经种下了种子。放弃在形胜天下的关中盆地称王，而眷恋故土——东楚，以及简单的认为把一马平川的中原归属了自己，就能够“得中原者得天下”，注定了项羽将以失败而告终。

即使项羽能够很快结束荥阳之战，甚至进占整个洛阳盆地，汉军也能够再退守函谷关，并据地势更险峻的“崤函通道”节节抵抗。而要想攻破这道天险，楚军所需要付出的代价和时间成本将会更大。反观楚军，一旦在军事实力上被汉国逆转的话，他们背后那一马平川的平原之地就不知道要退到哪里才是个头了。

对于以“勇战”而闻名于世的项羽来说，他一开始应该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地缘上的劣势这一点。毕竟凭借自己的军事能力，项羽可以说以一己之力打垮了强大的秦军，并成为事实上的天下之王。在这巨大的成功面前，项羽本身对楚军战力的信任度，要远高于那些被世人视作天险的雄关峻岭。然而在荥阳拉锯的时日一长，习惯于一战解决对手的项羽，也不得不重视这些战略性的东西了。要知道，摆在项羽面前的，不单单是以后可能会遇到的汉军不断据险以自守以消耗楚军的局面（那会迫使楚军必须投入数倍的资源才有可能取胜），更在于这时候的战争已经转而成为比拼双方根基之地地缘实力的战争了。

当战争陷入拉锯状态时，双方在正面战场上的一些战术性的胜负就已经不那么重要了。重要的是，谁的后方拥有更多的资源来支撑这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以双方最根本的基地——江东平原和关中平原来说，尽管在后来的历史中，江东平原的价值越来越高，并且最终成为物产丰富、富甲天下的象征。但在楚汉战争时期，江东平原无论在开发程度还是农业基础上都远不如周、秦两代苦心经营了近千年的关中之地。更何况，秦人还“帮助”刘邦开发了“天府之国”的成都平原，足以在粮食产量上再造一个关中平原。在这种情况下，单从物资补给的角度看，刘邦一方也要更占优势（基本就是接收了秦灭六国时的本钱）。

除掉所占板块的地缘实力差距以外，刘邦的侧后方显然也要比楚军安全得多。相比楚军后方有不安定的“游击将军”彭越，以及首鼠两端的“齐国”，刘邦的侧后方可以说是高枕无忧。唯一有过异心且盘踞河东的魏豹，也已经被韩信迅速解决了。这种无后顾之忧的地缘政治格局，让刘邦不仅能够率领汉军主力在荥阳一线消耗楚军，还能够让韩信独立出太行山，在黄河以北攻城略地。

如果说对手有大后方源源不断的补给（具体的后勤保障是由慧眼识韩信的萧何负责的），而自己的后方却又不断遭遇彭越的袭扰，以至于补给困难，已经让项羽感到有些难以支撑了的话，天才军事家韩信在河北平原的快速推进，更成了压垮项羽必胜决心的最后一根稻草。韩信在河北平原如此迅速的解决掉赵、燕两国，不仅从北面给楚军造成了巨大的战略压力，还在战术上直接支援了荥阳前线的汉军。在项羽返身击退彭越，暂时解了“梁地”之困之后，率主力回师荥阳前线的项羽又一

次取得了战役的主动权，不仅夺回了之前被刘邦复夺的荥阳，还逼迫刘邦不得不弃城而逃。

要是没有韩信在河北平原的成功，在荥阳前线失利的刘邦很可能就要考虑在洛阳、滎池、崤山、函谷关等崤函通道上的据点上设置第二、第三道防线，以阻击楚军的追击了。不过，有了韩信在河北平原的成功，刘邦就又多了一种更积极的选择，就是在汉军苦苦支撑洛阳盆地东大门其他据点的时候，从河北调兵以扭转战局。

一般情况下，有了韩信这个军事天才在河北的良好发展，刘邦应该选择命令韩信率军渡河侧击楚军，以缓解汉军的正面压力，甚至击溃楚军。然而刘邦却选择了一种相对另类的方式，就是突然出现在韩信军中，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征调了韩信军的主力，并兵分两路，一部分东向去支援彭越，以让他继续袭扰楚军后方；另一部分则带回了荥阳前线，继续和楚军对抗。

单从战术角度来看，刘邦这种做法也有他的道理。明知项羽在正面战场的军事能力远胜于自己的他，最希望和项羽打的是一场消耗战。依托自己的地缘优势，刘邦有信心把这只老虎的爪子磨平。而从结果来看，汉军的这种恢复能力也的确让项羽感到了绝望。为了能够迅速结束这场消耗战，他甚至使出了一招似乎只有小人才会用的招数——以刘邦的家属，尤其是父亲的性命来迫使刘邦投降。只可惜他遇到的是一个流氓，一句：“吾与项羽俱北面受命怀王，曰‘约为兄弟’，吾翁即若翁，必欲烹尔翁，则幸分我一杯羹。”就让项羽手中的王牌变得一文不值了。当然，项羽说起来也的确做不了小人，思虑再三他还是留住了刘邦家属的性命，并在双方和谈之后交还给刘邦。

与刘邦有韩信可以帮助独当一面不同，英雄无双的项羽就有点独木难支了。不过这也怪不得旁人，事实上韩信当初投的就是项氏家族，在受到冷遇后才转而投入汉军阵营的。而这个在军事上完全可以自我发展、独当一面的韩信，最终也成为西楚政权的掘墓人。

第二节 韩信决定攻打齐国的私心考虑

当楚军在荥阳前线越来越感到难以支撑时（倒不是正面对抗不行，而是补给越来越困难了），在河北整军完毕的韩信又一次开始了他的东征之旅。这一次，他的目标是最后一个独立的诸侯国——齐国。一旦齐国落入了汉军之手，项羽的后院可就算是真正的起火了。

如果说项羽的军事天才加速了秦帝国崩溃的话，那么韩信的军事天才则让历史的车轮，更加快速的驶向新的大一统王朝——汉帝国。正是在这两个不世出军事天才的共同作用下，从陈胜在大泽乡喊出那声“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到项羽饮恨乌江，刘邦建立汉朝，仅仅花了八年时间（公元前 209 年——公元前 202 年）。不过

与项羽依赖自己超凡的勇气“勇战”，并以江东子弟兵为核心建立百胜之军不同，韩信所代表的是一种“谋战”的思维。这种思维不仅仅表现在战术上的多变，同样也表现为“不挑食”。两者之间的区别，简单点说就是如果项羽本身出现问题，包括他的江东子弟兵不断的被消耗掉而无法得到有效补充的话，那么项羽和他的军队的战力就一定会受到影响；而反过来，韩信的“不挑食”，则表现为他可以空降到任何一个区域，统帅任何一支军队，都能够使之迅速形成战斗力。二者的管理能力，孰优孰劣相信大家都能够感觉出来。

相信对于项羽和韩信军事才能的研究成果，并不会仅仅运用于军事领域。不过这些并不是我们所要关心的，我们现在所要解读的主要内容是双方在战略上的博弈。当刘邦征调了韩信军主力南下对抗楚军主力后，战略上独当一面的韩信并没有闲着。只不过他这一次的动作，却已经不能完全被定义为“食君之禄，忠君之事”了。

对于韩信的军事才能，我想大家已经不会怀疑了。史书中用一句“韩信将兵，多多益善”，便极好的总结出他整合、统帅军队的能力。因此在刘邦征调走韩信军主力之后，韩信很快以剩余军队为基础补充整合出了一支新的军队。而对于韩信而言，他这时候面临两个战略方向的选择：一是南下侧击楚军，与刘邦、彭越三面围攻项羽；二是东征齐国，打掉这个持观望态度的“第三方”。

从楚汉战争的对抗形势而言，南下合围楚军，无疑是韩信最有可能，也最应该做的决定。因为从战略格局来看，被刘邦、彭越消耗得疲惫不堪的项羽，现在已经是进退两难了。如果韩信此时作为生力军加入正面战场的话，项羽所能选择的就只能是战略后退了。然而最终韩信还是选择了第二套方案，即东征齐国。至于原因，其实很简单，战略上已经看清结果的韩信，要为自己的将来打算了。

尽管有秦国中央集权的郡县制在前，但参与秦末战争的将领们都相信，这并不是一个得人心的制度。也就是说，不管谁获得最终的胜利，对有功之臣进行分封都是必需的。对于韩信来说，也是时候为自己的将来考虑了。一般情况下，军事将领所封建之地都是自己的战功所在。从韩信现在的战功所在来看，山西高原上以河东为核心的“西魏”之地，河北平原的燕赵之地，都是韩信帮助汉军所打下的天下。就目前的情况看，韩信可以选择向刘邦要求分封魏王、赵王，或者燕王。

单从给自己选一块根基之地的角度看，河东之地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作为晋国故地，周王朝八百年的历史已经充分证明了这是一块风水宝地。不过韩信却并没有奢望刘邦会把这块地封建给自己。有了项羽放弃高地而陷入战略被动的前车之鉴，任何一个有战略思维的人都应当不会相信，刘邦将来也会步项羽的后尘也回到楚地，坐视太行山以西那些高地成为他人的根据地。事实上在韩信大破西魏，将魏豹送往荥阳前线之后，河东就已经被刘邦改制为“郡”了。在刘邦如此明确的发出信号之后，如果韩信一定希望得到这块封地的话，很难不让人怀疑他是不是想步魏豹的后尘。

既然做不了魏王，那么河北平原的燕、赵之地呢？以当时的情况来看，韩信也

同样不大可能图谋这两块土地。一方面，韩信之所以能够迅速在赵地取得军事上的胜利，也和得到了与他合作的原“常山王”张耳的鼎力相助有关。关于张耳和赵国的恩怨，我们在前面的内容已经交待过了。可以说，张耳之所以投奔汉军阵营，想的就是有朝一日能够重返赵地。在这种情况下，韩信如果一定想做赵王的话，刚刚稳定的赵地势必会出现变数。事实上，在韩信、张耳统军攻取赵地之后，张耳就已经被刘邦加封为新的赵王了。因此不管从哪个角度看，韩信都不会打赵地的主意。

假如燕国是被韩信武力攻破的，也许韩信会考虑向刘邦请求做个燕王。不过燕国却是在“胡萝卜加大棒”的政治攻势下主动投降的。这样一个“顺应天命”，识时务的典型，无论如何也不好打他的主意了。其实就算燕国是被韩信武力收服的，韩信也未必看得上眼。虽然从面临内部博弈的安全角度看，像燕地这样后背无忧的边缘板块（不考虑边缘民族的情况下）无疑是更有机会传以子孙的封建之地；而从政治角度看，燕地也远离了将来的政治中心，可最大限度的避免中央政权的掣肘。只是以燕地本身的地缘潜力而言，在中央之国内部诸板块中可以说排名靠后。很难想象，以韩信之功会愿意屈就在此。

既要有边缘优势，又要远离政治中心，还要在包括物产、人口、利于防御的地形等地缘潜力指标上占优，能够满足这个条件的就只有“齐地”了。齐地虽然非常符合韩信为将来谋一块安身立命之处的目标，但如果这时齐王田广像燕国一样识时务的倒向汉军阵营的话，那么韩信也就很难有机会了。到那时，他再所能谋的估计就只有他和刘邦、项羽共同的老家——东楚之地了。只是有了项羽的案例在前，这似乎并不是个好的选择。

第三节 韩信击败齐楚联军后拿下齐国

鉴于齐国现在“中立”的态度，刘邦本身对于劝说齐人倒向自己还是很有信心的。毕竟所谓的“中立”，只不过是看风向罢了。只要自己在楚汉战争中取得战略性优势，相信齐国很快就会倒向自己的。而战略的天平，在项羽困于荥阳前线且韩信攻略河北之地后，就已经倒向汉军一面了。在这种情况下，那位曾经为刘邦在陈留之战中出过力的高阳酒徒酈食其被派往了齐国，以说服齐王弃楚投汉。

正如刘邦所预料的那样，此时楚汉两军的战略形势的确足以让齐王生出弃楚投汉的想法。只是荥阳战场尚没有决出胜负的现实，却又让齐国不愿意这么快就把宝压在刘邦身上。于是乎，齐国虽然表面上同意了倒向汉军阵营，实际上却仍然保持中立，并没有出兵攻击楚军。至于那位喜好喝酒的说客酈食其，倒也没白跑一趟，每天都和齐王在宫中把酒言欢。

齐王选择这种暧昧态度也不能说错，毕竟项羽现在还控制着半壁江山，虽然现在战略上有些被动，但军威尚在，齐国希望在更有把握时再反戈一击也可以理解。

只是这种暧昧态度，最终却为齐王带来了杀身之祸。因为基于前面我们所分析的原因，齐国可以入汉，但齐王如果入汉的话，却会让韩信失去这块为子孙后代所谋的福地。在这种情况下，本来就独立发展，在政令上不需要受刘邦具体节制的韩信，决定乘齐国尚没有在行动上证明自己有投汉之心的背景下，发动了攻齐战役。

从战略上来看，韩信此举是十分危险的。因为无论刘邦对齐国有没有采取政治攻势，齐国也会保持中立状态，最低限度不会与汉军为敌。依照秦灭六国的路线，在解决了楚国之后，齐国基本就会放弃抵抗了。事实上，以今时今日的情况，并不用等到尽收楚地后才能解决齐国问题。时刻盯着风向的齐国肯定会在最后的时刻主动出兵帮助汉军打“落水狗”的。换句话说，此时的韩信大可无视齐国的存在，集中兵力南下帮助刘邦与楚军决战。而如果不这样做，一定要以齐王答应降汉不可靠为理由，力图通过武力来解决齐国的话，齐国就不可避免的投入西楚阵营了。

最终的情况也的确如我们所分析的那样，在韩信的 attack 之下，那位已经和齐王喝了几个月酒的汉使酈食其成为牺牲品（被活煮了，不过他最后的表现还是很英雄的）。而为了支援这个来之不易的盟友，项羽派出了自己得力的军事将领龙且，率领二十万楚军北上与齐军联合作战。对于韩信来说，如果不能一战灭齐，而让楚汉战争出现齐楚联合对汉的相持状态的话，那他就必须为自己的那点私心付出代价了。

关于韩信执意攻齐是否存在私心，或者说攻齐是不是最好的选择，有朋友提出不同意见。其实韩信或者其他历史人物在执行公务时，存有一些自己的小算盘，也是十分正常的（没有倒不正常了）。只不过不能因私废公，置公务于不顾罢了。像土木堡之变中，王振为了回乡光宗耀祖，在后有追兵的情况下，执意绕到蔚县盆地去转一圈，结果到了家门口又怕损害了自家庄稼，再更换线路的做法，就是典型的因私废公，忘记自己的主要职责是什么了。

对于韩信来说，在齐国没有真正倒向汉军之时（标志就是有没有主动向楚军发起攻击），是有理由认为，先解决掉这个潜在对手有利于为汉军赢得最后胜利的。毕竟如果齐国归汉的话，楚军的后院就不保了。而在这种情况下，为自己谋一块安身立命之地的想法，就有可能决定韩信到底是愿意相信齐国真心降汉，还是阳奉阴违了。

事实上从最初的战略分工来看，河北平原的燕、赵两国，以及山东半岛的齐国，这几个名义上归属于楚军阵营的诸侯国就是由韩信负责的（刘邦所率的汉军主力，主要是正面顶住楚军主力）；而从战术准备的层面来看，韩信的确也已经做好了攻齐的充分准备。换句话说，无论齐国是否降汉，箭在弦上的韩信都有信心收服齐国。当然，如果韩信攻齐失败，导致齐国归入项羽阵营的话，相信前述之观点应该就不会有太大异议了。对于韩信来说，不论是因为自信、能力，还是幸运，最终的结果都是他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出于“历史”对胜利者的尊重，再去讨论韩信这个战略选择是否是最佳选择，意义其实也不大了。

在韩信突袭齐国，攻破齐都临淄之后，西楚援军也穿越沂沭河谷，到达了齐国的核心地带。最终韩信与齐楚联军的决战是在潍水之侧。在先秦分析齐国的地缘结构时，由鲁北平原和胶莱平原所组成的平原地带被定性为齐地的核心板块，而潍水正是这两块平原的连接处。说起潍水来，很多朋友可能没印象，不过说到潍坊的话，相信大多数人都知道的。很显然，依照中国人标示地名的规律，潍坊之名得自于流经它的“潍水”了（现在叫潍河）。

潍水之战的具体地点并不是在潍坊，而是在潍坊南面的“安丘市”，不过这场战役的细节并不是我们解读的方向。韩信在大平原地区又一次验证了自己的军事天才（这次用了水攻的战术）。此战齐王田广，以及楚军统帅龙且被杀。在齐地核心平原取得决定性胜利的韩信，也随之取得了齐地的控制权。接下来那些在山地的抵抗，也很快在韩信的军事、政治攻势下土崩瓦解了。这其中所遇到的最大抵抗，当属齐王田广的叔叔田横。退至泰沂山脉的他，在最后的抵抗失败后（具体地点为莱芜），转而向南投奔了彭越。

第四节 项羽说服韩信自立的计划失败

现在看起来，局面对刘邦是相当的有利。项羽可以说是羽翼尽失，所能控制的地缘板块，也就是他当初给自己留下的中原、东楚之地了。这一大片没有天险庇护的土地，现在全线面临着汉军的威胁。除非项羽有办法一夜之间变出一条长城来，否则他就算有三头六臂，也无法防御这纵深千里的防线。不过项羽虽然不能变出长城来，却有可能派出说客，也做一次外交努力。而他所努力的对象，就是新得了齐地的韩信。

尽管当初项羽并没有留意过韩信，但韩信这两年的作为已经足以让霸王刮目相看了。很明显的是，韩信的成就，在军事上完全是个人之功。他非但没有得到刘邦的支援，反而不时的被征调主力。而从战果来看，可以说半个中央之国都是韩信打下的。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刘邦还是项羽，心中都不可避免的产生一个疑问，那就是有点功高盖主，尾大不掉的韩信在政治上有没有更高的要求。

对于刘邦来说，他需要思考怎么圆满的处理这个问题，既不让韩信有自立门户的想法，继续为己所用；又不至于让韩信觉得得不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不过对于项羽来说，面对这个问题就不用有太多顾虑了。现在的他，唯一翻盘的机会，就是说动韩信以齐地为根基自立门户（倒不是说一定要投向自己）。那样的话，不仅可以解自己的后顾之忧，还可以极大的削弱刘邦的实力。

如果韩信在政治上有更大的野心的话，相信无论项羽游说与否，他都有可能自立门户。然而从韩信最终为自己选择的安身立命之所可以看出，韩信并没有这种想法。假如有的话，以他的战略观察力，是不会不知道，秦晋之地才是王气所在，而齐地

只是一块上不上，下不下，更适合安享富贵的所在。可能会有朋友觉得韩信这样做，是很没有政治远见的。因为功高震主的他，在汉帝国建立之后，最终还是死于中央集权的体系之下。只是我们也知道，即使韩信再善谋，他也很难判断出，汉帝国将来到底会采用什么样的政治结构。要知道，秦帝国那中央集权的方式所带来的后果，大家可以说都是心有余悸。将来刘邦再完全复制秦帝国的可能性是非常小的。即使不像项羽那样完全采取分封制，郡县+分封的混合结构还是可以的。在这种情况下，韩信相信自己能够以诸侯之身封得一块富庶之地，也是合乎情理的。

还有一个让韩信放弃谋天下打算的可能性，是在于政治资本。项羽和刘邦之所以能够成为公认的天下争夺者，是因为他们在灭秦战争中所建立的不世之功。前者击败、收降了秦军主力；后者则攻入关中，成为秦帝国的直接终结者。换句话说，在灭秦战争中寸功未立的韩信，如果也想争夺天下的话，并没有政治资本（简单点说就是没人服气）。在未能说动韩信自立门户后，项羽再想翻盘的机会就已经不存在了。他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在做出让步的前提下和刘邦进行和平谈判。其实这已经不是双方第一次试图用谈判的方式解决问题了。只不过时过境迁，当初想谈判的是刘邦，而现在想谈判的是项羽罢了。

第二十二章 楚汉进行固陵之战和垓下之战

第一节 刘邦毁约后与楚军发生固陵之战

所谓谈判，无非就是划分地盘了。刘邦在荥阳之战之初屡败屡战时，试图劝说项羽接受的方案，是以太行山——洛阳盆地一线为分割线。也就是说，高地属汉，低地归楚。不过今时今日的局面，刘邦已经不可能回过头来答应这个条件了。项羽只有割肉，才有可能让刘邦觉得有和平解决的必要。现在在项羽手中控制的，就是中原腹地以及东楚之地了。要让刘邦满意，而自己又有根基之地的方案，就是让出中原之地，回到东楚老家了。只是那样的话，也就意味着项羽完全失去了天下，只是一个偏安的诸侯罢了。那样的话，项羽是无论如何都不会答应的。以项羽的底线而言，和刘邦共享天下，分治东西已是极限。在这种情况下，分割中原成为唯一让双方都有可能接受的方案。

虽然从地缘结构上看，这种局面能维持住的可能性极小，但从政治角度看，将中原一分为二，西部归汉，东部归楚，算是为双方都保留了颜面，也在表面上成就了楚汉共治的局面。至于这条分割中原的中线在哪里呢？相信大家都已经想到了，那就是魏国当初所开挖的“鸿沟”。从几何的角度看，以鸿沟为界，不失为一个平分天下的方案。然而从地缘结构来看，这只能是一个理想状态。既前无古人之行，也后无来者效仿。你无法想象，在一马平川的中原腹地，仅仅依靠一条人工开凿的运河，就能够让楚汉两国相安无事。

事实上这并不仅仅是鸿沟的问题，相比山地而言，河流本身的分割作用并不算强。在山地的话，通行的道路往往是有限的。单是穿越那些有重兵把守的山口、关卡，往往就足以让试图打破平衡的一方知难而退了。至于河流，即使不考虑到冬季有可能的结冰情况，进攻方依靠船只也能够更灵活的掌握主动权（所以据江河以为天险的一方，一定要在河对岸有一片缓冲之地）。尽管以鸿沟作为“楚河汉界”是那么的勉强，但对于在荥阳前线苦战日久的刘、项二人来说，这却是一个暂时可以接受的方案。毕竟这场战争双方都打得太苦了，都需要有一个缓冲期来休养生息。也就是说，虽然双方心里都清楚，楚汉之间必定还有决战，却都认为可以迎来一段和平期。

正因为刘、项二人都认为鸿沟暂时可以成为双方的地缘平衡线，因此在立约之后，楚、汉两军主力都准备开始后撤了。最先行动的是楚军，他们回军的目标是“彭城”。对于项羽来说，彭城是他霸业兴盛的支撑点，也是他的都城、大本营。一直以来，彭城至荥阳的补给线都被彭越所袭扰，现在，西线无战事的项羽需要回去好好整理一下后院了。至于刘邦，他当然不是会回到项羽分封给他的汉中了，关中平原才是刘邦下一步需要重点经营的地缘中心。不过，正当刘邦准备率主力回师关中之时，

情况却发生了变化，促使他改变了战略方向，提前打响了与楚军的决战。

促使刘邦改变主意的，并非时局发生了变化，而是有人把当前的局面清楚的分析给他听了。就目前的战略格局来看，汉军显然是占据了绝对优势。攻取齐地之后，楚军在战略上已经面临两线作战的局面了；从战术的角度看，也对汉军十分有利，因为荥阳之战实际上是以项羽落败而告终的。当然，这并不是说楚军的战力比汉军弱，而是汉军的补给状况要远好于楚军，楚军实际上是给“饿”走的。既然战略、战术都占优，那么乘项羽后撤之机，刘邦与韩信、彭越等军几面包抄，一举在运动战中消灭楚军主力，就成为一个非常具有诱惑力的方案。

能够一战而解决楚军主力，总是好过让项羽回去休整完毕再战要好得多。要知道，楚军的战斗力还是非常强的，只是苦于补给不力罢了。如果让他们回到了根基之地，自己反过来打攻坚战的话，那就不知道什么时候能结束战争了。不过对于刘邦来说，心里明白汉军在野战当中并不是楚军的手。之所以能在荥阳之战笑到最后，无非是凭借坚固的防御工事，以及充足的补给，把对方给拖死罢了。因此，如果刘邦想作为攻击方在野战中消灭楚军，就必须有大大超出对手的兵力。这一点，就要取决于韩信、彭越等独立作战的“准诸侯”们，是否愿意倾力相助了。

从刘邦的角度看，调动韩信、彭越两军南下合击楚军，并不应该成为一个问题。毕竟这两军虽然一直在独立作战，但都属于汉军阵营，且在之前的军事行动中也都做得不错。正因为有这个自信，刘邦在权衡之后决定越过鸿沟，准备在楚军回到东楚之地之前一战而定乾坤。

汉军主力追上楚军的地方，叫做“固陵”（今河南太康）。一直以来英雄情节颇重的项羽，应该没有想到刘邦那么快就毁约追来。很快，汉、楚两军就将在固陵展开一场决战了。对于项羽来说，他其实应该早就盼着和汉军主力来一场野战了。当日那种攻城战，实在是让处于防守方的汉军占得了不少便宜。而刘邦也知道自己军队的战力，所以他在咬住楚军之后并没有急于进攻，而是扎下营来等待韩、彭两军到来。非常不幸的是，刘邦并没有等来韩信、彭越两军。更为不幸的是，在刘邦等待合军的过程中，项羽并没有闲着，一向在战术上非常自信的他，很快便回身对汉军发动了突袭。一场刘邦计划中的“群殴”，就这样变成了一对一的“单挑”。

单挑的结果，不用说想必大家也猜到了。没有压倒性优势兵力的汉军，很快便败于楚军之手。不过刘邦并没有就此后退，而是重新拾起了他在荥阳耗走项羽的“乌龟战术”，即用深壕坚垒把自己保护起来，使得战争又一次进入了消耗状态。这种“不思进取，以本伤人”的做法虽然难看，却很成功。反过来看还没有回到根基之地的楚军，虽然固陵之战中取得了战术胜利（史载杀伤汉军两万），却依旧面临着后勤不力的战略局面。也就是说，楚军这招回马枪虽然又一次证明了楚军在野战中的能力，却并无法改变战略上的被动。至多只是让自己可以更加从容的后撤罢了。

第二节 刘邦对韩信和彭越裂土封王

如果说项羽在固陵之战后继续选择了战略后退，是出于无奈，那么刘邦在战略上有压倒性优势的时候仍然大败，需要的就是反省了。他需要反省的最主要问题是，为什么在自己发出攻击令之后，韩信、彭越两军却按兵不动，只顾在自己认定的地盘中攻城略地呢？

前面我们说到了韩信在齐国已经答应降汉的情况下，仍然执意攻齐是存有一定的私心的。这种说法引来了一些朋友的质疑。实际上在战略上认定对手已无逆转可能性时，为自己做些打算并无不可。很多时候，这甚至是最高领导者所希望看到的。这种小富即安的想法，最起码证明你暂时不会觊觎最高权力的想法，只是想在体制内获得个好位置罢了。韩信和彭越当时的情况也是如此，因为战略上谁都看得出，项羽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没有翻盘的机会了，是时候该为自己做些打算了。

韩信、彭越二人为自己将来所做的谋划并不难猜，那就是成为汉王朝体系下的一方诸侯。有这种想法并不过分，也很现实。不用回看当年武王伐纣后封建诸侯的历史，仅仅是在数年前，分封十八诸侯的项羽就已经给刘邦树立一个榜样。尽管我们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中央集权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了，但谁又能苛求在这个转换过程中的人一定能够看到，甚至接受这个现实呢。我们并无法判断当时的刘邦是否已经为自己将来的政权做好了结构规划（到底是封建，还是郡县），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他现在必须让那些有功之臣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至于韩信、彭越二人想要的究竟是什么，其实并不难猜。前者想要做的是“齐王”，而后者想做的是“梁王”。

韩信想做“齐王”之心，在他执意攻齐之时，就已经不是秘密了。现在的他，已经基本扫清了齐地所辖的各地缘板块，驻军于“沂沭河谷”的地缘中心——城阳（也就是当年莒国的都城，现在的山东莒县）。如果他愿意的话，很快就可以沿着沂、沭两水南下，攻击项羽在泗水两岸的根基之地（特别是楚都“彭城”）。至于彭越，他对齐、鲁之地兴趣倒不大。这位一直不肯投入项羽阵营的乱世枭雄，图谋的是项羽的自留地——梁地。要是项羽当初肯把梁地封给彭越，而不仅仅是给他一个“侯爵”的话，彭越很有可能就是项羽的部下了。也正因为如此，在没有从刘邦处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时，彭越和汉军更像是一种平等合作，而不是上下级的关系；也因为这种关系所产生的不信任感，彭越甚至收留了那位被韩信打得国破家亡的末代齐王——田横，以让自己在政治上有更多的选项。

既然彭越自始至终希望做“梁王”，那我们就要花点时间解释一下“梁”这个地缘概念了。简单点说，“梁”指的就是魏国在华北平原的土地。我们知道，魏国的根基之地本来是在山西高原的“河东”，而中原之地只能算是自己国土中次一级的板块。不过当秦国崛起，河东之地因秦人的压力越来越难以支撑时，魏国的政治

中心便开始转向中原了。直至秦人完全控制了河东，把魏人的势力赶出太行山以西后，魏国在地缘属性上算是完成了一次被动的搬迁工作。其标志就是居于中原之地中心位置的“大梁”城（也就是现在的开封），成为魏国的政治中心。而为了和之前的魏国有所区别，这一时期的魏国也被称之为“梁国”了。

由于魏国在中原的版图并非一成不变的，因此确认“梁”这个地缘板块的边界究竟在哪，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如果以宋国灭亡之后的情况而言，西至现在的郑州，东至泗水，北至河水（河济平原的西部），南至睢水流域，都可以算是梁地。从位置上看，这可以说是一块天下至中的板块，这也是项羽执意要把它归入自己直属地的原因所在。只是说起来，彭越执意希望在梁地称王，并不是个好想法。相比韩信，彭越的战略眼光就要差得多了。韩信谋齐地，算得上是一个成熟的想法。即使不考虑那些技术问题（比如板块的完整性、防御力等），仅仅从历史中吸取教训，当年同样为周王朝立下了最大军功的姜子牙，也已经向后人证明了，齐地是一个有机会传于子孙，并在今后有可能出现的诸侯体系中位列三甲的板块。反观中原这块是非之地，可以提供的反面例子就太多了。即使没有汉帝国后来的中央集权，彭越和他子孙的日子也不会好过。

记得在彭越刚刚登上历史舞台时，我们曾经分析过为什么彭越会对梁地感兴趣。这其实和他的根基之地有关，彭越所生长和起兵的“昌邑”（现山东巨野县与金乡县之间），位于深沟以北，济水以东，巨野泽以南，位置正处在泰沂山区和中原之地的交接处。由于连通泗、济两水的深沟存在，昌邑和深沟以南的“陶邑”一样，处于几方势力交织之处。齐、魏、宋、楚，甚至秦的势力，在战国时期都曾经触及于此。这样的地缘位置，也让彭越的家乡有机会连通几个重要的地缘板块，并在其中选择自己的奋斗目标。

从现在的情况看，彭越已经离自己的目标很近了。为了促使韩、彭两军南下，尽快结束这场战争，在固陵之战遭遇挫折的刘邦，很快便意识到了是“分蛋糕”的时候了。为了满足彭越做地头蛇的愿望，分封给彭越的“梁”，并不仅仅限于中原之地，而是向东北方向越过了巨野泽，到达了泰山与济水交汇之处的“谷城”（今山东平阴县）。另外划定了睢阳这个曾经的宋都（商丘）作为彭越封国的南点。从位置上看，彭越的根基之地“昌邑”，正好处于谷城——睢阳两点连线中的中点（这样昌邑就有机会做彭氏“梁国”的政治中心了）。

这种设计，明显是为了满足彭越既想谋中原之地，又不想做地头蛇的想法，可谓用心良苦。只不过将来确定梁国东、西边界时，估计还得花些心思。毕竟这种切割方法并不符合地缘规律，也很难像齐地那样找到稳定的地缘边界。不过这些细节在当时都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刘邦已经表明了自己的态度，让韩信、彭越二人得到了自己想要的封号。至于自己将来的封国究竟有多大，还是要看自己努力的。因为按照惯例，你的封地所在地一般也就是你所立主要军功之处。而这一切变现的

时间，和项羽生存的时间又是成正比的。有鉴于此，封号一至，再也不用刘邦去做工作，新晋的“齐”、“梁”二王，便急不可待的领军南下了。

第三节 汉军南下攻楚并策反淮南楚将

从战略上看，南出沂沭河谷的齐军（韩信军），所指向的会是西楚在泗水流域的根基之地。尤其是彭城这个大本营，将会是这位汉军第一人所需要解决的目标；至于彭越，他更感兴趣的是汉王分封给他的中原之地。不过他们现在的心中究竟是公心多一点，还是私心多一点，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两支生力军一动，项羽在中原及泗水流域就没有后路可退了。

正在向东作战略后撤的项羽，在得知韩信已经攻克了彭城，彭越也已率军南下的消息后，心里应当知道，淮河以北已经不再有他的立足之地了。现在的楚军虽然还有机会在野战中取得战术性胜利，却也绝没有实力再在攻城战中被消耗掉了。也就是说，如果想要夺回包括彭城在内的被韩、彭二军南下占领的城邑，几乎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唯一正确的战略决定，就是回到那些暂时没有被汉军染指的楚地，然后以此为基地准备防御战。以刘、韩、彭三人的攻击方向来看，淮河以南地区会是项羽最后翻盘的本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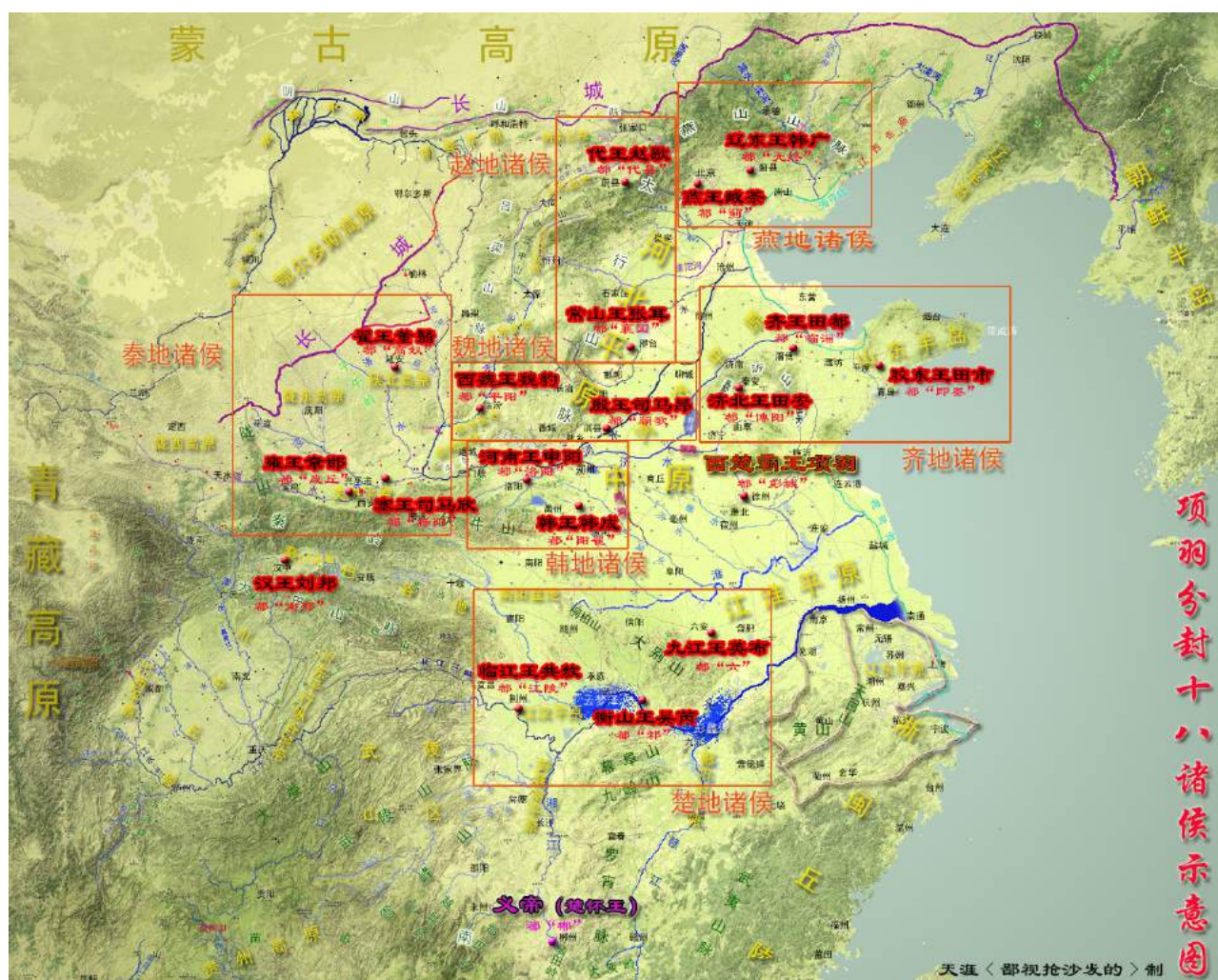
事实上，在后来的历史当中，以江东为基地，淮河一线为缓冲，大多数时候是南方政权对抗北方政权的基本模式。所谓“守江必守淮”，如果没有江淮做外围，长江防线的所谓天险实际上是为双方所共有的，并不能起到真正的防御作用。当然，要真正的实现南北分治局面，长江中上游的两湖平原，以及巴蜀之地也必须由南方政权掌握。以当时战略格局来看，项羽并不具备这种条件。不过如果有淮河做第一道防线的话，项羽最起码会有喘息的机会，整军再战。然而刘邦并没有把这个机会留给项羽，因为在他的手上还有一张政治王牌，可以迅速将淮南乃至“吴头楚尾”的赣江流域，从西楚政权中分离出来。这张政治王牌也曾经是项羽阵营中的一张军事王牌，他就是那位和韩信、彭越并称汉初三大名将的“英布”。

在我们之前对于楚汉相争的解读过程中，有几个地缘板块归属并没有详细交待过。一是南阳盆地、两湖平原所属的西楚、南楚地区；二是淮南——赣江流域这片“吴头楚尾”的中间地带；三就是以江东平原为核心，包括对应的江淮之间地区的“吴”地了（现在算是东楚之地了）。在项羽当日封建的版图中，“吴”地作为东楚的一部分，也是自己的兴起之地，是留给自己的。一直到项羽和刘邦签订鸿沟为界的和约时，这块土地都还是项羽的根基之地。而淮南——赣江流域这片拱卫东楚的外围之地，则是分封给项羽最得力的军事助手——九江王英布的。至于两湖地区，则封建了临江、衡山两王。

当日蒙阳拉锯战伊始，刘邦在项羽的强大攻势下艰难抵抗时，曾经制定过分兵

三路战略。北路为以太行山两侧的山西高原、河北平原为战略方向的韩信；中路以依托洛阳盆地节节抵抗楚军的留守汉军；至于南路，则由刘邦亲自统帅，沿着他当日入秦的武关道，入南阳盆地以期开辟新的攻击路线。这条攻击路线，刘邦可以说是非常熟悉了。在他刚刚在关中盆地站稳脚跟时，就已经派军试探性由此攻入过中原，只不过被楚军击破，挡了回去罢了。

以南阳盆地西连关中，南控江汉，北临洛阳，东连中原的位置，项羽在分封之时，并没有分封给其他诸侯，而是想着和中原腹地一起，划给自己做自留地。只是南阳盆地离项羽所依托的东楚之地太远，当地军民对项羽并没有东楚之民那样的向心力。反而是刘邦在从武关道入关的过程中，恩威并施的收取了南阳盆地的民心。因此在刘邦亲自率军重出武关道后，南阳盆地很快就归附了刘邦。



项羽分封十八诸侯示意图

刘邦在控制了南阳盆地之后，并没有试图由此向中原渗透。毕竟经由前面那么多次的经验教训，刘邦本人是没有信心再和楚军PK的。对于汉军来说，能够守住当年楚国留下的方城，让项羽不得不分心南线安全，就已经能够帮助缓解荥阳前线

的压力了。而急于寻找汉军主力决战的项羽，在得知南阳盆地失守于刘邦之后，也很快率军南下。只是在楚地先人留下的防线面前，项羽这趟算是白跑了。在他还没有想到办法把汉军逼出来决战时，彭越在泗水流域（攻下了下邳）的捣乱，又让项羽和楚军主力不得不回后院救火了。在南阳盆地形势稳定之后，刘邦也回到了荥阳前线。

也就是说，在荥阳正面战场还在拉锯的时候，汉军已经在南线控制了南阳盆地。虽然这个战略方向本身所执行的主要是牵制任务，并没有像韩信一样的将领可以独当一面的担当出击任务。但南阳盆地归汉，在战略上还是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那就是将两湖平原与楚军主力隔离开了。这也使得临江、衡山两王在思考是不是要继续留在项羽阵营时，不得不考虑到汉军所给予的现实压力。使得在整个楚汉战争当中，两湖地区事实上保持了一种“打酱油”的姿态。其实如果有得选，那些兴起于秦末战争的新晋诸侯们，都更愿意“打酱油”，好好经营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待刘、项二人决出胜负后，再做选择。只不过，形势比人强，不是谁都有机会骑墙的。像西魏王魏豹，齐王田广就是这样的例子。



楚汉第三战役——垓下之战示意图

没有机会打酱油的，还有九江王英布。至于他为什么叛楚归汉，我们之前已经分析过了。在他走后，他的“九江国”也成为项羽的直属之地。对于刘邦来说，英布来投，本身在政治上就有足够重大的意义了。而在刘邦决心越过鸿沟，准备对楚

军发起最后的决战时，英布也该发挥他的具体作用了。这个作用就是回到自己原来的封地，以自己的人格策反淮南之地。以当时楚、汉对决的形势而言，相信谁都能感觉到项羽的颓势了。在这种情况下，英布在淮南的出现，更多的是给了那些故旧一个倒戈的理由。不过为了快速解决淮南问题，而不让项羽有机会打造淮河防线。在英布前往九江故地招降的同时，之前派去协助彭越袭扰楚军后方的一支汉军（领军将领名为刘贾）也渡过淮河，并围攻淮南重镇“寿春”了。在胡萝卜（英布招降）加大棒（刘贾围寿春）的共同作用下，淮南的楚国守军很快便出现了变化。楚将周离率军攻下了英布之前的国都“六”，并领军北上，与刘贾、英布合军渡过了淮河，攻占了淮北重镇，涡水之侧的“下城父”（今安徽涡阳县）。

在战国时期，下城父一直是楚国与中原国家势力交汇的地方。以英布名义招降的淮南楚军由南向北攻击到此的意义在于，让调整路线准备南下渡淮的楚军不得不又一次校正自己的行军路线，放弃进入淮南的打算了（之前如果彭城不失，在固陵之战后，楚军本应该向东往彭城方向撤退的；彭城既失，则沿涡水快速退入淮南是好选择）。现在对于项羽和他剩下的十万楚军来说，唯一的机会就是向东南方向退却，寻机渡过淮河，依托项氏家族崛起的江东地区做最后的抵抗了。然而，正当楚军接近淮河渡口，即将退入江淮地带之时，刘邦、韩信、彭越、英布所率领的四路大军（70万）已经高效地合围了过来（大家都封王了，效率自然就高了）。终结项羽不败神话的楚汉第三战役——垓下之战，也即将拉开序幕了。

第四节 汉军在垓下之战击垮楚军

假如汉军这次的效率不是那么高的话，项羽一定不会选择在淮北的“垓下”与汉军决战。尽管项羽曾经用“破釜沉舟”的方式，自断后路的与秦军决战，并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但“此一时，彼一时”，现在的项羽最希望的是退到一个有险可依，能够让他喘息的地方休整。由于英布在淮南地区的成功策反，项羽即使退到了淮河以南，也无法依托淮河建立防线了。不过离家乡越近，项羽所能得到的支持度就会越高。不仅仅是江东父老会给他全力支持，那些或主动，或被动叛乱的江淮地区，在他有望恢复元气时，也很有可能都会重新站队。只是这一切的预想都需要时间来验证，而项羽现在恰恰最缺少的就是时间。

没能在汉军追上并完成合围之前渡过淮河，是压垮楚军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手上还有十万精兵的项羽，虽然没有力量在面对七十万汉军时反败为胜，却还是有可能集中力量在包围圈中撕开一个缺口，向南退却的。问题在于，如果淮河之上没有足够的船只接应的话，撤退到此的楚军就只能与追击而来的汉军“背水一战”了。在对方兵力占据绝对优势，又处于攻击状态的情况下，后撤状态的楚军“背水一战”会是什么结果，闭着眼睛也能想到。

以项羽的性格而言，即使在战略上没有机会，他在战术上也是有可能拼力一搏的。所以当项羽被逼到绝路时，自杀性的突围很可能是他最后的选择。不幸的是，项羽最终并没有机会完成这壮烈的最后一跳。因为在他的面前，除了七十万汉军以外，还有一个不世出的军事天才——韩信。相比项羽的“勇战”，韩信在战术的运用上就要丰富得多了。这一次，当包括韩信军在内的几路汉军轮番冲击楚军都不能得手后（不过已经消耗了半数楚军），韩信需要帮助刘邦思考一下有没有什么新的战术能够迅速结束这场战争。



垓下之战

以当时楚、汉两军的实力对比来看，汉军即使用刘邦惯用的“乌龟战术”围在楚军四周坚壁不出，也能把没有后勤补给的楚军给耗死。不过刚才我们也说了，如果光用这种消极战术的话，项羽很有可能在粮草真正断绝之前做最后一搏。那样的话，汉军所要承受的损失就很大了。

毕竟项羽以乡情为纽带训练出来的子弟兵，其战力是非常惊人的。

既然项羽用来维系楚军战力的重要手段就是“乡情”，那么韩信同样也可以“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具体的战术，想来大家都已经耳熟能详了，它就是“四面楚歌”。让汉军中来自楚地家乡的士兵围唱楚地之歌，以此来瓦解楚军的士气，可以算得上是一次“心理战”的经典案例。即使是在现代战争，类似的战术也一直在战略层面上运用。好像在二战当中，对阵各方都会用对手的语言组织电台，放些能够引发乡愁的音乐，以期从战略层面上瓦解对手的士气。不过说到效果，韩信“四面楚歌”的战术运用却是立竿见影的。楚军在听闻四面楚歌之后，不仅仅引发了乡愁，还引发了战略上的绝望。这种绝望产生的根源在于，既然汉军中有那么多来自他们家乡的士兵，那么是不是意味着自己的家乡已经成为汉土。要是那样的话，自己即使能够突围又有什么意义呢？

虽然说就算没有韩信的“四面楚歌”战术，项羽在垓下之战也没有胜机。不过这一战术对楚军士气的瓦解，却使得项羽在粮尽之前领军作最后一战的想法成为泡影。摆在项羽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率领还愿意一战的士兵作最后的反击，英勇的死在战场上；要么带着最亲信的少量部队突围（这么大规模的包围圈是不可能没

有间隙的，小股部队还是有可能跑掉的）。最终项羽务实的选择了第二套方案，带领八百人的亲信部队乘夜突围，并快速渡过淮河。只能说，项羽在这个时候没有选择“玉碎”，而是放弃大部队出逃，是因为他并不相信所有的楚地都已经归汉，最起码自己发家的江东之地应该不在此列。也就是说，项羽最后的本钱并不在于剩下的几万楚军，而是在江东。项羽和他的亲信卫队突围的时间是在半夜，而汉军发现项羽已经突围则是在凌晨。

第五节 项羽南逃失败后自刎于乌江

从技术上看，在项羽乘夜突围一直到江东渡口的这段路程中，能够延缓这几百骑兵行程的主要是淮河。虽然历史上没有明确记载，但项羽和他的卫队很有可能是在抢渡淮河时被发现的（你无法想象，拥有绝对优势兵力的汉军不会在淮河各渡口设防），这也使得项羽最终带入淮南的卫队仅剩下一百多人了。不过能在追兵赶到之前渡过淮河，已经足以让项羽他们甩开后面的几千追兵了。然而上天仿佛已经厌倦了中央之国内部的这些血雨腥风，希望快些结束秦、汉之间的这场战乱。项羽并没有机会回到江东整军再战，而是死在了与自己家乡仅一江之隔的“乌江亭”（关于乌江亭渡口的位置及结构，在吴越春秋时已经交待过了，记不清的朋友可以回翻）。



楚汉战争

让项羽丧失最后机会的，是一片丘陵之地——“江淮丘陵”。记得在吴越春秋的章节中，我们曾经分析过这片位于长江以西的丘陵之地。在南京以东的长江因为还处在江海之交状态，未能有合适渡口时，南京——芜湖的这段南北向的长江（大多数在现在安徽境内，也称之为“皖江”）是横渡长江、出入江东的必经之路。也正因为如此，当时的长江三角洲地区才被称之为“江东”。等到南京以东的扬州一

带成为连通长三角地区的主要跳板后，这一地区的地缘标签就是“江南”了。

在皖江的两侧各有一片由南部山地延伸的丘陵之地，长江以西为“江淮丘陵”，以东则为“江东丘陵”。从军事的角度看，如果项羽有足够的时间退入淮南并转入防御战的话，作为江东屏障的“江淮丘陵”地带，一定会是他重要设防的区域。只是现在的他，已经不可能有这样的机会了。本来有可能成为帮助他建立防线的“江淮丘陵”地带，现在却成为他退入江东的最大障碍。



楚汉第三战役——垓下之战示意图

曾经有朋友质疑过，丘陵地带是否能够像高大山脉一样，影响包括军事行动在内的地缘交流。其实在丘陵地带，通道也同样有限，并需要维护，尤其是在植被茂盛的地区。防御者利用这些海拔不高的山地控制通道，一样可以给进攻者都造成很大障碍。另外，所谓“山水相连”，丘陵地带内部所形成的相对低洼之处所蓄积出来的湖泊、湿地，同样会对通行者造成很大的困难（江淮丘陵地带最大的湖泊，就是合肥之侧的巢湖了）。

直接导致项羽被汉军追上的原因，并非是汉军控制了通往江东渡口的那些道路。因为汉军现在全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了垓下前线。只要能凭借绝对优势兵力，一战解决掉这最后的楚军主力和项羽本人，那些尚未征服的楚地很快就不会有强烈抵抗了。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防备楚军有可能的突围，至多只是控制淮河北岸各渡口就可以了。那么在付出代价之后成功抢渡淮河的项羽，到底是怎么让汉军追上的呢？

其实问题的答案也很简单——他迷路了。

项羽迷路的地方，正是在被我们称之为“江淮丘陵”的山地中，具体的地点叫做“阴陵山”。从《楚汉第三战役——垓下之战》的图上我们可以看到，阴陵山与项羽最后有机会渡江的“乌江亭”有多么的近了（约 15 公里）。如果不是迷失道路的话，他完全有机会带着这剩下的一百多亲信到达乌江渡口。很可惜，慌不择路的他还是没有找对通过阴陵山的道路，更为致命的是，项羽在向当地人问路时，又被错误的指向了一片湖泽之地，以至于被尾随而至的几千汉军先锋部队追上。



丘陵地貌

当项羽从阴陵山冲出汉军的包围，继续向乌江亭方向攻击前进时，他的身边只剩下二十八人了。而尾随而来的汉军，很快就把他们包围在了乌江渡西的一个小山头上（今名“骊马山”），而这时项羽距离乌江亭渡口仅仅只有十里之遥了。可以说已经可以在山头之上清晰地看到江东

之地了。问题是，这时的项羽其实已经抱定了必死的决心。他接下来所能做的，就是像一个英雄一样壮烈的死去。因为如果项羽这次突围顺利，能够把这八百亲信骨干带回江东，那么他还是很有机会迅速组织起一支有战斗力的军队，扼守住江东的各个渡口（能够被项羽带出来的人，都算得上是身经百战的子弟兵，最低限度能当百夫长之职）。也就是说，虽然项羽失去了楚军主力，但他把这支军队的魂给带了出来。只是这一切，都是建立在没有和汉军接战的前提之下。只要交战就会有消耗，而现在每消耗掉一个人，都会让项羽重建楚军的希望之火变得更小。

现在，在经历过与汉军的两次鏖战之后，就算这二十八骑全数被带到江东，也无法以他们为骨干快速打造出一支军队了。正是因为抱着必死的决定，项羽和他最后的卫队又一次展现出了惊人的战力。记载这段历史的史家，也没有掩盖他对项羽最后时刻所表现出来的英雄气概的钦佩之情。在几经冲杀，杀伤了数百汉军之后，最后跟随项羽的二十八骑也消耗殆尽。而冲击到了渡口边上的项羽，也放弃了最后的机会。他对划船前来接应的乌江亭长的那句“无颜见江东父老”之语，道尽了英雄此刻的凄凉之情。

其实从项羽灭秦之后渴望“衣锦还乡”，我们已经能看出项羽不是一个能卧薪尝胆的人了。更何况就算项羽肯不顾面子只身回到江东，又能怎么样呢？他甚至连个帮他通传信息，动员江东军民的人都没有了。而且可以肯定的是，追击的汉军会如影随形的跟随他渡江，并且不让他有喘息之机。与其到时候陷入绝路，狼狈的死在汉军手中，倒不如放弃最后的机会，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这场战争。那样的话，最起码在后人的评价中，项羽还能保住他的英雄气节。为了让这场人生的谢幕更加悲壮，项羽甚至在自刎之前对包围他的汉军将领（很多都是他过去的部下）说道：“吾闻汉购我头千金，邑万户，吾为若德”。将自己的头送给故旧请功，也算是项羽以自己的方式为楚汉战争画上一个句号吧。

公元前 202 年，时年 31 岁的项羽自刎乌江，既代表了楚汉战争的结束，也喻示着在中央之国的土地上，一个新的朝代——汉即将诞生。不过对于这场战争的胜利者刘邦来说，面对这个百废待兴的国家，他还有很多麻烦需要解决。作为中央之国最高统治者的刘邦，首先要面对的是一个历史性的抉择——帝国，还是王朝。

第二十三章 汉帝国解决异姓与同姓诸侯问题

第一节 刘邦在郡县制与分封制上的选择

自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到项羽自刎乌江亭，仅仅用了不到八年的时间（公元前 209——公元前 202 年），刘邦就以布衣身份登上了中央之国的最高权力宝座。相信这一点，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之前我们也说了，能这么快的完成秦汉交接，很大程度是因为有两个不世出的军事天才：项羽和韩信共同作用。他们在军事上的卓越表现，以及在政治上的不足，共同打造出了汉家天下。

仔细观察秦末汉初的这段历史，我们会发现，无论是陈胜、吴广，还是刘邦、项羽、韩信，都是楚人。如果我们把这段历史归结为楚人之间的博弈，也并不为过。而从地缘文化融合的角度来看，楚人能够主导这段历史，并重建中央之国的秩序，意义非常之大。它直接将原始属性为黄河文明的“华夏文明”，晋升为整合了黄河、长江两大文明的“汉文明”。当然，在后来的历史中（尤其是现在），为了融合更多的边缘文明，“华夏”一词仍然成为代表中央之国的主要的地缘标签。不过这时候的“华夏”二字已经绝不会像先秦一样，把吴、楚所代表的长江流域视作蛮夷之地了。

其实华夏文明一直在遵循这样的博弈路线不断的扩张的。就好像在经历过夏、商、周三代的博弈、融合之后，本来发源于黄河中游的华夏文明在战胜了东夷之后，将整个黄河流域变成了中央之国的一部分一样。而古典时期最后一次同等意义的地缘融合，则源自于明、清两朝在台湾海峡所进行的最后的博弈。基于那次博弈，华夏文明成功的站上了台湾岛。只不过在甲午战争之后，由于台湾岛被割让给了日本，华夏文明的这次扩张差一点发生逆转。

如果不是项羽不太适合做一个政治家的话，也许为华夏文明开创一个新时代的就是项氏家族了。那样的话，项姓倒很有可能成为中国排名前几的大姓了，就像刘姓现在这样。前面也有朋友说了，看了楚汉之争，觉得英雄人物对于历史的走向也很重要。怎么说呢，其实这就要看你的视角高度了。如果从大的历史趋势来看，成功者并非是在创造历史，而是在顺应历史潮流；而如果从具体的朝代名称、家族的兴盛等微观角度来认定“历史”的含义的话，英雄人物是可以改变“历史”，或者本身成为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我们绝大多数人来说，往往最能感受到的是后一种“历史”。因此这个帖子与其说是让大家产生一种误解，即认为个人不能影响“历史”，只能随着历史趋势随波逐流，倒不如说是希望告诉大家，只要能够比大多数人更先一步看清大势所在，就会比其他人更有机会创造属于自己的“历史”。

回到刚刚创立了一个新时代的刘邦身上。无疑，他现在已经成为“历史”的开创者，创造了属于自己的历史。然而，如果刘邦不能够看清大势，顺应历史趋势的话，他

很快也会像项羽一样被历史所抛弃。刚才我们也说了，汉朝的建立代表着黄河、长江文明的完美融合。不过要想成功的做到这一点，刘邦个人必须作出一定的“牺牲”。这个“牺牲”就是绝对不能像项羽那样依恋乡土，把自己的政治中心放到中央之国的东南部。正因为如此，在结束了楚汉战争之后，刘邦很快便定都在了渭水之南的“长安”。

身为楚人的刘邦入主华夏文明最核心的地缘板块——关中，本身就意味着南北文化有了完美融合的地缘基础。然而对于迈进新历史时期的中央之国来说，仅仅从地缘文化上完成融合是远远不够的。刘邦必须为他的国家选择一个合适的制度，以避免像秦帝国那样在完成统一之后，又迅速陷入崩溃。在结束楚汉战争时，我曾经说到，摆在刘邦面前的头等大事，是一个历史性的抉择——帝国，还是王朝。这其中的实质，就在于汉朝到底是准备采取秦人所打造的中央集权体系；还是周人创建的封建式分权体系。

从历史的趋势来看，以郡县制为政治标签的中央集权体系，无疑是最高统治者所希望做到的理想状态。如果能成功做到这点，无疑是可以最大限度的把权力集中在自己身上，避免出现春秋、战国那样的动乱。只是有了秦帝国的前车之鉴，要想让整个社会接受中央集权制，暂时还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最起码那些经过项羽分封，后来又或被动，或主动倒向汉军阵营的诸侯，以及为汉朝的建立立下汗马功劳的重要军事将领（比如韩信、彭越、英布），不会满意这种安排。有人说，这些曾经的“王”最终都倒在了汉帝国中央集权的车轮之下，是因为他们看不清形势。其实这也不能怪他们，即使是历史发展到古典时期末期的清帝国，也一样会有裂土封王的“三藩”与中央政权的博弈。这种分权与集权的博弈，实际上是贯穿于整个历史的（现在也是一样，只不过形式不同罢了）。

既然秦人那种高度集权的政治体系不适合新生的汉朝（最起码当时不适合），那么像项羽那样以战功为依据，把中央之国重新切割为一个个诸侯国是不是就是最好的方案呢？有了项羽的教训，这种做法显然也是不可取的。就算你从形式上接过了秦始皇所创立的“皇帝”的称号，而不是像项羽那样仅仅满足于“霸王”的名号，也改变不了中央之国又一次陷入分裂边缘的境地。

有了秦朝、项羽这两个反面教材，加上之前周王朝名义上保有了八百年中央之主尊号的历史经验，刘邦有机会为汉朝创立一个自认为集众家之长的混合模式。那就是郡县+封国的混合模式。即在中央之国内部各板块既建立由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郡县，又分封拥有行政自主权的“封国”。从形式上看，这似乎是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这些封国与郡县犬牙交错，互相制衡。一方面保证了帝都中央的最高统治者拥有高于所有封国的实力，以及对封国的控制力；另一方面又保证了那些有功之臣能够得到他们想要的权力。

然而事情却并非那么简单，因为刘邦所创立的混合模式，其依托郡县制所延伸

的核心权力固然是掌握在自己手上，那些他认为也是帝国重要组成部分的“封国”，却也是必须以血缘为纽带间接掌握在自己手中的。也就是说，在刘邦的汉帝国混合体系中，并没有像韩信、彭越这些异姓诸侯王的生存空间。很快，一场在汉帝国内部的清洗工作，以及由此所带来的战争，成为帝国建立之初所需要面对的最重要的问题。

刘邦为汉帝国选择混合模式，其实也是历史的必然。因为虽然我们一贯把战国以后的中央之国定位为“中央集权制”，但限于技术的原因，仅仅依靠帝国首都的控制力，是很难控制如此广袤的国土的。尤其是在那些面临重大外部压力的边缘板块，如果没有大尺度的授权，是很难在面临变故时及时作出反应的。因此封建近亲、功臣为藩王也好；建立军政一体的藩镇也罢，这种集权与分权共存的模式都是不同程度共存的。而中央之国的各个朝代，也就是在这两种力量的制衡、博弈当中，不断的轮回了两千年。

第二节 刘邦剪除帝国异姓诸侯王

对于刘邦来说，秦晋之地算得上是汉帝国的根基之地，也是必须牢牢抓在手上的。相比之下，帝国在东部远离政治中心的领土，就暂时需要用封建、郡县相杂的形式加以稳定了。虽然在刘邦心目中，周王朝那种以血亲封建为主的模式被认为是王朝永固的典范（相对的，秦帝国那种不封建血亲的模式，就被认为是帝国崩溃的根本原因了）。但现实中，那些在项羽封建体系中有一席之地，后来又在不同时期倒向汉军阵营的诸侯王，以及像韩信、彭越这种开国功臣，才是帝国建立之初必须用“封建”制安抚的对象。

问题是，帝国体系对于异姓王的这种不信任，在项羽自刎乌江之后很快就显露出来了。取得最后胜利的刘邦，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夺了韩信的兵权，并将他从有山河之利的齐地，改封至东楚之地为王（都“下邳”，齐地则封建给了刘姓诸侯）。次年，又以谋反的罪名夺其楚王之位，降为淮阴侯。从清理异姓诸侯为刘氏江山铺平道路的角度看，韩信以及其他的异姓诸侯最后的下场都是可想而知的。问题在于，作为汉帝国当中军事能力最强，又完全成长于楚汉战争（与项羽封建体系无瓜葛）的韩信，是否应该最先被削弱的。

按照远近亲疏的处理原则，正常情况下，刘邦应该先利用韩信消除那些项羽体系的诸侯势力，然后再一举拿下他的。最终没有这样处理，而是最先拿韩信开刀，只能说是因为韩信的军事能力过强了。其过于强大的实力，让刘邦认为，只有他才是真正能够威胁到汉家江山的人。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点，尽管刘邦对韩信“狡兔死，良狗烹”处理方式，不免让其他的异姓王有兔死狐悲的想法，并引发了一系列的叛乱，但他们都没有能够对汉帝国造成真正威胁。

在那些试图先发制人，不愿坐以待毙的诸侯中，实力最强的要算是英布了（公元前196年反）。一方面，英布被刘邦封为“淮南王”，所统辖的区域大致与他在项羽体系中重叠，算得上是地头蛇了；另一方面，英布也是秦汉相交这段历史中，最得项羽军事能力真传的将领。也就是说，就其军事能力来说，比那些同时期封王的诸侯们要强得多。然而，即使是战斗力最强的英布，在汉军开始平叛之后，也仅仅支撑了3个月就兵败身死了，其他的诸侯下场会怎么样，就可想而知了。

其实英布和这些诸侯的下场，并不会让人感到意外。毕竟现在的刘邦所掌握的资源，已经大大超出楚汉相争时期，而这些无法形成合力的异姓诸侯们，实力又不可与项羽相提并论（战略上还都处在帝国的包围之中）。不过，并不是所有试图为生存而战的诸侯们，都没有给帝国的稳定造成大麻烦。在整个秦汉相接历史中都处于打酱油状态的边缘板块——燕代之地，就差一点成为帝国的心腹之患，并迫使帝国几度用兵平叛。

事实上，燕代之地也是最先开始叛乱的地区之一。而引发这场叛乱的诸侯王，就是在韩信大军压境之下才被迫倒向汉军阵营的“燕王”。公元前202年8月，叛乱的燕国很快向西攻取了代地所属的代郡、雁门郡、云中郡。这也使得帝国的北部边境尽数成为叛乱地区。当然，燕国并不是第一个叛乱的诸侯。比他还早几个月的，是同样在楚汉战争中打酱油，但却未正式投入汉军阵营的江汉平原上的临江王。对于这些诸侯王来说，应该也很清楚，即使没有刘邦试图以血缘纽带作为封建基础的打算，没能在楚汉战争中建功立业的他们，也不可能真的在帝国的版图中保留一块自留地的。正因为有这种忧虑，在汉帝国建立的当年（公元前202年），这两场叛乱就爆发了。

从结果上看，虽然没有韩信相助，刘邦在解决这些叛乱之地时也算游刃有余。与后来攻灭英布所花费的时间也差不多，基本都是三四个月解决战斗。只是问题在于，与其他地区的叛乱不同，燕代之地的叛乱并没有因为燕王（臧荼）的被擒杀而告终止，反而“按下葫芦起了瓢”似的屡生事端。不仅如此，这场以燕代之地为根源的叛乱，还向南延伸到了山西高原的中部（太原盆地一带），以及原属赵地的河北平原中部。也就是说，北地的叛乱很快便要直接威胁到帝国的核心地区了。

之所以会有这种情况出现，当然不是因为北地叛乱的那些诸侯、将领们军事实力强，或者这几个板块有足够的地缘实力与帝国分庭抗礼。真正能支撑他们和帝国作对的，是来自中央之国以外（当时的范围）的地缘力量——蒙古高原。而这一时期，代表蒙古高原影响中央之国历史发展的力量，就是我们大家所熟知的匈奴。

从公元前200年白登之围后，仅仅用了五年时间，刘邦和他的继任者就完成了剪除异姓诸侯的工作。公元前195年6月，最后一个叛乱的诸侯“燕王卢绾”兵败后逃入匈奴。而在同一个月，汉帝国的开创者刘邦，也终结了他那传奇的一生。在刘邦死的时候，他应该不会认为和亲能够一劳永逸的解除掉匈奴人的威胁。事实上，

你永远不可能指望绥靖政策能够获得永久的和平。类似政策的使用者必须要清楚一点，这仅仅是用来争取时间的。

然而在内政问题上，刘邦也许会感到欣慰。因为在他为汉帝国所规划的蓝图中，那些相间于郡县之中的异姓封国，都已经被刘氏子嗣所取代了。有了这层血缘加固的混合设计，刘邦有理由相信，他的帝国会比周王朝和秦帝国都更加稳定。问题是，天下的诸侯都姓了“刘”，汉家江山就稳固了吗？情况并非如此。40年后，已经休养生息得差不多，并且又一次陷入和匈奴大规模冲突的汉景帝，也将面临一个改变中央之国命运的历史机遇。而这一次，倒在汉帝国战车之下的，就是那些刘邦曾经倚重的刘氏诸侯。

第三节 刘邦用刘氏诸侯替换异姓诸侯

公元前202年，当刘邦击败项羽正式建立汉帝国时，帝国的疆土之中存在着七个经过战争洗礼的异姓诸侯国。由北至南分别是：燕国、赵国、韩国、梁国、楚国、淮南国、长沙国（参见《西汉元年地缘结构示意图》）。观察这七个封国的地缘结构，我们会发现，关中六国中除了齐国之外，实际上就算复国了。也就是说，汉帝国所直接统辖的，是大家都不希望它复国的“秦地”，以及秦国当年的连横对象“齐国”。为了连接这两块分列东、西的汉土，河济平原的西部，以及河北平原的最南端，并没有像战国时代那样，被赵、韩、梁所分割，而是成为汉帝国的直属地（河内郡、东郡）。在这样的分配格局之下，可以说自炎黄时代就已经体现出自己地缘价值的东西两片高地，都紧紧的掌握在帝国的手中了。为了让中央政府的直接领地能够完美延伸到帝国的最东端，刘邦甚至在刚刚登上帝位时，就迫不及待的将希望成为齐地之王的韩信转封为楚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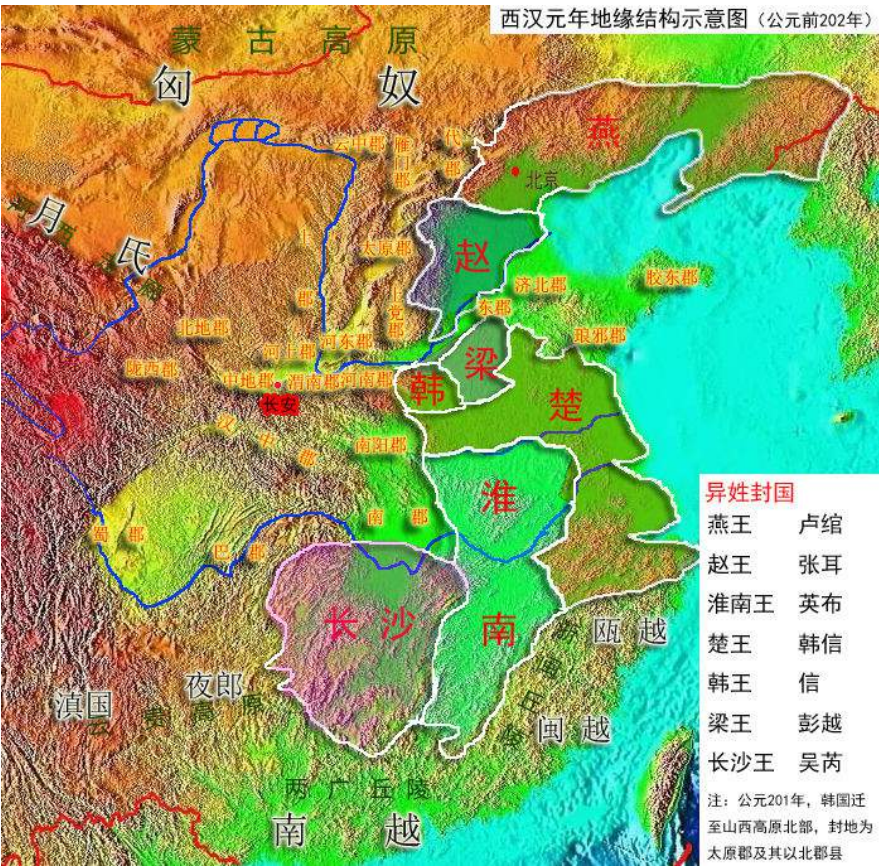
比起周王朝那种仅仅将直属领地从关中盆地延伸到洛阳盆地的做法，这时的汉帝国无疑要更有控制力。当然，仅仅依靠河内、东郡这种河济走廊来连接帝国的直属行政区，显然是有些危险的。因此在做出这个安排的第二年，韩国就被迁到了山西高原的北部，去在与匈奴人的战争中体现自己的价值了。

尽管在汉初出于当时的形势，刘邦在自己掌握最有地缘优势的核心地区的同时，分封了七个异姓诸侯，但这些异姓诸侯国的结局从一开始就注定是悲剧性的了。刘邦在去世之前，所发出著名的“白马之誓”——“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更是明白无误表达了他不允许异姓诸侯王存在的想法。不过剪除异姓王，并不代表对封建制的否定。恰恰相反，刘邦所总结的关于秦帝国崩溃的经验教训中，很重要一条就是秦帝国过于集权，而没有封建子弟这一条。

从今人的角度看，刘邦的这种想法可能有些保守，然而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刘邦为帝国所设计的子弟分封+郡县集权的结构，却是必要的过渡过程。因为就郡县

制而言，即使最高长官是由中央政府所派出的亲信官吏所担任，但绝大部分的地方官吏还是要从当地选拔的。在六国的记忆还存在于民众的脑海中时，这些地方官吏一旦遇到以复国名义煽动的叛乱时，是很容易闻风而动的。关东之地之所以在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后，很快就遍地狼烟，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比如项氏家族，就是被地方官吏请去做吴地义军的领导者。

要想有效管理那些可能发生的变故的话，在中央政府控制力渐弱的板块授权有最大独立性的“封国”来管理，是最有效的。而血缘就是维系封国与中央政府关系的纽带。正是因为对“封建制”管理边缘板块的认可，所以在刘邦分封异姓王的第二年，齐地还是被封建给了刘邦的长子（庶出的刘肥）。



西汉元年地缘结构示意图

在刘邦看来，将边缘板块分封给自己的子孙，要比交给官吏们管理更安全。为了最大限度的消除那些有可能对刘氏诸侯侵入地方感到不满的势力，刘邦将那些与六国王室有亲缘关系的地方豪强悉数迁入关中。事实上，同样的事情，秦始皇已经做过一次了。只不过，刘邦认为秦始皇做得还不够彻底。有了秦帝国崩溃的教训，刘邦有理由认为，能对帝国稳定造成威胁的并不仅仅是那些王室成员和他们的近亲。那些系出王室，已经深植于民间，成为地方大姓、豪强的“远亲”，同样有着很强的号召力和更强的行动力（想想与皇室八竿子才能打着的刘秀、刘备是怎么崛起的）。

已经深植于民间，成为地方大姓、豪强的“远亲”，同样有着很强的号召力和更强的行动力（想想与皇室八竿子才能打着的刘秀、刘备是怎么崛起的）。

应该说，刘邦为帝国设计的这套架构对汉帝国的稳定，以及消除六国意识所可能造成的危害做出了积极的贡献。问题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有极大自主权的封国势必会对中央政府的主导权发起挑战。这一问题并不会因为血缘关系而不存在。相反，在大家都系出一脉，在血缘上都有机会继承整个帝国时，在控制中央政权的帝王体系内，政权更迭的风险反而更大。

既然刘氏封国同样有可能对帝国的稳定造成威胁，那么恢复到秦人所使用的纯粹中央集权制，似乎就势在必行了。然而事情的发展，总是需要一个过程的。无论在哪个时代，想要消灭地方割据势力，从来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大部分时候，中央政府“削藩”的做法（甚至只是想法）都是要引发战争的，就好像刘邦和那些异姓诸侯之间所发生的博弈一样。当然，也不是所有的“削藩”之举都要用硬着陆的方式。即使在刘邦强力清除异姓王的时候，也还有一个异姓封国存在了将近半个世纪，并自然退出政治舞台的（无后），这个封国就是“长沙国”。

第四节 文帝和景帝解决同姓诸侯的政策

关于长沙国为什么能够成为例外的地缘背景，我们后面再分析。现在我们所关注的是，汉帝国是如何解决掉那些尾大不掉的刘姓封国的？相比那些异姓诸侯，这些与皇室同脉的宗室之国，处理起来要棘手得多。不过办法是人想出来的。当刘邦的第四子代王刘恒以诸侯之身被拥立为汉朝第五位皇帝后（公元前180年），对诸侯坐大有切身体会的他，在坐稳皇位后，便开始着手解决这一问题了。而他所采取的策略并不是削减封国的数量，而是反其道而行之。史称“众建诸侯而少其力”。

“众建诸侯而少其力”，说得简单点，就是将诸侯们的封国再次分割，使得每一个封国的力量变小，以此来降低封建割据对中央政权的威胁。事实上，刘邦在世之时，最有割据潜力的楚地就已经被分割为：长沙、淮南、楚、吴等四国了。只不过，这还远远不够。在这次重新分割中，韩信当日最想得到的齐地，也被分割成了六个新的封国。而南北纵深过长的淮南国，也被分割为了三块。最终，整个六国故地被重新分割成了十九个封国。如果说整个战国时代的特点，就是诸侯不断兼并，数量不断减少，最终形成七国割据格局的话，那么汉帝国创立之后，就是反其道而行之了。整体继承战国山东六国格局的封国体系，被一次次地分割。

从技术上看，帝国通过采取分割诸侯国而不是强制取消诸侯国的柔性做法，来消除封建割据的影响，是一种“杀人不见血”的软刀子。因为这种分割，是在为诸侯子孙谋利的旗帜下进行的。也就是说，按照汉帝国或说华夏原有的继承体系来说，能够得到封土继承权的只有嫡长子。而中央政权有意将改变这种继承制度，在那些大型封国继承问题上，让其所有的子嗣都有机会裂土为王。在这种情况下，在准备分割的诸侯国中，除了太子所代表的力量以外，大部分都转而成为受益方了，由此而形成的阻力也就小得多了。

用这种每传一代就分割一次的做法来削弱单个诸侯国的力量，相信假以时日，汉帝国内部的封建割据尾大不掉的问题便会逐渐消除。问题是，一方面并不是每个人都愿意等那么长的时间的；另一方面，这种分割法只是使单个诸侯的力量得到控制，但从整体上来说，并没有加强中央集权（封建在外的土地并没有减少）。因此在文

帝之后的景帝时期，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的削藩政策开始出炉了。为帝国提出削藩新主张的大臣叫“晁错”。他的具体主张就是对犯有过错的诸侯王可以保留他的封号，但却必须就此将他们大部分的封地收归中央政权，而只保留国都所在地的郡作为王国所在。与“众建诸侯”这种不影响诸侯王生前利益的柔性做法相比，晁错的这种做法显然要强硬得多。

从战略背景来看，在北方匈奴压力越来越大（匈奴在河西走廊、西域一带扩张成功，并持续犯边），而汉帝国急于集中力量对抗匈奴时，加快削藩的速度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这些封国为了维护自己的独立体系，并不会愿意将所有力量都交付给中央政权统一使用。更重要的是，那些体量依然巨大的诸侯，对皇权本身就是一种威胁。早在文帝时期，就已经多次出现刘氏诸侯王国的叛乱问题了。问题是，这种硬性削减封地的做法，不可避免的会引起所有诸侯王的不满。要知道，即使是一个普通人，也很难保证在一生中不犯错。更别说是那些天高皇帝远，在自己的封国中作威作福惯了的诸侯王了。更何况在中央政府明确准备削藩的政策背景下，那些被中央政权派驻到封国之中“帮助”管理的官吏，本身就带着放大镜来找寻诸侯王的过错。

为了对抗中央政权的削藩之举，帝国东部最有实力的七个封国开始了联合军事行动，史称“七国之乱”。由楚地分割出的吴、楚两国，齐地分割出的胶东、胶西、济南、菑川四国，以及河北平原的赵国，成为叛乱的直接参与者。可以说，以战国后期的地缘格局来看，这相当于赵、齐、楚三国联手向秦国发起反击。

在出台新的削藩政策之时，作为帝国的最高统治者——汉景帝并非没有考虑到由此可能造成的反弹。不过关东诸侯们如此之强烈和迅速的军事行动，还是出乎了他的意料。即使是在汉高祖刘邦执政时期，也没有同时出现过如此大面积的联合叛乱。在缺乏军事镇压信心的情况下，为了避免出现帝国由此可能造成的分裂局面，力主强硬削藩的晁错成为替罪羊，被腰斩于市。只是既然已经撕破了脸，反叛诸侯们就不会满足于一切恢复原状了。比起刘邦所面临的那些异姓诸侯来说，这些身为皇室子孙的诸侯，会认为自己并不仅仅有维持割据状态的空间。在他们看来，自己同样有机会继承整个帝国。前提是，他们能够成为帝都的主人。

很大程度上看，七国之乱战争格局是在复制楚汉战争。而反叛诸侯的领导者，也正是领有江东、江淮东部的“吴国”。说起来，鉴于项羽崛起于江东，刘邦一开始对于吴地的封建就是心存疑虑的。他甚至在分封自己的侄子刘濞为吴王时，就曾经敲打过这个颇有能力的晚辈，告知其“慎毋反”。然而所谓的反叛者之所以能够“反叛”，往往并不是因为他主观上有“心”，而在于他意识到自己客观上有“力”做到，才会试图对抗中央政权的。从这个角度看，吴地又一次成为东部的地缘核心，也是一种基于地缘背景上的宿命了。

让帝国抵御住叛乱诸侯进攻的，还是当年刘邦的深谋远虑。试想一下，如果当

初刘邦也像项羽一样，固执的将自己的直属领地放在一马平川的东部。那叛乱的核心地区，就会来自于第二阶梯上的西部封国了。要是那样的话，即使帝国的军队能够在第一时间抵御住叛乱者的进攻，也很难攻入诸侯们的根基之地（想想项羽在荥阳之战的困境）。战争也会不可避免的进入拉锯状态。现在的话，单从战略层面上看，控制太行山——大别山以西地区的中央政权，也会更有机会笑到最后。

在帝国中央释放出和解诚意而没有收到效果后，帝国终于决心用战争的方式来解决这件“家事”了。比起楚汉战争中，有彭越在梁地后方袭扰楚军更为幸运的是，此时的魏国故地“梁国”并没有加入叛乱，而是站在了平叛的第一线（因为梁王与汉景帝为同父同母的亲兄弟），这也使得帝国中央处于更有利的位置。最终，在经过十个月的战争之后，七国的叛乱以失败而告终。而这七个封国的土地，也自然收归中央了。

对于开创“文景之治”的文、景两帝来说，以战争的方式来解决削藩的问题，并不是他们所愿意见到的。不过在诸侯占据半壁江山的情况下，这场战争似乎又是不可避免的。很多历史评论者把些因削藩而引发的冲突归结于刘邦的“短视”，但从当时的背景来说，无为而治，充分授权地方的做法，会更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从而壮大中央之国的整体实力。只不过分权与集权之间的利弊权衡是一个永恒的问题，总是需要适时调整罢了。好在刘邦最初为帝国中央留下了足以约束封国的直属领地，让文、景二帝有能力逐步压缩了封国在帝国领土中所占的比例。这也为汉武帝彻底放弃“无为而治”的黄老思想，将汉帝国真正带入中央集权时代奠定了基础。

第五节 汉武帝以推恩令解决封国问题

当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君主之一汉武帝登上历史舞台时，汉帝国的内部调整已经卓有成效了。和与其齐名，同样伟大的“秦皇”奠定了中央之国核心区的版图不同的是，“汉武”的主要贡献在于将华夏文明渗透到了那些边缘地区。这其中，最让人感兴趣的就是在他那长达半个世纪的统治期间，与匈奴人所进行的博弈。相信这部分也是很多朋友所感兴趣的，不过在汉武帝准备带领农耕文明，对匈奴所统一的草原游牧帝国展开史诗般的战略反攻之前，他必须先解决中央之国内部所隐藏的诸多问题。

从大历史的角度看，从刘邦创立汉帝国开始，一直到汉武帝时期所做的很多工作，实际上都是在恢复秦帝国时期的结构。也就是说，这些工作其实在秦帝国时期已经用高度集权的手段做到了。只是因为秦帝国的手段过于激烈，没能让中央之国在历史变革的关口实现软着陆。最终使得中央之国又花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来进行调整。假如当时的秦帝国能够在内部结构调整上做些策略性的调整，也许“秦皇汉武”之功就会让始皇陛下一人独占了。当然，这一切只是假设了，而历史却又是不能假

设的。汉帝国注定要花上数十年的时间，来重新让中央之国回归到轨道之上。

在汉武帝登上帝位之时，帝国刚刚度过了它的 60 岁生日不久。在中国人的数字概念中，60 年意味着“天干地支”计时法循环过了一轮，被称之为“一甲子”。这似乎也在向汉武帝暗示，一个新时代即将开启。然而虽然“文景之治”为年轻的汉武帝解决了不少内部矛盾，但仍然有许多问题需要解决。其中对内部封国的削藩问题仍然是个令人头疼的事。不可否认的是，经由七国之乱之后，半数面积以上的封国已经纳入了帝国的郡县体系。只是那些剩余的诸侯国虽然不至于影响中央政权的安全，但却还是压缩了中央之国在调配资源上的空间。毕竟对于这些封君来说，资源是需要优先使用在维护自己地方体系上的。有鉴于此，汉武帝在稳定权力之后，开始制度上的“削藩”之路。这项制度史称“推恩令”。

从技术角度看，“推恩令”的指导思想是和汉文帝时期的“众建诸侯而少其力”如出一辙。只不过在实施方案上规定得更细，实施得更坚决。套用现代名词，就是将其“制度化”了。其基本方案在于两点，首先是从制度上保证了那些诸侯王子们的继承权（而不是嫡长子通吃），并且鼓励诸侯王自行二级分封子弟。所分封子弟，中央政府均予以承认。

如果说第一点只是在践行“众建诸侯而少其力”的理论，却并没有减少封建割据现象的话，那么推恩令中的第二个措施就是用来将他们消化进帝国体系的了。这第二条措施的关键在于，受“恩”分封的子弟，所得到的并非是“王”而是“侯”的称号（嫡长子还是能继承王位，只是这个王国已经大大缩水了）。也就是说随着时间的推移，汉帝国的版图中那些面积大、独立性强的“王国”，将很快变成一个可能只有一个中心城邑的“侯国”。

事实上，推恩令对于封建制度的致命性打击，并不在于将一个个面积较大的王国分割成小型“侯国”。因为根据春秋时期的经验，一个封君的强大于否，与他的爵位并不一定成正比。如果继续允许他们独立于集权体系之外，而中央政权的控制力又因为内部斗争弱化的话，伴随诸侯之间火并而来的新的领土兼并就一定会到来。这个过程就好像周王朝数百个诸侯国，最终兼并成战国七雄一样。有足够历史为鉴的汉武帝，当然不会允许这一现象出现在自己的帝国身上。因此在推恩令中最为关键的一点是，依照汉律“侯国”的行政地位等同于“县”，是受郡所管辖。也就是说，那些分割出来的侯国封君，相比那些中央之国所遴选出来的“县令”，更多的只是一个世袭的权力罢了。并且，这种特权也并非是不受约束的。如果有过错的话，无论是否为刘氏列侯，都有被削去封号的可能性。

汉武帝之所以能在制度上保证“推恩令”的实施，与文景之治所打下的基础是分不开的。经由这两个休养生息的时代，帝国不仅在经济上得到的恢复，还进一步压缩了诸侯们的生存空间，使之即使感觉到危险，也很难以叛乱的形式来表达不满。不过，最终在帝国版图上彻底抹去刘氏诸侯印记的，却是一个“外人”，这个

人也就是西汉帝国的终结者王莽。这位理想主义的改革者，为了自己的“新”王朝，自然不会允许那些刘氏诸侯们的存在了。当然，也有观点认为，如果不是西汉诸帝削藩太狠，王莽篡汉时，就应该有实力强大的诸侯王前来维护汉帝国的法统了。

世上之事总是很难两全其美的，集权和分权永远是一个需要平衡的事。在权衡之时，更多的是要“两害相权取其轻”。从这个角度看，西汉王朝的集权之路是一个正确的选择。否则的话，对内有可能造成新的分裂；对外亦不足以调配足够的资源对抗愈加强大的匈奴。然而，匈奴并非只是汉帝国唯一需要解决的外部问题。在帝国的南部，强大的汉帝国还有几个边缘地区需要解决。尽管这几个边缘地区对帝国的威胁远远比不上蒙古高原。但他们与华夏文明的渊源，注定了它们终将成为中央之国核心区的一部分。

这几个边缘地区，相信很多朋友都已经心里有数了。那就是分布于东南丘陵之上的三个越族王国：瓯越、闽越以及南越。为了重新将这三个在秦帝国时期就曾经纳入中央之国行政结构中的板块重新归位，汉帝国甚至打破了“非刘氏王者，天下共击之”的原则，在长达半世纪的时间里，允许异姓诸侯的“长沙国”留在帝国的版图中。至于这其间究竟有什么关联，我们下节再分析。

第六节 吴氏长沙国得以保留的原因

尽管在强大的秦帝国时期，包括岭南地区在内的整个东南丘陵地区都算是纳入了帝国体系，但这种融合是非常脆弱的。秦末、楚汉这二十多年的战争，不可避免的又让这一以“越”为名的板块重新游离出了中央之国的体系。在汉帝国重新统一中央之国的时候，东南丘陵地带内部已经根据自己的地理分割，由北自南分成了瓯越、闽越、南越几个王国。其中实力最强，也最为帝国所关注的，自然是由南征秦军所建立的“南越国”了。

秦帝国对岭南的征服，我们已经花过很大篇幅来解读了。应该这么说，在与中央之国的地缘关系中，南越之地本来是处在最末端的，或者说是离文明最远的地区。因为整个越地与中央之国对接的窗口在杭州湾南北，而在越国被楚国所灭之后，这些曾经直接参与过中央之内部分博弈的越人，向南沿着他们所熟悉的山、海之路，退入了浙闽丘陵，并由越国王族建立了瓯越（东越）、闽越两国。不过，随着秦帝国对南越地区的征服，越地诸板块与华夏文明的地缘关系远近，被逆转过来了。数十万来自中央之国的劳动力，极大的改变了南越之地的民族结构。而直接由南征秦军建立起来的“南越国”，一开始就很自然地在复制中央之国的政治体系，并成为最有可能对汉帝国南部安定构成威胁的地缘板块。

之所以要分析“越地”的地缘结构，是因为汉帝国并没有打算让这个边缘板块继续游离在帝国体系之外。而在汉帝国试图重新把自己的边境线推进到东、南沿海

的努力中，长沙国的建制又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环。说到“长沙国”，很多人可能会感到陌生。毕竟这个诸侯国之名并非直接继承自战国诸侯，而是从庞大的“楚地”中拆分出来的。简单点说，它所处的位置，就是长江以南的湖南省。从中央之国内部结构的角度看，湖南其实并不具备成为独立板块的条件。在相当长的历史当中，它只是作为以江汉平原为核心的湖北地区的附属板块。即使是在数百年后的三国时期，这种情况依然没有改变。整个湖南地区的归属，是根据长江以北战事的结果而决定的。

之所以会长期存在这种情况，与湖南的地形有着直接关系。武陵山区、南岭、罗霄山脉将湖南的核心低地合围成了一个口袋形。而朝北与江汉平原对接，是这个板块唯一吸收中原文明，参与中央之国内部竞争的路径。这样说，可能会让一些湖南的朋友感到不爽。毕竟在现阶段，湖南早已不甘于成为湖北的附属板块，并体现出自己独立的地缘价值了。其实，早在两千多年前，湖南这种独立的地缘价值就已经体现出来了。否则的话，也不会有特立独行的长沙国存在了。

湖南对于中央之国的特别地缘价值，直接来自于秦帝国对岭南的征服。在相关章节中，我们已经分析过了，五路南下的秦帝国是如何征服南越地区的，这其中对战局起着决定性作用的是一项地缘枢纽工程——灵渠。正是有了这项经由湘江、漓江，沟通长江、珠江水系的工程，秦帝国才有可能将岭南地区归入到华夏体系中。由此也奠定了湘江流域在中央之国地缘结构中的重要作用。如果希望将岭南地区稳定纳入中央之国体系的话，湘江流域就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明白了湘江流域对于控制岭南地区的重要性，我们应该也就能理解，为什么湘江流域能够有机会出现独立的诸侯国了。

虽然我们知道了湘江流域能够有机会出现独立诸侯国的原因，但不能解释为什么在汉帝国的行政建制中，长沙国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成为异姓诸侯的领地。要知道，为了控制边缘地区，在远离中央政府的地区建制有足够独立性的封国，是刘邦认为有必要的。而确保这些封国不至于成为新威胁的重要保证，就是这些诸侯国必须掌握在刘氏诸侯手中。仅仅用了五年时间，就解决掉几乎所有异姓诸侯问题的刘邦，在解决地缘实力最弱的“长沙国”时，技术上应该是不存在任何问题的。

真正让长沙国成为异类的直接原因，是长沙国国君的身份。这位在汉帝国体系中位列王位的封君姓“吴”，叫吴芮。而其家族所掌控的长沙国，也被称之为“吴氏长沙国”（以区别于后来的刘氏长沙国）。虽然提到吴芮，绝大多数朋友应该没什么印象，不过提到另一个与“吴氏长沙国”有直接关系的人，估计就有很多人知道了，她就是“辛追”。还想不起来吗？那马王堆总知道吧。马王堆古墓所出土的震惊世界的古尸，就是这位叫做“辛追”的夫人。而她的官方身份，则是吴氏长沙国国相（利苍）的正妻。

在汉帝国的封建体系中，诸侯国的国相往往是由帝国派出“协助”诸侯王治理

封国的行政长官担任。当然，这到底是在“协助”还是在“监视”，大家就心知肚明了。在这里指出马王堆古墓与吴氏长沙国之间的关联，并不仅仅是让大家对这个封国有更直观的印象。事实上，从马王堆古墓的奢华当中，我们也可以管中窥豹分封制度本身对于国力的消耗。这种消耗并不在于封国实际管理者的身份是什么，而在于这是一个相当独立且少受监督的体系，因此不可避免的会将大部分的资源消耗在自己身上（即使是本身行使监督职责的官员）。这样的话，能够为中央政府所调配资源势必会大大减少。相应的，中央政府在抵御外部威胁时，也就很难得到与其整体国力相适应的支持了（想想那些西汉诸侯墓的奢侈）。

回到“吴氏”长沙国得以立国的话题上来。当我们把焦点聚集在这个“吴”字上来时，我相信大家首先想到的，就是那个在春秋末年建立霸业的“吴国”了。事实上，吴氏长沙国也的确源于夫差之“吴”。当先人王业已经成为过去式时，用曾经的国名作为姓氏，已经成为那些王族后裔用以标注血统，记忆祖先荣誉的惯用手段了。

作为吴国王室后裔的吴氏家族，在吴国亡于勾践之手后，能够选择的退隐空间并不大。尤其是对比越人的话，这是因为越人本身是沿东南丘陵，及海岸线北上的族群。也就是说，当他们不得不退出中央之国内部的竞争时，还可以回到祖地之中去，并与之前遗留、散布在这片沿海丘陵带的越族部落重新整合。相比之下，最初由江淮南迁至江东地区的吴人，就不存在这样的纵深了。他们最初发源的区域，在区位上已经不可避免的成为中央之国的一部分了。在楚、越两国的包夹之下，任何想在其间割据的族群都没有独立生存的机会。这样看来，那些不愿意就此成为越国之民的吴人就没有地方可去了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江东和两湖地区之间，还存在一个比湘江流域更封闭的地理单元——赣江流域。

赣江流域，这个在区位上被概括为“吴头楚尾”的板块，正是一个吴国遗民有机会保持相对独立生存状态的区间。之所以说是相对独立，是因为吴头楚尾的赣江下游地区，虽然并不是中央之国以及楚、越（吴）争霸的主战场，甚至可以说，只是一个尚未有效开发的缓冲带；但如果你的想法是试图以其为基地复国的话，那么无论是楚国还是越国，都有足够的力量消除这个隐患。而如果你只是想在文化和族群上保持一定的独立性，在政治上愿意服从楚、越相争的胜利者的话，这种存在并不会认为是有害的。即使是中央之国发展到了高度集权的帝国时代，也同样有着“皇权不下县”的说法。地方的事务永远是那些以血缘为纽带的地方宗族势力做主，只要你不要傻到轻易介入中央之国核心权力的争夺就行了。

吴芮所属的吴氏家族在赣江下游地区的经营，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得以存在的。鉴于这个家族的出身，以及伴随而来的文化、技术优势，吴氏家族在赣江下游地区的经营，可以说是卓有成效的。其影响力并不仅仅限于当地土著，在那些因楚人入侵，同样不得不退出中央之国政治舞台的越国遗族中，他们也同样拥有很高声望。事情

就是这样，当吴、越两族是竞争对手时，他们之间的仇恨显得那么难以化解。然而当大家都成为失败者后，大家突然发现，在那些以华夏正统自居的人眼中，他们之间并没有区别。实际上，在经由那么多年的融合之后，所谓吴、越的确已经几乎合为一体了。以至于直到现在，绝大多数人依然搞不太清楚吴、越之间究竟有多大区别。

吴、越两族之间到底有多大区别，自会有学究们去研究。不过，对于统一中央之国的秦帝国来说，却知道如果想在长江以南的这片蛮夷之地，找一个代理人来帮助帝国管理那些不服王化已久的土著的话（以越族为主），吴氏家族是最好的选择。当然，这种安排的前提是，吴氏家族本身愿意积极融入这个全新的政治结构。幸运的是，已经在赣江下游经营五代之久的吴王后裔们，早已明白了应该怎样“识时务”。在楚人得势之时，吴氏家族的成员也同样进入过楚国的行政体系。接受秦帝国的领导，并向帝国中央保证自己有能力管理地方，并不需要做太多的权衡。正因为如此，当秦帝国决定在赣江下游地区置县时（番县，县治在现在的江西“鄱阳县”），番县最高行政长官的位置便交付给了吴王夫差的第五世孙：吴芮，史称“番君”。

如果不是秦帝国的迅速崩溃，可以想见，吴氏家族最有可能的结果是延续他们地方豪强的地位，并在帝国的地方行政机构中占据一席之地。在帝国还需要他们帮助管理南方那些尚未完全纳入华夏体系的“蛮夷”时，吴氏家族的结局应该会比那些被认为对帝国稳定有威胁的，与六国王族有亲缘关系的地方势力要好。不过历史注定要让这支吴王后裔登上更高的政治舞台。在秦帝国迅速崩溃，新的封建体系似乎又将建立起来时，“番君”和他的家族又一次准确的找到了自己的定位，为自己的家族又一次的打上了“王”这个政权标签。

第二十四章 汉帝国征服南越国和闽越国

第一节 汉帝国征服百越之地的背景

说在古典时期，百越之地对中央之国的重要性比蒙古高原和西域重要，可能会让一些试图恢复汉唐雄风的朋友不解。说起来，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毕竟以古典时期的生产力和技术特点来说，华夏文明是无法在蒙古高原和西域获得足够的耕地，以支持自己存在的。事实上，如果不是游牧民族持续从西、北两个方向给予华夏文明以巨大压力的话，包括汉、唐在内的强势帝国，甚至都不会在这两个方向有寻找新的耕地的努力。因为在大部分的古典时期，最为稀缺的资源并不是土地，而是人口。尤其是在我们正在解读的时代，人口远未成为一种负担，在长江、黄河中下游地区尚存在大片未开发的土地。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没有政治层面的战略引导，普通民众并没有自然渗透的动力和压力。

外部威胁所带来的战争，通常是大规模人口迁徙的诱因。比如为了防御北方压力，而向那些有可能转化为耕地的草原地区迁入农业人口；因为不愿意受人主中原的边缘民族统治，而向长江、珠江流域南迁等。在漫长的中国历史中，这两种情况下所导致的人口、文明扩散，是最为常见的。只不过，并不是每一次迁移都是成功的。能不能沉淀下来，不仅取决于你对土著居民是否有战略优势，更取决于这片土地不适合农耕文明。从这个角度说，华夏文明对百越之地的融合，比之在西、北方向做的那些尝试要成功得多。前者已经完全成为华夏农耕文明的一部分，而后者直到现在还处在文明融合期。

汉帝国对于百越之地的征服，很显然不是出于获得更多的耕地。事实上，这种关注是互相的，即不仅汉帝国在关注这些边缘板块，这些边缘板块上的王国也在时刻关注着中央之国的局势变化。之所以会形成这样微妙的关系，很大程度是因为百越之地与华夏文明之间已经形成了亲缘关系。系出春秋越国王室的于越、瓯越、闽越王国，与直接由南征秦军建立的南越国，身上无不带有显著的华夏基因。而秦帝国那超出常规的基于四海归一理念，对百越之地所进行的大征服，更是让双方的潜意识里都认为百越之地迟早会成为中央之国的一部分。能够让自己选择的，无非是存在的形式罢了。

如果按照秦帝国为中央之国设立的架构，百越之地是没有任何选择的。那些百越贵族除了在帝国的政治体系中谋求一个位置之外，是没有机会继续体验山高皇帝远的快感的。这一点，那些直接系出于越王族的瓯越、闽越王族，感受并不会比直接被秦军征服的南越部落要少。尽管秦帝国暂时使用了羁縻的方式，将越国遗民的避难地——浙闽丘陵地带纳入了帝国体系（在不动原有体系的前提下，变瓯、闽之

地为“闽中郡”，并授命位份最高的闽越王为最高行政长官），但很明显的是，当帝国完成了对南越之地的直接征服后，是不可能单单放任东南方向这片山地成为化外之地的。

与赣江下游的吴王后裔在秦末战争中看到家族复兴的机会一样，偏安于东南山地的越国王族，也同样看到自己继续保持独立状态的机会。与百越之地一样，关东六国的遗民同样不适应现在的生活状态。对秦帝国强大中央集权体系的恐惧，让大家不约而同的站到了帝国的对立面。也许从大历史的角度看，这其实算是一种倒退，或者说“复辟”。但历史就是这样，总是在进二退一的磨合中前进的。

正是由于对重新获取诸侯地位的渴望，被秦人封为“君长”的闽越王无诸，率领着越地诸部直接加入了灭秦的进程。当然，这些越人其实应该和吴氏家族一样，并没有参与到一线博弈当中去。他们的最大贡献，就是依靠自身的血统优势、政治影响力稳定了长江以南地区，使秦帝国完全没有了在楚地纵深开辟第二战场的可能性。因为有了吴、越两族的表态，即使南征秦军有意回师勤王，也会掂量一下自己有没有机会突破长江防线。在这种情况下，封关以自守，在乱世中谋得一个诸侯之位，就是最好的选择了。

相比那些完全被秦帝国征服的地区，一直保持独立状态的瓯越、闽越之地会更有理由得到一个诸侯的位置。其实即使不直接介入的话，这些越国遗民也同样可以独立，不过在中央之国体系内获得一个诸侯之位的诱惑还是很大的。这不仅可以让你有机会摆脱蛮夷的地位，重新成为华夏文明的一部分，更可以在新的政治体系中获得一个合法的地位。当然，这一切还要取决于你的站队是否正确。毕竟在秦帝国崩溃后，试图建立新体系的并不只一个人。幸运的是，这些久离中央之国政治舞台的越人并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在他们的回归之路上，当年的死对头，现在同病相怜的吴国遗民，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一直身处中央之国边缘，并识时务的向征服者表明自己价值的吴氏家族，拥有比越人更敏锐的判断力。这不仅保证了他们自己在楚汉战争中选择了胜利的一方，也让越人在汉帝国的体系中得到了一个“外藩”的地位（与南越国一样，属于朝贡体系的一部分，长沙国则是“内诸侯”了）。当然，越人也不一定要对吴氏家族感激涕零，所谓的“合作”，其实就是互相体现价值。在这个过程中，吴氏家族同样获利不少。正是由于他们能够向胜利者表明他们在越人中的影响力，才有机会在楚、汉两代都谋得一个诸侯之位，并成为汉帝国体系内难得能够善终的诸侯王家族。

在历史的车轮之下，无论是“内诸侯”的吴氏长沙国，还是“外藩”的瓯、闽诸越系王国，终究会成为中央帝国的一部分，但这并不影响在微观历史层面，他们在秦汉相接的时代做出过正确的选择。相比之下，南越国与汉帝国的关系一开始就显得不那么和谐了。对于封关以自守的赵佗来说，他的资本并不仅仅在于那数以十万计的南征秦军。比湘、赣流域更强的封闭性，比浙闽丘陵更大的耕地潜力，是

南越国得以立国的地缘基础。这些地缘优势给予南越国的，就是更多的思考时间。

第二节 汉初南越国能存留的原因

前面我们也说了，在汉帝国建立后的第七个年头（公元前 196 年），帝国内部叛乱诸侯的问题即将被解决掉时，南越国才“识时务”的表示，愿意接受帝国的建议，成为帝国名义领导下的“外藩”。然而南越国的存在，毕竟不像瓯、闽诸越那样“人畜无害”，也不像吴氏“长沙国”那样，主动成为帝国体系的一部分。对于帝国来说，南越国的地缘实力，足以对帝国尚未完全开发的长江以南地区造成威胁。而对于本身就因为南征成就诸侯之业的“南越国”来说，也不会相信汉帝国会真的与自己相安无事。因此，在双方宣布交好后的第十五个年头（公元前 181 年），战争终于爆发了。

史家往往把双方战争的爆发归结于刘邦的离世，以及吕后掌权后对南越执行了更强硬的政策。但其实鉴于双方都属于新生政权的性质，如果不通过战争的方式来试探下对方的实力的话，是很难为双方的关系找到一个合适的定位的。尤其是对于实力更为强大的汉帝国来说，有秦帝国貌似成功的开拓在前，是很难抑制住扩张的欲望的。

双方试探性战争的结果，就是谁也无法更进一步。南越国无法拔除掉专门为它设置的吴氏“长沙国”，而汉军也同样适应不了岭南那湿热的气候，以及复杂的地形。看上去，双方似乎打成了平手，但请不要忘了博弈双方的实力对比。在这种实力不对称的战争中，南越国方面完全有理由认为，自己才是最终的胜利者。基于这种自信，赵佗甚至于直接称“帝”，将自己与汉帝国置于平等的地位。不过赵佗和他的南越国其实也很清楚，他这个“帝国”是无法与中央帝国对抗的，无论这个帝国是谁的天下。

对于南越来说，最为现实的扩张方向还是百越之地。既包括浙闽丘陵上的“闽越”等国，也包括广西盆地、红河流域的“骆越”等族。当汉军像秦军那样在南越之地尝到苦头后，南越国的声威达到了顶峰，包括本来已经臣服于汉帝国的闽越等国也转而变成了骑墙派。其实只要不让他们去充当攻击汉帝国的炮灰，这种一身事二主的情况是很常见的，也算是小国的生存之道吧。此时的“南越国”，可以说得上是真正成为“百越之主”，其声威甚至超越了代表越人入主中原争霸的春秋越国。以至于到了清帝国时期，自视为“越族”唯一保持独立状态的安南政权，非常希望得到这笔丰厚的历史遗产。然而惯于将玩弄文字游戏的能力与政治能力划等号的帝国政治家们，看出了这其中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于是安南人所希望得到的“南越”国号，变身成为“越南”。

说一句题外话，试图从华夏文明的丰厚遗产中分离出属于自己文化体系的情况，

也同样发生在东北亚那个突出部上，而这一次，他们瞄准的是“东夷”。至于政治上，高句丽在东夷体系中的地位，则等同于“南越”在百越体系中的地位（最起码他们是这样认为的）。如果有一天，这个被分割为南北两块突出部变成了一个国家，并以“高丽”为名的话，希望大家不要感到奇怪。不管这种继承有多少合理之处，最起码它这样做已经不需要中央帝国批准了。

尽管从汉帝国的角度来看，攻击南越国的第一次战役算是失败了。但南越国方面同样不相信抵御住了中央帝国的第一次攻击，就等于获得了最终的胜利。这一点，相信亲身指挥了秦攻南越战役的赵佗，比谁都清楚。一旦汉帝国决心集中全部精力向南扩张的话，已经国家化的南越政权，并不一定会比秦军所面临的那些土著做得更好。唯一让汉帝国暂时没有这样做的原因，是因为匈奴在北方所造成的强大压力。有鉴于此，当汉帝国又一次抛出橄榄枝后，南越国便顺水推舟的去“帝号”，重新成为汉帝国的外藩。

南越国的这种做法，其实是非常务实的。毕竟只要你保持实际的独立状态，名义上谁更大总不是问题的关键。在漫长的历史中，即使是自视甚高的华夏中原政权，也不止一次的在名义上臣服过那些草原政权。反过来，为了获取实际的利益，那些华夏政权无法彻底征服的边缘政权，也经常主动示好。就这一点来说，农耕文明所拥有的强大地缘潜力是问题的关键。即使是南越国这样完全参照中原政权结构组织起来的国家，也无法在全部资源上自给自足。与地大物博的中央帝国的贸易通道是否畅通，会直接影响到国力。因此在历史上，我们会不止一次的发现，很多时候边缘政权对中央帝国发起攻击，并不一定是单纯的掠夺，而是为了恢复贸易（或者垄断贸易权）。反过来，中央帝国也不止一次的将封锁贸易通道，作为制约边缘政权的手段。看到这里，你是否会觉得有点眼熟？作为现在的世界主导者，这一策略也正是美国人所惯用的。

不管怎么说，在北方压力尚未缓解的情况下，汉帝国与南越国之间形成了长达70年的和平期。而在和平交往过程中，汉帝国的影响力也开始自然渗透到了南越国。基于南越国与中央之国的亲缘关系，南越国方面对从汉帝国吸引先进文化，也是持欢迎态度的。前提是要不要影响到它的政权稳定。然而对于汉帝国来说，南越国的存在终究是一件不那么让人舒服的事情。在这数十年的和平期内，汉帝国并没有放弃劝说南越国并入帝国体系，成为“内诸侯”的想法。而当汉帝国在对匈奴的战争中取得决定性胜利后，南越国归入帝国体系的战略窗口也开始打开了。

汉帝国对匈奴的决定性胜利发生在汉武帝时期，而完成这个历史使命的将领是两个著名的“外戚”：卫青、霍去病。不过由于这两人的功绩所在，倒没有人因此去怀疑他们能力了。至于他们和其他帝国将领是如何完成这些史无前例的开拓工作的，将会是我们后面内容的重点。现在我们需要解读的，是汉帝国如何去完成秦帝国在南线的未竟事业。

第三节 南越国成为内诸侯的计划失败

当一个人面临诸多问题时,解决思路无非有两种:“先易后难”或者“先难后易”。相比匈奴的压力来说,百越之地无论从态度,还是实力上来说,对汉帝国的威胁都要小得多了。更为有利的一点是,这些以“越”文明为特点的王国,潜意识里都对华夏文明有着很高的接受度,并且都在按照农耕政权的要求来改造自己。事实上,当高一级的文明与相对较低的文明能够无障碍的沟通时,事情总是会朝着有利于高一级的文明的方向发展的。这也就是所谓的战略优势,或者说时间在某一方说法的来源。很显然,在汉帝国决定暂时不动南越国,而是与之在保证表面宗主权的前提下进行平等沟通的那些年,双方在各方面所进行的那些交流、融合,客观上是有利于汉帝国最终吞并南越国的。

最终在微观政治层面上体现出这些融合效果的,是南越国的第四代君主赵兴决心接受汉帝国的“建议”,成为帝国体系管理下的“内诸侯”。在这个决定背后,有一个影响因素就是这位南越国君的母亲是来自于汉帝国。当然,尽管我们所接受的历史教育,往往会让我们感觉到,历史的走向往往在于某个政治人物的一念之差。但实际上,这些其实都只能算是表面原因了。单从南越国王室准备内附汉帝国这个决定来说,很显然与当时汉帝国已经对匈奴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有关。当你已经很清楚战略走向的时候,比较识时务的做法就是在此之前表明态度,以取得一个相对较好的结果。从南越国以后有可能的政治地位来说,在异姓诸侯早已被消灭,同姓诸侯也已经名存实亡的汉帝国内,取得一个半独立性质的“内诸侯”地位,其相对价值并不会比当年南越国所获得的“外藩”地位低。

并不是每一个人都有机会决定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的,然而在绝大部分的历史时期和社群里,总是会有一个精英阶层来影响相关决定的。也就是说,这些通过各种途径获得“表决权”的精英人物能否形成统一的意见,才是决定微观历史走向的直接原因。这也就是我刚才为什么说,历史并不像我们在很多书中所看到的那样,仅仅因为某个人的想法而改变的。比如在决定南越国命运这件事上,有发言权的精英阶层就出现了分歧。这种分歧最终使得汉帝国与南越国的关系没有实现软着陆式的对接,而是以“战争”这种硬着陆的方式完成了没有悬念的合体。

与很多王朝的走向一样,南越国在生存了将近百年之时,君主的权力也出现了被架空的现象。把持朝政的文官体系,并不愿意就此放权力。这其实是个有趣的现象,因为在300年后,那位被神化为谋臣典范的诸葛孔明,在劝说孙权接受“联刘抗曹”的建议时所提出的观点是,那些主和的文官们在归降曹魏之后,依然可以保有他们的位置和权力,而孙权家族就不可能再有今日之地位了。其实这也并不让人奇怪,因为南越国和东吴所面临的形势并不相同。在中央集权体系已经成熟的东汉末年,像孙权这种诸侯是没有机会在未来曹操所领导的帝国中,谋得一个半独立

的内诸侯地位的。相反，那些本来就已经习惯于在集权体系下各安天命，没有机会享受世袭权力的文官，却有可能因为平台的做大而获得更大的发展空间。

至于南越国，情况则正好相反。本来就已经被文官体系架空的南越国王室，在主动归附汉帝国后，其为帝国所节约的资源，以及所起的榜样作用，最起码能够保证他们虚位君主的地位可以世袭下去。这一前景，吴氏长沙国的存在可以提供参考。然而，既然汉帝国决定保留南越国王室，并且出于政治宣传的原因，很有可能会落实它“内诸侯”的地位（最起码在一开始会这样），那么被牺牲的就只能是原本把持南越国的文官体系了。即使是在刘氏封国当中，帝国中央也会直接派遣官吏，以“协助”之名帮助那些诸侯王管理政务，更何况是南越国这样一个刚刚归附的“外藩”了。正是由于这种担心，在南越国王室做出和平进入汉帝国体系的决定之后，一场由把持权力的文官所鼓动的叛乱终于发生了，主张归队汉帝国的王室成员成为牺牲品。

其实从历史趋势来看，南越国在这样一个战略窗口（北克匈奴）归入汉帝国是必然的。是否采取战争形式，对大势并没有太大影响。当然，以战争这种形式来进行的整合，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种消耗。不过好处在于，在战争之后，本来准备给予南越国的过渡期就可以取消了。也就是说，这时的汉帝国可以直接将南越国的领地归入中央集权的郡县体系了。

第四节 汉军兵分五路出征南越国

有了秦帝国之前征服南越所打下的基础，汉帝国再一次攻伐南越之地时，可以少走很多弯路。最突出的影响就是，汉军再也不用为在哪里打通一条水路补给线而烦恼了。灵渠的存在，无疑让汉帝国的南征有了底气。不过秦帝国为汉帝国所打下的基础，并不仅仅在于灵渠这条连通长江、珠江流域的战略通道。事实上在秦人征服南越之后，跨越“南岭”的多条陆地通道也被打通了。根据五岭南北的地缘格局，最为重要的有两条。一条是由长沙国桂阳郡起，（此时长沙国南部的山地，已经被建制为“桂阳郡”了）溯湘江上游的“耒水”而上，然后经由陆地通道跨越五岭中的“骑田岭”，再沿珠江水系北部支流“连水”而下，攻入珠江下游；另一条则是由豫章郡出发（今江西境）溯赣江而上，直至大庾岭北，在越岭而过后沿“浈水”入珠江。

与灵渠相比，这些尽量在长江、珠江水系支流上源之间，寻找接近点来修筑的跨岭通道，有优势也有劣势。其劣势在于，这种“水陆水”的沟通方式，在运输的能效上会比完全水路的“灵渠”通道低；不过优势也是明显的，就是与南越国地缘核心——珠江三角洲的直接距离要近（灵渠的话，要经由广西盆地才能进入广东境内），有可能更快速的解决战斗。究竟是选择灵渠这种先攻取南越国边缘板块（广西盆地），然后再步步为营攻击至珠江三角洲的方案更优；还是集中兵力快速通过

骑田岭、大庾岭通道，攻击南越国的方案更好，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如果按照秦帝国的经验来看，整个南越之地部落分割，并不存在一个可以号令全境的地缘中心。也就是说，你必须在所有地区都取得优势，才有可能彻底解决南越的问题。这样的话，能够支撑长期补给线，并由上游至下游逐次攻击的“灵渠”线，会是最好的选择。

然而南越国近百年来的国家化进程，也给汉帝国提供了另一种可能，那就是如果汉帝国能够快速攻克南越国的大脑——番禺的话，那么那些南越国苦心经营，模仿中原政权的行政体系，就很有可能识时务的马上转投汉帝国阵营，避免做无望的抵抗。这其实有点像是一个悖论，一个文明程度更高、组织完备的国家，在抵抗外来入侵时，其抵抗力很可能不及那种各自为政的部落联盟。理解这点并不难，对比下我们这些自视为万物之灵的人类失去大脑后，与蚯蚓这种低级生物被切成数段之后的生存力；再想想北美印第安人和南美印加帝国的抵抗过程，相信大家就能明白“文明”并不总是万能的了。

对于汉帝国来说，他们很难判断出即将遇到的抵抗和战争，究竟是一场必须各个击破的“持久战”，还是一场可以采取“斩首行动”，速战速决的战役。不过这对于汉帝国来说，似乎并不是一个问题。在击败匈奴之后，汉帝国的经济、军事实力都达到了顶峰。也就是说，帝国有足够的实力尽数利用这些可能的通道多路出击。至于说最终谁成为解决南越问题的最大功臣，就要看各路将领的表现了。既然有三条攻击南越的现成通道可供选择，那么汉帝国攻取南越的战争是否就是采用了这三条通道呢？答案可以说是，也可以说不是。说是，是因为这三条通道的确都使用了；而说不是，是因为在帝国谋划的攻击中，还有两条路线准备使用——夜郎线和闽越线。而这两条路线的使用，就有些假途伐虢的意思了。

在秦征南越阶段，我们已经对南越的地缘结构作过详细分析了。如果用地表形态来概括的话，我们可以将这片岭南之地统称为“两广丘陵”。而如果从水系的角度看，又可以标注为“珠江中下游地区”。当然，这里所说的“珠江”，并不仅仅是广州城里那一小段，而是指按照用下游河段之名作为整条干流以及水系之名，惯例定义中广义上的“珠江”。

既然两广丘陵地带只是为珠江中下游水系所覆盖，那么依照人类迁徙和交流的特点，其上游地区应该也有机会成为南越文化覆盖之地，并为汉帝国所关注了。单从水系的角度看，这种情况还是很可能发生的。不过结合到地理结构，南越文化对珠江上游地区的征服就很困难了。因为相比丘陵之地的两广丘陵，珠江上游地区的平均海拔要高出许多，在地理结构上已经属于中国地理中的“第二阶梯”了，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云贵高原”。活跃在这片高原上的土著部落，被中央之国统称为“西南夷”。

对比一下从华北平原渗透黄土高原有多么困难，我们就不应该对南越国控制西南夷抱有太多的期待。不过，以两广丘陵率先与华夏文明对接，并拥有更大农业潜

力这点来说，南越国对云贵高原还是有一定影响力的。最起码，活跃在这片高原上的部族并没有实力对南越国造成威胁。同样能够让南越国保有地缘优势的，还有浙闽丘陵（主要是南部）以及红河下游两个板块。假如不考虑北边华夏文明的威胁，南越国其实是完全有机会以“南岭”为界，珠江三角洲为核心，打造出一个“南越帝国”的。可惜的是，它的邻居太过强大了。



汉征南越国示意图（公元前112年）

如果我们把视线停留在“珠江水系”上的话，就很容易发现云贵高原和两广丘陵之间的地缘联系是靠什么来连接的了。简单点说就是，云贵高原拥有珠江上游的两条河流，即云南高原之上的“南盘江”，以及贵州高原之上的“北盘江”。而在这两江上游附近也生成了属于云、贵高原自己的政治体，其中最为主要的就是滇国和夜郎国了。不过，以当时云贵高原的文明程度而言，滇国和夜郎并不能算是统领整个高原的王国，而更像是一个部落联盟中的最大者，或者说是盟主的地位。像在夜郎国的东面，北盘江和沅江流域之间就还存在“且兰”等国。单从地理位置上来看，更靠近广西盆地的北盘江流域（牂柯江），也就是夜郎国的核心区，会更有机会与南越国互相了解。

人类对河流水系的认识，总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就好像在很长一段历史时期内，发源于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穿成都平原而过的“岷江”，都被认为是长江的源头（所以“江水”的概念到岷江为止，并不包括金沙江）一样。同样的情况，很有可能也发生在珠江流域。也就是说，从技术角度看，当时的人们并不一定知道，从昆明东

部流出的“南盘江”才是珠江的正源，但北盘江可以通南越，却一定是知道的。因为汉帝国在征服南越时，已经准备以夜郎为跳板，顺流而下征服整个珠江中下游地区了。尽管汉帝国现在所管辖的范围内并没有直通夜郎的水道，但秦帝国对武陵山区的征服，已经足以让汉帝国很接近这个封闭的西南“大”国了。借助乌江或者沅江水道，汉帝国的使者和军队真正在山路中行走的时间并非难以承受。当然，如果想借助夜郎的帮助，打通一条新的攻击南越通道（我们可以称之为“夜郎道”）的话，那么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夜郎为什么要帮助汉帝国。

假如汉帝国在公元前135年，初次派遣使者出使夜郎时就提出合作攻击南越的要求的话，是很有可能被拒绝的。因为此时的夜郎国并不知道汉帝国的强大，与此同时，南越国的强大却是可以让夜郎国充分感受到的。所以，与其说那夜郎国君向汉使发问的那句“汉孰与我大”，是不知深浅的“夜郎自大”，倒不如说夜郎国只是想客观的得出一个数据来决定自己的外交走向。对于小国来说，“事大”绝非不可接受，甚至可以成为一件有利可图的事。前提是，我必须知道你是否是最大的。我们并不知道，汉帝国是通过哪些手段让夜郎国明白了，它将要面对的是如何强大的一个帝国。不过从汉使打通与夜郎的外交通道到帝国开始攻击南越，中间有25年时间，已经有足够的时间做到这一点了。事实上，在向小国“示威”这件事上，中央之国向来有足够经验能够让你很舒服的意识到，只要愿意纳入帝国的朝贡体系，你将得到多么大的实惠。

从战术角度看，能够征用熟悉水路的夜郎人协助攻击南越，固然是可以增加胜算，不过却不是必不可少的一环。毕竟与灵渠这种完全水路的通道，以及骑田岭、大庾岭这种直线距离更近的“水陆水”通道相比，夜郎道无论在运力还是距离上都不占优。最终的情况也是这样，从夜郎出发的汉军，还没有穿越广西盆地时，番禺的战事就已经结束了。因此汉帝国之所以希望借助攻击南越这件事，让夜郎等贵州土著政权参与进来，很大程度是有一石二鸟的战略意图。从后来的结果来看，汉帝国也的确这样做了。征服南越之时，也正是贵州高原纳入汉帝国版图之日。有所区别的，只是那些愿意服从帝国调遣参与征越之役的夜郎诸部，最终得以在郡县体系下暂时保有一片领地，继续按自己的方式生存；而那些没有顺应天时的部落，则被回军之后的汉军所灭，其领土被直接划入郡县体系（如贵阳一带的贵州高原第二大国“且兰国”）。

加上从夜郎出击的汉军，汉帝国最终攻击南越国的军队被分成了五路。从战略布局来看，这五路大军也分别承担着不同的战略任务。从湘江流域（桂阳郡）、赣江流域（豫章郡）出击的两路汉军，无疑是承担着直接攻击南越国都的任务。最终这在这两路的竞争当中，翻越大庾岭的汉军成为最先攻至珠江三角洲的汉军。这很大程度是因为这条路线的直线距离最近。另外，汉帝国与南越国和平交往的这些年，汉军对边关、道路的熟悉，也非秦帝国可比。然而最终攻下番禺城，取得首功的还

是随后到来的另一路汉军（自桂阳方向来）——伏波将军路博德。这也造成了一个有趣现象，当后世统治者再试图对“越”地用兵时，他们总是喜欢把“伏波将军”这一称号授予被寄予厚望的将领，以期博得一个好彩头。而在这些伏波将军中，最为人所津津乐道的就是那位被认为是执行了外战任务的伏波将军“马援”（征交趾而胜，其他几位主攻的都是江东的“越”地了）。

尽管跨越南岭的这两路汉军，因斩首成功而对南越国造成了致命打击，但这并不代表自灵渠而下的汉军就没有任何功劳了。这支沿秦军主攻线路而下的汉军实际上分成了两路。一路在攻取了桂江（漓江下游）与珠江干流交叉处的重镇——苍梧（现在的广西梧州）后，沿珠江（广义）浔江段向西，然后再由郁江南下，征服广西盆地南部，直至红河流域；另一路则在过苍梧之后顺西江而下，与另两路汉军合击珠江三角洲。这两路汉军的攻击路线，其实也就是当年秦军所使用过的路线了。执行此项攻击任务的，是南越国的两员叛将。如果他们二人本身就是当年南征秦军之后的话，这倒也是个比较有趣的巧合了。



汉征南越国示意图（公元前 112 年）

这样看来，这四路汉军都有各自的攻击路径，像一把梳子一样的，把南越国各重要板块给梳理了一遍。各军会师之日，也就是南越问题全面解决之时了。唯一显得有些无功的，可能就是从夜郎顺江而下的那路汉军了。他们沿路所攻取的，是在南越国中属于边缘地区的广西盆地西部。如果这路汉军能够赶在沿灵渠——漓江而下的汉军之前，夺取苍梧这个地缘枢纽的话，倒是大功一件。可惜的是，由南越叛将所率领的那路水军，前进速度明显要更快一些。当然，这一路汉军也不必为此过

于懊恼，前面我们也说了，他们所执行的是“一石二鸟”的计划，将夜郎所属的贵州高原纳入帝国版图，才是此行的真正目的，而最终他们也做到了。

以一次战争之力开地千里，并收服了两个南方大国，算得上是大功一件了。比起发数十万大军两征南越的秦始皇，汉武帝应该感到满意了。然而如果让这位以武力著称的皇帝对战争结果进行评估的话，我估计他只会给自己打八十分。因为在战前的计划中，夜郎国并不是唯一准备执行“假途伐虢”之策的国家。帝国东南，南越东北的“闽越国”，同样是汉帝国希望一揽子解决的“外藩”。只是这个与中央之国有着密切地缘关系的越人王国，显然要比封闭“自大”的夜郎国，更了解那些中原人的想法。因为他们并没有接受帝国的征召，成为第六路大军。这也意味着，帝国在解决南越之后必须酝酿一场新的战争，来解决这个飞地般存在的边缘国家了。

第五节 瓯越国和南海国较早消失的原因

即使对中国历史没有任何了解的人，在看到吞并南越之后的汉朝地图，也一定会关注到在帝国的东南方向有一片临海之地的存在，是那么的不和谐。这片事实上已经完全被汉帝国所包围的土地，就是“闽越国”。关于闽越国的地缘结构，我们在秦帝国阶段已经详细分析过了。假如你想对应现在的行政区划来了解这个古国的话，那么能够和闽越国划上等号的就是福建省了。从地理结构上来看，福建是一个具有相当封闭性的板块，90%以上的土地为山地。无论是两千多年前的“越人”，还是现在的福建人，缺少可供大规模开发的耕地，都是所需要面对的最大问题。如果不是因为有面靠海洋这个地理优势的话，这个板块的地缘潜力并不会比同样为山地覆盖，缺少大平原的“贵州”更大。

海洋所给予福建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对外交流的渠道，对于板块内诸亚板块的交流也至关重要。因为与两广丘陵被一条珠江水系串联起来不同，福建的水系是由多条独流入海的河流共同组成的。这些独立水系在入海口处所形成的三角洲平原（主要有福州平原、莆田平原、泉州平原、漳州平原等），以及依附其上的福州、莆田、泉州、漳州等沿海城市，无疑是福建的地缘重心。如果没有海路将它们串联起来的话，彼此之间很难在两千多年前就结合在一起，成为一个统一的政治体。对比我们前面的分析对象——夜郎国来看，我们就会更清楚这一点了。虽然夜郎是贵州高原最大的王国，但并没有技术条件统一贵州全境。

从汉帝国的角度来说，征服像闽越、夜郎这样的山地之国，并不是很有价值。毕竟这些山地的人口、产出都十分有限，很难为帝国中央提供太多额外的资源。而反过来，征服它们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面对复杂的地形和强悍的土著部落，无论是攻击行动本身，还是维持对被占领地的统治，都足以让帝国在经济和精力上面临一场噩梦（想想强大的美国在阿富汗的遭遇）。更重要的是，东南、西南这些被

华夏视为“蛮夷”的边缘板块，并没有足够的机动性和欲望对中央之国构成威胁（游牧民族就不行了）。如果不是处在国力达到顶峰的话，这种可征可不征之地，往往只需纳入朝贡体系就足以让帝国的统治者满意了。

对于闽越国来说，不幸的是，空前强大的秦帝国迅速崩溃后，更为强大和有生命力的汉帝国又诞生了。在吞并南越国之后，仅仅是出于让帝国轮廓更完整的理由，汉帝国也不可能允许闽越国再保持独立状态了。事实上，在征服南越之前，汉帝国就曾经有机会先行征服闽越。如果那样的话，从闽越出发，沿海路攻击番禺的汉军，就很有可能抢得头功了。毕竟这条线路无论从距离还是运力来说，都是最经济的。

无论是先攻闽越，再取南越；还是反其道而行之，这两个百越王国的命运都是联系在一起的。不过按照板块划分，东南这片被合称为“东南丘陵”的沿海山地，最少还应该有一个独立王国的潜力。即除了福建沿海一带的“闽越”，以及两广丘陵的“南越”以外，浙江东南沿海的台州——温州一带，还有一个有条件保持独立状态的“瓯越”板块。由于越王族所控制的这片包括福建、浙南的沿海丘陵，也被称之为“东越”（与南越相对应），因此东越之地实际分布有闽越国和瓯越国两个王国。不过在汉帝国针对闽越的进攻计划中，我们并没有看到针对瓯越的部署。那么在汉帝国准备在吞并南越后，顺势解决闽越之时，这个在东越之地二分天下有其一的“瓯越”王国，又到哪里去了呢？

这是因为早在四十年前，这个越人王国就已经消失了。公元前138年，也就是汉武帝继位后的第三年，闽越对瓯越（史称“东海国”）发动了战争，试图成为整个东越之主。而无力抵抗的瓯越族只能向双方共同的宗主——汉帝国求助。对于闽越国这种擅自用武力，试图改变东越之地政治版图的做法，帝国有足够的理由进行干涉，尤其是闽越国所面对的是刚刚登上皇位，试图确立威信 of 汉武帝。因此，在瓯越国向帝国求援之后，汉帝国中央也迅速做出了反应。一场针对闽越国的战争，也拉开了序幕。

事实上，这并不是百越之地首次发生内部博弈。在汉帝国容忍整个东南丘陵地带依照自己的方式组建王国，并成为外藩之后，这片百越之地就没有太平过。单从秦以前的地缘格局来看，南越之地的地缘结构，显然要复杂得多，也更难统一。不过由于秦军的强势介入，南越板块反而一跃成为一个强大的统一体。反观东越之地，那些自认为都继承了勾践血统的王族子孙们，自退入浙闽丘陵之后，之间的争斗就没有停止过。这些越国王族之间到底经历了多少腥风血雨，抑或曾经分裂成为多少个互不隶属的王国，已经无从考证了。不过，依照历史的记载，以及浙闽丘陵的地理结构，闽越、瓯越两国应该是笑到最后的。

事实上，闽、瓯两国并不是被历史记录下来的，唯一的两个东越王国。在闽江、珠江流域之间，还存在两个特性明显，在中国的地方文化中占有一席之地的闽南、潮汕板块。由于地理相连，又与自己所在大板块的核心有明显的地理分割，这两个

拥有自己独立水系，又共同介于两广丘陵与浙闽丘陵相汇处的亚板块，之间的地缘联系甚至会更高。以至于在民间讨论重新分割中国省级行政区的方案时，有将它们从各自省份中剥离出来，重组一个新省的提法。

而其实，早在西汉之初，这一带就曾经出现过一个名叫“南海国”的东越王国。只不过，这个处在闽越、南越之间，地跨广东、福建，甚至延伸到江西境内的王国，注定是悲剧的命运。在汉帝国、南越国、闽越国的共同作用之下，总共只存在了二十年时间（公元前 195 年——公元前 174 年）。

历史记载，在灭亡南海国的战争中，汉帝国是发挥了主力作用的。无论是之前承认南海国，还是这次武力征服（理由是南海国反叛汉朝），都可以算得上是汉帝国对百越之地政治格局的介入。对于位于宗主之位的汉帝国来说，总是需要用各种手段来显示自己存在的。如果对南海国的小试牛刀取得了成功，那么汉帝国对征服整个百越之地的信心，就会增加许多。然而从最终的结果来看，战术上的胜利并没有带来战略上的扩张。因为当汉朝军队在其他越人王国的帮助下攻灭了南海国后，他们发现自己还没有足够的能力和精力经营这片土地。在汉帝国还没有解决北方压力，并且内部存在因削藩而引发的矛盾时，代表帝国攻取南越国的“淮南王”，并不愿意将资源浪费在这片高投入，低产出的山地上。

唯一有可能让失算的淮南王（他本来应该可以在胜利后，从扩张的地盘中获得稳定收益的）收回成本的方法，就是将南海国人民内迁了。前面我们也说了，在很多历史时期，因为战争所带来的人口消耗等原因，中央之国并不缺少等待开发的耕地。无论从利于管理，还是让南海国民产生更多“剩余价值”的角度来看，将他们迁入赣江流域都是一笔划算的买卖。至于南海国的土地，就只有留给闽越、南越两国去瓜分了。

这种放弃难以据守的土地，而将人口视为战利品强制迁移的做法，在古典时期是非常常见的。在我们所熟悉的三国故事中，诸葛亮在六出祁山攻击不利后，就曾经把数以万计的魏地之民尽数带回蜀国。而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了瓯越国的身上。只不过，那数以十万计的瓯越族人并不是作为“战利品”被迁入汉地，而是汉帝国以提供“避难所”的名义“请”进来的。

尽管摆在初登大宝的汉武帝面前的最大问题，仍然是来自匈奴的威胁，但能够在与匈奴决战之前，通过对闽越国的战争来检验一下国力，以及自己的控制力，也未尝不是好事。因此，汉帝国还是对攻击瓯越的闽越国采取了军事行动。为了保证这次出击能够成功，汉朝的军事家们为他提供了一条最可行的线路，即绕开那些复杂的山地，直接从海路南下，攻击闽越国沿海的重要据点，直至它的政治中心。从战术上说，这无疑是最佳的选择。然而这支南征的汉军，最终却并没有机会在战场上检验一下自己的海战能力。因为在他们到达闽越国之前，闽越国内部就已经发生了政变，并表示愿意听从帝国的管理。在这种情况下，帝国军队就面临了两难的选

择，是“开弓没有回头箭”，一鼓作气拿下闽越国，完全将东南沿海纳入帝国版图；还是见好就收，重新接受闽越国的臣服呢？

假如这时候，汉军在北方战线上已经取得了压倒性优势，那么帝国中央给这支南征汉军的命令，就很有可能是继续南下，以战争的方式将闽越国变成帝国的郡县。就好像当年韩信对齐国所做的那样。问题是，此时的汉武帝并非是因为对闽越国那片山地感兴趣而发动的战争。对于他来说，最大的目的是通过这场外战树立威信。因此在闽越国重新臣服之后，再耗费资源进行战争，就显得有些多余了。

当然，汉军既已出征，总是要有些战果的。于是发生在南海国身上的事情，同样也发生在瓯越国身上了（被内迁往江淮之地）。理由就是，如果瓯越国不内迁的话，汉帝国很难保证以后闽越国不会再次向北渗透。一边是虎视眈眈，随时有可能再次发动战争的闽越国；另一边是能够保护自己，并提供大片耕地的汉帝国。瓯越族人选择的余地并不大。除非他们有人认为有能力在闽越人的攻击下保持独立状态。只是他们要是真有能力做到的话，就不用向帝国请求帮助了。

其实瓯越国之所以难以抵抗闽越的入侵，与汉帝国也有直接的关系。因为从地缘关系上来看，与江东平原更为接近的瓯越，与汉帝国的关系要更近些。不过，这也意味着它更容易被汉帝国所渗透。在闽越国通过瓜分南海国而在东越王国中做大时，作为瓯越板块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台州地区，却已经成为汉帝国“会稽郡”的一部分。正是在这种此消彼长的情况下，胜利的天平开始倒向了闽越国。只是这种所谓的胜利，更多的是建立在汉帝国无暇南顾的情况下。当帝国在各条战线上都取得了胜利，并通过吞并“南越国”让闽越国成为一个孤岛时，它越地为王的梦想也就到头了。

在瓯越国因无力抵御闽越的入侵，被迫内迁之后，闽越国很自然地占据了瓯越之地，成为整个东越之主，并升级为“东越国”。只是当南越国灭亡之后，面临这样一个四面包围（包括海洋）的局面，东越国的灭亡没有任何悬念了。

第六节 汉帝国以四路大军攻灭闽越

公元前 111 年 8 月，南越国灭亡后仅仅半年时间，汉帝国便征发四路大军，发动了对闽越的战争。很显然，由会稽、南越两地海、陆并进，攻击东越国的沿海据点，是能最快结束战争的线路。在汉军的强大压力之下，战争只持续了四个月时间（还包括准备时间），便以东越国的投降而告终。

在最终如何处置“东越国”的问题上，帝国并没有特别的创新。对这块性价比超低的土地的征服，并不能给帝国带来特别的利益。除了将其国民内迁，以削弱土著居民的实力以外，帝国中央的统治者想不出有什么更好的办法来控制这片土地。这种做法也同样适用到了南越国的处理上。而这种大规模内迁人口，并放弃经营土

地（除了设置行政机构以外）的后果就是，一直到唐朝为止，整个东南沿海都基本处于未开发状态，或者说生产力出现了倒退（生活条件自然也就很艰苦了）。以至于在很长一段时间，中央之国只有强制把那些犯错的官员放逐至此，才能保证行政机构的正常运行。当然，任何形式的人口迁移都很难做到一网打尽，尤其是在东南沿海这样的丘陵地形中。对于帝国来说，也没有必要一定要做到完美。重点在于贵族阶层，以及最有可能成为不稳定因素的男性居民。所以直到今天为止，我们依然可以在东南沿海看到很多古越族所遗留下来的基因。

征服闽越国，并不是汉武帝所进行的最后一场扩张战争。实力达到顶峰的汉帝国，在扩张这个问题上，实际上是在重复秦帝国曾经的路线，即可占可不占的地方，都会去尝试占有。在今天看来，这些扩张行为通常会被视为是一种有远见、为子孙后代谋利的行为。不过以当时的情况来看，却是会透支国力的。然而人类社会的发展就是这样，能够掌握资源的统治者和精英阶层，总是会有意无意地加速一些事物的发展。只是这种加速，并不应该总是被归结为“大棋论”一类的战略布局罢了。

不管汉帝国最终扩张到了什么程度，取得了多少胜利，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匈奴问题的解决才是一切扩张得以发生的基础。所有这一切的扩张，都是在对匈奴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才有可能做到的。因此我们接下来的视线，又将回到北线，去看看在对百越之地的征服之前，中央之国的北方重心都发生了些什么。

后记

秦汉部分后二章与原贴的写作顺序略有调整，在原贴中，关于汉帝国异姓与同姓诸侯问题，汉帝国征南越和闽越，这两部分内容是在排在白登之围之后，现将之放在楚汉战争后面。因插在中间的主要是写匈奴之时蒙古高原的地缘结构，主要写的是地理层面的内容，倒也不至于影响对历史事件解读的连贯性。

秦汉、西域上册、西域下册，这三册的历史背景都是秦汉第一帝国时期。之所以作如此划分，是因为秦汉部分内容主要是关于秦汉之时中国核心区的历史解读，西域部分则主要是对亚洲大陆中部（西域）的解读（西域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指玉门关、阳关以西，葱岭即今帕米尔高原以东，巴尔喀什湖东、南及新疆广大地区。而广义的西域则是指凡是通过狭义西域所能到达的地区，包括亚洲中、西部地区等）。

二者之间关联度不在，秦汉部分的历史线比较明显（比如秦征南越、秦末起义、楚汉战争、汉征南越等）。西域部分则更多偏重于纯地理层面的解读，其中张骞通西域是串联起这部分内容中各板块的重要线索。关于这片干旱的地区的历史记录就比较少，多分布荒漠、草原、绿洲，地形以盆地、山脉、高原为主，气候、生产方式等与东部季风区都有明显的差异。

在西域下册的后半部分，主要对汉匈之战（汉武帝时期）的描写。在这部分，对历史事件的解读又成为重点所在。只是地理为经，历史为纬，汉匈之战涉及的地理单元较多（蒙古高原、北疆与南疆、中亚、河西走廊、河套平原等），只有了解了西域各板块的地理结构后，才能对这些历史事件有比较深刻的理解。

下面将这三册内容主要解读到的地理单元或历史事件列出：

秦汉：秦设三十六郡、秦收复河套、秦对闽越的管理、秦征南越、客家的分布区、秦末起义、楚汉战争、汉解决同姓与异姓诸侯问题、汉征南越。

西域上册：蒙古高原、陇西高原、河湟谷地、河西走廊、东疆、北疆、西疆、中亚、南俄草原、伊朗高原、兴都库什山脉、印度河平原。

西域下册：南疆、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克什米尔、汉匈之战（汉武帝时期）。